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к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機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俄羅 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海 古籍 出版 社

上

① 漢文部分

TK1-TK20

俄藏黑水城文獻①

上海 古籍 出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即

製

上

海

古

籍

印

刷

廠

ISBN 7-5325-2036-6 /Z·293 插頁 99 開本787×1092mm 1/8 印張 44.25 插頁 99

俄 藏黑水城文獻 1

出 版 上海 古籍 出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Ŀ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 古籍 出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即

製

上

海

古

籍

印

刷

廠

中國上海瑞金二路272號郵政編碼200020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92mm 1/8 印張 44.25 插頁 99 ISBN 7-5325-2036-6 /Z · 293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Филиал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1

Коллекции част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К1-ТК20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Академ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Китая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Шанхай 1996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①
Составител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Институ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АОН Китая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Издатель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Китай Шанхай ул. Жуйцзиньэр 272
Почтовый индекс 200020

Печать Шанхай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Институ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АОН Китая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Формат 787×1092mm 1/8 Печатный лист 44.25 Вкладка 99 Первое издание XII.1996г. Первая печать XII.1996г.

Перепечатка воспрещается ISBN 7-5325-2036-6 /Z · 293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he St.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Manuscripts
TK1-TK20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1996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Volume ①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72 Ruijin Second Road, Shanghai 200020, China)

Print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rinting Factory

©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8 mo 787×1092 mm 44.25 printed sheets 99 insets First Edition: December 1996 First Printing: December 1996 ISBN 7-5325-2036-6 /Z \cdot 293

蔣維崧

孟列夫

俄 方

魏同賢

E.N.克恰諾夫

主

俄

藏

黑水城文獻

編

魏同賢(中)史金波(中)

E.H.克恰諾夫(俄)

編輯委員會(按姓氏筆畫爲序)

中 方

毒李字白史鴻偉國金液音國章濱波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Главные редакторы Е.И.Кычанов Ши Цзинь-бо Вэй Тун-сянь

Редколлегия(Фамилии по алфавиту)

Е.И.Кычанов
Л.Н.Меньшиков
Бай Бинь
Вэй Тун-сянь
Ли Вэй-го
Ли Го-чжан
Не Хун-инь
Ши Цзинь-бо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Цзян Вэй-сун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Editors -in -Chief Shi Jinbo (on Chinese part) Wei Tongxian (on Chinese part) E.I. Kychanov (on Russian part)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Project Committee (in alphabetical order)

In China
Bai Bin
Li Guozhang
Li Weiguo
Nie Hongyin
Shi Jinbo
Wei Tongxian

In Russia E.I. Kychanov L.N. Menshikov

Executive Editor Jiang Weisong

攝 裝 責 幀 設 計 影 計 輯 本卷副主編 俄 藏 白 李 偉 嬪 國

黑 水 城 文 獻 1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①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этого тома Ли Вэй-го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главного редактора этого тома Бай Бинь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Цзян Вэй-сун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и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редактор
Янь Кэ-цинь
Фотограф
Янь Кэ-цинь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Volume ①

Editor-in-Chief for this Volume
Li Weiguo
Deputy Editor-in-Chief for this Volume
Bai Bin

Editor-in-Charge
Jiang Weisong
Cover Designer
Yan Keqin
Photographer
Yan Keqin

俄藏黑水城文獻總目録

前 言 E.N. 克恰諾夫

言 史金波

前

李偉國

言

前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漢文部分

西夏文世俗部分

西夏文佛教部分

1

Contents

Preface

E. I. Kychanov

Preface

Shi Jinbo

Preface

Li Weiguo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Manuscripts

Tangut Secular Manuscripts

Tangut Buddhist Manuscripts

E.M. 克恰諾夫

聖彼得堡所藏罕見的西夏文獻的發現, 成績應當屬于職業地理學家兼旅行家彼・ 庫・ 科兹洛夫

(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 1863.10.15—1935.9.26) »

洛 隊。 普爾熱瓦爾斯基中亞探險隊。1887 年,科兹洛夫在聖彼得堡軍事學校畢業,並被授予軍官銜。此後他參 年那是偏重數學和自然科學的中學)畢業,而在 1883—1885 年,還很年輕的科兹洛夫就參加了第四 夫此後的生活道路。後來科兹洛夫回憶道:「我永遠,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我大膽而坦誠地 下去。 加 (指普爾熱瓦爾斯基 (Н.М.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在這裏買了一座别墅。1882 年,科兹洛夫與普爾熱瓦爾斯基相遇, 了 博德市一家啤酒 這使他得到日後被委托獨立進行探險的鍛煉。他的第一次獨立探險是在 1899—1901 年實現的 科兹洛夫出生在斯摩稜斯克省杜霍夫申小镇一個牲畜販賣者的家庭。 1888 年别夫錯(М.В.Певцов)探險隊和 1893—1895 年羅博羅夫斯基(В.И.Роборовский) 」①在普爾熱瓦爾斯基的提攜下,科兹洛夫得以繼續自己的學業,並在斯摩稜斯克專科學校(當 廠當 -作者注)談了話,這一天決定了我整個一生的前程, 辦事員。恰巧一位當時就已出名的旅行家 和地理學家 他 在當地學校畢業後, 從此我便沿着這條路程走 普 爾 決定了科兹洛 熱 瓦 爾 就 探險 同 斯 在 屆 他 基 斯

埃 座廢城。 不爾海 似乎最先是旅行家兼民俗蒐集者波塔寧(『.H.ITorahuh)從土爾扈特蒙古人那裏得知黑水河口 哈拉 他曾在 1884—1885 年度旅行報告中寫道: 布留克(Эрхэ-хара-бурюк), 意指黑水極東部支流岸邊的黑城; 他們說, 那裏還可見到 他們(指土爾扈特人-作者注 説有 座古城叫 有

曾派 僅 無水 不大的 没 遣 有 告訴 他 城 **@ 1900** 垣 的 他這 同 伴卡贊科夫 即 年, 小 座 城 故 城 牆 地質學家奧布魯切夫(B.A.Oбручев)曾試圖找到 所 , 四 在 (A.H.Kasahkob) 前去尋找此城廢墟, 周 有許多沙埋 而 且 還把他引嚮了與黑城完全相 房屋遺迹。 挖開黄 沙就能 反的 都没有找到, 方嚮 找到 銀 0 這座沙埋 3 器 當 , 原因 年科 小 小 城 湿是 兹洛 城。 四 周 當 則 夫身在蒙古 樣 : 爲 地 流 的 蒙古 當 沙 地 , 附 居 也 民 近

古人搞好關 在 準備 係。 前 往蒙古 後來他寫道:「 一四川 考察時, 我內 小 科兹洛夫決定再去尋找。 抱着 個極美好的 幻想… 他考慮到前人所 在蒙古沙漠找到這 犯的錯誤 座 廢 城 決定同 當 地

對

廢

墟

情

況

秘

而

不宣

4

夫出 你 先 懷 是一次那樣平 沙皇尼古拉二 例 着 П.П.Семенов—Тяньшаньский) 一發前 蒙古 次 激 請 動 又得 的 因 求爲這次探險祝 爲裝備 心 四 到 一世的 凡 情]1] 離開 沙皇和皇位繼承人阿列克塞第二次召見 而 探險 探 召見, 又親切 沙 險隊 隊的 皇 一的。 福! 他在《蒙古 的召見(當時 還 行動 有 _ 當我最後對陛下 很 計 沙皇回答道:『 多事要做, 劃是 和 由 科兹洛夫積極參與下制定的。1907 四 , 帝 我把剛出版的三卷本西藏探險學術著作呈送給了 JIJ俄地 旅 要花很多時 . 説 : 『 行 理 我且不同你告别 日記》 學會 西藏探險進行得很成 在 留下了這樣一 間 著 0 名 地理學家兼旅 L 6 在你前去長途旅行出發之前 果然在 段話:「 功, 年6 1907 行 我受到 請允許 月 家謝 年 17 10 苗諾 H 了 我 月 依 光榮的召見 29 夫 照西 沙 科兹洛 皇 H 天 |藏 探險 夫 我 Щ 科 兹洛 還見 我 斯 得 是 基 的 到

十四四 這次 人, ⑦配以 探險計劃 武器: 是 10 步槍十二支,子彈一 月 2 日由沙皇批准的 萬五千發,施密特 0 探險爲期 兩 年 , 維松左輪手槍六支,子彈六百發 由 國 庫 撥款三萬盧 布。 探險 隊員規定爲

經蘭 持證 予 境 由 優 州 人爲 待 其 授予探險隊領導 隨 府 0 從十 我帝俄 及庫倫返回 特頒此 人陪 地理學會所遣科學探險隊隊長 照 同 以資 俄 人官憑文書如下: 國。 故 證 希 明 沿沿 隊長爲擲彈兵團 途所 並 加 經 蓋 地 或 方 ٦ 上 軍 璽 統帥 政 帝保佑: 0 當 外 0 亞歷 交部 局 該隊將 查 朕全俄皇 驗 Щ 副 放行 大三世近衛軍中 取道恰克圖經庫倫前 部長,1907 帝、 務令科兹洛夫及其隨從十員 專制 年 ∞ 校 君主尼古拉 月 彼・ 12 往 庫 中國西北 H 于 科兹 三世 聖 彼 洛 和蒙古 得 暢 夫, 仰 堡 通 全 遵 出 無 體 阻 然後· 聖 人 知 俄 口日 曉 途 並 或

簽字、印鑑」⑨

俄 國 政府和 沙皇本人之重視探險並 支持 地 理學會 的 創 議 多係此 類 探險結果獲得歐洲學術 界贊賞之

僅 能 是 力 學 此 故 很 一就 被 在 和 19 可 敦 歐 從 自 用于軍 能毁 煌 美 然科學 而大大提高了 世 和 和 紀末 而 黑 事 H 自 本對 水 不存的東西 至 城 的 植 20的 中 物 世 ?發掘 清朝 國 俄國學 紀 動 施 初 物學等 和保 政 加 因 府對 術界 政 英、 此哪怕是部分地得救,並得以保存到現在 治 存 此 的 而 德 領域 言, 經 無疑作出 國際威望 濟 法 壓 此對研 都 取得了令人矚 力的背景下進行的 俄 了一 0 究中國 但不能 定讓 瑞 典 步。 文化史乃至中國學 • 不公正 H 目 本 但 的 - 等國 是, 指 成 , 探 出 果 **%**險所 在 衆多探 [這些 對中華帝 俄國參與此 得當地 一探險 險 術 隊 國邊 顯然都是最寶貴的 時 地 間 形 項 在 Ë 測 疆 國 地 際性 過 從 理 量及情 事 學 將 學 此 近百 術 類 況報告 民 年 活 科學探 族 動 貢 的 今天 獻 尤 亦 爲 歷 險 那 可 史

||行 京 使 探 的 館曾將探險隊的 險 我 想特 探險隊 事 曾 别 寫 強 成 /道: 員 調 此 進 情況通知探險必經之路上的中國地方當局 ٦ 行 類探險 我們是通過俄國 調查都曾獲中 I 作 是曾得 國中央政 到中 駐博格多汗 或 $\overline{}$ 府允許並簽發護照。 清 朝) 的外交使館從北京政府得到護照的 中 -央政 權機構的 科兹洛夫就 同 意 並 1907-在 地 -1909方 當局 L 10 年蒙古 監 俄國 督 之下 四 北 進

邊境 前 進…… 專 大 員根克 此 探險隊行裝均專僱蒙民駱駝運送。」 在 前 (П.Е.Генк) 往 庫倫(烏蘭巴托) 及時與中國派駐蒙古的管理 的蒙古領土 12 上, 所租駱駝計四十 探險隊行 一當 局 進途中 接治 峰 都曾乘用 , 探險隊全體 蒙古 的 人員得 驛 馬 以 0 乘坐蒙古 ٦ 多 虧 恰 克

信 知 (Tyňuyň)經由拉卜楞至松潘廳的計劃 13 謹 探 1、險隊 地理學會檔案中現存一 通 知 並 如 非 下, 在 中國境內任 本人爲俄國 意行動 份「 [旅行 致甘 家中校科兹 0 例如 肅省外事局」 」母信的日期是1908 西 寧辦事 洛夫 的信中寫道: 大臣就曾及時得到有關科兹洛夫探險隊到 確 曾 與 年11 西 寧欽差 月 22 ٦ 兹接外 H 及通 事 判談 局 1908 判 有關 年 11 我 月 等從 15 來 H 的 通

和 協 助, 至于黑 當時他們管理着委付他們管理的領土 水 城 的 發現和 進 行 ?發掘 , 那 也 得到 , 爲清廷服務的蒙古王 那是清帝國 版圖內 經 爺巴登札薩克 由 理藩院特殊管轄的蒙古 和 土 爾扈 特 貝 勒 的 允許

間 王 П 爺巴登 1908便 而 問 且 孔薩 又可 年 3 您爲 少 克駐 月 /花精 初 什 多錫 力 麽 地 探險隊抵達草場天然地界烏果勒 和 0 消 定要走 當談話涉 耗 額 節 省開 濟納 及有關探險隊下 河 支 而 L 王 不 徑 爺 又 往 阿拉 補 津 步路 充説 善善 綫 托洛果 衙門? 時, ٦ 王爺得知科兹洛夫很想 直通 (Уголцзин-тологой) 看來你 呵 們 拉 對 善 額 的 道 濟 納 路 河 好 很 走 取 感興 道 即 還 額 趣 當 口 濟納 吧 地蒙古 少 花 河

納 密 槍 他 也 東 片 我 漸 您是 和 刻 回 的 西。 被 不 步槍 兩位 答巴 沙 會 掩埋 慢 怎 15) Улусун-туши-гуна 🗆 阻 顧問 你們 慢 麽 登 談 宴請 撓 扎 知 地 了 話 都「 道 你 就去看 説 薩克説 的 和 的? 們 結果就是這樣。1908 竭 留 他 7 發 科兹洛夫同他的先行者 | 聲機 力使我相信, 們 原 看 • 掘 吧, 説 我 來是這樣! 7 的 是 土 回答説 説不定你們自己也會找到什麽好東西。我看土 還有那 的 爾扈特人常去那座廢墟探掘埋 \smile 1 的 您 土 在 信 封請 我 説 爾 件 我要去的方嚮是没有路 是從我 的 聽手下 年3 扈 俄國駐北京使團 , 對 特 ٦ , 月 此 人 們的 那 人講 樣 舉將 12直 裏有 到 H 旅 , 是不 使 黑 最 科兹洛夫在給地理 行家寫 __ 他 水 座 近 可 從 轉請清廷 他 古 還 能 博格 藏 的 城 們 在 找到 的 書上 廢 的 去過 對 0 多 墟 財 黑 黑水城 L 汗 加 和 寶 , , 水 16 封 朝 我朋 確 很 , 和 巴登扎薩克爲「 學會 廷所 但 還 有一 有 的 通 是禮品幫了 聽說好像 意思 友的信 爾扈特人不會 往 得 秘 座 呵 薪 書 四 0 的 件 俸 拉 周 信中 于是 增 有 有 善 中 大忙 人 牆 得 加 衙 烏 寫 在 的 知 我 門 阻 魯 道 0 那 的 倍 城 的 擋你們 的 首先是左 孫 裏 市 對 道 起 話 找到過 L 路 置 初 不 17 王 去廢 人 加 由 施 王 過 爺 問 以 此 什 E 沉 道 墟 保 古 和 可 诼 麽 思

近… 貝 如 勒 後 來科 在 在 . 與 前 並許諾全力協助…… 兹洛 哥薩克布 往黑水城 夫 在 的 公開 里亞特農民巴德馬沙波夫談話 途中, 講 演 送到黑水城廢墟 第二位提供幫助者便是土爾扈特王爺, 中所説 他「 給了探 0 19 險隊很大的幫助 後, 土 爾扈特貝勒是直屬理藩 ٦ 交待 自己 的…… 即土 才有可能 爾 嚮 扈 導 院院 特貝勒 找到 把 的 探 黑水城 險 達 隊 希 帶 到 Даши 18 他 土 的 領 扈 地 特 正 附

L

見

没有他的協助,

,

于此 床 開 黑 左 Н.Я.Напалков 目 的 是土 始遇 鋪 水 0 的 方嚮 墊 乾 地 在 到 的 涸 高 夯 年 農耕 高 建築 低 河 我 進發。 們 的 臺 道 月 和定居文化 的 地 河 的 岸 巴塔「 特 \smile 激 上 兩 别是 側 情 • H 上 哥 矗 城 , 越 堡 從 沿 薩克伊 立 是 曾多次 探 着 途 的 西 前 高 險 北 可見寶塔 痕 顯 阿 漲 隊 萬 迹 然是農 爾 到 角 0 諾夫和馬塔耶 拞 泰 我們 矗 過黑水故 名 立 浩特 着 耕 _ 有 成 在 居 磨盤、 ω **員** : 兩座 組 民的文化 城 俄 (Алтан-Хото) 輪轂狀塔羣 里 L 科 夫, 或五 水渠 0 (1 兹 21) 不標志 谷地 俄 座 在嚮導巴塔 洛 由 里 夫、 , 探險隊營地 散落· 約 0 城堡 最 陶器、 是 2.5 切 在 由 後 爾 華 廢 的 通 諾 里 嚮沙 墟 陪同下,從托羅昂策 (Topoй-онцэ) 黑 瓷器碎片等等 座 到黑水約 主塔 夫 (A.A.Чернов) 水 0 作 傳 埋黑水的 城終于 者 和 説 注 建 守 有60-衛 在 出 \smile 處 黑水 古道 城 現 越 但 牆 了 65 過 是 外 城 , 里 越 此 的 , 面 條 最 接 城 騎 , 的 納 位 兵 乾 近 使 小 走 塔 于 就 我 朝 涸 爾 們 到 思 由 曾 的 科 組 駐 暮 半 古 感 大 粒 途 夫 想 興 成 河

就

趣

的

嚮

對 城 Œ 是城市過去的 固 的 面 城 整 的 方 牆 形, 在 越 城牆 個 都 東 迷 接 城 人人的 近古 高 有 邊長約 幾 達6 Ē 街 座 中 外 城 8 道 稜 稍 貌呈現 堡…… 偏北 俄 所 米, 里 見器 23) 0 在 城西北有 在 在 眼 過去建築物的殘址被流沙 \blacksquare 西城 東西 碎 前 片 0 Ē . 城 就 L 雄 牆各 中 22根 越多 偉的 則 據科兹洛 稍 有城門, 0 佛塔羣 城 偏 市 南 的 0 夫的 外有 輪廓 起自城門 牆 基厚 描 垃圾 Д 被 述 出 堆 4 - 6和 高 有 的 泥 兩條平行 ٦ 城牆是「 的 土 沙 米 形護城 所 É , 堆 逐 遮擋 東西南 的 漸 壓 , 主 以 住 嚮 防止 稍 要街道 7 上 高于 收 北 0 直 Œ 我們 縮 嚮 入城 東西嚮 地 , 座 高 爬 面 門 落 處厚 上 這 臺 穿過全城 0 , 顯 城 度 此 地 市 護 然表明 減半…… 構 城 便 見 成 兩 黑 兩 曾 各 堅 個 水 相

險 隊 成 員 在 . 首 次 探 察此 城 時 便 找 到 許 多陶 瓷器 碎 片 生 鐵 及 熟 鐵 銅 ` 銀 器 碎 片 瓦 片 錢

幣

紙幣

偶

爾還有祭祀

用

品品

作嚴 附 兹洛 遺址在 近 格 夫本人 探險隊 城 記 市 録 在 南 在日記中寫道: 25) 黑 城東半部 雖則 水城從 1908 科 兹洛夫在 B 塔在城中央東南 他 年4 和 城 他的手下 月 市平 H 面圖 逗 人「 留留 上 部 到 標 挖呀 13 出了 日 塔在城中央西 \vdash 刨呀 號 探 察和 ` 2 打碎呀, 號 發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學要求進行 **,** 4 南 角 號 折 遺 廟宇的 址 斷 呀 在 北 遺 都幹 城 址位 南 Ï 北 于 中 西部城 軸 24) 綫 對 偏 牆 發掘品 東 南 正 ယ 如 號 未 科

根據各種追述,發現物品計有

在 μ 號 遺 址 有「 畫 在 麻布 Ė 的 小 佛 像 L ٦ 粗 糙 的 金 屬 小 碗 和 西 夏文字手抄 本 殘

在 在 ω D 號遺 塔 址 有 有「 三本西夏文書本和三十本西夏文簿册 波斯文名著《 七智者》 故 事 集殘葉 ᆫ ` 張 麻布畫像『 伊 斯蘭教經寫本 阿彌陀佛顯靈 和藝 術裝幀 張

中 或 日絹畫 在 W 像 塔 • 有 ٦ 個美麗的帶笑容的 幾隻泥塑像脱落下來的透明眼球」 大型 面具和許多頭像 ٦ 幾隻磨製精細的水晶或茶晶 面 具 ` 個灰色頭髮的 眼 佛 球 頭 ` ٦ 個

平面型的大擦擦」。⑳

等 大 有 收 在總結第一 們 獲 所 搜集到的考古材料 有 書 次于黑水城逗留 籍 信 函 紙 , 張 爲數達 10 的 情 金屬 況 時 錢 個 幣 科兹洛夫指出 俄擔箱 婦 女飾 (1 物 俄擔合16 某 ٦ 些家 探險隊在黑水城廢 用器 公斤 具 和 H 作者注 常 用 墟度過幾天 具 殘 , 件 準 備 和 佛 運 交俄 總 事 的 用 國 品 説 等 來 地

堡 理 一學會 , 並 通 報 27) ¬ 有關 我們利用了土 發現黑水城及在該地發掘的情況, 爾扈特貝勒對探險隊的友好態度 還附送了文字和聖像樣品 , 立即通過蒙古 郵 以 驛分批 便 盡 快研 經 庫倫 究 運 和 作 往 出 彼

定

年 12 他 此 或 紀存在的 他 的 歷 辨認了 在 回 成果。 探險第三階段將「 信。 1908 史古城 月 23 西夏國 我寄到 據認此 他在日記中寫道:「 年 H 12 寫給倫敦皇家地理學會秘書的一件信稿爲證。 月, 彼得堡 弄到更多的貴重文物, 都……閣下收到此信時, 地乃是11-14世紀的西夏國都, 科兹洛夫在草地邊界歸都 比 的文字文獻材料 以前花費更長時間在黑水故城再次發掘。 格利戈利耶夫以地理學會副會長的身份通 以補充業已部分地運抵彼得堡的 我將已在前 據此趕忙爲我祝賀, 收到了 看來地理學會對此次發現非常滿意, 地理學會副 往蒙古南部 科兹洛夫在信中通報英國皇家地理學會 説我所發現的黑水城乃是11 會長 的 現已收到俄國 途中 格 知 利戈 發掘物 我 再過兩 利 耶 0 個 地理學會副會長來信 談到我 夫(A.B.Григорьев L 29 月 H 左右即 記所述還有 1908 並 在黑水城的 決定要我 世紀到 可 抵 達 我 記説 重 I 所 作 世

其中 夏國 流 西夏文文獻中, 國 放 都 **炒地。** 乃 便 我對 都 是 有 0 我的 早在 此城毁于中國明朝與蒙古人 1374 年之戰 寧夏城即今銀川市 關于西夏歷史的大量中國史材料俄譯文。由此完全可以 祖國同行們懷着深深的敬意,但我至今還不明白, 1833 我們從西夏原始史料了解到, 年 , 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 0 遺憾的是,這種誤解繼續存在于與科兹洛夫的名字有聯繫的 黑水城不僅不是西夏首都, 即 蒙古人曾想恢復他們已經失去了的中國統治權 雅金夫神 甫 是誰 看出 (о. Иакинф 和爲什麽説科兹洛夫「 , 在科兹洛夫當 而且是個三等城市) (31) 的 時 Ē , 著就已 文獻 人 找 們 是罪 到 認 中 爲 問 了 0 犯 32 世 西 的 夏 西

嚮

往

的

西夏廢

墟

(30)

從廢 А.И.Иванов) 城 所 年 出寫本除 10 月 15 和 漢文外 科特維奇(H 在 地理學會專門 還有 B.JI.KOTBИЧ) 三人作了 種用某一 組織的座談會 未知語言書寫的抄本 上 有關初步研究黑水城出土物的報告。 , 聽取奧登堡 至少是誰也 (С.Ф.Ольденбург 不懂 這種語言 $\overline{}$ 報告說 伊 盡 管文 鳳 閣 到

四 ፲ 利戈 而 應返回 利耶 戈壁沙漠繼續調查研究黑水古城深部 夫通 知科兹洛夫 ; ¬ 鑒于完整發掘的 重 要不惜 一要性 人力 地理學會授權我嚮你 物 力和 時間 從事 提 進 出 建議 步 一發掘 不要深入 字樣品是已經知

道

的

L

33

城 作 中 寫 保 0 道: 35) 在 距 6 年 離 月 我 OT 西 Ē 4 月 城 在 日 : 底 城門 寫…… 6 ٦ 月 晨 和 初 10 西 時間是五 北角的佛塔不遠處架起了我們的帳篷 時, 科兹洛 透過塵霧 點鐘 夫執行 已感天氣炎熱 地 我們終于看見了熟悉的黑水城灰牆, 理學 會 的 要求 不禁想到 , 口 到了 在淒 36 黑 水 涼 城 地 死 品 寂 0 半 的黑水 OT 小時後 月 27 城 我 H 我們 們 將 他 即 如 在 進 何 H 記 \mathcal{I}

L

我 係 即 土 從 城 地 們 牆 在 理 事 沙漠 學 運送河水 他 較 距 運 没 會 仍 離 有土 近 水 的 黑 探險 秘 然是額 水城 爾 運 書 和 糧 棟 的 扈特貝勒的 , Щ 等。 信中 濟 大屋 12 衹 羊 納河 有當地土 俄里處 特别 因 遺 此 的 址 38 這 頭 提 協 的 流 到這 座 助 近旁 爾扈特貝勒對我們持友好態度才能進行, 過 死城又暫且 , 0 種協助: 要對此城進行大規模探查是不可 0 此次 他 L 答應協助 37) , 他在· 我們的營地没有像上次那樣設 復活 ٦ 在 書 僱 , 炎熱的季節相當長期地耽在 中 還同 用挖土 寫道: 額濟納的 的 Ï 我們 人 住 重 我們 民建 能 新 的 開 還僱 立了 他使我們有 始了 在 科 城堡中 ,聯繫 用 中亞這一 兹 同 土 洛 土 爾 0 夫 爾扈 扈特 央 最靠 在 至今不 可能在其屬 1909 特 而是 人 近 每 的 貝 勒 ·爲人 年 天從 設 額 的 在 濟 7 下僱 知 距 納 額 愉 月 離 濟 河 的 快 ∞ 納 的 西 東 I 角 H 爲 關 支 挖 落 城 致

黑水 城「了 土 爾 扈特 解俄國 貝 勒 人 本人 在 廢墟生活如何 作爲地 方政 權 L 的 0 代表, 39 對探險隊 的 Ï 作 也 並 未不 加 注 意 他經常 派 遣 下 - 屬 官

前

來

0

Ĺ

哥 中 官 子 文 - 央高 薩 衙 找不到金屬 克 • L 于 布里亞 沿 紙 大建築直 北 幣 I 可 作 以 特 飾 説, 西 容 的 帶 開 物了。 通 器 • 領 東門 始 南 我們上次探 三方 舊兵器等。 站 科兹洛 ٦ 0 中 城 在 在 城牆 黑水城幾條街 牆 ·央高· 布 查 夫在 置祈 E 黑水城至少從外 大建築處有縱横街道通過 還找到 面 日記中這樣寫道 禱場 可 以 道範 所 看出 個 和 金 佛 圍內系統 屬 塔· 這座城市曾是多麽美麗 表部分是相 小 : 佛 ٦ 像 從第 地 東 南 調查房屋廢 , 0 當正規 發現 角 ᆫ _ 天起 40 則是馬廐 工作是分 的 本 , 流墟, 我們 , 用金粉 現在 和 , 就 有 守 布局又多麽合宜。 兩組進行 時 再也找不到 找到了文字資料(大多是 衛部隊 寫成 也 在 華美的 的 我 們 • 僱 銅 指定的 主 金 來的 一要的 元 字 西 藏 北 串 地 街 文 古 方 地 珠 道 區 小 挖 經 了 人 由 過 漢 册 是

市 平 面 據 啚 日記 上 我 判 視想這 斷 可 科兹洛夫 能 是因爲科兹洛夫衹認得藏文却 本 人 並未 正規參 加 發掘 因 礻 能 此 辨别漢字 甚至連 很 和 有 西夏字 意義 0 的 在 發 現 他 看 物 來 也 不 那都 曾 登 是 記 在 中 城 深

井

另

組

由

俄

羅斯

人

組

成

,

既

在城

內

發掘

也

在城外遠近各處踏勘

L

41)

或 [貨

中 本 越 方…… 服 大了 和 國 的 鞋子 出 但 多斯托耶夫斯 月 王 我不懂寫的 問 , 物 9 問 我 H 彼 ᆫ 也 有價 43 特 出)涼風· ٦ 爾 去發掘 現已 是什 基 我 值的藏文文獻是被火燒毀了的, 有 們 將 時帶雨 就 麽 近四 會 0 聽 更使我感興趣的是藏文寫本和書本, 知 到工人們 點, 的 道 季節過去了 0 工人們 □ ④ 先前 的 説話 來到 , 他認爲這裏没有墓葬 聲 我處 天氣已經炎熱 和 鎬 從保存完好的字母符號 , 頭 我同 刨 地 他 聲 0 們談了 6 很 月 , 6 難 不過暫 12 坐 話 月11 在 H , 帳 現在他 且 , 篷 科 H 看 還 裏…… 他 兹洛夫寫了 没有發現。 們 又 這可能 補 出 經常 去工 充説 來自 一作了 發現 今天又 封 西藏 的 信給 没 0 興 有 以 得 是 一發現、 漢 趣 地 外 到 越 理 的 文 寫 批 衣 地 來

安德列 安德列耶維奇閣下一

(А.А.Достоевский

會

則 的古 我 墟 上 晚 話 畫 臺 們 Ē 都 地 你 9 題總離 一駐紮 附 物 來我 時 上 當作廢 熱浪揚起的 炎熱炙 月 着 作過氣象 , 0 這次 22 不開 我們 往 在粘土上 我 物扔 人會使我 H I 發現 們 黑 我們又收集到許 6 塵 觀 水 一具叮 掉 離 測 開 沙令人窒息 城 的 月 們難 座很 當作 這裏 東 後 要想取得是不可 , ω 西 H , 晚上談 我們就 有 響 以忍受。 , 年 意思的 依然原封未動 • 塵 0 的是過 多文字 來,還没有 作者注 但是一早一 土 趕緊睡覺, 飛揚 就在陰涼處空氣也要烤到攝氏37 小 能的 去的 廟 材料 在 , , 人 任 , 空氣中 0 0 探險隊已 晚 早晨天剛亮就 П 同 何 不過是阿拉 天找到了 不僅我的 人到 處有幾尊彩繪泥 上次一 我們倒還輕松 0 過去的 此光顧 抵 樣, 什 伙伴, 達 伯 麽 黑 文材 這一次探險隊一 醒 , , 水城 遺址 早上 周 就是當地土著也都對發掘 , 自在 像 料 我 趁天氣比較涼爽工作 , 談的是要去找什 和 們又得到許多像以前 看來還同 , 在 錢幣, 牆上還有好看的壁 度多, 自感還可繼續在黑水城工作 其歷 史性 我們 還 到 地 有祭 面被太陽烤灼竟達 城牆之內令人感興 走時 黑水城就顯得 麽 祀 用 0 時間 樣保 白 品等 很 畫 運 交地 感興 天 0 過得 持 我 遺 0 們 趣 復活 原 憾 理學會 在 很 狀 休 的 城 60 趣 我 北 息 快 是 了 度 上 們 距 那 的 壁 處 人 離 以 否 每 樣 次 廢 的

. 城 能 沒得手 是由 牆 約 于白天 于年 400 那 深 米 在 很 H 廢 可 能 久 墟發掘 位于乾河床 科學界就不會像現在 也 可 所 能是獵 得 不 右岸的大佛塔。 豐 人探寶所致 , 不 如 這樣 所 望 擁 , 此塔高約 有這此 ᆫ 科兹洛 這就是説 一畫像 夫便派 10 米 雕 以 人 塑 包 前當 前 品 括 往 \neg 地 城 書籍等特藏了 基 居民 郊調 座 查, 也似曾嘗 中 腰 最後決定 和 半塌 試 打 開 打 的 開 佛 錐 頂

座

如

頂

塌

他

可

西

在 小 確 混 于不懂 明此塔藏有衆多佛像 伙 H 幅很. 邊分 伴 的 亂 本 起 取 H , 月 有 以 走 古老的曼陀羅 出 記 語言, 類 0 12 的 致今 去 的 中 Ĺ 裝 是僅 **龜發掘佛塔** 準 有 H 訂 這種按開本大小或者按某種我們尚不知曉的標志而進行 備 H 他 所 開 包 僅 記 尚 們 始 有的 裝 勘 無 載 發 半。 法 和 0 0 查 掘 的 套裝, 可 同 了 漢文材料。 ٦ 理清。 佛 工作 去年 塔的上部已完全清 以設想 幾 塔 今天我信步 座 , 進行 有的分册, 發掘的那 位 那 科兹洛夫本人没 于城 是 了九天,6 塔頂已毁, 將近早晨九點送到營地好多文物, 座 西 走到塔 座 預計 200 有 佛塔 的 出 俄丈 有 前 月 成 壓倒 大量 有經常注 20卷 樣 四周擺 1 去看 日結束。 了佛像 西西 , 夏文 這座塔裏也有各種書籍 俄丈合 2.134 I 所剩 46 着 意佛塔發掘。 泥 和 古物是否還 書籍是用 木坐佛像, 或者這此 漢文書 米 籍 的「 大帆 一佛像原 于是我立即前 的 關于 多 中央放着書籍和 佛 譯者 分類」 布 塔 塔內布 結果發現我 包裝運到營 先就同 • 注 簿册 ٦ , 我)處大塔之一 置 在 統過 書 去, 狀 卷本 籍、 相當程度上 況 的 文卷 地 蒙古 邊除 進行 手卷 和 伙 僅 計 畫 I 們 在 像 去 分 人 和 説 有 産 類 勘 嚮 書 灰 月 大本 還 生 我 得 像 塵 查 由 有 表 E 扔 的

傳 得 在 堆 量 堆 雜 堆 得 其 放 亂 在 | 亂 一西夏 遍世 中 べ着 極其 地 無 七 如 果 的 文字 章 板 界 7 八 塑像 有 雜 糟 我 上, 的時候, 的 寫 座 們 亂 底 層 比 也是這樣 本在做 有二千多本 著名的 時 本本緊疊 才稍 較 在 而説放 寶 一 下 真 佛塔 庫 八正的 法 有 事 的 秩 得井然有序 6 衹在塔底 底層 在 序 月 , 世界聲譽也降臨科兹洛夫。 ; ; 裏面裝滿了寶 那些寫 12 **47**) 起 才見出有些條 H 在《蒙古、 這座著名佛塔中搜集到 和 本數 有的 才見有些書本是用綢布細心包好的 0 6 後來當發現「 月 壓 以 15 物。 在 百 安多和黑水故城 7理: 計 H 另用木軸卷着 剛 的 堆疊 H 部分泥 揭開 我 着 記 在中亞 , 0 他在自己的回憶録中甚至又稱 就 塑像擺在同一 的 上 L |層, 的 所 ٦ 可 畫 有寶物: 越往上 獨立工作得到 發 _. 像 現 就發現 書中, Ĺ 隨 走 , 0 書籍 高 成 着 無論書或 , 科兹洛夫又強調 塔 度 發 百成千綢布封 裏的 珍 掘 変質し 佛像 面 的 る畫像 朝 東 進 的 西 內 展 塑 都 就 部 消 道塔中 皮的 放 科 越 像及其他 息 得 就 説 兹 亂 像喇 洛 如 書整整 很零亂 秩序 上 他 書 夫 嘛朝 [籍零 層 本 物 時 一齊齊 極 人 而 切 所 包 亂 着 説 好 大 都 地 地 扔

米 月 即 Ħ H 12 設 的 想 平 H 記 方米左右 説 中寫道 亂 七 八 糟 佛像放 是儲藏室, 或說井然 在 它的 有 塔內墊高 序都是 四 周 的 真 坐着 實 地 板 的 Ě \bot 0 泥 塔 在 的 木 平 佛 底 臺 像 層 面 0 的 佛 科兹洛夫説是「 像前 四 周 擺 平 放 ·臺中 書 籍 央有 地 以供 面 根 誦 , 立 讀 面 柱 積 約 他 ယ 在 X 4 塔 6

裏 H 底 鮮 栩 的 四 艷 日 周 栩 如 牆 記又寫道 上 令人驚嘆不 生…… 一掛着 從 神像 : 面 E 我邊寫邊欣賞這些佛像優美的頭 部 0 塑 0 可 像 用科兹洛夫的話説: 以 的 看 尺 出 碼 雕 則與真人一 塑家對古典美有 般 ٦ 大 全都泛着柔和的淡藍色和粉紅色 小 部 很高 0 據科兹洛夫説 , 其中 的 修養 有些頭像製作 50 , 塔裏取 這是一 得 件 出 如 此 的 的 極 光彩 神 藝 好 像 術 的 藝 0 瞧着 形 術 L 象 但 品品 生動 是 站 6 稍 <u>7</u> 月 在 微 19 色 那

夕 是原來就 但 文字文獻的主要部分, 這些 以 東西 放 設想在塔的 在塔 便 內的 從 城 裏 0 上 的廟 從科兹洛夫的 層 顯然是出自「著名的佛塔」 宇或可 書籍 和 能 畫 記録看來, 還從管理 像、 塑像等 部 門 盡管打開 可能是亂 運 藏到塔 的是 放 中 兩 的 0 座 0 如 佛塔 顯然是在 此 大 量 , 盡管在城區 的 佛 1226教 文獻 年春季蒙古 都 及其 發現文字文獻 他 文 人 獻 攻 未 人 前 必

碰

便

掉

顔

色……

子) 我們 邊 分 發現了 日 量 即 將 所 藏 , 又被他 做 人 內 留 12然後填了沙 看到: 月 相 的 下 南城牆 公斤以 19 當 報告的 座 的 齊整 理在 壁 寶物從這間屋子(H 今天把送到 龕 上 的 但在 沙裏。 速記記録 中 科兹洛夫在 東西 以備日後有機會再來。 0 我們 1926作者注) 關于所埋的地點, , 主要是塑像和頭像藝術品 營地 在 年科兹洛夫再訪黑水城時 我們發現有下述記載: 此放了 日記 在南 來的 及其他物品, 裏寫道: 所 部 些 有古物 城 牆 藝 科兹洛夫的日記裏留下了下列記載: L 發現之物「 術水平高低不等的佛 50看來, 還放了許多小物 即佛塔發現品 作者注) ٦ 東西是藏在南部城牆。 , 我們 本想全部帶走 53 也可能運走 運出 以 作 爲這一 品品 了 , 藏在走下城堡 挑 像。 總數約有五十件左右 選 次什 一部分。 和 , 還放了 埋 但 麽也找不 藏 是不 在 , 從科兹洛夫 1926 6 運 可 些 ٦ 月 到城 座佛 能 到 一頭 在離開黑 11 , 像 塔 牆 L 但 -23的 他 總 南 部 南 日 無 的 水 超這此 重 部 法 來說 的 城之前 30 年 牆 城 H 運 12 三東 多 裏 記 走 俄 的 西 中 還 的 的 月 是 我 盡 磅 屋 旁 部 ∞

可 是至今没有 不過, 南城牆 找 到 以 0 外埋藏的東西 中 國考古學家最. , 好在 看來是在城牆脚 南城 牆 再事 ·探查 下, 和 首先是那 發掘 座 原 來放 在 佛塔最 裏邊 的 華 美

得堡 他 們 分 臉 上邊我們說過 朝塔 所 收 內 藏 的 , 好像 經 書 , 在 喇 嘛 發掘佛塔時 在 大頁紙 做 法 寫 事 本 0 , 發現塔底平臺中 他 們 頁 面 頁 前 放 相 疊 着 書本 ·央有 其形式與印 0 顯 根木質 然這些書本就 度和 立 西 柱 藏廣泛流 是俄 周 韋 國科學 端 行 坐 者 着 院 和 東方 樣 尚 研 靠 塔的 究 所 塑 聖 像 北 牆 彼

學 來尺寸 年 發 懷 座 疑 約 旁 現 0 研 究 語 40 ·不大 所 根 副 佛 歲, 據牙齒 像 光 取 (而臉 坐 可 明 都 屬于 能 者」 姿 面 得 失踪于 和 形 的 嚮 ·西藏 出 之義 齊 頭骨骨縫狀況 人 中 Ē 下 骨 央 列寧 列結論: 架 呵 使 用 0 格 利 格 人覺得 科 于稱 根 安 勒 兹洛 則 被圍 ٦ 呼活 朝 蒙古人種 頭骨 可 頭骨屬于女性 夫 南 的 在 以 佛 年代 保 推斷 H 存完好 記 54) 或 這具 裏 死者年近老齡(五十多歲) 至少本 類型。 譯者注 寫 道 , 頭骨 盡 顱 格 文作者想再研 底較 管眉弓對 帶 根葬在北 , 終于發 到 此 窄 7 塔原爲紀念他 俄 枕骨發育不 現了 女人頭骨 或 牆前 究 經 而 正 坐 過 不 位 者 來說似發育 0 仔 知 良 , 而 的 所 細 取 建 **(55)** 頭 研 頭骨 在 牙齒 坐 顱 究 式 從 0 曾保 過 頭 , 很 此 分分 在 骨 人 細 人 類學 存 主 小 可 可 , 要 在 可 以 能 的 家 科學院 能 臉 看 是 沃 引 骨 大 出 起 位 爾 佛 某 科 像 死 民 般 格 此 者 説 夫 臺 根

1211這 有 新 后 夏 統 某些 籍 設 治 流 . 宗 在 1205 年蒙古人第 孟 年 一資 傳 想 者 列 在位 (1139-到 料. 在 夫(今天, 孟 她不無參與的 Л.Н.Меньшиков 列 篡奪 -1193使 夫又作 我們 人設 政 權 年 應該感謝這位女人 出 想 0 在位) 情 孟 次攻 個 況下登上了 她當了 列夫教授根 重大結論: 皇 人西 $\overline{}$ 帝 教授曾提 尼姑, 夏領土時 的 遺 皇 據葬 孀 位 被 出 0 著名的 者可 發配到黑水 **5**7 羅氏 此 純祐 個 後 ,能是 皇 很 她便 佛 在其母不無參與的情況下被其堂兄弟安全(1206 浪漫 塔 后 女性便認 裏 被擯斥于國 城, 在 的 面 其子純祐執 假設: 的 死後就葬 書籍 爲: 塔裏葬的是西 是她 事 之外 在 可 政 的 那 以 (1194-座 不 私 人藏 她後來 必 7 懷疑 著名的 -1205品品 夏皇后 的 她兒子 L 命 佛 年) 羅 運 塔 黑 不 氏 時 得 被 水 曾 城 此 而 推 是 出 知 翻 人 皇 是 後 根 土 但 太 的 據 西

況 后 新 而 籍 籍 定是 這 屬 進 男 行 是 都 那 中 孟 就 性 全 有 可 僅 列 夫的 國 水 能 可 兩 0 后 平 科 流 以 見 不 是 設想 的 假 或 兹洛 通 别 説 她 都 的 人 是 類學鑒 是 的 夫 的 皇帝 部 私 作 最 根 爲 個 人 分 據 初 序 藏 施 書 定 很 也 印 贈者 籍 跋 書 同 有見地的 發. 意是 確切認定這具 的 可 書籍者 能 標 而 而署名 準 屬 是 是 説 她 出 于 推 的 ·男 測 法 所 自 的 性 分 她 送的 私 是 頭骨 但 的 0 僅 如果 次 私 散 書 在 不 人 此 圖 塔 屬 施 書 而 女性 就 書 中 跋 已 官 像 館 確 0 民 , 是 不 别 葬 我們 過 次是 不過要指 的 的 要駁 皇帝 __ 在 個 看 嚴 書 得 倒 格 女 和 Ë 出 出 它, 説 施 人 來 主 加 點 : 又暫 沃爾 衹 蓋 施 這 書 有 了 羅 類 施 科 找 且 夫對 皇 書 樣 贈 假 回 印 后 設 籍 佛 對 的 此 塔 章 這 的 出 此 存 名字在 是有此 個 有 女 在 土 並 很 無 X 的 一懷 多記 論 西 就 不 頭 哪 夏文 是 意 疑 骨 味 羅 載 的 種 的 皇 情 重

告别 發現它 科兹洛夫 大 有了 的 運出了一個保存完好的 座著名佛塔提供了多麽巨大的 拜訪 信 注 准 在 噶 發現, 中 探 (1190 1、險 比 寫 1926 爾 , 陪 道 第 良 隊 發現了 種 同 即 年的西夏字典 年 次前 馬 前 ٦ 將 12 來的 在 離 開 我很 月 探險隊 一本字典 來考察時更多。 是 黑 ∞ 圖 H 高 他 水 興能 的 城 的 書館, 即將上 ^ 之前 掌 公衆講演速記稿中可 繼承人 , 財富 能幫助 中珠 嚮這位蒙古王爺親自 路 計有二萬四千卷, • 當 土 L , \forall 我們 天, ∞ 關于從 爾 位十三、 扈 (59) 夏 看懂 特 作 天的 貝 者注 勒 ٦ 700 著名的佛塔」 朝霞 四 曾 以了解:「 卷書 「歲漂 道謝 就高 來 在 到 東方 古 我還記得漢學家伊 亮可愛的 聲 0 城 是他又一 如果再 喊 剛剛 十七年前 廢 叫 中 墟 : 發現和 男 加 ٦ 映 , 次爲 孩, 上 537 彼得 紅 隨 曾 即 時 位 從 黑· 運出 我們提供了 還有 科兹洛 , 土 幅 鳳閣興高采烈的 庫 的 兹米 水 全體 爾扈 畫 物品 夫就 城 , 奇 廢 屬 特 官, ! 貝勒 寫信 墟 大 考察黑 那 運 概 在 麽就 他們 出 數 就來 您 給 的 樣 四 量 水 地 城 到 會 子 十 都 占 理 我 的 騎 這 學 明 書 駝 裏作 們 着 白 他 幫 館 會 駱 裏 從 助 高 秘

閣 城 我 佛 個 發現一本字典, 奥登堡説 1909 教祭祀用品 人傾嚮 年秋 于存放 及書籍展覽。1910年末, 全部黑水城材料現暫放地理學會頂 在 使得有可 水城出土物運抵彼得 科學院 亞 能解讀饒有興趣的西夏文字…… 洲 博 物 館 堡 想您也 考慮 存放在 到 有同感 探險所得 層 地 的 理學會。1910 空房內 對嗎? 獨 問題是黑 0 無二的 L 伊 60 鳳閣 年初 水城材料將存何 文物 和科特維奇 安排 在 地 , 理學會舉辦 科兹洛夫從莫斯 Ě 在 處尚未得 進 行 7 整 到 理 次 解 科 1寫信 伊 黑 鳳 水 那

ᆫ

院 東方 然 研 究所 事 聖彼得堡 情 最 後就這樣 分 所 做 前 身 Ţ 0 0 全部書 而 畫 像 籍和文字文獻都轉交給科學院 雕塑品和物質文化遺存, 起初是交給俄 亞 洲 博 物 館 國 博物館 即 現 在 民 的 族 俄 學 國 科 學

後

來轉給了國家艾爾米塔什博物

館

閣 中 發 海 編 現 戦争年 了 7 就曾提 亞 ω 洲 西 部 代 夏詳 博 分類字典 未能 到 物 收録三千 館 解 面 的 詞 <u>,</u> 世 典 西夏文文獻最 個 · 1935 《音同 没有書名) 西夏文聲類(西夏文字 年 2 ` 初是 的 月 ° 文海 詞 唇音 9 **61**) . 典(由 H 所 伊 , 指的 西 鳳 和其他分類字典 伊 齒音、 夏 閣 鳳 就是《音同 閣 教 授 漢 致 舌尖音) 從 函 俄詞 事 呵 整 列 典? 理 克謝耶 字典, 歸 伊 類 鳳 文海》 夫(, 0 閣 無詳解。2 交給科學院 除字 在 В.М.Алексеев 1918和 典 ^ ^ 雜字》 年發表 番 漢 漢 出 合時 文《 版 等字典, 的 社 出 廣 掌 ^ 西 版 韻 中 夏 П 珠 1918型字 遺憾 但 文 人獻 外 因 年 典 的 處 \forall _ 伊 他 ^ 在 聶 文 文 或 鳳 還

家奥登堡 被 有 歷 逮 收 Щ 捕 稿 不 丢 知道我的手稿 和 失的 退 一稿 標 0 記 除 的 伊 鳳 手 , 從 1919 閣 稿 外 還 在 最早從事黑水城文獻整理者還有蒙古學家兼滿學家科特維奇 我處 年到 0 1922ᆫ 既然 年,就放在科學院 詞 典手 稿一 直 在 伊 我 鳳閣手中 取回 此 稿時, 看 來 就決定不再寫什麽了 是在他于 1937 , ⑫以及佛 -夏季

夫專著, 來, 64) 黑 關于西夏文獻的 水城文獻的 研 研 究和 究, 出版是漢文和西夏文分開 則見各年多種出 版 物 進行 的 0 關 于漢文文獻研究的 歷 史 請 見 孟 列

Н.А.Невский) А.П.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 在 伊 鳳 閣 之 後 戈 不 爾 同 巴 時)、克平 (K.Б.Кепинг) 喬 期 娃 從 (З.И.Горбачева 事 西 夏 文 獻 研 ` ` , 究 本文作者現已完成所藏佛教文獻部分叙録 者 克 有 恰 龍 諾 果 夫、 夫 捷 А.А.Драгунов 林 季 耶 夫 卡 坦 聶 斯 歷 基 山

無二的材 隨 着上海古籍出版社將黑水城文獻付諸出版, 料 毫無疑 問, 這些材料能對中國文化及中國文化在西夏國的存 中國 和世界學術界將有可能 在 利用 11 以 及對消逝的西夏 至 14 世 紀這一 人人民 獨

的

文化給予

新

的

説

明

望 將給予尊重 己 中 這 以 -國研 的 種現象在 及從事登記造册、 那些 文化 事 情 究者和讀者 在 並 就 是這 戦 引爲自豪的 許多民族文化遺存的命運中都 , 争、 正 樣 是他發現和珍重這些實在是獨一無二的 革命和 編寫早期目録的俄國科學家, 有 當然無疑也包括世界學術 關 全體中國 被 情 況 包圍年代的艱苦條件下參與保存、 已 簡 人, 述 還有外國的 如 上 很普遍 , 界。 部 同行們, 0 都值得受到感謝 我相信中國同行 如今, 分文化遺存 黑水城材料, 本書的 對俄國 逐步整理和修復這些罕見的寫本 從 旅 中 出 版 . 國 行家、 和所有有文化的 領 並 Ĩ 這些文化 將其轉 傳 地理學家兼博物學家科兹洛夫 到 了 交給了 遺 或 存中 中 家界限 國 學 的 人 術 之外 界 以 部分送還給 和 及熱愛自 刻 我謹 順 本 便 説

白濱 學 、黄振華 術界了 解並 、聶鴻音 且珍視中國 陳炳應、 西夏專家們的著作 羅矛昆等等 他 們是羅福 成、 羅 福養 王 静 如 史金 波 李 範 文

熱心人獻身此一事業。 在 就 面 已經做 臨 着 要做一 的工作是不少, 次更大、 不過 但 更難的 研究西夏文化的隊伍 面 前 工作: 要做的 還更多 鑑定數以 0 遺 E 百計的 /憾的 在逐漸擴 殘片, 是没有 大。 :經費 但 我們看到對西夏文化感興趣者不僅 是目前 把 黑水城 也還人手不足 所 出 的 書籍完 需 全修 要有年 復 輕 現 有 的

和 中 城材料是對研究遠東地區文化無可估量的寶貴史料 轉爲西夏文的譯著成爲學術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工作 地方文化相互作用的顯例, 國 人、日本人和俄國人,還有美國人、 人員以高尚的勞動將爲所有對西夏文化感興趣的 界的財富時 是在此基礎上形成文化上新形式而作爲遠東文化部分的顯例 , 英國人、法國人、瑞典人、荷蘭人。本文作者堅信,當由藏文 藏族文化和藏傳佛教研究者對西夏文獻的興趣也會大增 遠東地區文化的中心就是中國文化。 人們開闢一 條通往 西夏文化遺存 這是中國文化 0 可 以堅信 黑水

之路,必將獲得世界科學界應有的高度評價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于聖彼得堡

陳鵬譯, 黄振華校)

注 :

- 1 II.K. 科兹洛夫《H.M.普爾熱瓦爾斯基 第一位中亞自然研究者》,聖彼得堡,1913年,84 頁
- 2 Г.Н. 波塔寧《中國的唐古特—西藏邊境和中蒙古 波塔寧 1884—1885 年游記》 聖彼得堡,1893 年,464

頁。

- 3 B.A. 奧布魯切夫《中亞、中國北部和南山 ***** 聖彼得堡,1900—1901 年,卷 2,399—400 頁
-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彼得格勒,1923 年,100 頁。
- ⑤ 同上,第3頁。

4

- 6 《1907—1909 年蒙古 —四川旅行日記》,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 目録 1, 154 號
-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59 號。

7

- ⑧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100號。
- ⑨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00 號。
- 10 蒙古、安多和黑水城故城》一書草稿,地理學會檔案, 特藏 18, 目録 1,61
- 探險報告的速記記録稿,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59號。

11)

- ⑫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19─20 頁
- 探險報告的速記記録稿,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59

號。

13

-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49 號。
-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76—77 頁。
-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46 號。
-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78 頁。
- 探險報告速記記録稿,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59 號
-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95 頁。
- 同上,99 頁。

20

19

18

17)

16

15)

14)

同上,102頁。

21)

- 同上,102—104 頁。
- 23 22
- E.M. 克恰諾夫《衹有文獻在作證》,莫斯科,1965 年,27—28 頁。
- 參見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108 頁。

《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54 號。

同上,108—109 頁。

26

25

24)

同上,112頁。

27)

同上。

28

- 29 Ⅱ.K. 科兹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156號
-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50 號。
- 雅金夫神甫《西藏和青海歷史》,聖彼得堡,1833年。
- 參見 3.M.穆爾扎耶夫《在亞州心臟》,莫斯科,1990 年,12 頁。

- Contract

參見 E.M. 克恰諾夫《衹有文獻在作證》,33 頁

33

32

31)

30

- 34)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406 頁
- **II.K.** 科兹洛夫《1907—1909 年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56 號
- 同上。

36)

35)

37)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55號。

-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46—547 頁
- 同上,547—548 頁

39

38

- 40 Ⅱ.K. 科兹洛夫《蒙古· -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57 號
-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50 頁。
- 42) 41) **II.K.** 科兹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57

號

- 43 同上。
- 44)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 目録 1,54 號
- 45) **II.K.** 科兹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57 號
- 46) 同上。
- 47)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65 號
- **T.K.** 科兹洛夫《蒙古、 安多和黑水故城》,556 頁。
- 科兹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 157 號
- 50 同上。

49

48)

- 51) 同上。
- (52) 同上。
-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24 號
- **(55)**
-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55—556 頁
- JI.H. 緬希科夫(孟列夫)《 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叙録》(II.K. 科兹洛夫特藏),莫斯科,1984 年,75 頁。

-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57 號

同上。

57)

56

54)

T.K. 科兹洛夫《蒙古·

53

-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55 號。
-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124號。

59

58

- 60 俄國科學院檔案,特藏 208,目録 3,274 號。
- **61**) A. M. 伊鳳閣《西夏文獻》,載《俄國科學院通報》, 第 6 集,1918 年,799—800 頁。此外,參見伊鳳閣出版

的著述《黑水城出土文獻-院通報》,1911 年,831—836 頁;伊鳳閣于 1916 年在彼得格勒還發表了《彌勒上生經》,原文爲西夏文,伊 發掘物》,載《帝國地理學會通報》,第 45 卷,1909 年,463—477 頁;《西夏歷史的一 鳳閣附漢譯文。此外,至少還有伊鳳閣用德文發表的兩篇文章。 十三世紀的漢文私信》,載《帝國科學院通報》,1913年;《科兹洛夫的黑水城 頁》, 載《帝國科學

- 參見 B.JI. 科特維奇《中國元鈔樣式》,載《帝國地理學會通報》,第 45 卷,1909 年,474─477 頁;又見其 對黑水城所出蒙古文獻的介紹,載《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61—565 頁。
- 參見他對波斯文本《七聖賢》的介紹,載《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66 頁, 同書有對佛教塑像和 畫像的 描
- JI.H. 緬希科夫 (孟列夫) 《 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叙録 》。

64)

寫。

63

62)

65) 夫《西夏文寫本與刊本》,莫斯科,1963年。 H.A. 聶歷山《 西夏語文學 研究與詞匯》(兩册),莫斯科,1960年。 3. M. 戈爾巴喬娃和 E.M. 克恰諾

Введение

Честь открытия уникально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коллекции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Си Ся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му географу и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у Петру Кузьмичу Козлову (15- X - 1863 — 26-IX-1935 г.).

П.К. Козлов родился в небольшом городке Духовщина Смоле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 семье перегонщика скота на продажу.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местной школы он работал конторщиком на пивоваренном заводе г. Слобода. Случилось так, что 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городке приобрел себе дачу знаменитый уже тогда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и географ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В 1882 г. произошла встреча П. К. Козлова с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м, определившая весь последующий жизненный путь П. К. Козлова. Позже П. К. Козлов вспоминал: "Тот день ..., когда я сам смело и искренне заговорил с ним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м — Е.К.) я никогда, никогда не забуду, ... тот день решил всю мою будущность, и я стал жить этой будущностью". При покровительстве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ого П. К. Козлов продолжил св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закончил Смоленское реальное училище (среднюю школу с уклоном в математику 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тех лет), а в 1883 — 1885 гг. совсем молод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четверт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ого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1887 г. П. К. Козлов заканчива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енное училище и получает офицерское звание. Последеующее участие П. К. Козлова в экспедициях М. В. Певцова (1888 г.) и В.И. Роборовского (1893 — 1895 гг.) подготовили его к тому, что ему были доверены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ервую из них он осуществил в 1899 — 1901 гг.

Кажется, впервые о заброшенном городе в устье реки Эдзин-гол (кит. Хэйшуй) узнал от монголов-торгоутов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и собиратель фольклора Г. Н. Потанин. В своем

отчете о поездке 1884 — 1885 гг. Г. Н. Потанин писал: "Из памятников древности (торгоуты — Е. К.) упоминают город Эрхэ-хара-бурюк, т.е. от самого восточного рукава Едзина; тут, говорят, виден небольшой кэрим, т. е. стены небольшого города, но вокруг много следов домов, которые засыпаны песком. Разрывая песок, находят серебряные вещи. В окрестностях кэрима большие сыпучие пески, а воды близко нет". В 1900 г. город в песках пытался найти геолог В. А. Обручев. Местные монголы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указали ему,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но и отправили ег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в другую от местонахождения Хара-Хото сторону. В том же году, П. К. Козлов, находившийся в Монголии, отправил на поиски развалин города своего спутника А. Н. Казанкова, тот тоже города не нашел. Причина была та же : сведения о развалинах скрывало мест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Собираясь в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 К. Козлов решил повторить поиски и учесть ошибки своих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поладить с местными монголами. "В тайниках души, — писал он позднее, — я лелеял заветные мысли найти в пустыне Монголии развалины города". ⑤

Проект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 разработан Советом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ри активном участии известного географа и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а П. П. Семенова-Тяньшаньского, и лично П. К. Козловым. 17 июня 1907 г. П. К. Козлов получил аудиенцию у царя Николая II. В "Дневнике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 1909 гг." сохранилась следующая запись: "Принятый в частной аудиенции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я подарил Государю три тома науч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Тибет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тогда только что вышедших из печати), как никогда просто и ласково, я ушел от Государя очарованный. На мои последние слова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у): "По примеру Тибет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окончившейся столь благополучно, позвольте просить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я и на этот раз!" — Государь заметил: "Я не прощаюсь. Я хочу вас видеть перед самым отъездом в ваше долг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едь еще предстоит масса хлопот и времени на снаряжен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29 октября 1907 г. перед отъездом в экспедицию П. К. Козлов был принят царем и наследником-цесаревичем Алексеем вторично.

Проект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 утвержден царем 2 октября. На экспедицию сроком на два года из казны было выделено 30 тыс. рублей, ее состав утвержден в 14 чел.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о выдано оружие — 12 винтовок с 15 тыс. патронов и 6 револьверов Смит-Вессон с 600 патронов. $^{\textcircled{8}}$

Руководителю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о выдано официальное удостоверение, текст которого гласил: "Божьей милостью, Мы, Николай Второй, император и самодержец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и прочая, и прочая, объявляем через сие всем и каждому, кому ведать надлежит, что по-

датель сего Начальник отправляемой Нашим Русски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 обществом через Кяхту и Ургу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ый Китай и Монголию и имеющий возвратиться затем через Ланьчжоуфу и Ургу обратно в Россию научн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Гренадер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II полка 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 отправляется заграницу и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затем обратно в Россию. Его сопровождают десять человек прислуги. Того ради дружелюбно просим все высокия Области и приглашаем каждого, кому сие предъявится, Нашим же Воинским и Гражданским управлениям всемилостивейше повелеваем П. К. Козлова и 10 человек прислуги не только свободно без задержания везде пропускать, но и всякое благоволение и воспоможение ему оказывать. В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того и для свободного проезду дан сей паспорт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Наше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ечати. В С-Петербурге Августа 12 дня 1907 года по Указу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Товарищ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ечать Подпись", 9

Внима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лично царя к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оддержками начинаний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 многом объясняется тем резонансом, который имели достижения этих экспедиций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научном мире. Северные и западные области Китая не обследовавшиеся на месте китайскими научными силами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для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научном уровне, привлекали внимание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ученых.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учных экспедиций последней четверти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в. — английских, немецких, французских, русских, шведских, японских и т. д., были получены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географ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истор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ботаники, зоологии и т.п.). Русское участие в эт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науч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было весомым и весьма поднял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рестиж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и. Было бы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 не принимать во внимание то, что такое научное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окраин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на фоне европе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японск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давления на Китай, что 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съемки местности экспедициями, их отчеты о состоянии дел на местах могли бы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ы и в военных целях. Разрешая эти экспедиции, Цин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безусловно шло 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уступки. Но сейчас,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через сто лет, как та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имели мест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открытие и сохранение для науки только Дуньхуана и Хара-Хото, оказалось ценнейшим вкладом в изучение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дл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уки. Было хотя бы частично спасено и сохранено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то, что имело большую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погибнуть безвозвратно.

Хочется особо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они работали с ведома китайских (цинских) цен-

тральных властей и под контролем местных. Члены экспедиций получали разрешение н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паспорта о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итайские паспорта, — писал П. К. Козлов о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1907—1909 гг., — были получены от Пеки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через посред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и при Богдо-хан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в Пекине "поставило в известность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те мест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власти, где должна была проходить экспедиция". Поставило в проходить экспедиция".

Так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Монголии до Урги(Улан-Батор) экспедиция передвигалась, пользуясь почтовой (уртонной) монгольской службой. "Благодаря кяхтинскому пограничному комиссару ... П. Е. Генке,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 снесшимся с китай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м управлением, персонал экспедиции хорошо проследовал н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почтовых лошадях ...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багажа экспедиции, везомого на верблюдах, специально нанятых экспедицией у монголов подрядчиков". ⁽²⁾ Нанято было 40 верблюдов.

Экспедиция не передвигалась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произвольно. Так амбань г. Синин был заблаговременно уведомлен о прибытии экспедиции П. К. Козлова. В Архив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хранится черновик письма П. К. Козлова властям пров. Ганьсу, озаглавленный "В комиссию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Ганьсуй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В тексте письма говорится: "Вследствие письма Ком(итет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от 15 ноября 1908 г. сим позвольте уведомить, что я рус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Козло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имел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Сининским ценцаем, так равно и с Гуйдуйским тунпанем о своем плане пути от Гуйдуй через Лабран в Сунпаньтин". Письмо датировано 22-XI-1908 г.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ледует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все передвижен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П. К. Козлова производилось с полного ведома цинских властей и никак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ства не допускалось.

Что же касается обнаружения Хара-Хото и раскопок в Хара-Хото, то все это тоже было сделано с ведома и с помощью состоявших на цинской службе монгольско князя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а и торгоутского бэйлэ, кокоторые управляли вверенной им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как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находившейся под особым управлением в составе империи Цин через Лифаньюань.

В начале марта 1908 г. экспедиция прибыла в урочище Уголцзин-тологой, ставку местного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князя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а. Когда разговор зашел о возможном дальнейшем маршрут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и князь узнал, что Козлов хотел бы попасть в устье реки Эдзин-гол, он спросил: "Почему вам во что бы то ни стало желательно идти именно на Эдзин-гол, а не прямо в Алаша-ямунь, куда и дорога хорошая и времени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мень-

ше, а потому меньше трудов и лишений и меньше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издержек. Вероятно, — добавляет князь, — на Эдзин-голе у вас предвидится какой-нибудь большой интерес?" "Да! — ответил я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у, — вы правы: там имеются очень любопытные развалины старинного города!" --- "А вы откуда это знаете?" --- вопрошает мой собеседник. — "Из книг наши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и из писем моих друзей," отвечаю я. — "Вон оно что, — глубокомысленно протянул князь... — я слышал о Хара-Хото от моих людей, они бывали там,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ет город, обнесенный стенами, но он постепенно засыпается песком... Говорили мне, что там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бывают торгоуты и копают и ищут скрытых богатств. Слышаля, что будто бы кое-кто и находил кое-что. Вот пойдете, увидит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что-либо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е и сами найдете.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оргоуты не станут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вашей дороге на развалины, как не будут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и самим раскпокам. ... Торгоуты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ени тщательно скрывают Хара-Хото и старинный путь в Алаша-ямунь". (5) Это был итог бесед. А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и князь и два е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как писал П. К. Козлов 12 марта 1908 г. в письме секретарю ГО, "старались убедить меня, что в желательном мной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нет дорог". 16 Помогли подарк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револьвер и ружье, угощение и слушание грамофона, и письм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в Пекине с просьбой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цинским властям о присвоении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у более высокого чина "улусун-туши-гуна", что должно было в три раза увеличить размер получаемого им от богдо-ханского двора содержания". ⁷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без помощи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а П. К. Козлов, как и его предщественники, мог и не найти Хара-Хото.

Вторым его помощником на пути к Хара-Хото оказался князь торгоутов, торгоутбэйле Даши. Как отмечал позже П. К. Козлов в публичной лекции, Даши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мере оказал содейств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да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найти Хара-Хото". После разговора с казаком-бурятом Бадмажаповым торгоутский бэйлэ "поручил своему ... проводнику доставить экспедицию в соседство его ставки ..., и пообещал полное содействие ... по достижению развалин Хара-Хото". Торгоутский бэйлэ подчинялс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Лифаньюань.

1 апреля 1908 г. пять членов экспедиции —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А. А. Чернов, Н. Я. Напалков, казаки Иванов и Мадаев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проводника Бата выехали к развалинам Хара-Хото из урочища Торой-онцэ. Бата "много раз бывал в мертвом городе". До Хара-Хото от лагер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о примерно 60 — 65 ли. "С половины пути уже начали попадаться следы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ой или оседлой культуры — жернова, признаки оросительных канав, черепки глиняной и фарфоровой посуды и проч. Но нас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зани-

мали глинобитные постройки,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убурганы,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по одному, по два, по пяти вдоль дороги, исстари проходящей к Хара-Хото, этому памятнику прошлого, засыпаемому песком пустыни. По мере приближения к заветной цели, волнение наше все увеличивалось, все росло. За три версты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8 ли — Е. К.) мы пересекли древнее сухое русло..., на возвышенном береге реки стояли развалины цитадели Алтан-Хото, где, по преданию,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когда-то кавалерийский отряд-стража Хара-Хото. По сторонам высохшего русла раньше залегали, по-видимому, культурные долины с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им населением. Вот, наконец, показался и сам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й на низкой террасе из грубозернистых песчаников. Над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ым углом крепости возвышался главный щпицеобразный субурган, из ряда меньших, соседних, устроенных также на стене и рядом со стеною вне крепости. По мере приближения к городу черепков посуды стало попадаться все больше, вид на город заслонился высокими песчаными буграми. Но вот мы поднялись на террасу и нашим глазам представился Хара-Хого во всей внешней прелести". Одя по описаниям П. К. Козлова, стены города "были строг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ы на север, юг, восток и запад, образуя правильный квадрат, каждая из сторон составляла около версты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2.5 ли — Е.К.). В запад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стенах города имелись ворота, защишенные Г-образным выступом, затруднявшим прямой подступ к ним, 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не прямо одни против других, а восточные - несколько к северу, а западные - несколько к югу от центра стены. С запада на восток город пересекали две главнуе параллельные улицы, начинавшиеся от ворот. ... Мощные стены города, высотой до 6 — 8 метров,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м его углу были увенчаны величественными субурганами. Стены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ужались к вершине, и толщина их, достигавшая у основания 4 — 6 метров, уменьшалась вполовину ... Каждая стена имела по нескольку бастионов. ... Небольшие возвышения из песка, мусора и земли — остатки прежних строений — довольн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али бывшие улицы города". 23

При первом обследовании города члены экспедиции находили черепки глиняной и фарфоровой посуды, обломки чугунных, железных, медных, серебряных изделий, черепицы, монеты, бумажные деньги, "изредка и предметы культа".

Экспедиция находилась в Хара-Хото с 1 по 13 апреля 1908 г.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и раскопки в принципе были лишены научн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ы. Как писал в дневнике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он и его люди "копали, рыли, ломали, рушили". Не было строгой фиксации находок, хотя на плане города П. К. Козлов обозначил Развалины №1, №2, №4 в северной половине города, несколько восточнее от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оси север-юг, Развалины №3 в южной части восточной половины города, субурган В в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части

города и субурган А в его юго-западном углу, развалины кумирен близ южной половины западной стены. Судя по разным упоминаниям, было найдено:

Развалины №1 — "буддийский образок, писанный на полотне", "тяжелые грубые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чашечки и обрывки рукописей письма Си Ся".

Развалины №3 — "листки персид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 отрывок из знаменитого сборника рассказов "Семи мудрецов" ("Китаб-и-Синдбид"),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плет".

Субурган А — 3 книги и 30 тетрадей письма Си Ся, "образ на полотне" "Явление Амидабхи", "образ китайского типа на шелку", "большая слегка улыбающаяся красивая маска и ряд других головок и масок", "голова Будды, позолоченная с темносиними волосами".

Субурган В — "несколько экземпляров стекловидных глаз, выпавших из глиняных статуй", "глаз из горного хрусталя или топаза, красиво отшлифованный", "большие плоские цаца". $^{\textcircled{6}}$

Подводя итог первому пребыванию в Хара-Хо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отмечал: "В течение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ней, проведенных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Хара-Хото, в общем итоге экспедиция обогатилась всевозможными предметами: книгами, письменами, бумагами,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ми денежными знаками, женскими украшениями, кое-чем из домащней утвари и обихода, образцами буддийского культа и проч. Переведя в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ы собрал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наполнивший десять посылочных пудовых ящиков (1 пуд — 16 кг — Е. К.), приготовленных затем к отправлению в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льзуясь хорошим дружелюбным отношением к экспедиции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я тотчас же отправил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почтой в Ургу и далее в Петербург в нескольких параллельных пакетах известие о фактическом открытии Хара-Хото, находках в нем и приложил образцы письма и иконописи для скорейшего изучения 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В декабре 1908 г., находясь в урочище Гуйдуй, П. К. Козлов получил ответ от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А. В. Григорьева. П. К. Козлов записал в дневнике: "А. В. Григорьев в качестве помощник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извещал меня ... о моих работах, или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их в Хара-Хот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это тангутская столица Си Ся,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ая с II по XIV век. Этим открытие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идимо, очень довольно и решается предложить мне на обратном пути завернуть вновь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город, ... пополнить его высокого интереса материалы, которые уже добыты и частью прибыли в Петербург". Дневниковая запись дублируется черновиком письма от 23-III-1908 г. секретарю Королев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Лондоне. П. К. Козлов

извещал Британское Королев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что третий этап его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удет посвящен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м, более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ым, нежели прежде, раскопкам в мертвом городе Хара-Хото. Пока что мною получено письмо от помощника (замесдидель)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знакомства с письменами и другими документами, отправленными мною в Петербург, он спешит порадовать меня, что открытый мною Хара-Хото есть Си Ся, столиц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царства,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его с ІІ по ХІІ век. ... Когда Вы, 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 получите это письмо, Ваш покорный слуга будет на пути к Юж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и еще месяца через два уже и на своих любимых развалинах Си Ся".

При всем глубоком уважении к мои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м коллегам я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могу понять, кто и почему решил, ч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нашел" столиц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и Ся. Еще в 1833 г. был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большая монография Н. Я. Бичурина (о. Иакинфа)[®], в которой содержались обшир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и Ся, переведенные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из них был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столицей Си Ся являлся для времени П. К. Козлова г. Нинся,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г. Иньчуань.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продолжает бытовать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вязанной с именем П. К. Козлова. Из тангутских первоисточников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Идзина (Хара-Хото, кит. Хэйчэн)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являлся столицей Си Ся, но был третьеразрядным городом, местом ссылки каторжан. Он погиб в 1374 г. в ходе войн Минского Китая с монголами, надеявшимися возвратить утерянную над Китаем власть.

15 октября 1908 г. на специаль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были заслушаны три доклада —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А. И. Иванова и В. Л. Котвича о первых обследованиях находок из Хара-Хото. Было доложено, что "извлеченные из развалин рукописи, помим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писаны на языке неведомом,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прочесть их никто не умеет, хотя образцы письма и известны". ³³

А. В. Григорьев известил П. К. Козлова, что "ввиду важности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открытия, Совет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уполномочил меня предложить вам не углубляться в Сычуань, а вместо этого возвратиться в пустынь Гоби и продолжи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недр мертвого города. Не жалейте ни сил, ни времени, ни средств на дальнейшие раскопки". ³⁹

В конце мая — июне 1909 г. П. К. Козлов, выполняя вол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звратился в район Хара-Хото. 27 мая он делает запись в дневнике: "Пишу ..., время пять часов, но жара дает себя сильн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и невольно наводит на размышление, как мы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в мертвом, унылом Хара-Хото". ³⁵ 4 июня. "В десять час. утра мы через пыльную мглу увидели, наконец, знакомые серые стены Хара-Хото, а еще через по-

лчаса уже вошли внутрь крепости и недалеко от западных ворот и углового C-3 субургана расположили наши шатры". ³⁶

Широкомасштабное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города было бы невозможно без помощи торгоутского бэйлэ. В письме Секретар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от 8 июля 1909 г. П. К. Козлов особо отмечает эту помощь: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долгий путь в жаркое время года экспедиция могла провести в пустыне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ени неизвестном уголк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благодаря лишь отличному отношению к нам местного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который да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реди его подчиненных нанять землекопов, водовозов, поставщиков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я и проч.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временно ожил и установил связь с обитателями Эдзин-гола, ближайший из рукавов которого, восточный, протекает в двенадцати верстах от Хара-Хото. На этот раз наш лагерь приютился не в центре крепости, как прежде, а несколько ближе к западной стене подле руин большой фанцза". В книге он писал: "Я возобновил прияте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попрежнему главном на Эдзин-голе, ... заручился его содействием по найму рабочих-землекопов, а также подрядил тогоутов ежедневно доставлять нам с Эдзин-гола воду и баранов".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местной власти не оставлял без внимания работу экспедиции, он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исылал в Хара-Хото чиновников из свое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чтобы "знать, как поживают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русские". ³⁹

О начале работы П. К. Козлов записал в своем дневнике: "С первого дня стали находить письмена,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китайские, ассигнации, посуду, старые орудия и проч. Попался и маленький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й бурхан, докшит, найдена великолепного золотого письма маленькая квадратная тибетская книжечка".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рошлый раз наружно, по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мы обследовали Хара-Хото довольно порядочно. Теперь уже не находим ни чох, ни бус, ни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х украшений. Стоя на стене Хара-Хото, видишь, как красиво и удобно был расположен этот город. В С-3 районе: сам князь, вдоль северной, западной и южной стен расположились молитвенные постройки, субурганы. ... В Ю-В углу конюшни с гарнизонной частью. ... Главная проезжая улица проходила прямо о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высокого здания, которое огибалось поперечной улицей и вновь продольной до восточных ворот". Работа была организована двумя группами-нанятые рабочие-монголы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казака-бурята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исследовали развалины фанз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немногих улиц Хара-Хото, а иногда пытались рыть глубокие колодцы в указанных мною местах". Русская группа вела раскопки как внутри города, так и "производя изыскания вне хара-хотоских стен, в близком и далеком расстояниях".

Судя по его дневнику, П. К. Козлов сам регулярно не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 а находки, даже

интересные, никак не фиксировались на плане города. Думается, ч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представлял себе, как выглядит тибетское письмо, а иероглифику китайскую и тангутскую, кажется, не особенно различал. Для него все это была "китайщина".

9 июня. "Сейчас около четырех часов явлись ко мне рабочие, я поговорил с ними, и вот они уже идут на занятия. Интерес еще более у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иду и я на раскопки. Трудно сидеть в юрте, когда слышишь голоса работающих и стук лопат о землю. ... Попадаются из рукописей чаще других китайские, не знаю, что они скажут нам. Более всего меня интересуют тибетские, как рукописи, так и книги, но ... на них нам пока не везет. Вот и сегодня китайщина попалась в целости, интересные же тибетские письмена оказались сожженными, уцелевшие знаки наводят на мысль об ином, нежели тибетск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 Узнаем в Питере". 11 июня к прежнему замечанию об отсутствии захронений, П. К. Козлов добавляет: "не попадается и одежд, обуви". Прохладная, ветряная, даже с дождем по началу погода, сменяется жарой. 12 июня П. К. Козлов пишет письмо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А. А. Достоевскому.

"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Двадцать второго мая (3 июня — Е. К.) экспедиция прибыла в Хара-Хото и расположилась бивуаком внутр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тен, на интересных развалинах. В наше годично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из древнего города в него никто не заглядывал: его развалины выглядели в том же положении, в каком мы их оставили. Нетронутыми оказались и те предметы, извлеченные нами из под обломков мусора, которые мы оставили как ненужные. Как и в первое пребывание, так и теперь, с приходом экспедиции Хара-Хото ожил: задвигались люди, застучали инструменты, по сухому воздуху полетела пыль. За истекшую неделю нам удалось пополнить прежние, уже отправленные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сборы. И в этот раз мы добыли и продолжаем добывать и письмена,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и арабские, и денежные знаки, и предметы культа и прочее. На одном из выступов северной части крепостной стены мы натолкнулись на интересный храмик с глиняными выкрашенными бурханами против входа и любопытными на стене картинами, к сожалению, картины приклеены к глине и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ими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возможным. Не только мои спутники, но даже и туземцы прониклись интересом к раскопкам. Мы только и говорим о Хара-Хото: вечером о том, что найдено в течение истекшего дня, утром, что предстоит найти. Время бежит быстро. После вечернего метеор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наблюд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производится в 9 часов, мы быстро засыпаем. Просыпаемся чуть не с зарею и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прохладе ведем свои работы. Днем отдыхаем, а то и пуще томимся от изнурительного жара, так как в тени воздух нагревается до 37 с лишком, а земнея поверхность накаляется солнцем свыше 60 С. Пыль или песок, поднимаемые горячим воздухом,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изнуряют. Но зато по утрам и вечерам мы дышим летко и свободно, чувствуя себя еще способным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дальнейшие работы в Хара-Хото". 49

Поскольку за дни работы в развалинах города находки не были столь обильными, как бы это желалось, П. К. Козлов направил людей на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и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вскрыть большой субурган, который находился примерно в 400 м от западной стены города, на правом берегу сухого русла реки. Субурган был высотой около 10 м и состоял "из пьедестала, середины и конического полуразрушенного верха, попорченного то ли временем, то ли охотниками за сокровищами", т. е. попытки вскрыть субурган, видимо, предпринимались и раньше местными жителями. Если бы им это удалось, очень вероятно, что наука лишилась бы той коллекции иконописи, скульптуры и книг, который она располагает сейчас.

12 июня начались раскопки субургана, того самого, в котором, как мы можем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находилось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книг на языке Си Ся и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Обойдя работавших монголов, я отправился к моим спутникам, которые исследовали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крупных субурганов отстоящих на запад от города в 200-х саженя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казало, что он богат бурхан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ими письменами, которых к 9 ч. утра столько нанесли на бивуак, что я тот час же ушел к ним, сортируя, очищая от излишней пыли и приготовляя к упаковке. Подобно тому, как в субургане прошлогоднем, в этом были всевозможные книги, тетради, свитки, иконопись. Папался очень старинный мандал. Надо полагать, что крыша часовни субургана обрушилась и повалила бурханов или же они с самого начала были так брошены, куда бросали и книги, и свитки, и иконопись". (6) Работы по раскопке субургана продолжались девять дней и были завершены 20 июня. В огромном брезенте книги сносили к лагерю и там сортировали. Без знания языков эта "сортировка" по форматам или еще каким-то неведомым нам признакам и произвела, в известной мере, тот хаос, с которым покончить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нет сил и до сих пор.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постоянно за раскопками субургана не следил. О состоянии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убранства субургана есть в дневнике лишь запись от 15 июня. "Сегодня я прогуливался к субургану, посмотреть, много ли осталось в нем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добра, и пришел к заключению, что мои ребята справедливы, заметив, что взята только лишь половина. В верхней части ступы всё очищено, кругом сложены, сидя, крупные деревянноглиняные бурханы, а в середине книги, письмена, книги — большие, малые, в переплетах или папках, терадями или свитками".

Если мы сравним две дневниковые записи от 12 июня и 15 июня, то обнаружим, что

по мере раскопок Козлов пишет то о беспорядочно "брошенных" книгах, то о книгах, сложенных в известном порядке. Позже, когда известие о знаменитой находке, "перле в моих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х работах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ак писал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облетела мир и к Козлову пришла подлинно мировая слава, он склонялся в свои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даже к образцовому порядку в субургане: "Открыли знаменитый субурган. Он оказался весь набит сокровищами. Едва сняли его верхушку, как открылись книги, стоящие целыми сотнями на полках в полном порядке в шелковых переплетах. Более 2000 книг нашли". ⁽⁴⁾ В книге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что в верхней части субургана все лежало в беспорядке, а в нижей был какой-то порядок: "Все богатство собрано в знаменитом субургане: книги, образа, статуи и другие предметы ... лежали в крайнем беспорядке. Еще в нижней части хранилища намечалась некоторая система: часть глиняных статуй была размещена на одной высоте, лицами внутрь, наподобие лам, отправляющих богослужение перед большими рукописными листами письма Си Ся, сотнями наложенных один на другой". "Чем выше, тем хаотичнее группировалось богатсво субургана, книги лежали кипами и в одиночку, плотно прижатые друг к дуругу или к образам, свернутыми в отдельности на деревянных валиках. И книги, и образа были сложены в самых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х положениях, как равно и статуи, заключенные между ними. Только в основании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о отмече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книг, тщательно завернутых в шелковые ткани". ⁽⁴⁸⁾

Пока можно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что истинными являются сведения и о хаосе и о порядке. На дне субургана ("на полу", по выражению П. К. Козлова, площадью примерно 3 × 4 м, т. е. около 12 кв. м), где находилось захоронение, вокруг него "сидели" деревянно-глиняные бурханы, а перед ними "для чтения" были разложены книги — в дневниковой записи от 20 июня сказано, что статуи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возвышенном внутреннем полу субургана, вокруг площадки, в центре которой стоял столб". По стенам нижней части субургана висели иконы. Скульптура, кажется, в натуральную величину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тела, была по признанию П. К. Козлова, превосходн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работы. Запись в дневнике от 19 июня: "Пишу и любуюсь всеми теми изящными головками бурханов.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так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 исполнены, что стоят и смотрят словно живые. ... По лицам видно, что у художника-скульптура было чутье к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красоте". Извлеченные из субургана иконы поражали живостью и свежестью красок, "все, — по словам П. К. Козлова, — утопало в нежно-голубом и нежно-розовом сиянии". Но стоило тронуть икону ... и краски осыпались.

Мы должны допустить, что в верхней части субургана книги и иконы, скульптура,

вещи могли быть в беспорядке. Очевидно, весной 1226 г. накануне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шествия, в субурган было спрятано кое-что из городских храмов и, возможно, городской управы. Вряд ли такое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уддийских, да и иных текстов было положено в субурган изначально. Из записей П. К. Козлова,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о вскрыто два, и были находки "письмен"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города, ясно, что основная масса письмен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происходит из "знаменитого субургана".

19 июня П. К. Козлов сделал в дневнике следующую запись о находках — "все бы взял, да не имею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Часть того,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г увезти, П. К. Козлов зарыл в песок. О том,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то место, куда все было упрятано впрок, в дневнике сохранились следующие записи: "Перед оставлением Хара-Хото оставшееся богатство наше мы вынесли из этой комнаты (в южной стене города — Е.К.) и спрятали его при спуске от крепости южнее субургана у самой стены, засыпав песком. Делал это я на всякий случай". Видимо, кое-что было спрятано и в самой южной стене. В дневниковой записи 11/23 июня читаем: "Сегодня мы отбирали и прятали все, что было принесенно на бивуак, т. е. все-все от субургана, и отнесли в южную (в стене комнату) внутреннюю часть стены, в нишу. Туда сложили несколько бурхано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 исполненных в большей или меньшей степени. Там лежат головы (до 30 с лишним фунтов весом, т. е. 12 кг и более — Е. К.) и проч. Там многие мелочи, в общем до полусотни номеров". Устя, возможно, то что было спрятано в южной стене, П. К. Козлов, хотя бы частично увез во время вторичного посещения Хара-Хото в 1926 г. В стенограмме доклада, который был прочитан П. К. Козловым 8- №-1926 г. мы обнаруживаем следующую запись: "Мы думали, что в этот раз ничего не найдем, но в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нашли довольно порядочно,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статуй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головок". 53

Но вещи, зарытые вне южной стены, кажется, у ее подножия,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та великолепная скульптура,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в глубине субургана, так до сих пор и не найдены. Китайским археологам следовало бы произвести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и раскопки у южной стены.

Выше мы уже писали о том, что когда субурган был раскопан, то обнаружилось, что в центре платформы в основании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 воткнут деревянный шест, вокруг восседали скульптур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монахов (?) лицами они были обращены внутрь субургана и походили на отправляющих богослужениях лам. Перед ними лежали книги, очевидно, книги-потхи коллекции СПб филиала ИВ РАН — большие листы рукописных книг, наложенные один на другой. Это были книги той формы,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широк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а в Индии и Тибете. У северной стены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 обнаружен скелет в сидячем положении. В дневнике П. К. Козлова записано: "Открыли, наконец, голову сидящего человека, веро-

ятно, гэгэна, в честь которого и воздвигнут был этот субурган. Череп дает основание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ок(ойный) имел около 40-ка летнего возрастал и принадлежал к типу или племени тибетско-арий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ому. Гэгэн был похоронен в сидячем положении, у сев (ерной) стены, на почетном месте, у подножья бурхана наиважнейшего и по размерам сам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лицами бурханы были обращены к центру, гэгэн на юг". Поскольку череп из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 привезен в Россию, он был более тщательно обследован. Антрополог Ф. Волков пришел к следующему заключению: "Череп очень хорошей сохранности. Несколько суженное основание, округленные, очень слабо развитые костные выступы (гребни), очень мелкие зубы, небольшие размеры вообще и изящные очертания лицевого скелета заставляют склониться в пользу мнения, что череп этот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женщине, несмотря на довольн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для женского черепа развитие надбровных дуг, могущее наводить на некоторое сомнение. Судя по состоянию зубов и черепных швов можно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возрост покойницы близким к старости (более пятидесяти лет)." Череп хранился в Институте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 где и затерялся, вероятно, в годы блокады Ленинграда.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автору этих строк неизвестно, чтобы он обследовался еще раз.

Гипотеза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а именно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е, остроумное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е и не более того. Но опровергнута о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случае, если череп из субургана будет найден и будь вновь будет проведена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экспертиза, твердо установлено, что это череп не женский (мы видели, что кое-какие сомнения в этом имелись и у Ф. Волкова), а мужской, к чему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склонялся П. К. Козлов.

Если же в субурган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ыла погребена женщина и, допустим на момент, что эта женщина была императрицей Ло, то допустимо, что часть книг могла быть из ее 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Отметим только, что среди книг на языке Си Ся имя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Л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о всего дважды, оба раза как дарительницы книги (один раз это упомянуто в колофоне и один раз на книге проставлена печать о дарении). В том и другом случае это могли быть не её личные книги, а книг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розданы ею, как и прочими другими императорами и жертвователями, о чем имеется много упоминаний. Книг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лись по все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Их, по стандартному выражению предисловий и послесловий, "раздавали чиновникам и народу". Наличие таких книг, строго говаря,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эт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личные книги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Ло или ин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теля тиража книг.

Перед отъездом экспеди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развалины города посетил торгоутский бэйлэ. "В день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дальнейший путь, — писал чуть позже П. К. Козлов секретар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 лишь только зардела летняя заря на востоке ко мне прибыл с прощальным визитом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наследника, красивого симпатичного лет тринадцати мальчика и всего своего штата чиновников, молодецки восседавших на отличных рослых лошадях джунгарской породы. Я искренне был рад, что име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лично принести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этому монгольскому князю, оказавшему нам вторично еще большее содействие и предупредительность пр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Хара-Хото нежели в первое посещен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 О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найденного и увозимого из "знаменитого субургана" мы узнаем из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ублич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П. К. Козлова от 8-Ш-1926 г. "С развалин моего Хара-Хрто 17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было вывезено тяжести на 40 верблюдах. Что они везли? Они везли великолепно сохранившуюся библиотеку, которая состояла из 24 тысяч томов. ... Я помню восторг китаиста А. И. Иванова, который найдя его (тангу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1190г. "Чжан чжун чжу" — Е. К.) громко завопил: "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В вашей библиотеке я сделал открытие, открыл словарь, который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честь 700 томов книг. Если к эт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прибавить еще 537 картин, ... то будет понятно, как велико то богатство, которое составлял тот знаменитый субурган". 59

Осенью 1909 г.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Хара-Хото были доставлены в Петербург и размещены в здан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начале 1910 г. в Обществе была устроена выставка предметов буддийского культа и книг, найденных в Хара-Хото. Думая о судьбе привезенных из экспедиции уникальных находок, П. К. Козлов писал в конце зимы 1910 г.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у из Москвы: "Весь харахотин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пока хранится в свободных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комнантах, наверху. А. И. Иванов и В. Л. Котвич работают по его сохранности. Иванов разыскал словарь, дающи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асшифровать интересные письмена Си Ся. ... Вопрос, куда поступит Хара-Хото, еще не решен. Лично я имею тяготение к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му Азиатскому музею. Думаю в вас найти единомышленника — не правда ли?"

Собственно,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так и вышло. Все книги,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были переданы в 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 АН, прямым наследником которого ныне является СПб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а иконы, скульптура, памятник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оказались в начале в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отделе Русского Музея, а затем поступили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

Разборкой и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ием тангут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в Азиатском Музее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занимался проф. А. И. Иванов. Помимо словаря "Фань-хань хэ ши чжан чжун чжу" он выявил и тангутские толковые словари — "Гомофоны", "Море письмен" и 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В статье от 1918 г.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А. И. Иванов упоминает; 1.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их знаков,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х по начальным (губным, зубным, свистящим) звукам, без подробных объяснений. 2.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их знаков, 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по образцу извест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Гуанюнь и носящий название "Море слов". 3. Словарь,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й по материям (без заглавия)". (1) Речь идет о словарях "Гомофоны", "Море письмен" и "Цзы цза". К 1918 г. А. И. Иванов составил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о-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на три тысячи тангутских знаков. Словарь даже был сдан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В. М. Алексееву: "Жаль, что Невский не знаком с моей рукописью, которая пролежала в Академии с 1919 по 1922 г., когда я, взяв ее, решил больше ничего не писать. Рукопись у меня с пометками о приеме и возврате". Поскольку рукопись словаря находилась у А. И. Иванова дома, видимо, она исчезла во время его ареста летом 1937 г. Наряду с А. И. Ивановым, первичной обработкой хара-хотин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был занят монголовед и маньчжурист В. Л. Котвич[©], а также буддоллог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 [©]

Позднее, изучение и публикац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и языке Си Ся осуществлялись раздельно. Об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смотри монографию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а $^{\textcircled{6}}$, тангутск $\overset{\textcircled{6}}{\sim}$ части — ряд публикаций разных лет. $^{\textcircled{6}}$

После А. И. Иванова над разбором книг на языке Си Ся в разное время работали А. А. Драгунов, Н. А. Невский,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Е. И. Кычанов, А. П. 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 К. Б. Кепинг. Автором этих строк подготовлено в рукописи 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будди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С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м настоящего издания Шанхайски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 "Гуцзи чубаньшэ"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китайская и мировая наука получит в свое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уникальный материал XI - XIV вв.,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ливающий новый свет на китайскую культуру и быт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Си Ся, а также на исчезнувшую культуру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ак случилось (об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этого вкратце сказано выше), что часть памятников культуры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оказалась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страны — впрочем, это явлени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е в судьба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ультуры многих народов. Ныне, когда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данным изданием часть эт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йскому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ю и китайскому читателю,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сей мировой научн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я убежден,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и все образованные люди Китая, все китайцы, любящие и гордящиеся своей культурой, зарубежные коллеги отдадут дань уважения русскому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у, географу и естествоиспытателю П. К. Козлову, нашедшему, оценившему и передавшему в руки наук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уникаль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Хара-Хото. Я полагаю что заслуживают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 и те российские ученые, которые в тяжелых условиях войн, революции, блокады хранил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збирали и реставрировали ред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писали инвентарь и составляли первые каталоги.

Науч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знает и ценит труды китайск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по Си Ся — Ло Фу-чэна, Ло Фу-чана, Ван Цзин-жу, Ши Цзинь-бо, Ли Фань-вэня, Бай Биня, Хуан Чжэнь-хуа, Не Хун-иня, Чэнь Бин-ина, Ло Моу-куня и многих других. Сделано немало, но предстоит сделать еще больше.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 хватает средств на полную сплошную реставрацию книг из Хара-Хото, здесь пока предстоит еще большая и трудная работа. Следует отождествить сотни фрагментов, до которых пока еще тоже не дошли руки, нужны молодые энтузиасты, которые решились бы взяться за это дело. Но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сширятся круг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культуры Си Ся, мы видим интересующихся этой культурой не только в Китае, Японии и России, но и в США,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Франции, Швеции, Голландии. Автор этих строк убежден, что когда достоянием науки станут переводы, сделанные на язык Си Ся с тибе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к тангутским текстам возрастет интерес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тиб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тибетского буддизма.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Хара-Хото — неоценимый источник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центром которой являлась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йская, наглядный пример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культур местных и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йской, с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на этой почве новых форм культуры как частей культуры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Можно быть твердо уверенным, что благородный труд работник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Гуцзи чубаньшэ", который откроет доступ к памятникам культуры Си Ся всем интересующимся ею, получит должную высокую оценку мировой научн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Е.И. Кычанов 23-VI-1994,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римечание

- П. К. Козлов,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перв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природ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Пб, 1913, стр.
 84
- ② Г. Н. Потанин, Тангутско-тибетская окраина Кита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 Н. Потанина, 1884 1885. СПб, 1893, стр. 464.
- 3 В. А. Обруче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и Наньшань, т. II. СПб, 1900 1901, стр. 399 400.
- ④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Петроград, 1923, стр. 100.
- ⑤ Там же, стр. 3.
- ⑥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1909 гг., Архи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фонд 18, опись І, № 154.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Дневник, фонд-ф., опись оп.,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аство-ГО.
- ⑦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9.
- ⑧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І, № 100.
- 9 Там же.
- Шерновая рукопись книги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61.
- ① Стенграмма доклада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9.
-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19 20.
- ③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доклад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І, № 59.
- ④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49.
- ⑤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76 77.
- ⑤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46.
- 🛈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78.
-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95.
- 20 Там же, стр. 99.

- ② Там же, стр. 102.
- 22 Там же, стр. 102 104.
- ② Е. И. Кычанов, Звучат лишь письмена, М., 1965, стр. 27—28.
- ②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1909 гг.,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4.
- 🖾 См.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108.
- №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108 109.
- **27** Там же, стр. 112..
- 28 Там же.
- 29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І, № 156.
- 30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І, № 50.
- ③ о. Иакинф, История Тибета и Хухунора, СПб, 1833.
- Отм. Э. М. Мурзаев, В сердце Азии, М., 1990, стр. 12.
- 33 См. Е. И. Кычанов, Звучат лишь письмена, стр. 33.
- Э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406.
- ⑤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1909гг,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6.
- **36** Там же.
- ③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5.
-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46 ─ 547.
- 39 Там же, стр. 547 548.
- ⑩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І, № 157.
-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50.
-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сь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7.
- 43 Там же.
- ⑤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сь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7.
- **46** Там же.
- Ф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65.

- 50 Там же.
- 51 Там же.
- 52 Там же.
- 53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І, № 124.

- ⑤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55 556.
- ⑤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фонд П. К. Козлова), М., 1984, стр. 75.
- **57** Там же.
- ⑤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24.
- ⑥ Архив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РАН, ф, 208, оп. 3, № 274.
- ⑥ А. И. Иванов,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ерия VI, 1918, стр. 799 800. Кроме этого, см. публикации А. И. Иванов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города Хара-Хото, I. Китайское частное письмо X II в.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13; Из находок П. К. Козлова в Хара-Хото,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XLV, 1909, стр. 463 477. Страница из истории Си Ся,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11, стр. 831 836; Сутра "Восхождения Майтрей на небо Тушита". Тангутский текст издал и китайским переводом снабдил А. И. Иванов. Петроград 1916 г.; К этому сдедует добавить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две публикации А. И. Иванова на немецком языке.
- © См. Котвич В. Л., Образцы ассигнаций Юань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в Китае,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XLV, 1909, стр. 474 477; См. также ег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памятников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61—565.
- © См. ег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персидского текста "Семи мудрецов" 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66 и его описан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буддийской скульптуры и иконописи в этой же книге.
- б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 В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М. 1960.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М., 1963.

Preface

The achievement of discovering the unique St. Petersburg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of Xixia writing belongs to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and traveler Peter Kuz'mich Kozlov (15, Oct. 1863 - 26, Sep. 1935)

P. K. Kozlov was born in the small town of Dukhovshchina in the oblast of smolensk, in a family which drove cattle to market. After completing the local school, he worked as a clerk in an ale brewery in the town of Slobod. It so happened that in precisely this town the by then already renowned traveler and geographer N. M. Przheval'skii had bought himself a summer cottage. In 1882 occurred the meeting of P. K. Kozlov and N. M. Przheval'skii that determined the entire subsequent course of Kozlov's life. Later Kozlov recalled, "That day..., when I myself began freely and frankly to speak with him (Przheval'skii - EIK) I never, never will forget, ... that day decided all my future, and I began to live that future." With the patronage of Przheval'skii, Kozlov continued his education and completed the Smolensk technical middle school (real'noe uchilishche), and in the years 1883-1885, while still quite a young man, took part in the fourth expedition of N. M. Przheval'skii to Central Asia. In 1887, Kozlov completed the St. Petersburg military school and received officer's rank. The subsequent participation of Kozlov in the expeditions of M. V. Pevtsov (1888) and V. I. Roborovskii (1893-1895) prepared him for being entrusted with independent expeditions, the first of which he undertook in 1899-1901.

It appears that G. N. Potanin, traveler and collector of folklore, was the first to learn from the Mongols-Torgots about the abandoned town at the mouth of the Edzingol river (Chin. Heis ii). In his account of the 1884-1885 journey, Potanin wrote:

From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the Torgots - EIK] mention the town of

Erkha-khara-buriuk, i.e., from the most eastern branch of Edzina: here, it is said, a small kerim is visible, that is, the walls of a small town, but around [are] many traces of houses which are covered with sand. Digging in the sand, one finds silver objects. In the environs of the kerim [are] large friable sands, and there is no water nearby.²

In 1900 the geologist V. A. Obruchev tried to find the town buried in the sands. Local Mongols not only did not show him where the dead town was located, they led him in an entirely different direction from the location of Khara-khoto. In the same year, Kozlov, finding himself in Mongolia, sent his traveling companion, A. N. Kazankov, to search for the ruins of the town; he also did not find the town. The reason was the same: the local population was conceal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ruins.

Preparing for the Mongol-Sichuan journey, Kozlov decided to repeat the search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istakes of his predecessors,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local Mongols. "In the recesses of the soul," he wrote later, "I cherished fond thoughts of finding the ruins of the town in the desert of Mongolia." [5]

The project of the Mongol-Sichuan expedition was worked out by the Council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famous geographer and traveler, P. P. Semenova-Tian'shanskii, and of Kozlov personally. On 17 June 1907 Kozlov was received in audience by Tsar Nicholas II. In "Diary of the Mongol-Sichuan journey, 1907-1909" is preserved the following notation:

Received in private audience (incidentally, I presented the Sovereign three volumes of the scientific results of the Tibetan expedition, which had then just come off the press), as never before simple and gentle, I left the Sovereign charmed. At my parting words to His Majesty: "On the example of the Tibetan expedition, which concluded so successfully, permit me to request a blessing for this one too!" – the Sovereign remarked: "I am not bidding farewell. I wish to see you right before departure on your long journey, for surely there still remain many affairs to attend to and time for equipping the expedition." ⁽⁶⁾

In fact, on 29 October 1907, before departing on the expedition, Kozlov was again received by the Tsar and by Heir-Apparent Aleksei.

The expedition project was confirmed by the Tsar on 2 October. For the two

years' duration of the expedition 30,000 rubles was issued from the treasury; its composition was confirmed at 14 persons. The expedition was given arms-12 rifles with 15,000 cartridges and 6 Smith-Besson revolvers with 600 cartridges.

The leader of the expedition was granted an official authorization, the text of which read:

May it please God, We, Nicholas II, Emperor and Autocrat of All Russia and so on, declare hereby to each and every one, to whom it is given to know, that the bearer of this the leader of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dispatched by our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by way of Kiakhta and Urga to North-Western China and Mongolia and to return thereupon by way of Lanzhoufu and Urga back to Russia, Lieutenant-colonel of the regiment of Royal Grenadier Guards of Emperor Alexander III, Peter Kuz'mich Kozlov, departs across the frontier and will return later to Russia. Ten persons as crew accompany him. On his behalf we amicably call upon all higher oblasts and invite each before whom they appear. Our Military and Civilian administrations most mercifully command not only to allow P. K. Kozlov and the ten-person crew to proceed in all places freely and without restraint, but also to show him every goodwill and assistance. In evidence of this and for smooth passage is granted this passport with the state seal affixed below. In St. Petersburg, on the day of 12 August in the year 1907 by Decree of His Imperial Majesty,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Seal Signature[®]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Russia and of the Tsar personally to the expedition, and their support for an undertaking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is explained in large part by the impact which the achievements of these expeditions had in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world.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not undergoing investigation by Chinese scientific powers at the level of the then contemporary European scientific standar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uropean scholars. As a result, from the numerous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19th and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ies – English, German, French, Russian, Swedish, Japanese, etc. –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were obtained in the areas of geographg, ethnography, history, and natural sciences (botany, zoology, etc.). Russian

participation in thi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movement was weighty and greatly raised the prestige of Russian science.

It would be unjust not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act that such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frontier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ook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European – American – Japa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essure on China, and that topographical surveys of localities by the expeditions, their reports on the state of local affairs could be used for military ends as well. In allowing these expeditions, the Qing government made definite concessions. But now, almost 100 years after such expeditions took pla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discovery and preservation for science of Dunhuang and Khara-khoto alone are a most preciou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for Chinese science. That which was most likely to perish irretrievably was saved and preserved down to our day, however incomplete.

I wish especially to emphasize that the expedition operat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Qing) central authorities and under the control of local authorities. Members of the expeditions received permission to carry out research and passports from the central Chinese government. "Chinese passports," wrote Kozlov about the Mongol-Sichuan expedition of 1907-1909, "were received from the Peking government through the offices of the Russian diplomatic mission in Bogdo-khan." The Russian embassy in Peking "informed about the expedition those local Chinese powers through whose areas the expedition would be passing."

Thus through the territory of Mongolia to Urga (Ulan-Bator) the expedition moved, using the Mongolian postal service. "Thanks to the border commissar at Kiakhta...P. E. Genok, who communicated in a timely way with the Chinese-Mongolian authorities, the personnel of the expedition set out handily on Mongolian postal horses...accompanied by the baggage of the expedition, carried on camels specially hired for the expedition from Mongolian contractors." They hired 40 camels.

The expedition did not move through Chinese territory at will. Thus the amban of the city of Xining was informed beforehand of the arrival of Kozlov's expedition. In the archives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is preserved a draft of a letter from Kozlov to the authorities in the province of Gansu, with the heading "To the Commission on Foreign Affairs of Gansu Province." The text of the letter says, "In consequence of a

letter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from 15 November 1908, I beg to inform that I, Russian traveler and Lieutenant-colonel Kozlov, in fact had discussions with the Xining qinchai as well as with the tongpan (vice prefect – RWD) of Guidui about our route of travel from Guidui through Labrang to Songpanting." The letter was dated 22 November 1908.

In this fashion, it bears emphasizing, all movements of Kozlov's expedition were accomplished with the complete knowledge of Qing authorities and no arbitrary actions were permitted.

As far as the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 of Khara-khoto are concerned, all that was likewise done with the knowledge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Mongolian prince in Qing service, Baldyn-Dzasak, and the Torgot beila, who ruled the territory entrusted to them as Mongolian territory, a constituent of the Qing empire under spe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Lifanyuan.

At the beginning of March 1918, the expedition reached the borders of Ugoldzintologa,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local Mongolian prince Baldyn-Dzasak. When the conversation touched on the possible further route of the expedition and the prince realized that Kozlov wanted to gain the mouth of the river Edzin-gol, he asked:

"Why do you want so much to go to Edzin-gol, and not directly to Alashan-yamun, where the road is better and it takes less time as well, and therefore fewer difficulties and deprivations and also fewer material losses. No doubt," added the prince, "you expect something of great interest at Edzin-gol?" "Yes!" I answered Baldyn-Dzasak, "You are right: some very curious ruins of an ancient town are there!" "And how do you know about that?" inquired my interlocutor. "From books by our travelers and from letters of my friends," I replied. "Indeed there is!" the prince said slowly, plunged in thought. "I heard about Kharakhoto from my people, they have been there; in truth a town exists, enclosed by walls, but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covered over with sand ... I have been told that Torgots go to the ruins there and dig and search for buried treasures. I've heard something to the effect that someone even found something. Go and see, and maybe you will even find something remarkable. I don't think that the Torgots will block your route to the ruins, nor will they block even your

excavations ... The Torgots lately have been quietly hiding Khara-khoto and the old path to Alashan-yamun."

That was the sum of the conversation. But originally both the prince and two of his advisers, as Kozlov wrote on 12 March 1908 in a let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Go [Geographical Society – RWD], "tried to persuade me that in the direction I desired there was no road." Gifts helped, foremost a revolver and a rifle, entertainment and listening to the gramophone, and a letter to the Russian embassy in Peking with a request to address the Qing authorities about conferring on Baldyn-Dzasak the higher rank of "ulusun-tushi-gung" which would have increased three-fold the upkeep that he received from the Bogdo-khan court. Hence Kozlov, like his predecessors, could not have found Khara-khoto without the help of Baldyn-Dzasak.

His second helper on the path to Khara-khoto was the Torgot prince, Torgot-beila Dashi. As Kozlov observed later in a public lecture, Dashi "to a significant degree rendered assistance to the expedition, and made it possible to find Khara-khoto." After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Kazak-Buriat Badmazhapov, the Torgot-beila "charged his ... guide to convey the expedition to the neighborhood of his headquarters ..., and promised full cooperation ... in reaching the ruins of Khara-khoto." The Torgot-beila was indirectly subordinated to the Lifanyuan.

On 1 April 1908, five members of the expedition, Kozlov himself, A. A. Chernov, N. Ia. Napalkov, and the Kazaks Ivanov and Madaev accompanied by the guide Bata departed for the ruins of Khara-khoto by way of the margins of Toroi-onts. Bata "had been at the dead town many times." From the expedition's camp to Khara-khoto was about 60-65 li.

Halfway we began to encounter traces of an agricultural or settled culture-millstones, signs of irrigation canals, fragments of earthen and porcelain vessels, and so on. But pounded earth structures engaged us most of all, especially the suburgans, situated singly, by two, or by five along the rode, of old leading to Khara-khoto, that monument of the past buried in the desert sands. As we approached the cherished goal, our excitement mounted apace. In three versts [about 8 li – EIK] we crossed an ancient dry riverbed ... on the elevated band of the river stood the ruins of the citadel of Altan-khoto, where, according to legend,

was once situated the cavalry guard detachment of Khara-khoto. By the sides of the desiccated riverbed, it appeared, earlier had been tucked a valley with a farming population. Here, at last, appeared the town of Khara-khoto itself, situated at the bottom of a terrace of coarse sand. Above the northwestern corner of the fortress rose the main conically-shaped suburgan, in a row of smaller adjoining ones, built likewise on the wall and next to the wall outside the fortress. As we got closer to the town fragments of vessels appeared in greater numbers; the view of the town was hidden by tall sand dunes. But then we climbed the terrace and before our eyes appeared Khara-khoto in all its outward charm.

Judging by Kozlov's description, the walls of the town

were strictly oriented to the north, south, east and west, forming a regular square, of which each side was about a verst [approx. 2.5 li - EIK].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walls of the town had gates, protected by L-shaped projections difficult of direct approach, and situated not directly one opposite the other, but the eastern a bit to the north, and the western a bit to the south of the center of the walls. From west to east two main parallel streets bisected the town, starting from the gate ... The powerful walls of the town, 6-8 meters in height, were crowned by stately suburgans in their northwestern corner. The walls gradually narrowed toward the top, and their thickness, reaching 4-6 meters at the base, diminished by one half ... Each wall had several bastions ... Small remains of former structures, protruding from the sand, refuse, and earth, fairly clearly delineated the former streets of the town.³⁸

During the initial inspection of the town, the members of the expedition found fragments of earthen and porcelain vessels, scraps of articles of cast-iron, iron, copper and silver, bricks, cash, paper money, and "here and there cult objects."

The expedition remained in Khara-khoto from the first to the 13th of April, 1908. Overall the survey and excavation lacked a scientific archeological foundation. As Kozlov himself wrote in his diary, he and his people "dug, rummaged, broke, smashed." There was no precise fixing of the location of finds, although in the map of the town Kozlov indicated Ruins No. 1, No. 2, and No. 4 in the northern half of the town, somewhat to the east of the central north-south axis, Ruin No. 3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town, suburgan B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town and suburgan A in its southwest corner, ruins of idols [Buddhist statues-RWD] near the southern half of the western walls. Judging by various references, there was found:

Ruin No. 1: "Buddhist images, drawn on linen," "heavy, coarse metal cups and scraps of manuscripts in Xixia writing."

Ruin No. 3: "sheets of Persian manuscripts, ... fragments from the famous collection of stories, "Seven Sages" (Kitab-i-Sindbid), "Islamic manuscripts and artistic book bindings."

Suburgan A: 3 books and 30 notebooks in Xixia script, "an image on linen," "Appearance of Amitabha," "an image in Chinese style on silk," "a large, slightly smiling attractive mask and a series of other heads and masks," "a Buddha head, gilded with dark blue hair."

Suburgan B: "several specimens of glass-like eyes that had fallen out of the earthen statues," "eyes of rock crystal or topaz, nicely polished," "large, flat tsa-tsa."

Summarizing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visit to Khara-khoto, Kozlov remarked:

In the course of several days passed in the ruins of Khara-khoto, overall the expedition enriched itself with all kinds of objects: books, letters, papers, metal

monetary tokens, female decorations, some household implements, images of the Buddhist cult, and so on. In terms of quantities, we gathered archeological

material that filled ten 16-kilogram mailing crates, prepared then for shipping to

the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good, amicable relations of the Torgot – beila with the expedition, I at once sent through the Mongolian post to Urga and beyond to Petersburg, in several concurrent packages, news of the actual discovery of Kharakhoto and its finds, and enclosed samples of writing and religious painting for immediate study and identification.

In December of 1908, while on the border of Guidui, Kozlov received a response from the deputy chairma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A. V. Grigor'ev. Kozlov wrote in his diary:

A. V. Grigor'ev, as assistant to the chairman, notified me ... about my labors,

or their results at Khara-khoto. It turns out that it was the Tangut capital of Xixia, which existed from the 11th to the 14th centuries. Evidently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is very satisfied with this discovery, and it is decided to propose that I return again to the historic town on the way back ... to augment the materials of such great interest already obtained and partly in Petersburg. [®]

The diary entry is duplicated in a draft letter of 23 December 1908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in London. Kozlov informed the British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that the third stage of his expedition would be devoted to

additional excavations, more protracted than before, of the dead town of Khara-khoto. For the time being I hav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the deputy chairman of the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acquaintance with the writing and other documents that I sent to Petersburg, he hastens to gratify me that the Khara-khoto I discovered is Xixia, the capital of the Tangut state, which existed from the 11th-14th centuries ... When You, dear sovereign, receive this letter, your humble servant will be on the road to Southern Mongolia and within a further two months already at his beloved ruins of Xixia.®

With all due respect to my native colleagues, to this day I cannot understand who decided, and on what basis, the Kozlov "found" the capital of the Tangut state. As early as 1833 the large monograph of N. Ia. Bichurin (o. Iakinf) was published, which contains considerable Chines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Xixia,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and from which it was entirely clear that the Xixia capital was Ningxia, as it was called in Kozlov's day, the present-day city of Yinchuan. Unfortunately, this error continues to occur in the literature connected with the name of P. K. Kozlov. From Tangut primary sources, we know that Edzina (Khara-khoto, Chin. Heishui) not only was not the capital of Xixia, but was rather a third-rank town, a place of exile for hard labor. It perished in 1374 in a battle between Ming China and the Mongols, desirous of recovering their lost power over China.

On 15 October 1908 in a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were heard three reports, by S. F. Ol'denburg, A. I. Ivanov and V. L. Kotvich, about the initial studies of the finds from Khara-khoto.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manuscripts extracted from the ruins, were, besides Chinese, written in an unknown language, at least none

of them could read it, although the form of writing was known." ®

A. B. Grigor'ev informed Kozlov that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esent discovery, the Council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has authorized me to propose to you that you not ensconce yourself in Sichuan, but rather return to the Gobi desert and continu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heart of the dead town. Do not begrudge either strength, or time, or resources on the further excavations."

At the end of May-June 1909 Kozlov, fulfilling the charge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returned to the Khara-khoto region. On 27 May he made a note in his diary: "I write ... the time is five o'clock, but the heat is making itself strongly felt and involuntarily induces reflection on how we will work at dead, melancholy Khara-khoto." June 4. "At ten in the morning through the dusty haze we saw, at last, the familiar grey walls of Khara-khoto, and within half an hour we had already entered into the fortress and not far from the western gates and the angle of the NW suburgan had set up our tents."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 of the town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Torgot-beila. In a letter of 8 July 1909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Kozlov made special mention of this help:

The expedition was able to pass through the desert to a hitherto unknown corner of Central Asia, over a rather long road and at a hot time of year, thanks only to the excellent relations of the local Torgot-beila with us, which allowed us to hire, from among his subjects, diggers, water-carriers, provisioners, etc. Thus the dead town momentarily came alive and established contact with the inhabitants of Edzin-gol, of which its closest branch, the eastern, flows twelve versts from Khara-khoto. This time our camp took shelter not in the center of the fort, as before, but somewhat closer to the western wall beside the ruins of a large fangzi (house).

In the book he wrote, "I renewed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Torgot-beila, as before the chief in Edzin-gol, ... secured his cooperation in hiring digger-workers, and also engaged Torgots to supply us daily with water and sheep from Edzin-gol."

For his part, the Torgot-beila, as representative of local authority, did not ignore

the work of the expedition; he regularly sent officials from his government to Kharakhoto to "find out how the Russians are doing in the ruins."

At the start of the work, Kozlov noted in his diary:

From the first day we began to find writing, primarily Chinese, paper money, dishes, old weapons and so on. We also came across a small metal Buddha, dokshit, a small square Tibetan notebook of splendid gold writing was found.

One can say that last time, outwardly at least, we investigated Khara-khoto in a rather orderly manner. Now we have found neither sneeze nor bead nor metal ornaments. Standing on the wall of Khara-khoto, you can see how beautifully and conveniently this town was laid out. In the NW region: the prince himself, along the northern, western and southern walls were situated prayer structures, suburgans ... In the SE corner stables with the garrison section ... the main thoroughfare lead directly from a tall central building, which was encircled by a cross street and then by a longitudinal [street extending] to the eastern gates.®

The work was organized by two groups; the hired Mongol worker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Kazak-Buriat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ruins of houses along several streets of Khara-khoto, and occasionally tried to dig deep wells in places designated by me." The Russian group led the excavation both inside the town as well as "carrying out the investigation outside the Khara-khoto walls, at distances both near and far."

Judging by his diary, Kozlov was not present on a regular basis and the finds, even if interesting, were not fixed in any way in the plan of the town. It appears that Kozlov imagined he understood how Tibetan writing looks, but Chinese and Tangut graphs he did not much distinguish. For him it was all "Chinese stuff."

June 9. "Just now, at around four o'clock, workers appeared before me, I spoke with them, and now they have all gone to their tasks. Interest mounts steadily, and I will go to the digs. It is hard to sit in the yurt, when you hear the sounds of those working and the clatter of shovels in the earth ... the manuscripts we chance upon are most often other Chinese,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y will tell us. Most of all the Tibetan ones interest me, both books and manuscripts, but ... in those we have not yet been lucky. As for today it was entirely Chinese stuff, the interesting Tibetan letters turn up charred, those graphs

that were spared lead to the thought of origins other than Tibetan ... We will find out in Petersburg."®

On 11 June, to an earlier comment about the absence of any burials, Kozlov added: "we have come across no clothing or shoes." The cool, windy, even at first rainy weather turned hot. On 12 June Kozlov wrote a letter to A. A. Dostoevskyi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Dear Andrei Andreevich! On the twenty-second of May (3 June - EIK) the expedition arrived at Khara-khoto and has set up camp within its historic walls, in the interesting ruins. In our year-long absence from the old town no one has dropped in: its ruins look in exactly the same condition as when we left it. Untouched even are those objects extracted by us from beneath the wreckage of debris, which we left as unneeded. As in the first sojourn and so now,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xpedition Khara-khoto has come to life: people started moving, instruments started pounding, dust began flying through the dry air. In the week just past we have succeeded in replenishing the previous archeological collections, already sent to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this time we have obtained and continue to obtain writing, including Arabic too, as well as monetary tokens and cult objects, etc. In one of the projection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fortress walls we came across an interesting little temple with earthen ornamented Buddhas opposite the entrance and curious wall paintings; unfortunately the paintings are glued to the clay and it is not possible to avail ourselves of them. Not only my companions but also the natives have become imbued with interest in the excavations. We talk only about Khara-khoto: in the evening, about what was found that day; in the morning, about what will be found. Time flies swiftly. After the nocturnal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we go right to sleep. We awake practically at dawn and in the relative cool conduct our work. During the day we rest, otherwise we languish all the more in the debilitating heat, such that in the shade the air warms to 37 degrees C and more, and the surface of the ground becomes incandescent in the sun to above 60 degrees C. Dust or sand raised by the hot air, positively enervat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breath easily and freely in the mornings and evenings, feeling ourselves yet capable of carrying out further labors at Khara-khoto.

Because after days of work in the town's ruins the finds were not as abundant as would be desirable, Kozlov sent people to investigate the vicinity and took the decision to open the large suburgan, which was located about 400 meters from the western wall of the town,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dry river channel. The suburgan was about 10 meters high and consisted of "a pedestal, the middle, and a conical, partially destroyed top, wrecked either by time or by treasure hunters," that is, attempts to open the suburgan evidently had been undertaken also by earlier local inhabitants. If they had succeeded, then it is very likely that science would have been deprived of that collection of religious paintings, sculpture, and books which it now has at its disposal.

On 12 June began the excavation of the suburgan, the same in which, we may suppose, was found the majority of books in the Xixia language and in Chinese.

Passing around the Mongols who had been working, I headed for my companions who were investigating one of the largest suburgans standing west of the town at a distance of 200 fathoms [1 Russ. fathom = 7 ft.]. The investigation had revealed that it was rich in Buddhas and Chinese writings, so many of which had been carried to the bivouac by 9:00 in the morning that I at once went out to them, sorted, cleaned of accumulated dust, and prepared them for packing. Similar to what had been in the suburgan of the previous year, in this one were all kinds of books, notebooks, scrolls, paintings. A very old mandala turned up. Probably the roof of the suburgan's chapel fell in and overturned the Buddhas, or else they we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cattered about so, books and scrolls and paintings tossed every which way. ⁽⁶⁾

Work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suburgan continued for nine days and was completed on 20 June. The books were carried to the camp in a huge tarpaulin, and sorted there. Without a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s, this "sorting" by format or yet by some characteristic unknown to us brought,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chaos which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eliminate completely to this very day, Kozlov himself did not observe the excavations on a regular basis.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interior furnishing of the suburgan there is only one notation in the diary from 15 June.

Today I strolled out to the suburgan to see if much remained in it of archeological goods, and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my fellows are right, having observed that but a mere half has been taken. In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stupa all has been cleaned, arranged round about, seated, large wood-earthen Buddhas, and in the middle books, writings, books – large, small, in bindings or boards, as notebooks or scrolls.

If we compare two diary entries from 12 June and 15 June, we will observe that according to the excavations, Kozlov writes now about the disorderly "scattered" books, now about books arranged in a particular order. Later, when the news about the celebrated finds, "the pearl of my independent labors in Central Asia," as Kozlov himself wrote, flew around the world and Kozlov attracted real world fame, he inclined in his recollections even to an exemplary order in the suburgan: "We opened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It was packed with treasures. Hardly had we removed its roof, when books appeared, standing by the hundreds all on shelves in complete order in silk bindings. We found more than 2000 books. "

In the book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Kozlov stresses that in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suburgan everything lay in disorder, whereas in the lower portion there was some order:

All the riches collected in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books, images, statues and other objects ... lay in extreme disorder. In a still lower part of the storehouse was marked a kind of system: part of the earthen statues were positioned at one level, with faces to the inside, resembling lamas performing a religious service in front of the great sheets of Xixia manuscript writing, deposited by the hundreds one on top of another.

The higher up, the more chaotically was grouped the riches of the suburgan, books lying in piles and singly, tightly pressing against each other or against images, coiled up individually on wooden rollers. Both the books and the images were placed in the most diverse positions, like the statues, enclosed among them. Only at the base of the suburgan were noticed some books carefully wrapped up in silk cloth.

For the time being one can suggest that both the testimony of chaos and of order is true. At the bottom of the suburgan ("on the ground" in Kozlov's expression, a

square of roughly 3 by 4 meters, or about 12 square meters), where the burial was found, around it "sat" wood-earthen Buddhas, and before them "for reading" were placed books – the diary entry of 20 June says that "the statues were found" on a raised interior floor of the suburgan, around a landing in the center of which stood the pillar." On the walls of the lower part of the suburgan hung icons. Sculpture in the actual proportion of the human body, it seems, was by Kozlov's admission superior artistic work. An entry of 19 June from the diary: "I write in delight of all and those graceful Buddha heads. Some of them are so artistically executed, that they stand and look as if alive ... From the fa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artist-sculptor had a feel for classical beauty." The icons removed from the suburgan were stunning in their vividness and freshness of beauty; "All," in Kozlov's words, "were flooded with a soft blue and soft pink radiance." Yet it was worthwhile to move the icons ... and the dyes crumbled.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 books and icons, statues, things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suburgan could have been in disorder. Obviously, in spring of 1226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ian invasion, things from the city's temples were hidden in the suburgan and, possibly, the city administration. It is hardly likely that such a great quantity of Buddhist and other texts would have been placed in the suburgan at the very beginning. From the notations of Kozlov, it is clear that, although there were two suburgans opened, and there were finds of writing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town, the mass of written documents come from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On 19 June Kozlov made the following notation about the finds in his diary: "I would have taken everything, but did not have the capability." That part which he was unable to cart away, Kozlov buried in the sand. As to where the place is located where was everything was hidden for future retrieval, in the diary is preserved the following notation:

Before our departure from Khara-khoto we took from that room [at the southern wall of the town - EIK] our remaining treasure and hid it at the slope from the fortress farther south of the suburgan right along the wall, covered with sand. I did this just in case.

Apparently something was buried right in the southern wall. We read in the diary

entry of 11/23:

Today we collected and hid everything that was brought to the bivouac, that is, every last thing from the suburgan, and carried it to the southern [at the wall of the room] interior part of the wall, to the niche. There we placed several Buddhas, artistically executed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There lie heads [up to 30 or more Russ. pounds in weight, that is, 12 kilograms or more – EIK] and so on. There are many trifles, in general about fifty items. ^(a)

It is possible, however, that whatever was hidden in the southern wall, Kozlov, however incompletely, took away at the time of the second visit to Khara-khoto in 1926. In the shorthand notes of the report, which Kozlov read on 8 December 1926, we notice the following notation: "We thought that this time we would find nothing, but overall we found rather a lot, mainly statues and artistic heads."

But the things buried outside the southern wall, at its foot, and above all those great sculptures which were in the depths of the suburgan, apparently have never been found to this day. Chinese archeologists should carry out investigation and excavations at the southern wall.

Above we have already written that when the suburgan was excavated, it was observed that in the center of the platform at the base of the suburgan was stuck a wooden pole, around which grandly sat sculptured representations of monks, with faces turned to the interior of the suburgan and who looked like lamas performing a religious service. Before them lay books, evidently the pothi-book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many sheets of manuscript books, laid one on top of the other. These were books in that form which was widespread in India and Tibet. At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suburgan a skeleton was noticed in a seated posture. In the diary Kozlov writes:

We at last opened the head of the seated person, a *gegeng* probably, in whose honor the suburgan was erected. The skull allows one to say that the deceased was about 40 years of age and belonged to the type or tribe of Tibeto-Ari-Mongolian. The *gegeng* was buried in the seated posture, against the northern wall, in an honored place, at the foot of a Buddha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and

greatest size, with the faces of Buddhas turned toward the center, and the gegeng to the south.

Since the skull from the suburgan was sent to Russia, it was more carefully studied. Anthropologist F. Volkov came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 skull is in very good condition. Some narrowing at the base, rounding, very weakly developed bony projections, very small teeth, the overall small size and fine features of the face of the skeleton incline to support the opinion that this skull belonged to a woman, in spite of the superciliary arch, rather well developed for a female skeleton, which might raise some doubt. Judging by the condition of the teeth and the skull joints one can estimate the age of the deceased at close to old age (more than fifty years). §

The skull was kept at the Institute of Ethn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where it was lost, very likely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blockade of Leningrad. In any case, the author of these lines does not know if it was examined a second time.

Professor L. N. Men'shikov has put forward the romantic hypothesis that an empress of the Tangut state, Empress Luo, widow of the Tangut emperor Renzong (r. 1139-1193), was entombed in the suburgan. Empress Luo was dowager empress during the reign of her son, Chunyou (Huanzong, r. 1194-1206). After the first Mongolian attack on the territory of Xixia in 1205, Chunyou, not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his mother the empress, was deprived of power by his cousin Anquan (Xiangzong, r. 1206-1211). Basing himself on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interred was female, Men'shikov considers that "we can be sure that after her son was overthrown, she was distanced from state affairs. Her further fate is unknown, but several data ... suggest that she became a Buddhist nun, was exiled to Khara-khoto and after her death was buried in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From this supposition Men'shikov reaches a substantive conclusion: "the collection in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was her private library," "we are obliged to this woman for the fact that these books from Khara-khoto survived to our day."

The hypothesis of Men'shikov is a supposition, a clever supposition but nothing more. But it can only be refuted if the skeleton from the suburgan is found and if a qualified anthropological examination is carried out, firmly establishing that the skull

is not female (we saw that U. F. Volkov had some doubt of it), but male, which Kozlov was initially inclined to think. If a woman was really buried in the suburgan, and if we allow that the woman was the Empress Luo, then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of the books could be from her personal library. We will note only that, among the books in Xixia, the name of Empress Luo can only be affirmed twice, both times as the bestower of the books (once it was mentioned in the colophon and once a seal recording the bestowal was affixed). In both instances these coule be not her own personal books, but rather books which were distributed by her, as by other empresses and donors, about which there is lots of evidence. Books were disseminated throughout the state. In the conventional expression of prefaces and colophons, they were "distributed among the officials and people." The presence of such books, strictly speaking, does not mean that these were necessarily the personal books of the Empress Luo or any emperor who disseminated the edition of the book.

Before the departure of the expedition from Khara-khoto, the Torgot-beila visited the ruins of the town. "On the day of the expedition's departure on its next journey," wrote Kozlov a little la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the summer sunrise had just reddened the east, when the Torgot-beila came to me on a farewell visit, accompanied by his heir apparent, an attractive, appealing thirteen-year old boy and his entire staff of officials, fine young fellows mounted valiantly on excellent great horses of the Dzungar breed. I was genuinely happy to have the chance personally to thank this Mongolian prince, who had repeatedly shown us more cooperation and consideration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Kharakhoto than during the first visit of the expedition.

About the approximate quantity found and brought back from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we know from the notes of the public report by Kozlov on 8 December, 1926.

Seventeen years ago 40 camel loads were brought out from the ruins of my Khara-khoto. What did they carry? They carried a superbly preserved library consisting of 24,000 tomes ... I remember the joy of sinologist A. I. Ivanov, who, upon finding it (the Tangut-Chinese lexicon of 1190, "Zhang zhong zhu" – EIK), loudly cried out, "Petr Kuz'mich! In your library I have made a discovery, I have found a dictionary which allows one to read 700 volumes." If one adds

another 537 paintings to that library, ... then it becomes clear how great is the wealth which comprised that celebrated suburgan.®

In fall of 1909 th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were delivered to Petersburg and placed in the building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1910 an exhibition of objects of the Buddhist cult and books found at Khara-khoto was organized by the Society. Thinking of the fate of the unique finds brought back from the expedition, Kozlov wrote from Moscow to S. F. Ol'denburg at the end of winter, 1910:

All the Khara-khoto material is kept for the time being in spare rooms at the Society, upstairs. A. I. Ivanov and V. L. Kotvich are working on their preservation. After searching, Ivanov found a dictionary which enabled the decipherment of Xixia writing...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eal with Khara-khoto is still not resolved. Personally I am inclined toward the academic Asiatic Museum. I think that you are similarly inclined, no? ®

In fact, in the end that is what happened. All the books and monuments of writing were given to the Asiatic Museum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which today is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whereas the icons, sculptures and monuments of material culture at first were located at the Ethnographic section of the Russian Museum, and then ended up at the State Hermitage.

Professor A. I. Ivanov was the first to undertake the decipherment and identification of Tangut texts in the Asiatic Museum. Besides the dictionary Far. han heshi zhang zhong zhu, he discovered both Tangut explanatory dictionaries, like Yintong ("Homophones") and Wenhai ("Sea of Writings"), as well as thematic ones. In an article of 1918, "Monuments of Tangut Writing," Ivanov remarks:

- 1.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arranged by initial (labial, dental, sibilant) sounds, without detailed explanations.
- 2.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composed on the model of the famous Chinese dictionary *Guangyun* and carrying the title "Sea of Words."
- 3. Dictionary, arranged by matters (without headings).[®]
 Reference is to the dictionaries *Yintong*, *Wenhai* and *Zazi*. By 1918 Ivanov had

compiled a dictionary (Tangut-Chinese-Russian?) of three thousand Tangut characters. The dictionary was even given to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but in the years of the civil war it was not published. In 9/2/1935 Ivanov wrote to V. M. Alekseev: "It is a pity that Nevskii is not familiar with my manuscript, which lay at the Academy from 1919 to 1922, while I, retrieving it, have decided not to write anymore. The manuscript is with me, with comments about its reception and return." In so far as the manuscript of the dictionary was at Ivanov's home, evidently it disappeared at the time of his arrest in the summer of 1937. Along with Ivanov, initial work on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was undertaken by the Mongolist and Manchu scholar V. L. Kotvich, and also S. F. Ol'denburg.

Later, study and publication of monuments of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in the Chinese and in the Xixia languages took place separately. For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monuments of Chinese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see the monograph by L. N. Men' shikov; for the Tangut part, there are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over many years.

After Ivanov, at different times A. A. Dragunov, N. A. Nevskii, Z. I. Gorbacheva, E. I. Kychanov, A. P. Terent'ev-katanskii, and K. B. Kepping worked on the analysis of books in the Xixia language. The author of these lines has prepared a manuscript of a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Buddhist portion of the collection.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by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monuments of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Chinese and world scholarship will have access to unique material from the 11th-14th centuries, which without doubt will shed new light o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exist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Xixia state, as well as on the vanished culture of the Tangut people. It so happened (the circumstances of which were explained briefly above) that part of the cultural monuments from the territory of China ended up beyond the borders of the country; however, this is a widespread phenomenon in the fate of the cultural monuments of many peoples. Now, upon returning through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a part of these cultural monuments to the Chinese researcher and the Chinese reader, and indeed to the entire world scholarly community. I am convinced that Chinese colleagues and all educated people of China, all Chinese who love and are proud of their culture, and colleagues abroad will pay a tribute of respect to the Russian

traveler, geographer and naturalist P. K. Kozlov, who found, valued, and handed over to the hands of science genuinely uniqu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I suggest that those Russian scientists also deserve thanks who in the difficult conditions of war, revolution, and blockade preserved, gradually analyzed and restored the rare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wrote an inventory and compiled the first catalogues.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knows and values the labors of Chinese specialists of Xixia, Luo Fucheng, Luo Fuchang, Wang Jingru, Shi Jinbo, Li Fanwen, Bai Bin, Huang Zhenhua, Nie Hongyin, Chen Bingying, Luo Maokun and many others. Much has been done, but even more must be done. Unfortunately, the means are lacking for a full and complete restoration of books from Khara-khoto, and here is where even more and difficult work needs to be done. Hundreds of fragments, which no one has yet looked at, must be identified; needed are young enthusiasts who will decide to set themselves to the task. But gradually the circle of researchers on Xixia culture will widen and we will see interest in this culture not only in China, Japan, and Russia but also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France, Sweden, and Holland. The author of these lines is convinced that when translations made in the Xixia language from Tibetan become the property of science, then the interest in Tangut texts of researchers in Tibetan culture and Tibetan Buddhism will grow. Th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are invaluable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Far Eastern regional cultures, whose center was Chinese culture, a vivid example of the interaction of local cultures and the cultures of China, and of the formation on this soil of new forms of culture as elements of Far Eastern culture. We can be certain that the high-minded labor of workers at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which will open access to the monuments of Xixia culture to all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m, will elicit the deserved, great esteem of the world scientific community.

E. I. Kychanov

June 23, 1994, St. Petersburg

Translated by Ruth W. Dunnell

Notes

- ① P. K. Kozlov, N. M. Przheval'skii, first explorer of nature in Central Asia, St. Petersburg, 1913, p. 84.
- ② G. N. Potanin, Tangutsko-tibetskaia okraina Kitaia i Tsentral'naia Mongolia: Puteshestvie G. N. Potanin, 1884-1885 (The Tangut-Tibet border of China and Central Mongolia: the travel notes of G. N. Potanin, 1884-1885), St. Petersburg, 1893, p. 464.
- ③ V.A.Obruchev, Tsentral'naia Aziia, Severnyi Kitai i Nan'shan' (Central Asia, Northern China and Nanshan), vol. II, St. Petersburg, 1900-1901, pp. 399-400.
- Kozlov,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Mongolia, Amdo and the dead town of Khara-khoto), Petrograd, 1923, p. 100. Hereafter: Kozlov 1923.
- 5 Kozlov 1923, p. 3.
- 6 "Dnevnik Mongolo-Sychuan'skogo puteshestviia 1907-1909 "("Diary of Mongolia-Sichuan journey 1907-1909"), Arkhiv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Archives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fond 18, opis' I, no. 154. Hereafter: "Dnevnik", fond-f., opis'-op., Geograficheskoe obshchestvo-GO.
- ⑦ Arkhiv GO, f.18, op. I, no. 59.
- Arkhiv GO, f.18, op. I, no. 100.
- 9 idem.
- 10 The draft manuscript of the book,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Arkhiv GO, f.18, op. I, no. 61.
- ① Shorthand notes of the expedition report,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9.
- 12 Kozlov 1923, pp. 19-20.
- 3 Shorthand notes of the expedition report,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9.
- (1) Arkhiv GO, f. 18, op. I, no. 49.
- (5) Kozlov 1923, pp. 76-77.
- 16 Arkhiv GO, f. 18, op. I, no. 46.

- ① Kozlov 1923, p. 78.
- 18 Shorthand notes of the expedition report,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9.
- 19 Kozlov 1923, p. 95.
- 20 Kozlov 1923, p. 99.
- ② Kozlov 1923, p. 102.
- 22 Kozlov 1923, pp. 102-104.
- 23 E. I. Kychanov, Zvuchat lish' pis'mena (Sounding only in writing), Moscow, 1965, pp. 27-28.
- 4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4.
- 25 Kozlov 1923, p. 108.
- 26 Kozlov 1923, pp. 108-109.
- ② Kozlov 1923, p. 112.
- 28 idem.
- 29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6.
- 30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0.
- 3 o. Iakinf, Istoriia Tibeta i Khukhunora (The history of Tibet and Koko-nor), St. Petersburg, 1833.
- 3 See Ye. M. Murzaev, V serdtse Azii (In the heart of Asia), Moscow, 1990, p. 12.
- 3 E. I. Kychanov, Zvuchat lish' pis'mena, p. 33.
- 34 Kozlov 1923, p. 406.
- 3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6.
- 36 idem.
- 3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5.
- 38 Kozlov 1923, pp. 546-547.
- 39 Kozlov 1923, pp. 547-548.
- W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41 Kozlov 1923, p. 550.
- W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43 idem.
- 4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4.
- (b)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46 idem.
- 47 Arkhiv GO, f. 18, op. I, no. 65.
- 48 Kozlov 1923, p. 556.
- 49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50 idem.
- (51) idem.
- 52 idem.
- (5)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24.
- M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65 Kozlov, 1923, pp. 555-556.
- 56 L. N. Men'shikov, *Opisanie kitaiskoi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fond P. K. Kozlov, Moscow, 1984, p. 75.
- (57) idem.
- (58)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5.
- 69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24.
- 60 Arkhiv Akademii Nauk, RAN, (Archiv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f. 208, op. 3, no. 274.
- A. I. Ivanov, "Pamiatniki tangutskogo pis'ma" ("Tangut manuscripts"), Izvestiia Rossiiskoi Akademii Nauk (Bulleti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eries VI, 1918, pp. 799-800. In addition to this, see the publication by Ivanov, "Dokumenty iz Khara-khoto (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the Chinese private letter of the 13th century", Izvestiia Imperatorskoi Akademii Nauk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13; "From the finds of P. K. Kozlov at Khara-khoto", Izvestiia Imperator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XLV, 1909, pp. 463-477; "Stranitsa iz istorii Si Sia"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Xixia"), Izvestiia Imperatorskoi Akademii Nauk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11, pp. 831-836; "The sutra 'On the rebirth of Maitreya in Tushita Heaven'", the Tangut text was published and a Chinese translation provided by Ivanov, Petrograd, 1916. To these should be added at least two publications by Ivanov in the German language.

- See Kotvich, "Examples of paper notes of the Yuan dynasty in China", *Izvestiia Imperator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XLV, 1909, pp. 474-477; see also hi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onuments of Mongolian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in *Mongol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pp. 561-565.
- See hi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ersian text "Seven sages", in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p. 566 and his description of the monuments of Buddhist sculpture and icons in the same book.
- Men'shikov, Opisanie kitaiskoi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 65 N. A. Nevskii, *Tangutskaia filologiia: Issledovaniia i slovar' v dvykh knigakh* (Tangut philology: the analysis and the glossary, 2 volumes), Moscow, 1960. Z. I. Gorbacheva and E. I. Kychanov,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Tangut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Moscow, 1963.

史金波

的 理 部 值很高 俄藏黑水城文獻。 著録和拍攝工作。 重要的資料,此乃學術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出版界的一項壯舉。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中國黑水城出土文獻, 0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93 根據協議, 現在這些爲學術界所矚目的文化瑰寶將陸續公諸世上, 中方人員于 1993 年、1994年兩次赴俄, 年與該所達成協議 卷帙浩繁 與俄方專家合作, 爲學術研究提供大量嶄 合作編輯 內容豐富 進 學術 出版· 行 整 全

西夏文文獻,也有相當數量的漢文及少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獻, 俄藏黑水城文獻有八千多個編號, 係中國中古宋、夏、金、元時期的寫本和刻本, 距今已有七百至九百年的歷史, 其中絶大部分是 均屬珍

本、

善本或孤本

上。 市 今寧夏、 子元昊時期勢力更加 不斷壯大。 今甘肅東部、 五 州 唐初 西夏是十一世紀初在中國西北地區建立的封建王朝, 主體民族是党項羌。南北朝時期, 設治所于夏州(今屬陜西省靖邊縣 甘肅大部 宋初 党項族最強大的拓跋部首領拓跋赤辭歸唐,被賜李姓。中唐以後, 寧夏和陝西北部一 臣屬宋朝, 雄厚 陝西北部,內蒙古西部和青海東部地區。 0 夏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元昊正式建國稱帝, 被賜趙姓。後經党項族傑出首領李繼遷、 帶。 中和元年(881)党項族首領拓 党項羌主要分布在今青海省東南部、 , 開始了事實上的地方割據。五代時期 首都興慶府(後改名中興府, 西夏共歷十帝, 跋思恭被封爲定難軍節 李德明父子兩代的發展, 享國一百九十年。 大部分党項人逐漸內徙 四川省西北 國號大夏 夏州党項政權 部的 即今寧夏銀 世稱西夏 度使 廣袤草原 至德明 前期與 管領 勢力 到 Ш

紛 北 争 宋 中 遼 鼎 西 夏 立 盡 , 管 後 期 地 與 域 南 偏 宋 狹 金對 經 濟 峙 軍 , 事 在 中國 力 量 較 中 古 弱 時 但 期 它 形 往 成 往 複 雑 與第二 而 微 妙 國 的 聯合對 新 付第 Ξ 或 L 或 局 面 使 自己 在 當 時 于 各 或

足

輕重

的

地

位

1

特 建于都府 别 番 是漢 文 夏 或「 州縣 Ξ 族 朝 文化 番 文化 ; 又弘揚佛教 和 藏 事 L 族 業甚爲發達 後世 文化 稱 完成了 境 西夏文。 內 0 Ÿ 通 行 國 用西夏文翻譯數以千卷計的大藏經的 一前 西夏注 西 夏 夕 文 , 已 和 重党項族 創 漢 製了 文 也 的傳統民族文化 記録党項族語言 使用 藏 文 0 西 夏 的 統 同 浩大工程 民 一時積 族文字 治者既 極 吸 提 0 獨具 收其 倡 時 儒 稱 他 民 學 爲 民族 族 番 學宮庠 風 文化 格 字 的 L 西

夏文化是中國中古時期歷

史文化燦爛輝煌的

章

焚掠 作爲 落 族之中而消亡 數 民 和 族 末帝李 十三世紀初 建 個國祚近二百年、 使大批 立 的 峴 Ē 西 的 , 西夏文也因不 朝 夏 被 文獻 殺 西 多知 夏經 而宣告滅 歷了 遼 有完備典章制 文物遭 ·再使 新崛 金 亡。 到 , 用 毁損 ②蒙古軍 而 起的蒙古帝國鐵 鮮 而變成無人可識的 知 度 0 的王 西夏 元代修撰 隊爲報復西 朝 0 元 , 很 遼 騎的 明 多重要史料未能 死文字 夏的 時 宋 幾 期 度衝擊 金三史, 激烈抵抗 党項 , 公元 族 西 保 勢力逐 在占 夏僅 存下來 1127領 漸 作爲三史的 年, 初 衰微 , 期 致使 進 終 , 行 以 最 後 世 附 首 後 了 1都中 對 傳略 殘 融合于其 酷 中 興 古 作 的 府 時 叙 屠 期 述 戮 的 民 少 和 陷

罕見 科學 對居 光 現了 遺 于 以 址 著名 建 的 世 , 殿 庸關 (今屬 《堂的 立 九 , 從根 世紀 這是繼敦煌 雲臺 的 和 發展 西夏 內蒙古額濟納旗 重大發現 呈現于世 本上 門 初 的 文、 洞 , 中 壁 最 改變了 ·國學 重 石室發現大批 漢文合璧的 元代六 一要的基石 應是二十世紀 者張澍 西夏資料 前 體 蒙古語 文字石 以 0 涼州感通塔碑 自 珍 匱 巨大的 貴 一乏的 稱「 此 初俄國探險家科兹洛夫 (П.K.Kosnob) 刻 以 文獻後 中 哈拉 狀況 後 西 勇氣在 夏 豐 浩 文字 國學資 0 甘 特 從 富多采的 肅武 次 L 的 而 料 收獲數量 $\overline{}$ 研 拉開了 挖掘 的 威清應寺的 究引 又 西夏歷史文化 出 獲取新的 起了 次 如此 的大批 重 ·學術 大 巨 碑亭中 大、. 文獻 發 界 西夏資料的 撩 現 的 開 內 和文物 0 重視 率領的考察隊 啓封了 黑 容 7 朦 如 水 0 此 朧 城 0 4 序幕 豐 這些文 真 前 發 的 Ē 現 富 面 人 0 封 紗 的 的 使 ③ 十 人獻 在 資料 西 砌 文 夏研 以嶄 獻 西 和 九 的 夏黑 世 文物 是 壁 是 新 究 紀 壨 西 夏 + 水 末 的 步 的 , 發 姿 重 城

水 城 遺 址 位 于 今內蒙古 自 治 园 額 濟 納 旗 政 府 所 在 地 達 蘭 庫 布 鎮 東 南25 公里 的 荒 漠 之中 0 黑 水 登

堂人室,

人

面

威 戰 境中幸存下來的 乃」之異寫 因 1286) 古稱 脅着 失去了生存的 争堵斷了 軍 司 人們 意 弱 在 水) 的 下 譯 此 , 其源 生存 曾流經巴 距 成漢 設 北 基 亦 亦 方 本條件 集乃城約 仍爲西夏語音 語 集 的 但高温乾燥却是保存古代文獻 爲 乃路 軍 丹吉林 事 而減少 黑 總 重 水上 10 管 鎮 沙 公里處的黑水河道, 府 漠 ,最後這座城市終于成爲無人居 0 0 這是中國至今保存西夏語音的重要地名 西夏寶義 元代沿用 ⑤ ¬ 灌溉着農田草場, 亦集乃」爲西夏語音,「 元年(1226) 西夏舊稱, 文物的 河水改道北 使這裏成爲宜農宜牧 今稱 蒙古軍攻 最 額 好條件。 濟納旗 住 流 的 , 亦集」 破黑 緑洲逐漸 死城。 的 黑水城文獻就 水 , 額濟 黑水城極端乾旱的 十四世紀四十年代末 的 ·城 , 即 緑 被沙漠吞噬 納」三字 洲 元 水」 世 是 西 祖 意 夏王 在 至 這 實爲 元二十三 城中 種 朝 乃 自 特 于 「然條 此 殊 的 由 設 居 亦 的 件 年 民

疇 門 寬 能 米 段 大 相 上 明 的 /城 顯 連 以 9 南 東 城 這些古 爲黑水城增添了壯觀景象。 內蒙古考古隊認爲小城即西夏所建黑水城, 痕 , 北長 門外 溝渠縱横 層 北 1983 - 1984迹 米 隅, 高 拱衛 人留 此 374 夯層 8 地 東、 下 10 10 正方形瓮城 米,牆基寬 12.5 ∞ 禾苗葱葱 的 北 公里之內無任何居民居住, 釐米。 釐米, 年內蒙古考古隊的 遺迹, 城牆與大城套合, 城西北角矗立着佛塔羣, E 遥想當年寺 0 駝羊遍野的郊外畫 四 南設城門, 城內街道、 面 **米**、 城牆外側共有馬 ·廟林 調査 頂寬4米左右,平均高度約 西 有瓮城、 官 <u>小</u> 南 6衙、 如今在沙漠、 兩 晨鐘 給人以荒 面 大城爲元代擴建。 面城垣被元代居民改造、 馬面 寺廟、 面 其 中 暮鼓、 19 涼 個 角臺等設施 店鋪、 一號塔高 戈壁中的黑水城遺址有大城 車 , 死 北 水馬龍 寂 民居皆有遺存。 6 11 10 小城約成方形 南 神 0 ot , 大城城垣 秘的 米 街市繁華 米。東西城牆中部各設一 東西各4。 利用 感覺 ⑥高聳的 城外 基本完好 的 , 憑吊 分解爲 城區 邊長 古塔雄 依 城牆夯築 這 稀 和 圖 238座 不 | 景 可 小 古城 踞 相 東 見阡 城 在 西長 連 以 米 , 對錯 接 及阡 夯土 小 時 陌 城 牆 牆 的 城 421之 基 還 畦 數 陌 在

黑 的 水 俄 讓科 國 城 有 着 即 兹洛 四 動]1 引 人歷 夫 起 在 蒙古考察隊 國 黑水城 史傳説的黑 外探險家們 遺 址 0 其中所 的 繼 水城, 注 檀尋找 視 獲 使這一 的 最早踏 1909 當時尚 帶居民對此 上這塊神 年科兹洛夫探險隊在 無人可 秘 識的西夏文文獻 城産生了 的 土地 並 種 有所 城 莫測 外西邊 收 , 引起了俄國學者的 高深的崇敬感 獲 的 的 是 1908 座佛塔中 年 早在 由 發現了 高 |科 兹洛 度 + 重 九 大 世 視 夫 量 率 紀 他 領 文

定和 的 在 獻 趣 聖 艾爾米 中國 一彼得 文 物物 塔什 堡亞 北 年英國人斯坦因步科兹洛夫後塵, 相 京 在此又發掘出 洲 當 大學教務長徐炳 博 民 于 物館 找 族博物館 到 了 冬宮) 個 , 批 後 中 昶爲首 0 文書 世 改名爲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 俄 紀的 國 I組成 人 圖 在黑 書館 的 中瑞 水 趕赴黑水城, 和 城所獲甚豐的消 西 博 北 物館。 科學考察團 這些珍品 掘獲不少文獻。⑦ 1927 息, 一彼 , 到 得 旋即 也引起了其他 堡 額 被運 分 濟納河下 所 往 文物 聖 游 一彼 年 國家探 藝 得 以 黑 術品 堡 以 水 , 險 瑞典 文獻 則 城爲中 家的 存 資 人 放 斯 濃 料 心 在 文赫 厚 著 存 進 興 名 放

難 險隊 以忘懷 九 ` 世紀末、二十 考察隊 中國學術界同仁更是感到深 紛至 ·世紀 沓來, 初 , 中國大批珍貴文物 中國的 清 深的遺 朝 政 憾, 府 政 都希 治 相繼流失海外。 腐 望這些國寶能早 敗 , 國力孱 對于這段慘痛 弱, H 列 重見天 強 人侵 H 的 0 , 當 歷 回歸 史, 時 祖 中 此 外 或 人民 或 的 探 考察,黄文弼

書 年, 二十五身西夏時代泥塑像 年 中 調 百 國 査 八十多處 和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曾兩次到黑水城遺址進行考古調 國家文物局 19491984同 在 年 距黑水城約 年後 年 中國 出. 兩 批准 土不少文物和多種西夏文、 次 黑 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組織的 發 水城 掘 20由 , 遺 和 公里的老高蘇木遺址 基本上將全城 內蒙古考古研究所聯合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對黑水城遺址 址 少量文書。⑧ 所 在 的 額濟納旗 勘查完畢 1976漢文和蒙古文文書 先 年甘肅省組成考古隊于黑水城遺址及其周 也采集得一 西夏考察組也初次赴黑水城進行考察和 後 人劃歸 重點發掘 查。1963 甘 肅省 些文書,1979 面 積 和內蒙古 11000 年秋季的 多平 自治區 年又在 調 查持 方 米 一管轄 黑 續 進行 揭 水 時 \circ 1962 訪 城 露 圍 間較長 問問 發掘 內 出 地 得 房 品 年 1983到 屋 進行考古 經 和 少 基 發現了 1963年經 量 址 文

綜觀先後 出 土 的 黑水城文獻, 仍 以 俄國所獲最 稱宏富。其餘各次所 出文獻 無論從數 量 上 內 Ë

種

類

上

學術價值

上皆不能望其項背

夏文專號 考證出 開 始 俄 整 國 此 學 理 上 一佛經名 ·者對 研 0 當 究這 俄 時聶 稱 他 藏黑 此 在 卷帙浩繁的 文 同時編輯了西夏文字典, 歷 水 獻 Щ 城 (H.A.Невский)在日本工作 文獻 從中 先 文獻 選 後 編 進 出 中 行 首次找到 四 了 + 多 次 種 實有開 文獻 7 整 西 理 目 夏 創之功。二十年代末, 和 , 文一 録 著 他 録 通過伊 發 漢 0 表 文雙解詞 最 在 早 鳳 中 着 閣等 國 手 語集 進 人 或 行 得到了 龍果夫 立 ^ 整 番漢合時掌中珠 北 理 平 和 部分文獻資料 圖 (А.А.Драгунов) 研 書 究 館館 的 是 刊 伊 並 鳳 西 進 並 閣

1984 第 最 中 作 行 的 的 ?勞動 的 研 大的 個受命編造所藏西夏文文獻 西夏 究 漢文文獻作了詳細著録。② 年蘇聯科學出 西夏文文獻作了認真的整理和著録。 發表了不少論著 文寫 很 年蘇聯東方文學出版社 高 本 的學術造詣爲俄藏黑水城 和 刊 版社 本 出 , · 1929 版了孟列夫(JI.H.Meньшиков) 這是在 多年來克恰諾夫、 清 年 出 册 前 他 版了戈爾芭切娃 0 人基礎 口 文獻 他 國 在 後, 俄國學者不辭繁難、 的 清 上整理 開始對 理 整理做 的 克平 (K.Б.Кепинг) 同 的 . 時 俄 出 比較系統、全面 (3.И.Горбачева) 藏黑 了卓越的 對文獻 的《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 水城 進行了拼 鍥 文獻 貢 而不舍的精神令人贊賞 為。 進行科 的 又繼續對俄藏黑水 合 後來又有 俄藏黑水 和克恰 摘 學 録 而 多位 系統 諾夫 (Е.И.Кычанов 和 城 研 西夏文文獻 叙録 學者參 的 究 整 城 聶 理 文獻 加 歷 和 書 1 山 研 目録 中 整 以 究 對 辛 理 其 I 勤 並

世 量 一最 俗文獻和佛教文獻 多 俄 藏黑 約占 水 90%城文獻 左右;漢文文獻次之, , 有西夏 其中佛教文獻占絕大多數。 文、 漢文 藏文、 不足 蒙古文、 10% : 西夏文文獻就內容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幾類 回鶻、 其他民族文字資料數量較 文等多種民族文字類型 少少。 其 中 這些文獻又可 西 夏 文文獻 數

語言文字類

等 貴 中 少 文 詞 韻 的 人獻反 數 其 的 的 書 典 後幾 他 西 西 0 ^ 俄 一映了 文海 夏語 種 西 文獻 夏語言資料其種類之多樣 藏黑水城文獻中 義 夏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 同 大 是 寶韻 資 西夏學者對 批 料 , 西夏語言資料 種消亡的語言, 還 (簡 如著名的 有 用 ·有多種 稱 西夏語認識 西 ^ 夏文譯漢字 文海》 西夏文一 的 記 出 對消亡的語言紙能依賴保存下來的文獻資料進行 族 録 現 和 內容之豐富、 0 研 漢藏語系中 描 , , 漢文雙解詞 語音 爲漢藏語言的 究的 述 西夏文字書《音同 注釋西夏文字義 水準 解 釋 西 語言衆多 價值之高超足可與 語集《 對現在 夏語言 深層次研 番漢合時掌中珠 深 的 , 的 但 人研 字 , 字書 究開闢了 有 西夏文韻圖和韻 典 中 究 -古時 \wedge 和 、同時期漢語文音韻 辭 纂要》 構 書 新 擬已消 期語言資 的 語 , 領 注 音 域 用 亡的 表 表 釋西夏文字形 藏 料 研 ^ 以 Ŧī. 西夏 究 文注音 及 的 書 大 僅 音切韻 0 黑 量 有 語無疑 籍 的 研 漢 相 水 語 媲 城 西 究 是 音 美 西 西 , 夏 同 藏 夏 文 夏 至爲珍 《語言 資 這 文獻 義 義 語 此

六 種 十餘年 用 西 夏 範 文字 0 韋 西 廣 的 夏文字結構複雜 創 使 製和 用 品 推 域 行 寬 是西夏文化史上具 ` 延續 , 史書記載其「 時 間 長 的 實 筆 用 有劃時代意義的 畫繁冗 文字, 從 屈 創 曲 製 大事 開 類 符纂 始 0 直 作爲西夏文化 L 0 到 作 元 爲一 ` 明 種 靈 前 死文字, 後使 魂 的 用 西 其字形結構 夏 至 文字 少 有 四 是 百

研 出 和 規 西 究成爲文字學中 律 夏 文字構 0 這些文獻 造 的 不僅 的 秘 密 是西夏文字學的基礎 個 0 西夏、 難 題 文字構造既 0 俄 藏黑水城文獻中有 吸收 也豐富了中國文字學的 了漢字的 分 析 造字方法, 西夏文字構 又獨 內容 造 運 的 匠 ^ 文海 心 創 寶 韻 造 了 等資 特 殊 的 料 可 揭 方 示

一 歷史法律類

禀帖 值 官 容, 經 少 濟 階封號表 的 政 爲西夏人自己 過 部 黑水 文化 治 去 分 所能 城 的 軍 但 以 史料 副 見 事 內 將上 到 獨特的形 容 方 的 所 面 簡 撰, 例如 書等, 有關 稍 略 多 數 式記載西夏官制 真實地反映了西夏的歷史和社會面貌 西夏的 掛 通過典型的 種西夏文文書, 經 濟 漏 史料, 萬 文化 0 其 中 主要是史家編撰的漢文資料, 個案材料 方 面 西夏與宋、 是具有重要價值 像天盛年賣地文契、 偏少。 , 反 黑 映了 遼、 水城發現的西 西夏時期政治 金交往 的 稀見文獻 , 光定年穀物借貸文契 不僅 的 夏文獻中 史料稍多 皆非 有 政 ` 治 軍 西夏人自 事 有關歷 軍事 <u>些</u>, 經濟情 內 己撰寫 史 西 容 黑 夏 況 本 法 水城守將告近 也 身的 律 包 雖不乏有 他]含着 方 如 史 西 面 夏 很 的 多 文 内 較 價

軍 獻 謹 四 數 係 攻 社 富 制 的 事 守 條款 西 會 史上 百 民 争戰 堪稱 夏文木 法典 家 族文字印 餘 如 分 夏立 密 條 _ 庭 \wedge 天盛 等 次 的 類 0 ^ 的 貞觀 規定 部 大膽 它 刻 國 方 布 傳 真 吸 行 本, 後漸 局 改 面 統 玉 Ē 的 收 的 舊 的 要 革新 法 鏡統》 重 諸法合體 很近于現代法律 這是中 新 有 並 了 求 一要 典。 唐 定律令》(完備的法律,然 且 入内 0 ` 在 賞 等。 宋律 ·國古代繼印行《宋刑統》 在 容 原爲二十卷, 行 罰 的 內容上也不落窠臼 0 政 等 其 中 另 法典 的 法 簡稱 如 精 具 華 最 條文形式 民 體 填 貞觀玉 重要、最完備的當屬《天盛律 《天盛律令》), , 法 而漢文史料失于記載, 而 形式 補了漢文史料中所缺乏的 今存十九卷 微 經 鏡統》 和 濟 是 其系統性 內容 法 中國 别 後又一 作爲西 樹 上又有自己 , 軍 中古時期少見的頗具特色的軍事 卷內分門 事法方 **幟** 在 和規範性在當 次公開刻印頒行 其基礎上修訂 夏的專門軍事著作 不僅繼承了 黑水城發現 面 的 比 門下 特 西夏行 令 **》** 點 唐 時 列 0 律》 0 條, 政管 唐、 的 是絶無僅 在 的 形式 的 這部法典現 文獻 宋律 Ĭ 新法 全書共一 理 記載 朝 上 中却 宋 軍 法 在 有 , V 刑 典 事 刑 綱 7 的 ` 法 有 統 百 制 法 H ^ , 存一千三百 有關 , 多 亥年 可 也 分 \forall 四十七 度 種 更 明 訴 以説 是第 西 充 訟 · 新 夏 西 經 實 門 將帥 夏 層 是中 濟 法 法 部 法 餘 賦 方 次 , 更豐 用 以 律 士 税 清 國 頁 面 千 嚴 法 晰 少 文 及

三 社會文學類

文》 雜 載 的 , 以 俄 民族共同 及對 藏 收録了很多有關西夏社會生活 黑 水城 番 體 漢、 文獻 , 了 藏 中 解西夏境內各民族的地位 有多種 П 鶻 通俗蒙學讀 契丹等民族特點的 的詞 語 物 《 三才 和 其 中 相 互關係極具 記載 有關民族 雜字》 和 對于認識 姓 類似漢 價值 氏 , 和 主要是番姓(文《千字文》 研究西夏的主體民族番 的 党項族 著作 姓) \wedge 新 和 族是 集 碎 漢 姓 金 個 的 置 複 記 掌

到 會 狀 西夏人對自然以及倫理道德、 況 俄 藏 以 黑水城 事類帶條 文獻 目 中 有一 條目下有詳細注釋, 種大型 社 會制度 類 書 ^ 聖立 人際關係等認識, 共十五 義 海 V 卷 , 以特有 0 盡管現在 是研究西夏社會不可多得的重要資 的 體 已不完整 裁 比 較全面地記 但從遺存的部 載了 西夏 的 分仍可 自 然 7 和 社 解

婚姻家庭 不 少親屬 還 有 稱 準 調調。 種 確 西夏文文獻名爲 地釋讀其他 西 夏的親屬稱謂有别于漢族, 西夏文獻中有關親屬的 ^ 新集慈孝記 具有藏緬族系的 , 這是西夏輯譯的中 內容大有裨益 特 點 原 0 地區 這類文獻對 慈愍孝行故事 Ē 確 地 理 集 一解 其中記 西夏 社 載 會 的 了

要資 料 此外 還有 醫 方 曆書 占卜書等等, 皆爲研究西夏及同時代的 中原 Ė 中朝社 會歷 史與民 俗 文化 的 重

經中 理 的 西 辭 經 夏文詩歌集的 過 道 中 有 西夏的文學作品傳 德觀 很多發願 搜 祝願美好的 念 集了 諺語 文和 大量 寫本 ·和 未來, 序言, 還爲了 多 世 刻本, 種 極 類型的 多用對仗工整的駢文, 這些出 少 解西夏文學的 保存了數十首詩歌 ,過去所能 西夏諺語 自西夏人手筆的 對 見到的祇是漢文文獻中 偶 以 ` 醇厚 比 是研究西夏文學特點的 作品 反映 喻 的 民 引申 出 族風格展 以精妙的 西夏詩 韻 尚 歌 律等形式提供 示了 的 文采闡明 存的零星佚 面 西夏社 貌和特 重要資料 ?佛學奧 會 7 點 文 風 有 0 情與党項 理 價 俄 在 記 藏 值 語 黑 叙 的 水 素 集 述譯經 族 材 城 的 新 文獻 集 民 西 绵 夏 俗 印 中 合 佛 倫 有

四 古籍譯文類

失傳 古籍 私家 注 類 的作用是不言而 俄 書 西 藏黑水城文獻 六韜 夏 文 共十卷五十篇, 孝 經 喻的 中 黄石公三略 的 除 發現能 0 佛經 失傳已 如西夏文草書《 重 外 現這 久, ` , 有 ^ 部亡 然而 類 以 林 西 孝經 佚 夏 它以西夏文刻本的形式保存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 文翻 己 久 V 十二國》 譯的 的 , 古 譯自宋朝呂惠卿注本 籍 ^ 論語 0 等多種 又 如 V ^ 原 ^ 類 林 漢文典籍 孟 子 \forall 是 , V 而漢 唐代 • 孝經 文文《 這些文獻對 于 立 政 孝經》 編撰 呂 孫子 校 的 通 注 訂 過 部 本 兵 早已 法三 翻 整 重 譯 理

王 和 朝 整 統 理 治者 補 充 強 , 能 調 武 使這 備 失傳數 重視兵法 百 的 年 思想 的 重 一要古籍 亦 有助于探討西夏人怎樣 重 現 原 貌 0 黑 水城 出 理 土 一解漢 的 幾部 文的 譯 自 經典兵法 漢文的 兵 爲 書 中 反 映 國 了 的 兵 西 夏

度 反 西 映 夏 出 翻 中 譯 原 的 很 文化對西夏文化的強大影響, 多 種 漢 文典 籍 説 明 儒 學 在 是研究西夏文化與中原 西 夏 有 重 要 地 位 , 表現 文化關 了 西 係的 夏 吸 有價: 納 中 值 原 的 文 資 化 的 能 力 和 深

五 佛教經典類

F.

增

添

了

新

的

版

本

有 的 佛 同形 的 内 不僅是了解十二至十三 藏 力修造寺 關 佛 經 係 大力推 式的 方廣 教 中 西 帝 俄 爲中 制 的 夏 師 藏 度 寫 佛 行 黑 的 廟 人自己編撰 序 都有 國 本 華嚴 佛 記 水 城 刻經史增添了 録 跋 和 印 教 刻 文獻 重要的 經 施 ` 發願 佛 曾多 在 本 V 中 等 經 中 0 史料 國 這些 次 世紀藏傳佛教的重要文獻 如《 數 文、 0 這些 向 佛教史上占 量 有的譯 新 價值 宋朝 佛典珍品 依 最 題款等 佛 的重要篇章 多 金剛王亥母 教 的 自藏文經典 贖取大 是西 如 , 文獻有 有重要地 多種西夏文佛經的 對了解 對研究和 八藏經 夏 以淨 文佛 的 譯 西夏佛 , , 歷經 校勘 自漢 經 位 瓶 如 親 0 , , 也 教 佛教經典 誦 種咒王陰 文藏經 五 有 西夏文大藏經是中國第一 儀 的 是研究西夏佛教與藏傳佛教 十多年 四 題款 流傳 軌 百 多 , \forall 中 大孔 如 以 種 有極爲 ` 西 記載了 譯 ^ ^ 經 中 數 雀明王經 大般若 夏文翻譯大藏經 以千 重要的 有身要論》 西西 寫經 夏的 卷計 波羅 價 ` \forall 次用 印 值 兩 蜜多經 0 位 經 等。 西 0 少 密 帝 大密咒受持經 夏王 大量譯 師 不少 並 切關 數民族 施 V 經 朝 耗費大量 , 佛 這 的 係 自 提 文字 是 經 大寶 情 的 藏 倡 文的 可 都 佛 中 況 刻印 國 靠 以 有 積 人 法 V 等 多 及 資 力 佛 , (西夏 早 料 經 在 種 的 有 物 大 的 不 境

宏、 然, 資 源 格 于 料 也 刻 是 風 表 印 印 俄 格 現 文 種 藏 度 出 人獻 黑 獨 有 類 繁多 西夏 水城 特 中 流 的 有寫 行 的 則 書 文獻 于 版 , 爲 法 藏 畫 本 不 坊 特 還 族 拘 和 刻 殊的 刻 爲了 地 保留了 本或 园 本 格 魅 解 的 ; 私 刻工 書 力 西 其裝式豐富多采, 梵夾裝 人 體體 夏乃至宋朝 刻 姓 西夏刻印 有篆書 本 名 0 有此 0 很多西 版式也多種多樣 一文獻 楷書、 書 事業十分發達 籍 夏刻本 卷裝 有封 的 行書 書 套 寫 刀 和 經 法 摺 草 封 刻 , , 嫻 規格 書 政 裝 面 印 熟 府 0 形 蝴 不 有 裝 設刻字 印 蝶裝 式 的 幀 製 , 多姿多采 書法精 精 大本 紙張 司 美。 包背裝等皆備 , 等版 有 的 絶, 有 的 盈 的 有 看 尺 文 本 佛 到 獻 情 , 的 經 這 即 運 小 況 此 前 筆 明 提 本 書 確 供了 還 隨 的 此 僅 標 意 外 冠 籍 以 出 大 4 古 場 還 餘 爲 量 猶 刻 . 樸 有 如 面 實 ; 來 字 進 恢 自 物

司

人 西 夏書籍 版 本 的 大展 廳 , 想見 中國中 古時期書籍發展 的各 種 形 式

語詞 此作 刊 7 譯孫子 克恰諾夫著《 究 俄藏西夏文《 音;1966 藏文爲西夏文注音的材 (М.В.Софронов) А.П.Терентьев — Катанский) 悉、 黑 西 布了原文;1990 ^ 法學 出了 西夏國家的書籍事業》 水 作 夏 介紹、 ·城出土文獻 爲多學 文文獻 最 »··1988-1989 年出 重要的 類林 論語》 研究 ,科研 新集錦合辭》 版 編著 了克羅科洛夫(和克恰諾夫的《西夏語語 貢獻 \forall , 的著作陸 究對象的 年德國 需 和《新集慈孝記》 • 的 《孟子》 料研究西夏語音;1960 要有數十年 0 西 他們 年克恰諾夫出版了《天盛改舊新定律令》 的 夏文字 續出 , 俄藏黑水城文獻 赫伯特· 利用俄藏西夏文獻研究了西夏有關書籍的問題;1985 的 俄譯並 ` 主 版 В.С.Колоколов) 典手 克恰諾夫著的《文海》,俄譯並刊印了俄藏《文海》;1974 ^ 要著作 如 就是明證 孝經》 刊 弗蘭克和克恰諾夫出版了西夏軍事法典 , 稿, 日堅韌不拔的巨大勇氣和脚 印了原件;1979 研究並刊印了三書的原文;1981 有:1926 .. 1969 同 0 音 其價值 面對 時 年又出 研究 發表 浩 年出版了克平、 年聶 和 越 如 版了他的遺著《 了 克恰諾 烟 來越引起學術 歷 第一 年、1983 他 海 山 的 的 寫的 次用 夫的 研 文獻 究著作;1964 ^ 俄藏西夏文文獻系統 年和 踏實 克羅科洛夫、 西夏文字抄 西夏譯漢文經典》 界的 俄譯並研究了這一重要文獻 唐古特語文學》 難以釋讀 地的 1990年捷連基耶 注 科學精神。 意 ^ 貞觀 年克平先後出 的 0 年 多年 捷連基耶夫-文字, ¥ 玉 年克平 出 , 夫ー 鏡統 來 版 利用俄 , 地 , 俄 下 公布了他 了 研究 介 出 卡坦 國 決 索 紹 的 版 心 此 版 藏 弗 學者 年出 卡坦 7 斯 Ť 並 介 了 去認識 文 羅 西 刊 基 利 紹 獻 諾 夏語 們 西 出 西 斯 用 同 中 版 印 和 夏 夫 爲 基 夏 俄 以 研

獻 見 成 的 静 館 成 將 漢 介紹 刊 如 全 文 番 , \forall 中 和 聶 第 漢 書抄寫石印流行。 國學者很早就注意到俄 四 並 研 合時掌中 歷 年李範 作了 究 Ш 卷第三 主要著作有:1983 整 石濱純 文 一號作 理 珠》 和 的 研 ^ 爲 太郎等分别作了考釋。 一 頁, 究 同 1935音 西 .. 1985 研究》 夏文專號 藏黑水城文獻的 深知該書的 年羅福 年史金波 年 , 陳 成又抄印了俄藏西夏文字書《 L 對 出 西 重大學術價值 版 夏 的 價值 近十幾年來中 文 白濱、 ^ 介紹了 西 ^ 0 音同 夏 早 文物 黄振華的 在 V 此 研 1913次年即借得此書九頁石印 作了 -國的 俄藏西夏文獻的 究 研究;1988 年 西夏研究專家更加 文海研究 內 音同》 寓居日本的 中 也介 \circ 1932 片斷 1, 紹 年 將西夏文《 和 史 深羅振 研 金波的 年《 羅福萇 重視對俄 究了 流 玉 傳 礻 國立北 自伊 文海 少 1924西 俄 羅 鳳 藏 夏 **然西夏** 閣手 平圖 福 藏 佛 全部 年 西 成 教 羅 文 夏 中 史 得 文 王

文 ; 年 波 略 陳 華 史 炳 類 同年 金波 林 應 白 聶 鴻 利 的 濱 李範文的 音 ^ 用 黄振 吳峰 俄 西夏諺語 史 滅 華 金 黑 雲 年史金波 波 《宋代西 水 的 聶 城 的 鴻 文獻 西 ^ 音 番漢合時 夏文物》 新集錦成對諺語 北 的 ١ 聶 方音 文物 鴻音、 類林 \forall 掌 研究西 , 中 研 其中刊布了俄藏黑水城文獻 利 白濱 珠 究》 用 夏佛 的 俄藏夏漢對音資料研 , 在中 將 教 將俄藏西夏文諺語 西夏天盛律令》 西夏文《 歷史, -國第 並 次全部影印了原刻本, 類林》 重 新 整理了 究 , 譯成漢文, 中 ^ 將 新集錦合辭》 國 文物六十多種圖片;1989 西夏文《天 俄藏 西 北方音 西 恢復了失傳 夏文佛 並作了索引;1993 盛 全部譯 律令》 經 目 Ë 。 録 成 全部 久 漢 的 同 文; 漢 年 年 譯 · 黄 文 史 成 振 金

分别對西夏文《五音切韻 西 夏語的研究》 著名的 年 ·發表的 H 本 ·西夏學專家西田 西 夏語韻圖 依據俄藏西夏文文獻研究西夏文字、 V 和 ^ 《月月樂詩 五音切韻 龍雄也 很 \forall 重視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 的研究》 作了 研究 · 1988 語音和 年 發 表的 文法 和 ^ , 並 西 研究。1964 [夏語 編輯了西夏文小字典;1981 Λ 月月樂詩 年 1966的 年 研 究 出 版

的

堡 告 劃 期 量 全 于俄藏黑 展 深 而 東方 卓有 部 訴 感 的 並 中 各 他 出 能 遺 俄 親臨 研 將使漢學研究的某些領域因獲得新的資料 甚至認爲 國 成效的 版 憾 位 究所特藏部 水城文獻數量特别多 歷 中 學術 查閱 史進 使 近十數年來 界的 工作 H 專家們 等國 文獻 行 深 同 的 的 利用這些 刊布科兹洛夫所 人 西夏學專家爲介紹 仁 足 研 學者畢竟不多, 不出 書櫃中 究, 這 西夏學悄然升温 個 户 也即 |文獻中的珍貴史料 即 願 已經 很多具 能 望 對 一就 查閲 面 黑 獲文獻, 要實現 世 水 而 有重要價值 的祇占全部文獻的 城文獻進行 整理、 且閱讀 研 究 這批珍貴文獻以其獨特的文化 7 乃是具有 翻譯 而得到促 的 , 利 全部俄 時間 探尋遥遠的西夏王國 的典籍長期不爲世 用 和 深 0 層次 也終究有限 研究俄 頭等國際意義 聶 藏 進 黑 歷 的 極少部分, Щ 水 第二 藏黑水城 生前 城 文 次 獻 曾擬定過刊 因此 開 人 的科學事業 的 絶大多數仍 所 掘 文獻 的 出 知 面 版 魅力吸引 學 是 貌 付 0 將 出 專家們因 西夏研 術界希望 , 會 布俄藏黑水 進 了辛勤 0 大 然默 L 而 大 13 着學術 究 對 推 現在 有 難 默 的 的 西夏乃 進 勞動 以 朝 地 最 西 城 界 終 見 躺 可 文 同 到 夏 目 至中 H 在 以 學 獻 它 聖 的 作 欣 能 們 慰 將 了 的 的 彼 其 得 大 地 由 而

有 7 新 在 的 兩 次 收 赴 獲 俄 如 I 作 發現了 過 程 過 中 去未曾登録 我們 在 原 過 有 的基 的 新 一礎上 文獻 對俄藏黑 重要韻 書 水 城文獻 文海寶 韻 又 作了 的 寫本 次 整 書 理 頁 著 背 録 面 對 和 鑒 正 定 面 每

字 獻 種 面 世 考 注 究 釋形 使之更趨 界上最早 谌 酌 ` 義 的活字印本有重要的科學和文物 完 匡 • 音 整 正 過 的 刻 去定名 如 本 ^ 天盛律 ^ 音 不確者, 同 ÷ V , 考定某些文獻 以及藥方 <u>^</u> 貞觀 價 玉 ` 值。 一鏡統 告狀案等 成 這些成果都將在我們的 書年 \forall ` 代 ^ 0 對 類林 等 0 些 同 已 時 等都增添了 經整理 還發現了 出 過 版物中反映出 多 的 新 種 的 文 獻 西夏活字版 内 容 , 又找 0 此 到 外 了 還 新 對 的 這 文 葉

彼 藏黑水城文獻 的 的 人員爲中方人員提取 Л.И. Чугуевский) 得 充 0 分 上 目 認識 前 海 相 古 出 (Ю.А.Петросян) 籍 版 没 出 的 俄 版 有對學術發展 出 社 藏 更是熱情合作, 版工 是 大量文獻 黑水城文獻 之享譽 作 海 的 實 内 的 支持 付出了 外 在是功德無 熱愛和支持 \forall 的 這樣大規模 使 和 專 辛勤 關 業古 這一 心 的 難度很 量 的 籍 0 勞動 副 出 精 的 0 中 神 純 所 版 大的 方 學術性著作, 長 社 没有豐 克 人員在聖彼得堡工作 , 這 工作 恰 諾 次 得 他 富 夫 以 們 的 和 是極 順利 編纂與出版 又當仁不 研 究員 進行 爲不容易 孟 期 讓 列 該所特藏部的負責 間 經 夫 的 以 驗 得 事 很 克 到了 是難 大的 情 平 0 没 東 以 魄 丘 有對 方 力 承擔這 古 研 擔 耶 人和 究所 負 文 人獻 夫 起 項 Ï 斯 所 重 價 作 基 長 任 俄 值

類 版 0 歷 漢 史法 俄藏 文 文 律 黑 獻 類 依 水 城 俄 社 文 藏編號順 會文學類和古籍譯文類。 獻 \forall 按漢 序 編印 文文獻 0 西 西 夏文世 夏文世 西夏文佛教文獻參照經 俗文獻 俗 文 參考傳 獻 西 統 夏 文 分類 佛 方 教 律 法 文 按 獻 論三藏分類 內容分 和 其 他 類 民 族 依 文 字 次 爲語 文 獻 言文字 分 出

年 0 西 當 我 夏文字創 們 把學 術 製是西夏文化 界 一翹首 企盼 發展 的 ^ 的里程 俄藏黑水城文獻》 碑 , 我們 相信本 奉獻給讀者的 書的出版將 時 成爲 候 . 9 西夏研究新的 正值 西夏文字創製 起 九 百 六 + 周

艾 快 歐 整 爾 理 亞 米 此 出 塔什博 次 出 此 地 版 公諸 品 物 的 展 館 ^ 俄 覽 的 世 上 藏黑水城 大批珍貴的 受到 , 使黑水 學術界 文獻 城 繪 出 和 畫 V 土 僅 藝 文物· 術界 是科 精美的 全 的 兹洛夫獲自黑水城 部 青 雕 重 睞 塑 見 和 天日 我 器物等 們 , 希望這批 則 , 學者幸甚 也 古物 是 西夏 的 文物也能像俄藏 部分 文物 國 人 的 幸 另一 菁華 甚 黑 部分是藏于 其 中 水城 文 部 獻 分 精 聖 樣 彼 得 堡 在

作了 文獻 富 最 後應 有 成 分 效的 該 重 S 特 别 視 I 作 將 提 此 出 的 列 使之得 爲 是 中 , 國 中 以 或 社 順 社 會 利 科 會科學 進 學院 行 院院院 重 在 一點 本 項 書 部 目 出 及外事 版 組織 之際 高 領 科 我 導 們 研 對 籌 局 中 劃 對 整理 安排 國 社 會 編輯 科學 並 委派 院院 外 出 的 事 領 版 導 局 ^ 楊 俄 和 建 藏 有 關 或 黑 部 同 水 門 城

表

示

衷

心

的

感謝

注 ① 九八《党項羌傳》。《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党項傳》。《宋史》卷四八五、四八六《夏國傳》 《北史》卷九六《党項傳》,中華書局校點本(以下正史同)。《隋書》卷八三《党項傳》。《舊唐書》卷 (上、下)。

《遼史》卷一一五《西夏外記》。《金史》卷一三四《西夏傳》。清吳廣成《西夏書事》,道光五年(1825)

刊本。

2 《元史》卷一《太祖紀》。

1

3 清張澍《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後》,載《養素堂文集》。

4 威利《居庸關的古代佛教碑文》,1870 年。戴維利《西夏党項碑文》11 卷,巴黎,1898。

(5) 《元史》卷六〇《地理志》。

7 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水城考古發掘紀要》,載《文物》1987 .達《斯坦因黑水獲古記略》,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4 卷 3

向

8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額濟納旗沙漠中古廟清理記》, 載《內蒙古文物考古》1981 年創刊號。

號(西夏文專號)。

年第

7

9 岳邦湖、 陳炳應《我國發現的西夏文字字典〈音同〉殘篇的整理復原與考釋》,載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

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

李逸友編著《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科學出版社,1991 年。

10

11) 戈爾芭切娃、克恰諾夫《西夏文寫本和刊本》,蘇聯東方文學出版社,莫斯科,1963 年

12 孟列夫《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叙録》 ,蘇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編輯部,莫斯科,1984 年。

13 聶 歷 Щ 哈拉浩特西夏文獻出版計劃》,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東方學檔案,轉引自戈爾芭切娃、克恰諾夫《西

夏文寫本和刊本》導論。

Preface

The materials from the ruins of the Chinese city of Heishui, kept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re of great scholarly value because of their vast number and substantial content. In the year 1993,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Russian Institute to cooperate in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the entire Russian coll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agreement, Chinese personnel went to Russia in 1993 and 1994, and worked together with specialists there on arrangement, registration and photographing. Now these cultural treasure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will be published in succession and will supply many important new resources for scholarly research. This is a significant event in the scholarly world and a magnificent accomplishment in the publishing world.

With more than 8000 numbered item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from Heishui (or Heishuicheng) is comprised of precious, rare and unique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from the Song, Xia, Jin, and Yuan periods of China's middle ages, 700-900 years ago.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collection is written in Xixia script;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amount in Chinese and some in scripts of other nationalities.

Xixia was a feudal kingdom established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of China in the early 11th century. Its capital was Xingqingfu (later renamed Zhongxingfu, i.e. present-day Yinchuan city in Ningxia), and its main nationality was Tangut Qiang. In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Tangut people were located mainly in the vast grasslands of southeastern Qinghai and northwestern Sichuan provinces. At the beginning of Tang, the Tangut leader Tuoba Chici, of the most

powerful Tuoba tribe, attached himself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received the family name Li.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Tang, most of the Tangut people had migrated successively to the region of eastern Gansu, Ningxia and northern Shaanxi. In the year 881 the Tangut leader Toba Sigong was granted the title of Dingnanjun Jiedushi and the authority to govern five prefectures, with the prefectural capital at Xiazhou (now Jingbi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giving birth, in fact, to an independent local regime.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the forces of the Xiazhou Tangut regime grew steadily. At the beginning of Song the regime submitted itself to the Song dynasty and was presented the family name Zhao. With the later developments under the outstanding Tangut leaders Li Jiqian and Li Deming, to the reign of Yuanhao, the son of Deming, the regime's strength expanded. In the year 1038 Yuanhao made himself the emperor and established a state named Daxia, i. e. the Xixia of later histories. The vast area under the country's jurisdiction consisted of Ningxia, Gansu and northern Shaanxi, western Inner Mongolia and eastern Qinghai. With ten emperors, the Xixia regime lasted 190 years, coexisting with Northern Song and Liao in the earlier stage, and with Southern Song and Jin tn the later stage, which resulted in a complex and delicate situation of a new "Three Kingdoms" in the middle ages of China. Despite its narrower territory and weaker forces of economy and military, in the inter-state disputes of that era, Xixia occupied a decisive position by regularly allying with a second country to resist the third one.

The cultural undertakings of the Xixia dynasty were considerably developed. Before the state was established, native characters were created for recording the Tangut language, and were called fanzi, fanwen or fanshu at that time, and afterward Xixia characters. The Xixia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ts nativ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lso actively assimilated cultures from other nations, especially the cultures of the Han and Tibetan peoples. Xixia and Han characters were used concurrently in the country, as was the Tibetan script. The Xixia rulers not only advocated Confucianism by establishing schools in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but also promoted Buddhism by completing the great work of translating the Tripitaka of thousands of volumes into the Tangut language. The Xixia culture of a unique native style is a brilli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In the early 13th century, after suffering repeated attack by the powerful troops of the newly arisen Mongolian empire, and after the fall of the capital Zhongxingfu and slaughter of the last emperor Li Xian, Xixia was declared destroyed. Taking revenge on the fierce resistance of the Tanguts, Mongolian troops brutally butchered, burned, and plunder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ir occupation, destroying a great quantity of Xixia literature and relics. When the Yuan dynasty compiled the dynastic histories Liaoshi, Songshi and Jinshi, Xixia was only briefly narrated in biographies attached to the three histories. Although a kingdom of nearly 200 years complete with its own decrees and regulations, many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Xixia have not been preserved. This fact makes Xixia less known than Liao and Jin of the middle age kingdoms established by national minorities.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the force of Tangut ethnicity became weaker and it at last assimilated to others, while the Xixia characters were no longer used and became unrecognizable, a dead scrip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Chinese scholar Zhang Shu boldly excavated the protecting wall of a stele pavilion in the Qingying Temple of Wuwei, Gansu province, and discovered the famous stele in Xixia and Han characters of the Liangzhou Gantong Stūpa. This discovery was the prelude to acquisition of new Xixia material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research on the portion in Xixia script of the six-script inscription at the gateway of Juyongguan Pass aroused attention in scholarly circles. The really significant discovery that led Xixia studies into the halls of science was the vast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ifacts excavated by the expedition headed by Russian explorer P. K. Kozlov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in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of Xixia (near present-day Edzina Banner of Inner Mongolia, called Khara-khoto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The reappearance of literary materials and artifact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situation in regard to the scarcity of Xixia materials. The acquisition of a collection simultaneously vast in quantity and plentiful in content is a rare occurrence, and it is the second-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of Sinological materials after the excavation of the treasure of precious documents from the Dunhuang cave. The material discovered at Heishui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ation on which Tangutology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n on, the rich and varied historical culture of Xixia has been shedding its veil of obscurity, and with a brand new bearing has advanced steadily and made itself known to the world.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lie in the desert wastes 25 kilometres to the southeast of Dalain Kob town, sea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Edzina Banner of th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Flowing through the Badain Jaran Desert to irrigate the farmland and grassland, the Heishui River (anciently called Ruoshui) made the place an oasis suitable for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The Xixia Kingdom established a military district, making it an important military town. Mongolian troops captured Heishui in 1226 and the Yuan Emperor Shizu (Qubilai) set up the route command (Zongguanfu) of Edzina Route there in 1286. In the Tangut language, edzi means "river" while na means "black", in Chinese translation "Black River". The Yuan name Edzina, now Edzina Banner, is really a transliteration from Tangut, and is thus an important Chinese place name preserving the Tangut pronunciation. At the end of the 1340s, the Heishui river course, about ten kilometres from the Edzina city, was stopped up owing to warfare; the river flowed instead to the north and the oasis was gradually covered over by sand. The town's inhabitants declined in number becaus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living disappeared and finally the city became an uninhabited ruin. Although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extreme aridity at Heishui imperils human life, heat and drought are the best conditions in which to preserve ancient documents and artifacts. The Heishui collection was luckily preserved in such special circumstances.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the Inner Mongolian expedition in 1983-1984 at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now in the Gobi desert, there is a larger walled town and a smaller walled town. The smaller walled town is located at the northeastern corner of the larger walled town, its eastern and northern walls overlapping those of the larger walled town, while the western and southern walls were divided for use by the Yuan inhabitants into separate sectors. The Inner Mongolian expedition team maintains that the smaller walled town was the former Xixia city of Heishui, while the larger one resulted from Yuan expansion. The smaller city is roughly square, 238 metres long on each side; the base of its wall is 9.3 metres wide with rammed earth 8 centimetres thick. Its city gate is directly to the south with a small outer gate, battlements, towers and so on. The larger city is fairly well

preserved with walls 421 metres long from east to the west and 374 metres from south to the north, the base of which is 12.5 metres wide and the top about 4 metres wide; they are 10 metres high on average. There are two pairs of gates in the middl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walls; beyond the gates there are defensive square outer gates. Outside the four city walls there are 19 battlements, 6 at the north, 5 at the south, 4 each at east and west. The wall is built of rammed earth and the rammed tiers are visible, 8-10 centimetres thick each. A group of stupas stand at the northwestern corner of the city. Stūpa No. 1 is 11 metres high. Standing high on the wall, the ancient stūpas lend grandeur to Heishui city's magnificent appearance. The ruins of streets, offices, temples, shops, and residences are preserved inside the city and the traces of roads, fields, and ridges are faintly visible outside it. No inhabitants live within 10 kilometres of this area and the place gives people a feeling of wildness, stillness and mystery. Paying a visit to the dead city, from the remains of these former inhabitants one can still imagine the numerous temples, daily sounds of bells and drums, heavy traffic, bustling markets on the streets, intersecting roads, crisscrossing canals, lush green seedlings, and sheep and camels dotting the plains in the outskirts.

A city of moving historical legends, Heishui instilled i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region a deep esteem. Early in the 19th century Heishui drew the attention of foreign explorers. It was the Russian Mongol-Sichuan Expedition led by P. K. Kozlov in 1908 that first reached the mysterious place and was duly rewarded. The Xixia materials, still unreadable at that time,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Russian scholars, and prompted Kozlov to go on searching in the Heishui ruins. In the year of 1909, the Kozlov expedition found vast quantities of written materials and artifacts in a stūpa to the west of the city, the equivalent of finding a library and museum from the middle ages. This treasure was sent immediately to St. Petersburg; the written materials were kept in the St. Petersburg Asiatic Museum, later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while the artifacts and art objects were kept in the famous Hermitage (Winter Palace) Museum. The plentiful information discovered by the Russians in the ruins of Heishui aroused keen interest in explorers from other countries. Following in Kozlov's footsteps, the Englishman Sir Marc Aurel Stein went to Heishui in 1914 and obtained much material. In the year

1927, the Sino-Swedish Northwestern Scientific Expedition headed by Sven Hedin and Xu Bingchang, Dean of Beijing University, went to investigate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Edzina River centered on Heishui city, where Huang Wenbi excavated a number of document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orrupt politics and the weak econom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incurred imperialist aggressions. One after another, some foreign "expeditions" came to China at that time, and lots of Chinese precious relics were lost abroad in succession. The Chinese people could not get the grievous history out of their mind and academic colleagues even expressed deep regret over that matter, they hope that the national treasure will be soon reprinted and sent back to their motherland.

After 1949, Edzina Banner, where Heishui is located, was first placed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Gansu Province and then th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Mongolian Cultural Relics Preservation Team mad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twice in the Heishui ruins in 1962 and 1963. On a longer investigation in the autumn of 1963, they found 25 clay sculptures and several documents dating to the Xixia.[®] In 1976 an expedition organized by Gansu Province mad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Heishui ruins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and collected some documents at the ruins of Laogaosumu, about 20 kilometres from Heishui city. Other documents were found in Heishui in 1979. In the same year the Xixia Investigation Group,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ent to visit Heishui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he approval the Cultural Relics office. 1983 the Inner Mongolian National in Archaeological Studies and the Alashan Center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jointly excavated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After two investigations, in 1983 and 1984, the whole city had been thoroughly reconnoitred, more than 11000 square metres of principal area were unearthed, more than 280 house foundations were excavated, and many artifacts and a number of documents in Xixia, Han and Mongolian scripts were found.[®]

A comprehensive survey all of the excavated Heishui materials shows that the Russian collection remains the most abundant; other collections are too inferior to bear comparison in quantity, content, variety and academic value.

Russian scholars arranged and registered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on several occasions. A. I. Ivanov did the first work of arrangement and investigation. In the great mass of literature, he first found the Tangut-Chinese glossary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identified the titles of some Buddhist sūtras, and compiled a dictionary of Xixia characters, a genuine initial achievement. At the end of the 1920s, A. A. Dragunov began to study these materials; from them he compiled a catalogue of 41 classific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published it in China, in the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Volume on Tangut Studies). N. A. Nevskii, working in Japan at that time, received some materials from Ivanov and others, researched them, and published many studies. After he returned to Russia in 1929, Nevskii began his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arrangement and study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becoming the first to receive instructions to compile a detailed inventory of Xixia documents. While working with the materials, he did a lot of arranging, excerpting and research. Through diligent industry and lofty erudition, Nevskii made a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bringing order to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After that numbers of other scholars took part in the ordering work. Z. I. Gorbacheva's and E. I. Kychanov's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published by the Orient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63, is a comparatively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Tangut literature based on work of their predecessors.[®] L. N. Men'shikov's Opisanie Kitaiskoi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published in the Soviet Union by "Nauka" in 1984, is a detailed record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For some years, E. I. Kychanov and K. B. Kepping have continued conscientiously to arrange and to write about Tangut literature, the largest portion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 Russian scholars' spirit of perseverance and dismissing hardship calls forth in us profound admiratio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ncludes the scripts of many peoples: Tangut, Chinese, Tibetan, Mongolian, Uygur and so on, of which the Tangut literary materials are the most numerous, approximately 90%, and Chinese materials come next, with less than 10%, while those in other scripts are comparatively few in

number. These writings can be divided into Buddhist and Non-Buddhist literature, of which the Buddhist are the vast majority. According to content, the Tangut literature may be divided more or less in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1. Language and script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re are many varieties of dictionaries, glossaries, and phonetic tables that record,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Tangut language, and lots of other materials for researching the language. For example, the famous Tangut-Chinese glossary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the rhyme dictionary Wenhai baoyun (in short, Wenhai) that explains the structure, phonetics and meaning of Tangut characters, the Tangut dictionary Yintong, Tangut phonetic tables Wuyin qieyun, synonymy Yitong, Tangut glossary Zuanyao with explanations of transliterations from Chinese, Tangut materials with Tibetan phonetic transliterations and so on. Tangut is a dead language which can be studied only through the materials preserved. Being of great variety, plentiful content and high value, the materials on Tangut language in the Heishui collection equal the Chinese phonological works of the same period. These works reflect the standard of Tangut scholars in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ing their native language, so they are undoubtedly very precious for our stud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dead Tangut language. The Tangut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Tibeto-Burman group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ere are many languages in the Sino-Tibetan family, but only a few of them, such as Chinese and Tibetan, etc., preserve linguistic materials from the middle ages. The appearance of abundant material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have opened up the way to a deeper study of Sino-Tibertan languages.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angut characters were epoch-making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Xixia culture. As the soul of Xixia culture, Tangut characters were used throughout a vast region and wide scope, spanning no fewer than 460 years from their creation to the dynasties Yuan and Ming. Tangut characters present complex structures; historical chronicles record that the characters have complicated strokes, being as tortuous as the characters on seals and magic figures." Being a dead script, research on its writing structure became a difficult problem of philology.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materials such as the dictionary Wenhai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angut characters, and can reveal the secrets of Tangut morphology. The composition

of Tangut characters assimilated Chinese methods of graphic formation as well as displayed ingenuity in creating particular structural methods and regularities. These documents are not just the foundation of studying Tangut characters; they are also a substantial element of Chinese palaeography.

2. History and laws

Historical data about Xixia known from the past were chiefly compiled in Chinese by historians, not the native works of Tanguts. Although they retain some value, the data were too sketchy to supply much detail. Historical data about the diplomacy between Xixia and Song, Liao, Jin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about the history of Xixia itself; materials about politics and military affairs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about economy and culture. Written by native Tanguts, the Xixia literature pertaining to history and law found in Heishui authentically reflect the historical and societal situation of Xixia not only in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but also in economy and culture. Several Tangut documents, such as a title deed for the sale of land in the Tiansheng era, a certificate for a loan of grain in the Guangding era, a report from the commander of Heishui petitioning for a transfer, a report the Heishui deputy commander, and so on provide everyday examples which reflect the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Xixia times. The Tangut "table of official ranks and titles" is a precious document of great value recording in a unique form the Xixia official ranking system.

Xixia gradually acquired complete laws after the nation was established, but they are not record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data. The materials found in Heishui city include several Xixia codes, such as Tiansheng gaijiu xinding lüling ("Tiansheng Code"), its revised editions Xinfa and Hainian xinfa, the military code Zhenguan yujing tong, and so on.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mplete of these is the "Tiansheng Code," which is a Tangut xylograph with more than 1300 pages extant. This is yet another dynastic code of ancient China, published and promulgated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Song Xingtong, and it is the first code published in a national minority script. The "Tiansheng Code" consists of 19 extant volumes out of the 20 original; each volume consists of sections, each section of articles. There are 147 sections of more than 1400 articles in the entire code. It incorporates the essence of Tang and Song codes as well

as presents native characteristics both in form and content. In its structure, the distribution of provisions with clear outlines and a distinct arrangement closely resembles the structure of articles in modern legal codification; its systematization and regularization are unique for that time and may be termed a bold innov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w. As for the content, the code is unconventional and creative not only in carrying forward the well-knit and meticulous traditions of Tang and Song penal and procedural laws, but also in substantiating and enriching the administrative, civil, economic and military laws of Tang lü and Song xingtong. It may be judged a real code combining all others and supply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 economy,taxes, society and family system of Xixia which are lacking in Chinese historical data. Moreover, Zhenguan yujing tong, as an exclusively military compilation of Xixia, records in detail the stipulations, requirements,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for Xixia generals and soldiers in battle. It is a rare and singular military code from the middle ages of China.

3. Society and literatur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re are several kinds of popular primers, such as Sancai zazi and the book titled Xinji suijin zhizhangwen, the latter resembling the Chinese Qianziwen, both of which record words and phrases concerning Xixia social life. Records such as those concerning ethnic family names, mainly Tangut and Chinese names, and th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ngut, Chinese, Tibetan, Uygur, and Qidan, are of great value in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ing Tanguts as the principal nationality and Xixia as a complex ethnic community, and in understanding the positions and relation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within Xixia.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contains 15 chapters, Shengli yihai, which in a special format comprehensively records the natur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of Xixia through detailed explanations in entries arranged under factual categories. Although it is fragmentary now, the parts preserved still provide important rare material for research on Xixia society and on identifying how Tangut people understood nature, ethics, social institutions, human relations and so on.

Another Tangut book, titled Xinji cixiaoji, a selection of Chinese stories of affection and filial piety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into Tangut, records many Tangut

kinship term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Chinese and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o-Burman nationalities. These sorts of materials help us to properly understand marriage and family in Xixia society and accurately to elucidate th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kinship in other Tangut documents.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prescriptions, calendars, divination manuals and so on, all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social history and folk culture of Xixia and the contempory dynasti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Very few Tangut literary works were preserved, formerly glimpsed only in fragments found in Chinese writing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contains manuscript and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compilations of Xixia poems, which preserve dozens of compositions reflecting the style and features of Tangut poetry. The Tangut anthology of proverbs Xinji jinheci, gathers together many diverse Tangut proverbs which, in a rich native style, show the social circumstances of Xixia and the folk ethics and morality of the Tangut nationality. The proverbs supply valuable resources for understanding antithesis, metaphor, extended meaning and prosody in Tangut literature. Attached to Tangut sūtras are many vows and prefaces written by Tanguts, which explain Buddhist theories, recount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ng and printing the sūtras, and pray for a glorious future in finely matched rhythmical prose of unusual literary quality.

4. Translations of classic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besides Buddhist sūtras, has Tangut translations of many Chinese classics-Lunyu, Mengzi, Xiaojing, Sunzi bingfa sanzhu, Liutao, Huangshigong sanlüe, Leilin, Shi'erguo; the usefulness of these materials for the collation of ancient texts is self-evident. The Tangut Xiaojing in cursive manuscript, for example,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long lost edition with a commentary by Lü Huiqing of the Song dynasty, so the discovery of the Tangut Xiaojing has restored a lost classic. Another example is Leilin, an important private encyclopedia compiled by Yu Licheng of the Tang, in 10 volumes and 50 chapters, which had been long lost but is preserved in the Russian Heishui collection in the form of a Tangut xylograph. This important classic, lost for centuries, can be reconstructed through translating, rearranging, and supplementing the Tangut version. Some military work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and unearthed at Heishui, reflect the considerations of Xixia rulers in their emphasis on military armaments and attention to the military arts. They also shed light on how Tanguts understood the Chinese military classics, and add new editions to Chinese books on the art of war.

As valuable resources for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ut and Chinese culture, Tangut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clarify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Xixia, represent the ability and depth of Tangut absorp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estify to the great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Tanguts.

5. Buddhist text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are Tangut sūtras, which include more than 400 texts, thousands of volumes in total. Advocating and propagating Buddhism domestically, on a large-scale, the Xixia dynasty obtained the Tripitaka from Song dynasty on several occasions. Over more than 50 years the Tanguts translated the Tripitaka into Tangut and expended vast amounts of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build temples and print sūtras. Some of the Buddhist texts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for example, the Mahāprajnāpāramitā-sūtra, are Māharatnakūta-sūtra, and Buddhāvatamsaka-mahāvaipulya-sūtra; some of them are translations from Tibetan, for example, Mahāmāyurīvidyārājnī and Mahāmantrānudhārī $s\bar{u}tra$. Some of them are compositions of Tanguts themselves, for example, Yijingangwang haimu yi jingping qinsong yigui and Zhongyoushen yaolun. Many sūtras have variant manuscript transcriptions and xylographs which are of great value in researching and collating Buddhist texts. Great numbers of Buddhist texts translated from Tibetan are not only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Tibetan Buddhism in 12th-13th centuries, but also reliable resources for research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xia and Tibetan Buddhism. The prefaces, postscripts, vows and commentaries are of great historical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Xixia Buddhism, the translation, transcription,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of sūtras, and Buddhist institutions in Xixia. Two Xixia imperial preceptors mentioned in the comments of various Tangut $s\bar{u}tras$ are the earliest references to imperial preceptors and occupy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The Tangut Tripitaka pubished by Xixia is the first Buddhist canon printed in China in a national minority script. Xixia also printed a *Tripitaka* in Chinese, which adds a new classification to the Chinese *Tripitaka*. These new discoveries add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the history of *sūtra*-printing in China.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supplies much solid data for understand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production of various editions - styles of writing, blockprinting, binding and paper making - from the Xixia to Song dynasties. The extant materials include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in seal script, regular (clerical) script, running hand and cursive hand; some are extremely elegantly written, some wield the pen spontaneously, plainly and without restraint, conveying the particular charm of Tangut handwriting.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of Xixia was highly developed; some books clearly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printed by thd Kezisi, a blockprinting agency set up by the government; some of them initiated with blockprinted plates in vast envirment and unique style; some of them were blockprinted by firms or private individuals. Many Tangut xylographs were cut skillfully and printed elegantly; some have preserved the names of the block cutters. There are also many different styles of editions of various sizes; the largest book is over a foot in length and the smallest is only an inch or more. The number of columns and lines on a page also does not conform to one pattern. Various binding styles occur-scroll, butterfly, and stitched. In addition, there is the long narrow (Brahmī) book style which originated in India and circulated throughout the Tibetan regions. Some have varied and colourful bindings and layouts. Seeing these books is like entering an exhibition of Xixia publications; we can imagine every style of edition that developed in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s the object of multiple research endeavors, and its value increasingly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ly world, as evidenced by diverse publications year after year that introduce and study the materials unearthed at Heishui city. It requires the courage of an unwavering, longterm commitment, and a practical, scientific spirit to make the resolution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nd research the voluminous literatures and arcane scripts. Russian scholars have mad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n this respect. Their principal works are as follows: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by N. A. Nevskii (1926) researches Tangut phonetics by using Tangut

material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n 1960 Tangutskaia fildogiia was published posthumously, making available Nevskii's manuscript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Tangut collection and his research works. Issledovaniia po fonetike tangutskogo iazyka (1964) by M. V. sofronov and E. I. Kychanov,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angut phon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making use of the Russian Tangut materials. Kitaiskaia klassika v tangutskom perevode (1966) by V. S. Kolokolov and E. I. Kychanov, introduces and reproduces the Tangut translations of Lunyu, Mengzi and Xiaojing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The 1969 publication of More pis'men by K. B. Kepping, V. S. Kolokolov, A. P. Terent'ev-Katanskii and E. I. Kychanov includes the Russian translations and facsimiles of Wenhai. Vnov' sobrannye dragotsennye parnye izrecheniya (1974) by E. I. Kychanov also includes Russian translations and facsimiles. In Sun' Tszy v tangutskom perevode (1979), Les kategorii (1983) and Vnov' sobrannye zapisi o liubvi k mladshim i pochtenii k starshim (1990), K. B. Kepping researches and presents the original texts. In Knizhnoe delo v gosudarstve tangutov (1981) A. P. Terent'ev-Katanskii used the Russian materials to investigate Xixia book editions. Izmenennyi i zanovo utverzhdennyi kodeks deviza tsarstvovaniya nebesnoe protsvetanie (1987-1989) is E. I. Kychanov's translation into Russia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iansheng Code", an important document. Tangutische und chinesische Quellen zur Militärgesetzgebung des 11 bis 13 Jahrhunderts (1990) is E. I. Kychanov's and Herbert Frank's publication of the Tangut military code Zhenguan yujing tong.

Chinese scholars recognized long ago the value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Early in 1913 Luo Zhenyu, who made Japan his home, was able to see one page of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from A. I. Ivanov and recognized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at book. The following year he borrowed nine pages of the book and lithographed it for dissemination; Luo Fucheng copied the whole book and lithographed it in 1924. In 1935 Luo Fucheng also copied and printed the Tangut dictionary Yintong from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n 1932, the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Volume on Tangut Studies), Vol 4., No. 3, was published, introducing some of the Tangut literatur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with collaborative studies by Luo Fuchang, Luo Fucheng, Wang Jingru, N. A. Nevsky and Ishihama

Juntaro. In the past dozen years, Chinese Tangutologists have payed more attention to introducing and researching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Tangut materials. Their principal Wenhai Yanjiu (1983) by Shi Jinbo, Bai Bin and Huang works are as follows: Zhenhua, collates and translates the entire Tangut Wenhai into Chinese, and presents some accompanying essays. Chen Bingying also introduced and researched several Tangut materials from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n his Xixia wenwu yanjiu (1985). In 1986 Li Fanwen published his researches on the Tangut Yintong in Tongyin yanjiu. Shi Jinbo's Xixia fojiao shilüe (1988) presents hi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Xixia Buddhism using the Russian Heishui materials and artifacts, and a revised catalogue of the Tangut Tripitaka based on the Russian materials. Xixia wenwu (1988) by Shi Jinbo, Bai Bin and Wu Fengyun presents more than 60 photographs of documents and artifacts from the Russian Heishui collection. In 1989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wa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with facsimiles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an index, supplied by Huang Zhenhua, Nie Hongyin and Shi Jinbo. Xixia Yanyu - Xinji jin chengdui yanyu (1993) by Chen Bingying translates into Chinese all the Tangut proverbs of the Xinji jinheci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Leilin yanjiu (1993) by Shi Jinbo, Huang Zhenhua and Nie Hongyin, translates the Tangut Leilin into Chinese and restores the Chinese edition of Leilin lost long ago. Xixia Tiansheng lüling (1994) by Shi Jinbo, Nie Hongyin and Bai Bin in 1994 translates the Tangut "Tiansheng Code" into Chinese. Also in 1994, Li Fanwen published Songdai xibei fangyin, a study of the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 using Tangut-Chinese transliteration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Nishida Tatsuo, the famous Japanese Tangutologist, also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n 1964 and 1966 he issued his Seikago no kenkyū, an investigation into Tangut script, phonetics, and grammar, and a brief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His works Seikago inzu "Goin setsuin" no kenkyū (1981–1983) and Seikago "Yueyuele shi" no kenkyū (1988) research the Tangut Wuyin qieyun and Yueyuele shi respectively.

Tangutologists of Russia, China and Japan have devoted much hard and fruitful work to introducing, translating and researching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 ultimate aim of Tangut studies is to probe the face of the late Xixia kingdom through use of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resources in the collection, to study further Xixia and Chine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and to make yet another deep probe of the materials from Heishui city. The quantity of Heishui material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s extremely large, and only a few have been published;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rest silently in the bookshelves of the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 in the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Specialists have deeply regretted not being able to see them. In recent decades Tangutology has flourished and this precious archive fascinates research colleagues with its unique cultural charm. Because only a few scholars have been able personally to examine the materials, and the time for reading has been limited, after all, scholars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they will be published in full for experts to consult, research and utilize without stepping out of the room. N. A. Nevskii once drew up a plan to publish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he even held that it was a scientific matter of prime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to publish the materials obtained by Kozlov. Now we are gratified to inform every research colleague that this wish will soon come tru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ntir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ill enable further advances in Tangutology and promote some Sinological domains by the acquisition of new materials.

During two research trips to Russia, on the basis of our initial work we arranged, registered and identified work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and achieved some new results. We found new materials never before catalogued, such as the important manuscript of rhyme dictionary Wenhai baoyun, a xylograph of Yintong with explanations of character form, phonetics and meaning one by one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s, and prescriptions, law suits, and so on. We found new pages of some materials previously arranged and so made them more complete, such as Tiansheng lüling, Zhenguan Yujing tong, Leilin and so on.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reappraisal of the materials, we corrected some incorrect titles and dates. Moreover, we found Tangut books printed by moveable type, which are of important scientific value as artifacts and as the earliest moveable type editions in the world. All of them will be refected in our publications.

At present,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publish such an extensive scholarly work a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is weighty task cannot be discharged without full Knowledge of the value of these materials, or without the spirit of love and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research, or without abundant experience in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As a publisher specializing in classical texts and enjoying high esteem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makes an immeasurable contribution by bravely shoulder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ublish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hile working in St. Petersburg, the Chinese staff enjoyed the support and concern of Y. A. Petrosian,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The warm cooperation of Professor E. I. Kychanov, L. N. Men'shikov, K. B. Kepping and L. I. Chuguevskii made the difficult task proceed successfully. The head and personnel in the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 of the Institute worked hard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staff in selecting material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s divided into the categories of Chinese texts, Tangut non-Buddhist texts, Tangut Buddhist texts and texts in other national minority languages. The Chinese materials are compiled according to the inventory number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The Tangut non-Buddhist materials are classified by traditional categories, i.e. language and script, history and law, society and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of classics. The Tangut Buddhist materials a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sūtra, vinaya and śastra.

The Russia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hich the scholarly world has been eagerly awaiting, marks the 960th anniversary of the creation of the Tangut script [i.e., ca. 1035]. The creation of Tangut characters was a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Xixia culture, so we believe that this publication will be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Tangut studie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published at present includes only part of the antiquities that Kozlov found at Heishui city; another part, the flower of Tangut artifacts, consists of large quantities of rare drawings, beautiful sculptures and implements kept in the Hermitage Museum in St. Petersburg. Some of these treasures have been exhibited in Europe and Asia, and were well received in academic and art circles. We hope that these antiquities, like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ill be arranged and brought to light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all the antiquities unearthed in Heishui city will bring great happiness to scholars and to the people of China.

Lastly, it ought to be emphasized th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ts Foreign Affair Bureau and its Scientific Research Bureau devoted much attention to the work of compiling, arrangeing and publishing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and approached it as a major projec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y their favourable organization and preparatory, they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made Mr. Yang Jianguo of the Foreign Affair Bureau do a lot of remarkable work on assisting in the contact and arrangem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we express our thanks to the related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 Jinbo March 1st, 1995, Beijing

Translated by Nie Hongyin Revised by Ruth W. Dunnell

Notes

Dangxiang Chronicle", Beishi 90, Zhonghua Shuju punctuated edition (the same for all dynastic histories cited below); "Dangxiang Chronicle", Suishu, 83. "Dangxiang Qiang Chronicle", Jiutangshu, 198. "Dangxiang Chronicle", Jiuwudaishi, 138. "Xia state chronicle" (part 1, 2), Songshi, 485, 486. "Supplementary Chronicle of Xixia", Liaoshi, 115. "Chronicle of Xixia", Jinshi, 134. Wu Guangcheng (Qing), Xixia shushi, 1835 pub.

- 2 "Biography of Taizu", Yuanshi, 1.
- 3 Zhang Shu (Qing), "Shu Xixia Tianyoumin'an bei hou", in Yangsutang wenji.
- 4 A. Wylie, "On an Anci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t Keu-Yung-Kwan in North China". JRAS. 1870. G. Devéria, "L'écriture du royaume Si-hia ou Tangout", Mémoires pr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vol. XI, pt. 1 (Paris 1898).
- 5 "Treatise on Geography", Yuanshi, 60.
- ⑥ Neimenggu wenwu kaogu yanjiusuo & Alashanmeng wenwu gongzuozhan, "Neimenggu Heishuicheng Kaogu fajue jiyao", Wenwu 7, 1987.
- Tiang Da, "Sitan'in Heishui huogu jilüe", Guoli Beiping Tushuguan guankan vol. 4, No. 3 (Xixiawen zhuanhao).
- Neimenggu wenwu gongzuodui, "Ejinaqi shamozhong gumiao qingliji", Neimenggu wenwu kaogu, first issue, 1981.
- Yue Banghu & Chen Bingying, "Woguo faxiande Xixia wenzi zidian 'Yintong' canpian e zhengli futuan yu kaoshi", Zhongguo minzu guwenzi yanjiu,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84.
- ① Li Yiyou, Heicheng chutu wenshu (Hanwen wenshu juan), Kexue chubanshe, 1991.
- ① Z. I. Gorbacheva and E. I. Kychanov,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Tangut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Izdatel'stvo vostochnoy literatury, Moscow, 1963.
- ① L. N. Men'shikov, Opisanie Kitaiskoy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NAUKA, Moscow, 1984.
- 13 N. A. Nevskii, "Proekt izdania pamiatnikov tangutskoi kul'tury iz Khara-khoto" ("Plan to publish the Tangut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Arkhiv vostokovedov Instituan narodov Azii AN USSR, quoted from Z. I. Gorbacheva and E. I. Kychanov,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作爲中俄兩國三方學者合作的結晶 ^ 俄藏黑水城文獻 V 經過多年的精心準備 現在終于呈現在全

世界學人面前

學術價值和研究現狀,已足以給人啓迪;我的序言,擬對其中的漢文文獻作些簡單的介紹 克恰諾夫(E.M.Kычанов)和史金波兩位主編的長篇序言,分别闡述了黑水城文獻的 發現經過

高 黑水城文獻 供了大量歷史、文學和藝術研究的新材料。這兩大發現已經吸引了無數學人, 域的遼闊 殷墟甲骨、敦煌吐魯番遺書和黑水城文獻三大宗,這無異于掘出了三個地下書庫, 中國古代文明史以及世界文明史作出新的結論。就以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來説,重要的考古文獻發現就 古代文明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曾深深地震撼着學者的心靈,驅使他們找回曾經中斷的文化信息, 因,被自然的或者社會的強力淹没乃至毁亡的中國古代文化遺産實在太多了。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 三千年前的殷商時代; 久遠的歷史長河中,不知有多少凝聚于建築、器物和文獻中的豐富知識得而復失。所以每一宗有關中 如此豐富多采,人們仍不滿足,仍在不斷努力尋求新的發現。因爲衆所周知, 均差可同敦煌文獻媲美。和敦煌文獻相似, 綿長、博大而又精深的中國古代文明,具有永久的魅力,吸引着全世界的學者。盡管中國文化遺存 的 均爲其他同類發現所不能比擬。十五萬片甲骨卜辭的發現,把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信史提前: 發現, 則展示了 數萬件敦煌遺書重現了從兩晉到宋初傳抄時代卷軸裝書籍的多采多姿的風貌 遼宋夏金元特别是西夏時期的文化資源, 黑水城文獻還具有濃鬱的地方風貌 其數量之多, 形成了專門的學術領域 由于戰争、灾害等原 反映歷 宗教色彩和多民族 内容之廣, 史的長遠 從而 質量之 地 在 提 到 有 對 國

代 文字特色 民族各 決 王 朝間 不能認爲黑水城文獻原屬 的 文化是交流 的 相 通的 西夏王朝 黑水城 的 文獻從 個 城市 所 個側 有 面 其價值 反映了當時中華文化的發展水平 因 此 而有 相應的 局限性 時

子兵 天盛律令》 法 黑水城 V 更表明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不可分割 等 其中有些 文獻 中 聖立義海 有直接從漢文移譯的古代重要典籍, 宋人注本, 》及自編的一批佛學著作等, 漢文原書已佚 性 , 有西夏王朝和文人學者纂寫的 這些無不與漢文化有關 比 如《 論語》 ^ 孟子》 而黑水城文獻中 法 • 典 ^ 孝經 類 書 的 如 孫

文文獻,

獻 少在 文獻 中 分是被用 江 尼 漢 佛 研 序列 亦有· 説 出 據孟 文文獻共有四百八十八件,實際上這個數字還不是全部, 究 法 版 列夫 (Л.Н.Меньшиков) 1984年出 少數是孟 圖、◆362A《 來裝裱 可 現已收入《俄藏敦煌文獻 與 俄藏敦煌 英國 或修補「新書」的) 列夫未及描述的 藏 文獻 斯 師資 坦 因 的 「從黑· 相録儀》 編輯過程中 水城發現的 未計 如 等。 \forall 問 ^ 人。 六十 世 得到了澄清 而Φ229V《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一》殘抄本, 0 有若干件黑水城漢文遺書被弗魯格(K.K.Фиуг) 另一 -四卦 版 其 中 的 圖 個殘抄本KK. [[.0238 (k) 的 ^ 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叙録 , 抄本即是其中頗有意思的 部分已經在孟 比 如母211《大乘人藏録卷上》、 尚有不少時代較早的零星寫本殘片(列夫《 叙録》 相 V 互銜 統計 件 中得到釐 接 ₩360版 據北京大學榮新 俄 此 藏 編 次 黑 正 水 出 畫 人了 釋 也 城 版 大部 敦煌 的 迦 有 文獻 牟 文 不

表 這數百件 現簡述其價 文獻 值 中 如 次 衹 有 劉知 遠諸宮調 等少數幾件曾經正式公布或整件披 露 絶大多 數 均 爲 首 次

填補空白的 獨特 文

發

填

補

空白

宋 西夏官 在 黑 水城漢文文獻 府 軍隊的檔案材 中 有 料 直 接從宋金傳 黑水城漢文文獻中有一 人西夏的基本書 批獨特的文獻引人注目 籍 亦 有 西 夏刻 印 抄 寫的 將爲歷 書 籍 史學和文學史 , 還 有 不 少

的 制 西 北 文書 鄜 軍 兩宋之交宋朝 延 俸 路 的 背 軍 面 環慶路等地軍事 糧 是西夏文辭 制 西 度等等 北 邊境軍事 典《 有重要的 部署 文海 文書三十餘件 人員 雜類》 價值 調 動 的印 其中許多具 本 軍糧供應 計109紙 可 知當年經過宋金戰争以 體 而 涉 捕 微的記録 及政 逃懲貪等等方面 和 八 年 是史籍語焉不詳或者没有涉 (1118)後 對于研 至 夏金又發生戰争 建 究北 炎 元 宋末 年 (1127 的將兵 這 及

宋龍 羅 批 版 文書爲西夏所 舒本 影 印 問 ^ 世 王文公文集》 即 獲 ^ 0 宋人佚簡 西夏缺 (王安石文集的 少紙張 0 黑水城文獻 , 遂用 以 個 印 中 書 重 一要版 的 0 此 這一大宗軍事文書 本 類刻本 的 頁內 ·書頁內文書 文牘 , 與 近年已經由 , 前 ^ 王文公文集》 人已有記 上海古籍 載 , 最 出 內公牘 爲 出 版 名 社 的 以 堪 珂 是

稱

雙壁

文書 等 上生 書 元宣 究者 生與流傳的文獻 處 從年代 社 會 0 典麥契 光二 活 的 關 盡 如 可 出 知 係 重 土 上 管十四 捕盜呈文及批覆, 一説 視 的 黑水城最終成 年(1372) 的 夏神宗光定十三年(1223)千户釗亭申報的處決注户狀 局 社 在三十多年後的北 0 除了 世紀四十年代末 最早的是北 部 會 文書 、器物得以幸存 的 上述宋朝西北 原始記録 年款的毁房提控案牘, 雖 爲 然有零碎 刑房令,亦集乃分省糧斛收支檢單, 宋端拱二年(989)智堅等四人往西天求取菩薩戒的誓記 座 , 比起歷經文人整理的 死 元時 , 城 雜 戰争使黑水河 邊境軍事文書外, 亂 , , 黑水城 這是當地 不易辨識 地 提調糧 方 人民的一 改 政權 道北 • 黑水城漢文文獻中還有各色官私 不 食公文等。 史書記載更加貼近 依 流 成系統等先 場灾難 然在有效地行使着職能, 黑水城未能 屬于西夏遺物的 發放粟麥、 , 然而 天的 0 社會 缺陷 高温與乾燥的 逃脱被沙漠吞噬 更多的則是 出典土 , 接近真 但它們 有 老百 一地、 夏 有元時代內容紛繁 桓 社 實 畢 自然條件 , 最 姓仍然 的 宗天慶年 會文書 竟是當時 回貸之類的 結局 晚 因 的 而 六十 越益 在 是多件 又使那 這 但 間 當 塊 從 契約 一受到 裴 餘 地 裏産 土 這 的 松 有 件 各 地 等 北 文 此 壽 研 種

水 蘇聯交還中國 胡應麟贊爲「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 城文獻中的金刻本《 諸 宮 調調 在金代是民間 現藏北 劉知遠諸宮調》 京圖書館。 文學的大宗 由于它早已爲 在出現如 , 證實了這 也 是中 此 或 人所知, 成熟的 文學史上的 論斷。 作品之前 現在已經成爲文學史家不可忽略的論題 這部文學作品的原件, 重 要 , 環 必曾有過許 0 著名的 多同 ^ 董 已于本世紀二十 類 解 型 元 的作品 西 廂 記 奠 基 年 被 代 明 黑 由 人

清 王. 灼 話 紹興中爲幕官、 金 刻 雖爲殘本 本《 新 雕 但王灼所引唐封舜臣索《麥秀兩歧 文酒 所著書已引 清話》 是 文酒 部有趣的宋人筆記, 清話 則《文酒清話 \forall 曲 書 事亦在其中 目無載 當 , 刻于北宋時期 而王灼 且較王灼引文爲詳 的 ^ 碧鷄漫 黑 法》 水城 發現的 曾引述 其 文酒 文

但是 如 本 果從民間文學的角度去考察,也許其意義更爲重要。此卷扉頁録有關于五代史的民間唱詞:「 六 八十四 桂 圖 未見 别 本著録 作 爲術數 類 的 占 1 書 當 然 有助于了 解彼 時 彼地 特 有 的 民 俗 創

及 業開 尋 間 至 皇帝與葉静 河 拞 和一諸宮 上 分别 代 基 一源 顯朱 後 標 周 調」的 唐三藏去西國 志 能 歸 $\overline{}$ Ŧī. 看月宫, 梁 于 行干支和妻財 流行 柴氏 , 定 互爲印 0 雖有好事必不達」。其他還有姜太公遇文王、孟姜送寒衣 E 亂平妖復李唐。 取經 文先 證 的筆 列 官鬼 武則天稱帝、 頌 記 日, 小説話本的 父母等相 石晉異圖因 然後爲釋 安史之亂等語 應關係 題材 姑 義 嫂 敦煌 , 其後爲 下注該卦出 劉漢逢 變文的 可 '以從 贊 義爲蕃 日 , 處 題 一個 材 , Ξ 比 再後爲「 , 側 , 如「觀卦」下標明「此 這些 面 郭周社 了 講 解當時的 歌 唱 漢高 日。 稷 文學 成成 祖 柴氏……」 在各 從 困 民 間 滎陽 唐 代 信 桂 卦是玄宗 疊 圖 仰 張 的 以 唱 Ŧi. 爻

雕板印刷的寶貴史料

代

宋而至西夏王朝

仍是家喻户曉

久盛不衰

被

廣泛使用

的

上 獻 中 與敦 傳抄時代 已有 煌 印 文獻 時代 綿 刷 品品 延 不 最 出 同 現 久 的 , , 是,黑 敦煌 而 黑水城文獻從時代來說, 文獻最大量 水 城 文獻 中 地展 ·刻本多于 示了傳抄時代中卷軸裝形 抄本。 恰與敦煌文獻 這是時代進化 相銜接 式 的結果。 的 , 這一 風 貌 時代是刻 0 在 唐 中 Ŧī. 國 代 古 印 宋 文 初 籍 獻 的 傳 成 敦 熟并 煌 播 文 史

種 定爲北宋刻本 或者相當 所罕見 元 餘 刻 件 現象不能 本十 在 金刻 當 中 0 件 明 于北 國 今全國 本 版 簡 末 尚 有 的 宋 單 以 刻 有 時 乃 史上 即 地 來 ^ 期 至 Ŧī. 孫真人千金方》 有 以 一代刻 一海外 好古佞古目之。 藏書家即視宋元本爲瑰寶 的 《呂觀文進 , 遼 宋元刻 本數件 ` 金 藏有中國古籍 • 本最受重視 西 , 莊子義》、 其餘爲唐 夏刻本 ^ 因爲無論是從文物還是從文獻價值 新雕文酒清話 的 的圖 , ^ 與宋先後并存 則寥寥可 宋、 廣 書館極多, , 韻 藏書品位之高 僞齊 ,數了 Ŋ \forall • ^ 西夏、 曆書》 《六壬課 的 0 但藏有宋元本的 據孟 遼 下, 金 元寫本文獻 刻 及佛教文獻共十 列夫研 常以 本 秘訣》 , 判 的 有 自與宋本等價 等 圖 角 , 無宋元本及藏 人 在 書館不多 度 件 黑 而 水城 論 餘件, 西 夏刻 漢 宋 , , 收藏 有多 文遺 元刻 南 而 宋 本一百 西 刻 有北 少 本 夏刻 書 確 爲 本 中 宋刻 實 有 判 本 四 高 可 這 世 十 本 以 出

早的 本 的 尺 的 刻 幅 批早期 I 姓 大 手 多 和 氏 很 刻 的 大 印 同 I 樣 的 本 0 在許 圖 姓 名 書 由 多叙 于 理所當然是研究中 有 西 述刊 夏 的 雕 佛 板印 經長卷 刻緣起并 書 的 貫穿于 紙張 國 強 調 雕板印刷史的首選資料 施 從卷軸 粘合處 印 佛 装到 經功德的 , 也 就是雕板板片的交界處 方 洲(發願文、 蝴 蝶) 0 刊 題記 裝的 刻 體 全部 中 制 基 本 演變過 往往 保 上 留 還 是 程 着 能 1卷軸 見到 紙 又結合了 本 附 板 的 録 , 的 木

刊

板

豐 富 [多采的版 畫 創作 其體 制 ` 形 式 書體等的 多樣性 , 也是非 常常 值 得 注 意 的

圖 包 文 種 書從 背 形式 、獻爲中國中 的 在 装幀 卷 在 敦煌 軸 俗 裝 方 稱 遺 古書籍史的寶庫 向 蝴 面 蝶 書如俄 方 装 有卷軸裝 册 裝 , 藏 包背的 ` 從抄 ^ 社 ` 寫 , 經摺裝 司轉帖 稱包背 絶不爲過 向 印 刷 蝴蝶裝; 轉 中已開始出現 蝴蝶裝等。 化 的 又包背 特殊時期 其 中 而 到了黑水城文獻中已被較多地采用 穿綫的, 蝴蝶裝形式表現得 其裝幀形式表現了多樣化 向 無命名 最爲充分 可 以名之爲包背穿綫 和完 的變異 全 在 故 如 稱 西夏這 裝 黑 般 水 有 此 不

關 露 所 密 著名學者周 基 拞 李」、「秦」、「郎」,衹著姓。 廣韻 不避 一礎 作長篇前 +宋仁宗時, 必 琰 , 試與存 黑水城漢文遺書中有《 將引起學術界的 而 是一 現在能見到的北 \wedge 去聲十三祭至五 廣 祖 世 言中補校 之北 部 韻 謨曾作 陳彭年曾建議由朝廷印一些版面緊湊的常用書籍 在中國 又同 宋、 ^ ^ 廣泛關 廣韻 南宋 音韻學史上占有極高 鉅宋廣 ^ 説文解字 宋刻本書籍大多頁面較大,行字 十八陷 廣 校本 及元明 公韻 領 注 避宋諱至仁宗, V ,共三十 殘本一 以後刻本 , , V 可惜 詳校所 **樣**, 種 未能目 是必 地位 相 八 見各本 , 校 頁 刻 而英宗父、英宗、 本 須爛熟于 的重要典籍, 睹黑水城所 , 行款 蝴 ,後又在 存下平聲一 蝶裝, 無 胸的 相 疏朗, 出 同者 爲上海古籍出版 卷心高15.5釐米 教科 舊時治國學,文字音韻 廣 先 神宗、 此本刻工精 韻 書 異文頗多, 以便寒士 至 四 0 V 徽宗、 宵 , 黑水城出土北 否則不知 社影印 亦能購 九 整 而 欽宗、 麻 寬23釐米, , 大略視現存各本爲勝 而頁 十陽 道 出 置 高宗 宋 訓 他 版 , 面 刻 詁 此本或與其事 會 的 較較 是 上 如 ^ 、孝宗之名 中縫 必 小, 廣 何 鉅宋廣 聲三十 不可 公韻 興 行 奮 刻 少 韻 字 的 了 小 的 有 至 I 披

北 載 便 金 九 法 宋 呂 張 提 刻 中 , 本 惠卿著 本 呂 期 又 惠卿是北 句 0 有 他 政 而 呂 治 們 黑 有 史 對 氏 水 孝經傳 ^ 莊 于 城 宋王安石變法中的 的 儒佛 研 子義 文獻 《孝經義》早已失傳 究熙豐變法人物思想的 \forall 道 中 , V 三家的學 又發現了 或作《孝經義 ,「元豐七年 更早 重要 術 和 人物 的 義理不 先表進 0 黑水城文獻中竟有其西夏文譯本出 北 呂 宋 重要資料 0 刻 變法派 氏的解經之作, 存門户之見, ^ 本 內篇》 , 題 在王安石本人的 呂氏的 呂 其餘蓋續成之」 觀 凡其可取之處 不僅在經學史上占有 文進莊子 《莊子義 倡導下 義 V 陳 世 均 ^ 振 四 令文獻學家深 比較公允 曾編撰 庫 這簡直是奇迹 孫 全書 ^ 許多 直 席 之地 齋 地 未收 書 經 加 感 注 録 以 興 也是 解 吸 今存 蓋 奮 取 以 題 呂 研 爲 \forall 氏 順 卷 史 變 究 有

曾 知 延 州 , 鎮 廊 延, 在西北邊地爲官多年, 其著作在西夏頗有影響, 因 以 流 傳 也

三 刊本大藏的初期典範

O.

經 華嚴 ***** 在 經 ^ 黑水城漢 妙法蓮華 V 卷 四十《人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文文獻中, 經 \forall • ^ 般若心經》 占大多數的 • 是佛教 ^ 瑜 伽師 文獻 地 , ` 論》 有 ^ 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 呵 ^ 含經 釋摩 V 訶 • 衍 ^ 論 大般若 等 重要佛教經 波 羅 等印 蜜 多 行最 經 論 V 廣 • 其 金 中 以 剛

會 朝 集》卷二三五《賜西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 高 (1030 要輯 麗 曾 國 多 刻 次 本佛 稿 部 , 向 外 經 最 後 真宗天禧三年(1019) 國 肇始于唐五代, 和 宋大韶令集》 次爲神宗熙寧五年(1072) 周 邊并峙 政 大規模有系統的 權贈送大藏經。 等記: 贈東女真 載 宋 朝 刻印 0 國 太宗雍熙元年(984) 向 現特引熙寧間宋帝詔令一 一 部 , 西夏 則始于宋初的《開寶藏》 國回賜大藏經有六次 仁宗嘉祐三年(1058) 贈 H 本國 通 贈西夏國 以見其詳情 第 部 據《 次 端拱 佛祖統紀》 爲仁宗天聖 一部 元年 ^ (988 另據 宋大詔 載 八 ^ 宋 年 贈 宋

賜近 軍 命, 詔 移牒宥州, 夏國主: 年宣 令有司點勘, 給」事具悉 省親 差人于界首交割, 乞收贖釋典一 無至脱漏卷目, 所請 贖經 大藏, 至可領也 所 文, 有印造裝成紙墨工直 并簽帙 已指揮 所有馬七十疋, ` 複 印經所 帕 前 , 應 後 , 更不用進來 有經 新 并依例 舊翻譯 本 進馬七十 并 經 文 如 法印 , ·
疋 惟 造 覬 給賜 聊 宸 慈 充資費 令保 特 降旨 安 早

宗太平興國 翻譯經文」。 西 夏所得之宋刻大藏經, 八 年(983) 板運開 爲《 封 開寶藏》 存印經院 無疑。 , 曾經修訂補充 ^ 開 寶藏》 于太祖開 故夏國上表中特别提出要包 寶 四 年(971) 始 雕 括 于 成 前 都 後 新 太

宗 宗天賜 流 原 年 通 卷 準 寧宗之際 , 大 備 説 禮盛國 開寶藏》 延壽寺刻 底 明西夏所得 本 慶 0 羅皇 早已散佚, 黑 Ŧī. 的 年 水 后 城 ^ , (1073,爲超 華嚴 文獻 必藏于其都 現 中 經 度仁宗 當北宋熙寧六年 存世者僅 的 等 大量 而 興慶府 0 漢 仁宗天盛 施印者尤 文佛 有十一 典, 夏國求 卷(其中四卷在日本 多 乾祐間 陸文政 多爲西夏自刻 0 這些品 取漢文佛藏 施 當 印 種豐 南宋孝宗時 的 富 ^ 其中 不僅 心 刻 經 印 ***** 爲 大多又出于官刻 黑水 精 持修研讀 審的 所 大安十 刻 城文獻中 佛 和 桓宗 經 年 也 (1083)天慶 是爲 是 未發現 中 時 | 國 初 翻 代較早 [現存早期 當 刻 ^ 當 開 北 南 宋 的 翻 寶 宋 譯 藏 有 元 光 惠

本 - 藏經 的 遺 珍 , 是漢文大藏經刊 刻 史上 的 重 要 環 節

尚 宗 多 佛 期 + 宋 出 領 這 相 著爲歷 刻 年 教 勸 的 自 餘 河 此 繼 本 經 懸 文獻 年 確立完 化 隨 西 長 着 開 中 代 文 而 水 典 , 的 大藏 也 蘆 未 的 藏 控 城 寶 文獻 有 決 傳 傳 善 陸 成 制 , 1 藏 經 西 還 的 續 佛 功 播 而十分引人注目 和 П [夏刻-此 所 中 有身兼華嚴 尚 問 悉數 地 過 鶻 教 劫 程 未 題提供 後 但 組織了三千五百餘卷漢文佛 的 的 外録 吐 漢譯 本 收 刊 漢 流 系統 , 傳 蕃 包 文 , 布 0 佛 無論是西夏本 可 活 唐 括與梵文本 地將大藏經從漢文譯成少數民 末宋 必 動 信的資料 翻譯藏 具備了党項 教著作 五 凈 將 祖 主要集中 有助 初 土 和定慧禪 一宗 文佛經 的 顯 的 來源 于中土 0 • 教經 至于 土 藏文本 在 ^ 漢 雕 師 的 尚 通 密宗典 典的 板 的 理 黑水城 比 不 ` 宗 經 的 重逐 大師立 西 П 止 , 籍 于 夏 的 漢譯 還是從 密 鶻 源 所 遺 漸增 翻 流 方 ^ 一志銘 吐 吐 關 開 注 書 譯 已 面 大。 中 的 中一 蕃 係 寶 蕃等多民族的 0 大體完成 族文字,這畢竟是第 土 乃 藏 時稱「番大藏經」。 其底本 心 性海 黑水 些 至今没 傳 清 至西域佛 \forall 罕 涼 0 人 來源 不 見 城 解 心 文獻 漢 都 脱三 有 少 要》 流 得 可 傳 傳 新 教史綜合研究水平 譯經人 , 的 到 制 的 既 佛 譯 和 以 2雑藏 從中 ,佛 比 教 律 漢文佛 有梵文本 華 才與經 雖然這階 較 的 經 \forall 類 嚴 窺 清 各 • ` 次 密宗 測 法 的 晰 個 典與數 ^ 界觀 0 宗派 驗 的 西 鎮陽洪濟禪院 中 而 夏 段 也 經 , 梳 國 佛 ·的 典及 門 有 量 且 在 的 的 理 撰 提 在 藏 理 教理論依 龐 翻 前 述」, 等等 西 譯 西 文本 論 大 高 期 中 夏 夏 體 底 統 土 , 的 慈覺 爲 比 Ξ 本 治 佛 西 系 王 探 朝 主 既 朝 有 亦 教 如 夏 的 要 Ë 後 的 文 有 Ŧī.

許 見 救 的 金 就就 苦 刻 初 刻 本 是 經 基 道 家 傳 本 0 世 道 此 經 南 後即 華 經 典 的 模 真 始 的 最 仿 早 于 經 與佛家經典沉 滙 刻 五代 録 千佛名 本 , 道 發端于 ^ 家經 孫 全藏刊 經 真 \vee 典 南 浮樂辱 人千金方 的 刻則在宋崇寧政 朝宋時 形式 或 與 同 彼 , 刻 時 消 陸 印 代刊 此 修 了十 静 長 六壬課 和年 刻 廣 大道家天尊圖像 收經 黑水城文 的 間 秘 宋 訣 戒 ^ 稱 政 等 獻中有 方藥 和萬 《萬壽道 也 壽 符圖 爲 道 寫 我 藏 藏 件雕板印 本 [等書 們了 道教文獻 0 相 黑水城所 關 解道家著作 本 分爲三洞 0 另 ^ 在 太 外 敦 出 É 煌 結集 在 的 洞玄靈 黑 西 這 遺 水 書 夏 城 中 文 寶 的 遺 此 獻 并 書 天 乃 流 尊 道 不 傳 中 或 卒 説 的 藏

般傾

向

因

超 越 唐宋的 版 畫 成 就

提

供

了

綫

消

息

西 夏 雕板 書籍 的版 畫 , 在 美術史上具有特殊的 意義 目 前 我 們 所 能 見到 的 具 備 完整意義 的 版 書

曹 首 版 推 畫 氏 唐 咸 繪 江 刻 通 南 吳越 品 九 位 年(868) 之高 王錢氏的大批版 , 留 王 存數量 一玠造 ^ 之多 畫作品問世 金 剛 , 經 足 \forall 以 卷首 填 , 補 表明早期版 畫 以 0 往 到了 所 有 Ĭ. 版 畫 代 創 畫 宋 史圖 作 初 的 成 ١ 籍 雕 熟期 的 板 空 印 白 Ë 書 經 被 足 到來。 廣 以 泛 改 應 寫 而 用 中 時 隔 或 敦 版 不 煌 久 畫 史 的 歸 義 的 西 有 夏 軍

篇章

化 式 如 良 條件 好 涵 在 義的 黑水 契 由 西 機 夏 于發生和 和 交匯 雕 戰 城 亂等 文獻 特别 板 點 印 發展 上 原 中 是 書 保 因 西 事 , 也 的 夏 業 存了大 , 就 政 的 地域條件 民間 更 權 發 加 藝術 量 積 展 凸 中 極 , 現了 造 的 品品 原 汲 包括 成 特殊性 地 取 · 其重 中 了 區 版 刊 原 版 要 的 畫 畫 刻 , 的 由 存世 傳 藝 的 地 圖 統 術 于揚棄了 位 不 文化 書 H 多 益 和 版 0 成 , 推 熟 既 在 畫 有 的 西 動 , 的 夏 就 7 物 書 時 是 邊 質 期 畫 遠 技 和石 個 和 , 中 版 明 術 窟 畫 證 原 和 壁畫 地 市 由 0 于 品 場 相 之間 是 基 比 的 之下 傳 礎 統 種 廣 , 泛的 , 形 比 成 較 中 使之處于 文化 新 原 了 穎 蓬 地 的 品 交 勃 多 藝 流 發 大 重 術 爲 展 自 文 樣 比 的

書 ^ 清 籍 凉 黑 插 國 水城版畫主要有兩種形式: 置 師 答皇帝問》 其 中優秀者 等佛經卷首畫 有 ^ 華嚴 經 是單幅的 ^ 觀 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招貼年 畫 如 ^ 四 美 人 圖 V ` 法 ^ 華經 義 勇 武 V 安王 ^ 轉女身經 圖 等 是

就 寬 和 由 在 度 方 于 册 圖 客觀上 , 書 籍 更加 裝式的 書從卷軸裝向 版 對 畫 適合展 畫 適應 主要有 面 提 性 示 出了 諸 經 卷軸裝卷首 0 摺裝 卷軸裝版 如 匀 説 稱 法 和 方 , • 均 變相 册 畫 版 布 在 裝 畫 和節 的 的 寬度上 ` 過 經 宏偉場 奏的 渡 摺 較 裝 , 要求 版 卷 少受到 面 首 畫 同 創 畫 時 限 作 和 制 方 常常帶 , 册 由 , 于 常常占 書 ,要考 有對 扉 頁 據一 老軸: 慮到 畫 傳統 改 紙 種 成 , 約30-的 其 經摺裝後使 中 承 襲 以 45 卷 , 釐米 軸 又需要顧 主 裝卷首 像 甚 避 開 至 及對 畫 更多 摺 爲 經 多 綫 的 摺

第 表 中 I 化 性 繪 生」等 心 的 畫 紙榜題爲 西 夏版 壁 榜 的 畫 題 延 第三紙有「東 式構 伸 畫 有 在 諸居 教主釋迦牟尼佛」和「諸大菩薩衆」、「四 圖 構圖 特 有 别是宗教版 \pm E 如TK8 婦婦 南 是壁畫 施 方淨住 佛 ^ 總路: 佛説轉 畫 ` 世 幡 化成 畫 界無垢稱 當然就更多地繼承了其脱 的終結, 女身經 寶臺佛 Ŧ 卷 會之處」、「 佛 又是書籍 V 、「得 卷首 部弟子衆」等; 畫 聞 插 諸居 此 圖 此 胎 版 經信解歡喜」、「供養父母師長處」、「懷子 士婦轉 畫 畫 而 全長 的 來的那 先 59犛 驅 女成男出家之處」、「從母 第二紙 個 0 米, 藝 早 以 術 期 版 占三紙 樣式的 佛在耆闍 畫 一毫 許 無 疑 分 多特徵 崛 為三 義 Щ 地 説經 右脅 個 應 當 部 較 處」爲 是 有 手

身生得受大苦痛」、「女人爲他所使搗藥舂米若熬若磨」、「 左上角題「佛説轉女身經變相」。實際是爲此三紙全圖之總題 厭 離女身供養佛菩薩處」等。二、三紙終了

經的 單 的沿襲 情 常明 節等, 顯 而是逐漸地找到了 都是從壁畫變相的形式轉换而來的 這幅變相的滿版 版 畫的自身語言, 布局、 通過分割 表現爲獨立于壁畫 的 0 但 平面來展開 在改變壁畫爲卷首版 故 事 和一 的 時 般繪畫樣式的 間 畫 過 的 程 時 ` 候 采用 不同 更多 榜 題 的 來 已經 説 明 不 對 · 是 簡 應 佛

兩 視覺印象就應當相當于進入佛寺一開始時所看到的主尊形象 進人石窟寺 種 不 首 同 先 的 廟 藝術 把主題的 先 形式 看 所 空間 中央, 決定的 性 後看 的 0 (中央對稱 兩 壁畫展開 邊; 但 . 卷首畫 , 布局 常 常是中軸綫對 一却是從右至左展 改變爲時間性 稱 形式 的(流水過程) 開 , 看 這是由 畫 有個 觀瞻者的 布局 時 間過 0 程 這是由 視覺路 所 [壁 以第 綫 決 畫 定 和 的 眼 版 的 書

照 致 變 和 0 冉冉 包 變相故 其次 轉女身經變相》 括變相 展開了 事 卷首版 的 這部佛經的背景、 發展 忠實于經典原 畫 的 的三張紙幅 展開 應當同信徒們耳熟能詳的押座文、 過程同 意的表現 情節和功德結局 佛經「 ,正好對應了佛經的「

三部科 序分」 也是創作者對讀者長期形成的審美過程 , 的 ٦ 程序, 正宗分」 講經文直至俗講 完全遵循了 Ň 分」 ٦ 流 的程式 通 讀畫者的 分 的進程 ᆫ 的「 當打開 心理期 三部 相 審美 致 經卷的 科 分 0 小 這既是 理 時 的 的 候 程 必 版 序 要關 畫 相 創

這批 皇俄 目 世 界 異 域 國 黑水 而 在 格 聖 局 的 貢獻各自的智慧與力量時, 但 彼 也 城文獻及其藝術品是在 公得堡 一魂歸 有 中 國 了 中 東方研究分所特藏部珍藏了近一 [學人至今念及猶感刻骨銘心之痛 重大的 土 , 而且化身千百展現于世 改 變 0 如 今, 本世 雙方的感慨是很多的 當中俄 紀初中國 雙方的學者、 , 最 爲海內外學 後 個世紀的寶貴文獻的意義取得共識 近百年來, 個封 0 出 建王 《俄藏黑水城文獻 術界所共有 版家友好平等地坐在 朝 滄海桑田 清 朝 , 其意義 中 處于風 國 的出 一發生 的巨大是不言 雨 起 飄搖 7 版使這批珍品雖然身 研討 并 天 翻 的 爲實現這一 年代裏流 地 對全 覆 而 的 變 面 的 共同 刊 化 人 布

文獻 者的努力 以漢文爲主, 黑 水 城文獻 西夏文這種本已消亡的 的影響目前暫不如敦煌文獻 對于大多數研究者來說比較 歷 史文字已經被基本解 , 其研究程度也遠不如敦煌文獻那麽深 容易人手; 讀 而黑水城文獻以西夏文爲主, 但 畢竟能 熟練掌握西夏文的學者至今爲 人。 盡管經過幾 這是因 爲 敦煌 代

還是不多;另外,黑水城文獻原件的刊布滯後于敦煌文獻,也是原因之一。

版。 將重新編入本書。關于西夏文的世俗和宗教文獻,史金波主編的前言已經作了全面介紹, 引。爲了保持黑水城文獻的完整性,對于已經收入《俄藏敦煌文獻》的、已經確認的少量黑水城文獻也 漢文部分共分六大册,作爲獨立的一大部分,將在第六册中附收文獻叙録、年表、分類目録和索 《俄藏黑水城文獻》擬分爲「漢文部分」、「西夏文世俗部分」、「 西夏文佛教部分」三大板塊出 同時在各部分

原始文獻的寶庫獲取第一手資料。 可以預期, 隨着此次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全部發表,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掌握西夏文,親自從這 對黑水城文獻的研究也一定會像敦煌學一樣 成爲漢學領域的顯學

的各卷卷首,也都將分別提要説明。

之一。

九九五年八月二十日于上海

Preface

As the fruit of joint labor by three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nd Russia, the Heishuicheng (Khara-khoto)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is at last presented to the scholarly world after a long and painstaking preparatory stage.

The excavation process, academic value and research history of the Khara-khoto collection have been described in the lengthy prefaces by E. I. Kychanov and Shi Jinbo. My preface will present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llection.

The old Chinese civilization of long standing is both extensive and profound; its perennial attractions appeal to scholars all over the world. Although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s both rich and varied, people are still not content with it, but always seeking new discoveries. As is well-known, through wars and disasters, much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was buried or destroyed under the power of nature and society. Throughout the vast expanse and long history of China, an unknown quantity of the knowledge preserved in buildings, utensils and literature was lost, so every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bout ol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made a great impact on scholars and prompted them to retrieve lost cultural information so as to draw some new conclusions about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world. Tak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for example, which brought the signific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of Yinxu, of the extant documents at Dunhuang and Turfan, and of the literature at Khara-khoto. These three discoveries are tantamount to the excavation of three underground libraries; their extensive coverage of a long period and a vast region, and their rich contents make them incomparable with other similar findings.

The excavation of 150 thousand pieces of bone and shell inscriptions advances the accurate record of Chinese history to the Yin Shang period of three thousand years ago. In the thousands of extant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appear a rich array of manuscript scrolls from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up to the early Song dynasty, providing lots of new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literature and art. These two great excavation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 great many scholars and define new fields of academic expertise. The excavation of Khara-khoto materials displays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Liao, Song, Xia, Jin, Yuan, and especially Xixia. Its great quantity, rich contents and high quality almost rivals the Dunhuang materials. Just like those from Dunhua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strongly reveal the flavour of local life and religion, as well as being polylingual. One should not imagine that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belonged to only one city in the Xixia kingdom, which might limit the relevance of their value. The civilization of every nationality and kingdom at a given time is mutually interacti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then also shed light the developing level of Chinese culture.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includes such ancient classic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as Lunyu, Mengzi, Xiaojing, Sunzi (some of them are from lost commentaries by Song scholars), codes and anthologies written by Xixia officials and scholars, such as Tiansheng Codes, Shengli Yihai, as well as some Buddhist works, all of them cognate to Han culture. The literatur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Khara-khoto represents especially the continu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According to L. N. Men'shikov in his Opisanie kitayskoy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in 1984, there were 488 texts in Chines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from Khara-khoto, but this sum does not include some fragments from earlier times (most of them used to mount or mend later books). Some Chinese documents form Khara-khoto, entered by K. K. Flug into the ranks of Dunhuang materials, are now included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Some of these were acknowledged in Opisanie by Men'shikov, and some of them were clarified in the process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such as Dacheng ruzanglu uanshang (Φ 221), illustrations of Shijiamuni shuofa tu (Φ 360) and Shizi xiangluyi (Φ 362A). The manuscript fragment of Φ 229V (the 11th chapter of Jingde chuandenglu),

as pointed out by Rong Xinjiang of Beijing University, can be connected with another fragment KK.II.0238(k) in the Stein's collection from Khara-khoto in London. A few materials published here are not described by Men'shikov, such as an interesting manuscript of *Liushisigua tu* (Diagram of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In the hundreds of materials, only a few, for example the *Liuzhiyuan zhugongdiao*, have been published in full; most of them are publish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ir value will be briefly recounted below.

I. A Unique Literature that Fills in the Gaps

In the Chines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there are basic works passed directly to Xixia from Song and Jin, books block-printed or transcribed in Xixia, and a number of files and records made by Xixia and S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ilitary leaders. Worthy of note is the unique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Khara-khoto that supplies new materials to the fields of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irty odd military documents of the northwest border area from the tim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109 pieces of paper in total, concerning the military deployment, troop movement, provisioning, pursuit and punishment etc. of Fuyanlu and Huanqinglu in the northwest area from 1118 to 1127, are of great value for studying the institution of garrisons, payment and supply at the end of the North Song. They contain detailed records that were rarely described or even lost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se documents in the block-printed Tangut dictionary Wenhai zalei, which shows that there was a war between Xia and Jin after that between Song and Jin, and these documents were obtained by Xixia and used to print books because Xixia was deficient in paper. Documents preserved within the sheets of block-printed books, as recorded by our predecessors, the best-known are the documents within leaves of the Wangwengong wenji in the Longshu edition in Song times (an important edition of Wang Anshi's collected works), which were printed in collotype by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i.e. the Songren yijian. The great quantity of military 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ought to be of the same value as those in Wangwengong wenji.

Although the excavated social documents suffer the defects of being scattered, disorderly, incomplete, and difficult to read, they are after all part of the original

record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at that time; they are closer to the society and reality that the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compiled by scholars, so studen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m. Besides the military documents of the Song northwest border area, there are sixty odd various official and private social documents, of which the earliest is the pledge by Zhijian and three other friends to seek Buddhisattva precepts in India, dated to 989 (Song, Duangong 2nd year). The latest ones, dated 1372 (2nd year of Xuanguang of the Northern Yuan), are some files of interrogation concerning the destruction of houses and documents about the allocation of foods. Among Xixia documents, there are contracts for borrowing wheat by Pei Songshou in the Tianqing years of Xia emperor Huanzong, and a report of the sentencing of some subordinates by the qianhu (chiliarch) Zhao Ting in 1223. Even more numerous are the various Yuan dynasty documents, such as reports and replies regarding the capture of bandits, decrees of sentencing to punishment, grain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bills of Edzina province, contracts for extending wheat, pawning cultivated lands, borrowing money, etc.. Although the fighting at the end of 1340s made Edzina River changed its course to the north, Khara-khoto did not escape the fate of being engulfed by the desert at last. But it is known from document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Khara-khoto, during the North Yuan thirty years later, still effectively exercised its authority, and people still lived there. That Khara-khoto finally became a dead city was a disaster for the local inhabitants, but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heat and aridity preserved the literature and utensils the originated and circulated therein.

The "Zhugongdiao" is the principal element in Jin folklore and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famous Dongjieyuan xixiangji was praised by Hu Yinglin of the Ming to the effect that "the whole literature of the Jin dynasty is comprehended therein".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such a mature work, there must have been many earlier works in the same style. This conclusion is confirmed by the Liuzhiyuan zhugongdiao in a Jin edition found amo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the original of which was returned to China in the 1920s and is now kept in the Beijing Library. Because it was known earlier on, it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oint of discussion for historians of literature.

The Jin xylograph Xindiao wenjiu qinghua is an interesting Song sketch-book not

described in any bibliographies but quoted by Wang Zhuo in his Biji manzhi. Once a subordinate in a prefect's office in the era Shaoxing (1131-1163), the fact that Wang Zhuo quoted Wenjiu qinghua in his work, means that the Wenjiu qinghua was probably printed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Although the Wenjiu qinghua found in Khara-khoto is only a fragment, it includes the Tang story of "Maixiu liangqi" quoted by Wang Zhuo and is more detailed than Wang's version.

The manuscript Liushisigua tu (Diagram of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is not found in other bibliographies. As a divination text, it certainly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unique folkways of that time and place. It may have greater significance, however, if investigated from a popular literary point of view. A folk song reciting Five Dynasties' history is written on the title page, explaining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Five Dynasties, through the Liang, Tang, Jin, Han, and Zhou, the text were ordered in song (eulogies), followed by commentaries, then zan (praises) and ge (songs). In every divinatory symbol are indicated the relations of Wuxing (Five Elements), Ganzhi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wives, material goods, officials, ghosts, fathers and mothers etc., references to the position of the said symbol are given below. For example, it is indicated under the symbol guan that that symbol means the "Tang emperor Xuanzong enjoyed the sight of the moon and nothing would be gained though 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good". Besides, there are also stories about Jiang Taigong (Ziya) meeting Wenwang (Zhou dynasty), Meng Jiang sending the cotton-padded clothes, Gaozu (Han dynasty) being surrounded in Xingyang, Zhang Qian searching for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Xuanzang (Tang dynasty) seeking the Tripitaka in India, Wu Zetian ascending the throne, the armed rebellion led by An Lushan and Shi Siming, etc., from which one can learn the popular beliefs of those time and the themes of literary sketches, storytexts and Dunhuang transformation tales which circulated along with "Zhugongdiao". These literary recordings were well-known and flourishing throughout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Song and Xixia eras.

II. Precious Materials of Block-printing

Distinct from the Dunhuang materials, the block-printed books from Khara-khoto are more numerous than manuscripts, a result of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propag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eriod of hand copying of

texts lasted the longest. The Dunhuang literature represents, in their greatest quantity, the various scroll and book binding styles of that time. Printed texts appear in Dunhuang materials of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and the early Song. The dates of Khara-khoto materials overlap with those from Dunhuang; this is the time when block-printing became a mature and widely-used techniq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Song and Yuan dynasty receive the greatest attention; the contemporary Liao and Jin printings are certainly of the same value as those of Song, but the printings of Xixia are seldom mentioned. From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bibliographers have noticed the Song and Yuan printings as gems, and the ranking of a library has been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its Song and Yuan editions. This phenomenon cannot simply be seen only as lavishing praise on antiques, because the value of Song and Yuan editions proved to be higher than others in both material and literary terms. Today in China and overseas, a great many libraries collect ancient Chinese books, but only a small number of them possess Song and Yuan editions, even fewer are those with Song editions, and fewer still are those possessing Northern Song, Liao, Jin or Xixia xylographs. As Men'shikov shows,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there are more than ten Northern Song xylographs, such as Lüguanwen jin zhuangziyi, Guangyun, Lishu and some Buddhist texts; more than forty Southern Song xylographs; eight Jin xylographs, such as Sunzhenren qianjinfang, Xindiao wenjiu qinghua, Liurenke mijue; over one hundred Xixia xylographs; ten Yuan xylographs, and also a few printings of the Five Dynasties; the rest being the manuscripts of Tang, Song, the Jin puppet state of Qi, Xixia, and Yuan times.

These ancient block-printed books are naturally the most important material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The specifications of cutting blocks are basically one block for one piece of paper, and the size of the blocks is mostly large. In many postscripts describing the process of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sūtras, sometimes one can find the name of copiers and block cutters. Where sheets were glued together in some Buddhist scrolls, i.e. at the joints of blocks, are preserved the earliest names of block cutters. It is also noteworthy that the Xixia block-printings go through the whole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scroll form to the square butterfly

binding, and combine with various block-printed illustrations, thus their specifications, styles and handwritings are diversified.

Binding forms include the scroll, accordion, and butterfly styles, in which the butterfly binding emerges u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For example, there are common butterfly styles without binding up the spine, other styles with binding up the spine, and butterfly styles with spine binding and stitching. This style appea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Shesi zhuanti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from Dunhuang, and is widely used in Khara-khoto literature. In Xixia, as books evolved from the scroll to the square form, from manuscript to xylograph, the specifications of binding show the various divergences, so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extol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as a treasur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the Chinese books from Khara-khoto, there are fragments of Guangyun, blockprinted, preserved from the first rhyme xian to the fourth xiao, ninth ma, tenth yang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e even tone, from the thirtieth xiao to the fiftieth yan of the rising tone, from the thirteenth ji to the fifty-eighth xian of the departing tone. It is 38 pages in all, bound in butterfly, 15.5×23 cm for the text, and the surname of cutters, Li, Qin, Lang, are recorded at the middle seam of the block. There was a taboo on using the name of Northern Song emperors up to Renzong, but the names of Yingzong and his father, Shenzong, Huizong, Qinzong, Gaozong and Xiaozong were not tabooed. Most of the 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Northern Song now extant are comparatively large in page size and sparse in columns, but this edition is well printed, and has comparatively small pages and denser columns. In the time of Renzong (Song dynasty), Chen Pengnian suggested that the court print some widely used books with small blocks that the poor scholars could afford. Maybe this edition has a bearing on that. Compared with edition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and the Yuan, Ming and later times, this edition is not the same as others in form and content, but is roughly superior to present-day editions. The famous scholar Zhou Zumo worked out a critical edition of Guangyun by carefully collating all the editions he saw, later he also made some additions to Jusong guangyun in his long preface to that book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It is a pity that he did not see this Guangyun edition of Khara-khoto, for his delight could not be imagined. Guangyun is an important tex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In the past, paleography, phonology and semantics were the principal basis for classical studies, and *Guangyun*, as the *Shuowen jiezi*, were textbooks that had to be learnt by heart. The Khara-khoto publica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edition of *Guangyun* will draw the close attention of all academic fields.

Lü Huiqing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political reform led by Wang Anshi of the Northern Song. Led by Wang himself, the reform school compiled lots of textual commentaries to propagate their ideas of political reform. They had no sectarian biased in the scholarship and idea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and were ust and fair in assimilating their useful points. Historical records note that Lü Huiqing wrote a Zhuangziyi, "in the 7th year of Yuanfeng, he first offered up the Inner chapters, the others were evidently continuations" (Chen Zhensun, Zhizhai shulu ieti, vol. 9), he also wrote Xiaojingzhuan or Xiaojingyi. Lü's commentaries to the classics not only took their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studies, but also proved to b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s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and the ideas of political reformers in the Xining and Yuanfeng years. Lü's Zhuangziyi was not collected in Siku quanshu, and today only a Jin edition survives. However, an earlier edi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is found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titled Lüguanwen jin zhuangziyi, which is of great interest to scholars. It bears noting that Lü's Xiaojingyi had been long lost, so it is marvelous that a Tangut version of it was found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Perhaps because Lü was the magistrate of Yanzhou and Fuyan, occupying official positions in the northwest for years, his work influenced and spread to Xixia.

III. An Early Model of Block-printed Tripitaka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Khara-khoto is Buddhist, including the important sūtras and śastras, Dīrghāgama-sūtr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Vajracchedic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Yujia shidi lun, Shimoheyan lun etc.. Among them the most popular works are the 40th chapter, the Gandavyūha, of the Avatamsaka-sūtra, and the Guan milepusa shangsheng doushuaitian jing.

Block-printed sūtras appeared at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but the systematic

printing on a large-scale began with the Kaibao tripitaka at the beginning of Song. Fozu tongji records that the Song kingdom repeatedly gave the Tripitaka to other countries and neighbour regimes; the Tripitakas were present to Japan, Korea, East Jurchen and Xixia in the years of 984, 988, 1019 and 1058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Song huiyao jigao and Song dazhaoling ji, the Song kingdom gave Xixia six Tripitakas, the first in 1030 and the last in 1072. I now quote an edict from Xining years (1068 - 1077) by the Song emperor (Song dazhaoling ji, vol. 235):

Edict to the Xia lord: I learn from your memorial that "I beg you to send me a whole Tripitaka with bindings, bookmarks slipcases and sūtras translated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I hope Your Majesty will issue your decree with kindness, and order the department to check and sort out the volumes without omission. As for the whole outlay for printing, binding, paper and ink, I pay tribute to you seventy horses as usual ... As for sūtras you have asked to buy, I have already ordered the Department of Sūtra Printing to print all the sūtras for you, the garrison Bao'anjun to pass its official document to Youzhou and send someone to deliver them at the boundary. You can get the sūtras there and need not pay the tribute of horses.

The Song edition of the *Tripitaka* sent to Xixia is undoubtedly the *Kaibao tripitaka*, the blocks of which were cut in Chengdu in 971, then sent to Kaifeng in 983 and kept at the Department of Sūtra Printing. The *Tripitaka* was revised and expanded, so Xixia remarked in the memorial that it should include "sūtras translated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Kaibao tripitaka has long been lost, at present there remain only eleven volumes (four of them kept in Japan). That there are no originals of the Kaibao tripitaka in Khara-khoto indicates that they must have been kept in the Xia capital Zhongxingfu. Xixia sought the Chinese Tripitaka was not only for Buddhist practice and studies, but also as a basis for reprinting, translating and disseminating. The vast number of Buddhist works is mostly block-printed by Xixia itself, and many of them were prin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comparatively earliest ones are the Hrdaya sūtra, printed by Lu Wenzheng in 1073, and the Avatamsaka, cut at the Dayanshou Temple in 1083. The most popular sūtras were printed by Renzong in the years of Tiansheng

(1149-1169) and Qianyou (1170-1193) and by Empress Luo in the beginning of Tianqing (1194-1206) of Huanzong's reign for expiating the sins of Renzong. These various excellently printed $s\bar{u}tras$ are the heritage of the earliest printed Tripitaka preserved today, and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history of the block-printing of the Chinese Tripitaka.

Chinese Buddhist works from Khara-khoto literature did not only originate from the Kaibao tripitaka; there are many newly translated sūtras, Tantric texts and Buddhist works by Chinese not included in *Tripitakas* of past dynasties. At the end of Tang and the beginning of Song,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was nearly complet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s of each Chinese Buddhist School were perfectly established. After that the work of Buddhist translation concentrated mainly on Tantric texts, the originals being either in Sanskrit or Tibeta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these text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Sanskrit and Tibetan editions, has not been clearly described. Controlling Uigurs and Tibetans in Hexi, the Xixia regime possessed the qualified translation personnel and experiences of Tanguts, Chinese, Uigurs and Tibetans, and successfully organized the translation work of more than 3500 volumes of Chinese sūtras (then called the Tangut Tripitaka) in the first 50 years of its rule. The originals for translation in this period came mainly from the Kaibao tripitaka, but it was the first systematic translation of the Tripitaka from Chinese into a non-Chinese language. In the later Xixia period, along with the spread of Tibetan Buddhism, the number of translation from Tibetan sūtras into Tangut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numerous Tangut Buddhist texts from Khara-khoto will surely contribute to raising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Buddhism in China, Xixia, Tibet and Central Asia, and supply certain materials for investigating long-standing problems. As for some rare Chinese Buddhist works amo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such as the Changluliao heshang jiewai lu of the Chan School, the Tonglidashi lizhi mingxin xinghai jietuo sanzhi lü, Zhenyang hongjichanyuan cijue heshang quanhua wen of the Pure Land School, and Qingliang xinyao and Huayan fajie guanmen annotated by Zongmi who was both the fifth patriarch of the Avatamsaka School and Dinghui Chan master.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are from Song and from Xixia;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general tendencies of the Buddhist theories in Xixia can be seen from either local printings or tex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Daoist texts began with Lu Xiujing's collection of scripture, prescriptions and incantations in san dong (Three Caverns) during the Song era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fter that time Daoist texts rose and declined with those of Buddhism. A block-printed book in the Khara-khoto collection, Taishang dongxuan lingbao tianzun shuo jiuku jing, is modeled on the Qianfoming jing in printing the portraits of the ten main gods of Daoism. Daoist manuscript texts are not rare among Dunhuang materials, while block-printed texts appear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The Daoist Canon, called the Zhenghe wanshou daozang, was printed in the Chongning (1102-1107) and Zhenghe (1111-1119) eras of Song. Perhaps the Daoist literature found at Khara-khoto is either the earliest edition of Daoist texts extant today, or is related to the contemporary Song edition of Zhenghe wanshou daozang. Furthermore, the Jin editions of Nanhua zhenjing, Sunzhenren qianjinfang, and Liurenke mijue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supply information on how Daoist works spread to Xixia.

IV. Achievements in Block-printed Pictures Surpassing Tang and Song

The plates in the Xixia Block-printed books are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art. The plate in the complete sense that we can now see is that in the title page of Vajracchedicā by Wang Jie in the year of 868.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Song, block-printing was widely used, and a great many block-printed illustrative works by the Cao family of the Guiyijun at Dunhuang and by the royal Qian family of the Kingdom of Wu Yue in Jiangnan heralded the arrival of the mature period of early plate production. But the nearly contemporary Xixia plate-printings, high in quality and abundantly preserved, are enough to fill in the previous gaps and to revise the relevant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late-pri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Xixia block-printing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gradual maturation of materials, techniques and markets in the art of plate-printing, and allowed it to flourish. Especially the active assimi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the Xixia regime pushed forward the large-scale cultur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Central Kingdom and border areas. Clear proof of this are the many books and plates printed in the Central Kingdom and preserved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Owing to

natural conditions and warfare, the folk arts, including plate-printings, are less well preserved in the Central Kingdom. Because plate-printing was a new style of art in the Xixia period, because regional conditions favored its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former traditions of drawing and cave-mural painting was abandoned, Xixia plate-printing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mingling of multiple cultures.

There are two principal forms of Xixia plate-printing. One is the pictorial poster for the new year, such as Simeiren tu and Yiyong wu'anwang tu. The other is illustration to books, with excellent examples found on the title page of sūtras such as Avatamsaka, Guan milepusa shangsheng doushuaitian jing, Saddharma-pundarika, Zhuan müshen jing, and Qingliangguoshi da huangdi wen.

The plate-printing in Xixia books occur in three main varieties, i.e., plates in openings of scrolls and "harmonica" bound books, and on the title page of square notebook-bound books. The plates in scrolls are the most numerous. Following the transition in books from scroll binding to harmonica and square notebook, the production of plates frequently followed the scroll tradition as usual, but also had to adapt to the harmonica and square notebook binding forms. Scroll plates were relatively unlimited in size, usually occupying one piece of paper (approximately 30-45cm) or an even wider sheet so as to depict the vaster scenes of preaching the dharma or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At the same time, the requirements for symmetry, equal spacing and rhythm arose in consequence of the need to assure that the main portrait avoided the seam after the switch to harmonica binding.

The composition of Xixia plate-printings spelled the end of painting on wall and banners and the beginning of book illustration. Without doubt plate-printing in earlier periods must have developed out of hand drawings. Especially in religious pictures, they of course carried forward more features of the art from which they originated. A representative composition in the style of a wall drawing is the picture on the title page of Foshuo zhuannüshen jing (TK8), the overall length of which is 59cm, occupying three sheets and consisting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sheet has the titles "Jiaozhu shijiamuni fo" and "Zhu dapusazhong", "Sibu dizizhong" in horizontal cartouches. The second sheet has the title "Fo zai qishejueshan shuojing chu" in the middle; other

titles in cartouches are "Zhu jushifu shi fo yingluo huacheng baotai fohui zhi chu", "Zhu jushifu zhuannüchengnan chujia zhi chu", "Cong mu youxie huran huasheng". On the third sheet are the titles "Dongnanfang jingzhu shijie wugoucheng wang fo", "Dewen cijing xinjie huanxi", "Gongyang fumu shizhang chu", "Huaizi zaishen sheng deshou dakutong", "Nüren weitasuoshi daoyao chongmi ruo'ao ruomo", "Yanli nüshen gongyang fo pusa chu".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sheets, at left upper corner is written "Foshuo zhuannüshen jing bianxiang", as the general title of the whole triptych.

It is clear that in this pictur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hole block, the use of separate planes to illustrate stories, the use of horizontal cartouches to label scenes from the $s\bar{u}tra$, were all adapted from the wall painting style. But in the transition from wall painting to block-printed plate, people did not simply follow the former, but gradually found the distinctive language of plate illustration, which displayed many differences from the style of wall and ordinary painting.

Firs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ubject gave way to a temporal distribution. This resulted from the different forms of wall painting and plate-printing. The exposition of wall painting often shows axial symmetry; this results from the viewers' line of vision: entering a cave temple, people first see the central portion of the painting and then the two sides. But in a scroll, the pictures unfold from right to left in a temporal process, so the first object of vision shoule be the main icon, comparable to what one first sees upon entering a temple.

Next, the stages in the unfolding of a scroll picture parallels the stages of reading a $s\bar{u}tra$ in three parts: xufen (introduction), zhengzongfen (main section) and liutongfen (circulating se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formation tales should parallel the process of Buddhist questions and answers, text explanations, and folk sermons known intimately by disciples. This indicates the creation of block-printed plate remains true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text, and the creator's necessary attention to the reader's aesthetic process and psychology, which were shaped over a long span of time. The three sheets of illustrations to "Zhuannüshen jingbian" are correspond precisely to the pattern of the three-part division of $s\bar{u}tras$: when the scroll open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s\bar{u}tra$ are gradually presented in the whole transformation

tableau, following the readers' psychological expections.

The literature and art works of Khara-khoto were taken to Tsarist Russi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precarious years of Qing, the last dynasty of China. Up to now Chinese scholars have been deeply distressed by this.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has changed in recent decades as greatly as if "oceans had turned into mulberry fields". Now when scholars and publishers of both China and Russia sit together in friendship and equality to discuss and affirm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ecious literature kept nearly a century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respectively to contribute their wisdom and strength to reach a common goal, all sorts of emotions well up in their mind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will make the souls of these precious items return to the East, although their skeletons stay abroad. They will unfold before the world's eyes through thousands of transformations and be shared with great signification by the academic world at home and abroad.

The influence of Khara-khoto literature can yet not compare with that of Dunhuang, and its level of study is not as thoroughgoing as that of Dunhuang. This is because the Dunhuang literature, mainl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easier for most scholars to deal with, while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is mainly written in Tangut. Although Tangut as a dead script has been fundamentally deciphered by the efforts of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there are still few scholars who have mastered Tangut language skillfully.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Khara-khoto literature falls behind that of Dunhuang.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will be published in three parts: Chinese works, Tangut non-Buddhist works and Tangut Buddhist works. The part containing Chinese works consists of six volumes. As separate parts, the description, chronological table, classified catalogue and index will be appended to the sixth volume. To preserve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in its entirety, this publication will include a few newly confirmed Khara-khoto materials. The Buddhist and non-Buddhist material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have already been introduced by Shi Jinbo in his preface, and will be described separately in each volume of both those parts.

It should be expected that along with the entire publication of the Heishuicheng (Khara-khoto)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there may be increasing numbers of scholars trying to master the Tangut language, so as to use first-hand materials from the original treasure. Studies on Khara-khoto, as those on Dunhuang, are sure to become one of the remarkable academic field in Sinology.

Li Weiguo

Aug. 20, 1995, Shanghai

Translated by Nie Hongyin

Revised by Ruth W. Dunnell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共六卷,按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人藏號順序編排出

版。已被編入該所敦煌文獻序列(Φ、Дx)的黑水城文獻亦予檢出,收入本書

凡同一文獻的各種寫本與不同刻本全部收入本書。同一文獻有多號完全相同(同版同印次) 相應部分配補。 選收其中印製最精良、保存最完整者,其餘不再收録。遇殘缺污損葉面, 在第六卷所附《叙録》中對所有人藏文獻均作外觀與內容的簡述, 以同版同印次的他號文獻 並指出未收刻本 的 刻本

Ξ 凡配補的文獻, 以入藏最前的編號居首, 他號按順序以斜體排印附後。 配補葉面起迄在《叙録》 中

對應參見的文獻編號與部位

俄 **TK42** TK 44 TK 46 TK 48 TK 49 TK 52 TK54TK 5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每 文獻圖版均有文字説明。程式爲:藏家簡稱與原人藏編號, 文獻題目 圖版總數與序數。 若本

號圖版僅一幅, 則總數與序數一項省略。 如 : 四

加

以説明。

如 :

俄 $\mathbf{A}2$ 六十甲子歌 俄

TK 133

真州長蘆了和尚劫外録

(38-1)

五 同件文獻中有多項不同內容時 以 1, $2, 3 \cdots$ 標識 如 :

TK 137 . 佛說業報差別經 2 佛説無常經 ω 大佛頂白傘蓋心咒 4. 聖六字太明王心咒

同 藏號中有內容不相統屬的多件文獻葉、片時, 以 A, B, C..... 如 :

TK63A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俄 TK 63B 佛經

俄

俄 TK63C 佛經(西夏文)

文獻背面有文字、 圖案、印章等, 以原入藏號後加 V (verso) 標識。

> 如 :

俄 TK6V 粉蝶兒詞

學

文獻附屬的字條紙片等,以原入藏號後加 P(piece) 標識。如:

俄 TK49P 裴松壽處典麥契

七 六 要作通欄排列。 本書正文圖版係據原件直接拍攝,電子分色製版影印。 誤者,予以補正;原件無題者,據其內容及相關研究成果予以擬題。 文獻的命題,若原件前後多處有標題者,以完整、 通欄片以不超過文獻原大爲限。 通行、 一般作上下雙欄排列, 規範爲原則,擇采其一;原件標題缺損訛 命題依據在《叙録》 少量因內容或識讀需 中述説

八 本書每卷卷首均印有彩色圖版。 彩圖主要用于本卷精彩篇章的欣賞介紹 , 兼及特殊情況(彩繪 朱

筆、印章、字迹不明等) 的顯示。

九

本書第六卷附編《叙録》、《年表》、 《分類目録 索引》 以利查閱研究

Editorial Notes

- I. Consisting of six volumes, the Chinese part of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is published and compiled in the numerical order of the collection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Khara-khoto materials already compiled in the Dunhuang series $(\Phi, \mathcal{A}x)$ are taken out and included in these volumes.
- II. Each manuscript and different edition of one and the same work are all included in these volumes. Regard the identical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more than one number of the same material (of the same edition and page), the best printed and preserved numbers are included, others are not. Regarding fragmentary and blurry pages, other corresponding pages of the same edition are included as supplements. Descriptions of the forms and contents of all the literature are given in the Bibliographical Notes appended to the sixth volume; the numbers and parts of corresponding references not included are also indicated there.
- III. Th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are noted by marking the preceding number at the beginning and other numbers enclosed successively in italics.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supplementary pages will be indicated in the *Bibliographical Notes*. e.g.,

俄 TK42 TK44 TK46 TK48 TK49 TK52 TK54 TK5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IV. Each plate is labeled in this order: the abbreviated name of the collector and the original inventory number, the topics, the total number of plates and the ordinal number. If there is only one plate of one number, the items of the total and ordinal number are omitted. e.g.,

俄 TK133 真州長蘆了和尚劫外録 (38-1)

俄 A2 六十甲子歌

V. Different content in one and the same item are indicated by 1, 2, 3, ... e.g.,

俄 TK137 1.佛說業報差別經 2.佛說無常經 3.大佛頂白傘蓋心咒 4.聖六字太明王 心咒

Fragmentary materials differentiated from each other by their content in one and the same number are indicated by A, B, C... e.g.,

俄 TK63A 大方廣佛華嚴經人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俄 TK63B 佛經

俄 TK63C 佛經(西夏文)

Writing, designs and seals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per are indicated by adding V (verso) after the original number. e.g.,

俄 TK6V 粉蝶兒詞

Written pieces of paper enclosed with the material are indicated by adding P(piece) after the original number. e.g.,

俄 TK49P 裴松壽處典麥契

- VI. Regarding the topics of the materials, if there is more than one headings in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original, one of them will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omprehensiveness, currency and standardization. Gaps and errors in the original headings will be completed and corrected; where omitted, the original headings will be re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and relevant research. A concordance of headings is described in the *Bibliographical Notes*.
- VII. Facsimile plates in these volumes are photographed directly from the originals and printed with electronic colour scanners. The plates are arranged in two sections of the page, upper and lower; some are arranged in one section in regard to the needs of the content and coherence. The one-section plates are no larger in size than the originals.
- VIII. The colour plates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volume are printed for the reader's appreciation,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lendid chapters in the volume, and to demonstrate the documents' special conditions (coloured drawing, red ind script, seal, blurred writing).
- IX. Bibliographical Notes, Chronological Table, Classified Catalogue and Index are appended to the sixth volume for the reader's reference.



一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外景



二 東方研究分所閲覽室



四 東方研究分所庋藏黑水城文獻



三 東方研究分所手稿部



六 絹本彩繪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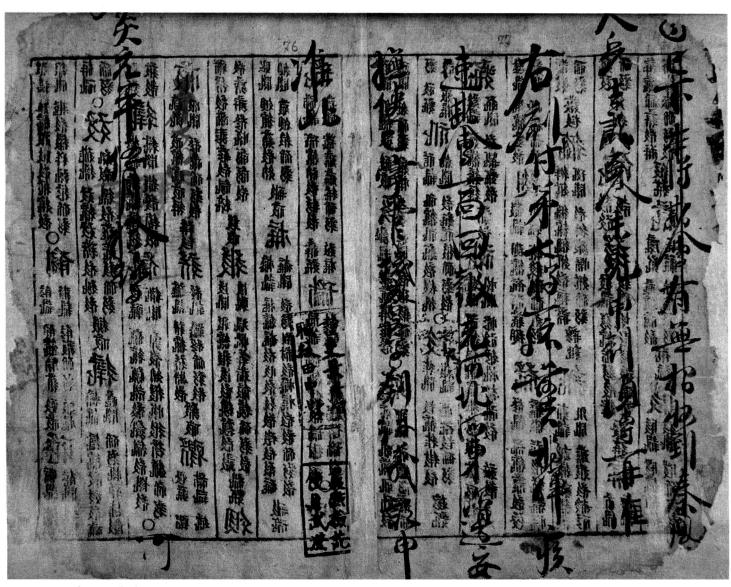


五 絹本彩繪大勢至菩薩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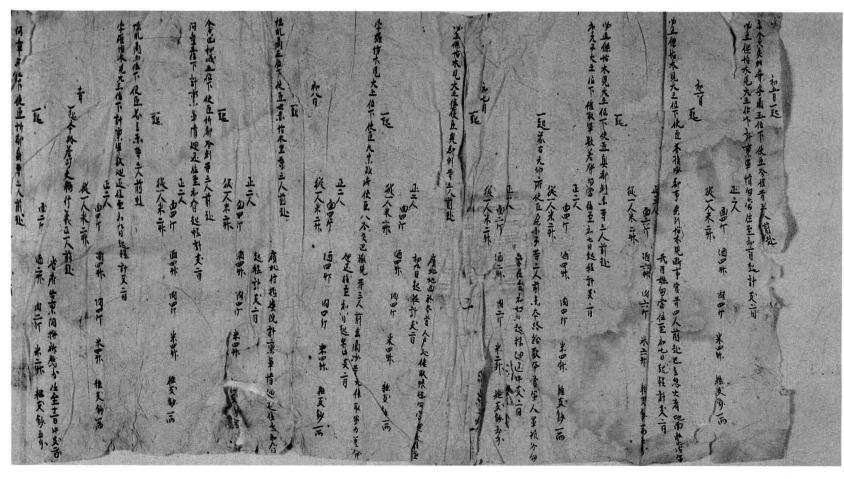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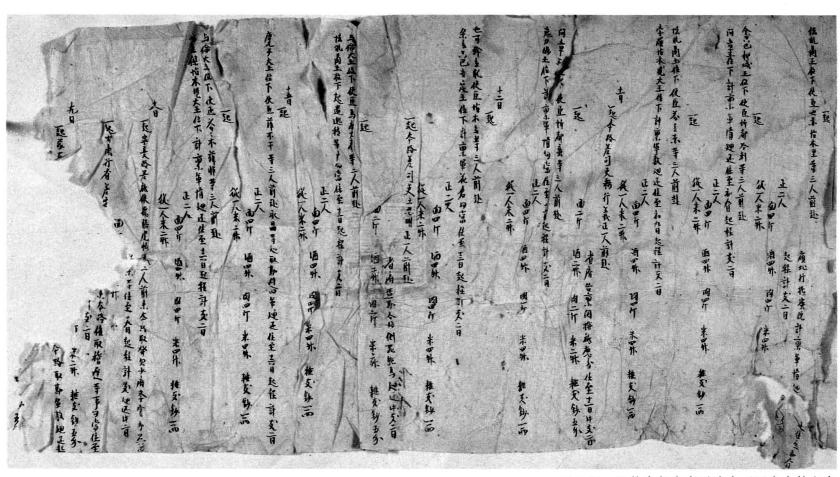
七 木板彩繪西夏文陀羅尼曼荼羅圖





一二 TΦ14 宋西北邊境軍事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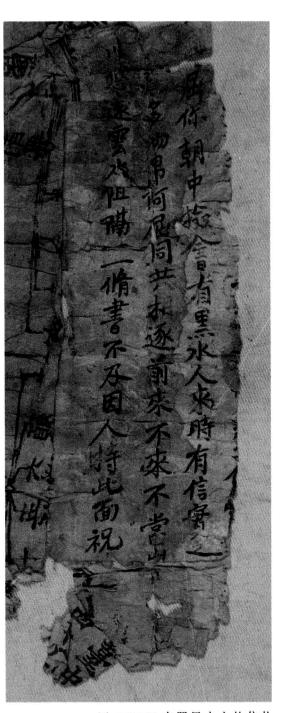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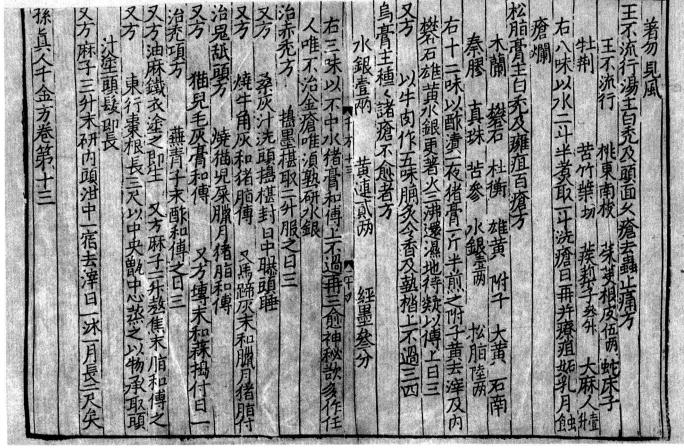
一三 TK248 元甘肅行省寧夏路支面酒肉米鈔文書



一五 TK264 至元通行實鈔貳貫



一四 TK300V 有關黑水人的信札





一七 TK322 元寫本六十四卦圖



一八 TK153V B60V 朱寫本卜筮要訣

三木一水主家中兄弟子孫少三更為事多不一水一木一土此課剛強之人亦後顧不與云三水一木一土此課剛強之人亦後顧不與云	宝子 孫子 不 子 法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子 不 子 不 子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法 不 方 方 方 方	一个人工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工工程 一个人工工程 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工程 一个一个工程 一个工程 一个一个工程 一个工程 一个工程 一个一个工程 一个工程	三大富更子孫榮王山課大喜更無込一金山課王家有文章之人不久為官田蚕進王人昌盛 還有官榮賴故	二木一火土裝昌 子孫風骨白堂堂二火一水土刑傷 家中温乱出非常
東宝地和	田织之罪门	家雖至	生悪食五郷 上事禄 王遇不	堂行常

一九 TK172 金刻本六壬課秘訣



二〇 TK288 金刻本新雕文酒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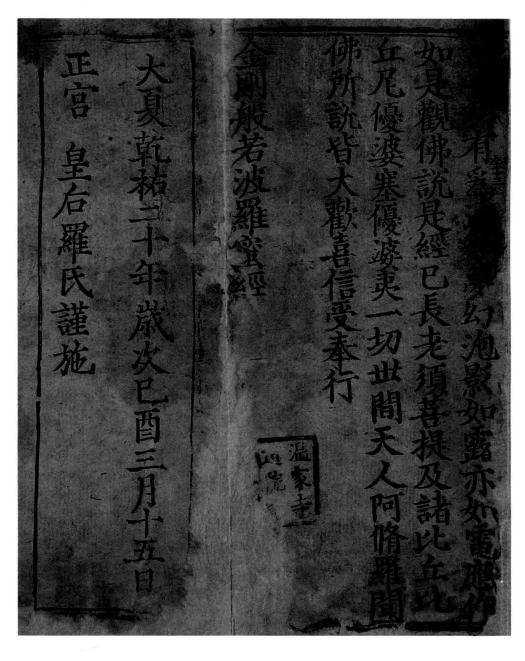


二一 TK6 宋刻本吕觀文進莊子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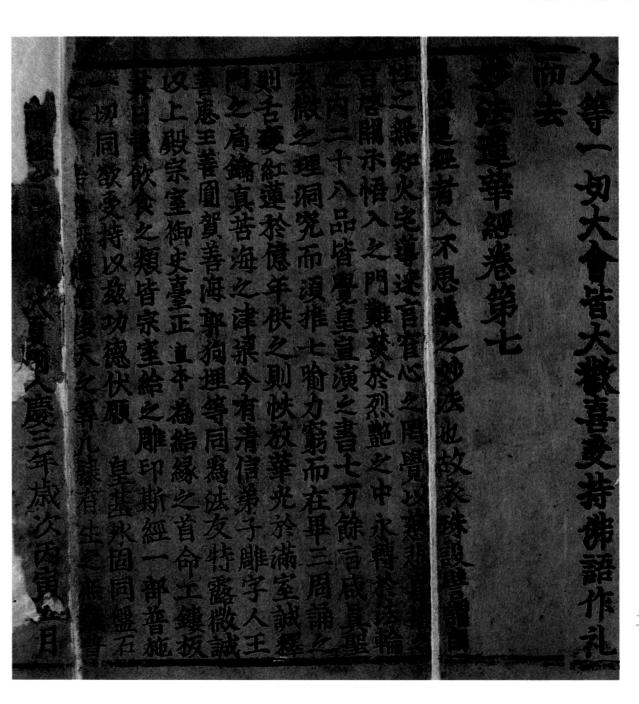
二二 TK151 宋刻本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説救苦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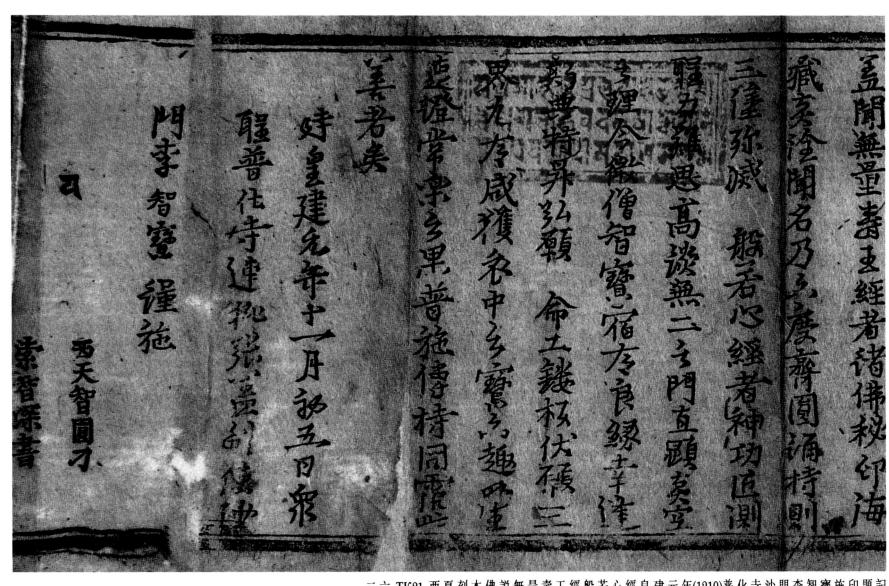
二三 TK14 西夏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乾祐二十年(1189)羅皇后施印題記

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大步壽寺演妙大德沙門 守瓊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 守瓊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 守瓊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 守瓊

二四 TK88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



二五 TK11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人慶三年(1146)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等 施印題記



二六 TK21 西夏刻本佛説無量壽王經般若心經皇建元年(1210)普化寺沙門李智寶施印題記

向頌云数讚甚深 金剛般若經欽第五 **承諸佛門依** 福田法男生靈普密益 登 者 彫 皇庭宴審率土豊登勾當者實相通神 聖岸 孙 霊 却幼 德 積 廣大如重空究竟如法界 福飛行水陆带角枝毛俱冰良因 時大中祥符九年四月八日服果 微妙 理先馮 助縁

二七 TK149 宋刻本金剛般若經鈔第五 大中祥符九年(1016)知丹州軍州梁某施印題記

毗盧現相稱性演 百千傷之大經彰生佛也無二如

時兩世 曼殊化身隨機設三 苦自分 妙門明階降也非

除各異是故 簡以科注釋其義引學者擊其門至于悟入大 云奇哉

法界則方通相虚萬象性實 法門都可謂 大也 相國蒙公製序指示

九竹舉網提綱花嚴經云張大数網於生此之 網若但科而不注如無 出凡要路意備詞存簡 網之綱科注別 文旣觀下有

二人 TK242 西夏刻本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下天盛四年(1152)沙門法隨等施印題記

毎思 早超十地之因速滿三身之果仍 漢共三萬餘卷并彩繪功德三萬餘 福宗親延萬葉之複武職文臣恒祭 龍圖永覇等南山而崇高 鳩勝善伏願 慎散施國內臣民普令見聞蒙益所 14 六趣四生咸捨生死法界含識悉證 顯於禄位黎民士庶克保慶於休祥 仁宗聖德皇帝拋離獨境安住淨 仁宗之厚德仰憑法力以薦資遂於 德聞經數喜定轉女身信樂受持速 珠衣挫聲聞直談妙理慈親獻蓋報 性大權應跡右脇化生推天帝不 無相無名之妙心顯非男非 末世去聖時遥宿植良因幸逢真教 **於聞堂乾大覺特開甘露之玄門** 周之忌晨命工鏤板印造斯典番 女身經者上東秋典了 世之洪思諸婦轉形酬多生之育 齊北海而深廣 皇太后羅氏發願謹施 天慶七卯二年九月二十 皇太后羅氏自惟生居 皇女享千春之 E 妙

二九 TK12 西夏刻本佛説轉女身經一卷天慶二年(1195)羅皇后施印發願文

聖師日散施

至朝天盛四年 歲次至申八月望日河道沙門釋為随 郑州開元寺僧西安州歸義劉德其雕板中文謹就

福星於官馬道如堯舜之風國等

華嚴之境惣期萬類

一真不間冤親將來無對溥異舍情悉如我願

於皇家曜

鏡中欲垂慈照者也

中里喜遇良規始欲修習終難得本以至口授則音律然

傳寫者句文脱謬致罷學心处成大失是以恭

土鏤板印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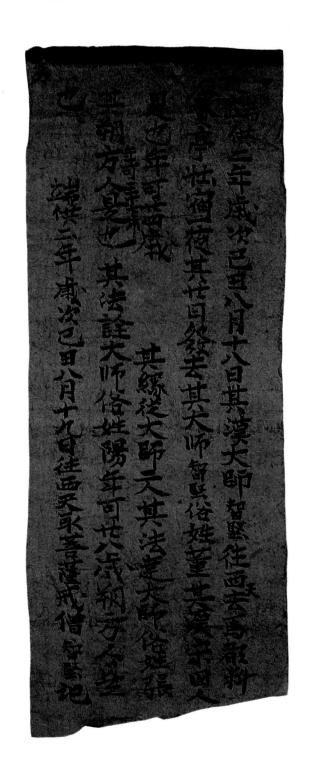
流通備諸學者若持若誦情

聞功產種智仰此上乗通嚴法界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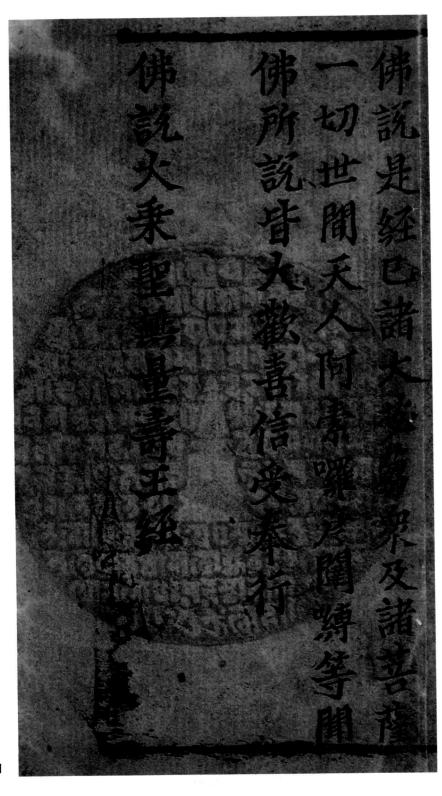
文上有科三者備矣一經顧馬使諸修觀之徒講宜之侣

稍勞披覽故有先賢移其科格以就

三〇 TK134 刻本通理大師製立志銘心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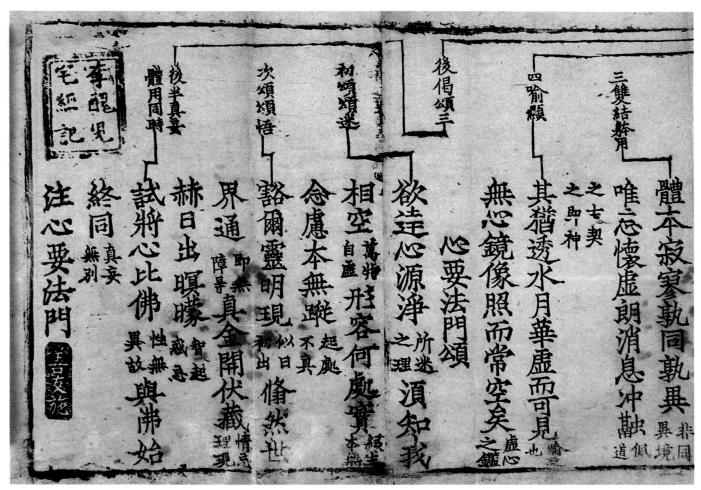
三一 B63 宋端拱二年(989)智堅等三人往西天求菩薩戒記



三二 TK76 刻本佛說聖無量壽王經梵文印

觀無量壽	四週願微	一个	一傷昔自	三慶遇迴向甲	後釋聚喜敬辞	初釋還山重說現	後耆山流通干	初王官流通六	後正釋經文十	初敏意科分自	三流通分子	後佛記生	初發心樂生	後悟道發心三	初見土観聖	三聞法獲益了	後下品下生	次下品中生
視無量壽佛經甘露疏科	三付屬令持二	後念持	初聞名	後勒持五	初舉益二	一舉益動持丁後	一正答名持丁	後依附宣説四後請受持]初阿難請問二	後以理答二	初引論問問	後通違妨子	初釋經文發	後諸天發心	次侍女發学	初夫人悟道	後釋經文三	次下品中生初辨差降二
言文都	後釋成以	獲勝擊	勒	後引證如	初釋文行	釋成謂	初正釋此		初問經名	後例會根壁	初正會女全	後結成是	次引發工	初正釋本	四生後利益一初指經勝益	後茶丁	初間門	後通妨一後
	後正釋經茎	後合法會	初釋阶芬	初配文顯意宿	後機釋成解	次釋經意圖	初配經文初	後指傳證如	初引經證	後證成	初會釋	後因願文	整丁初現果文	後教願實和	初指經勝益	後證成女	初正答	STATE

三三 TK148 刻本觀無量壽佛經甘露疏科文翠野樓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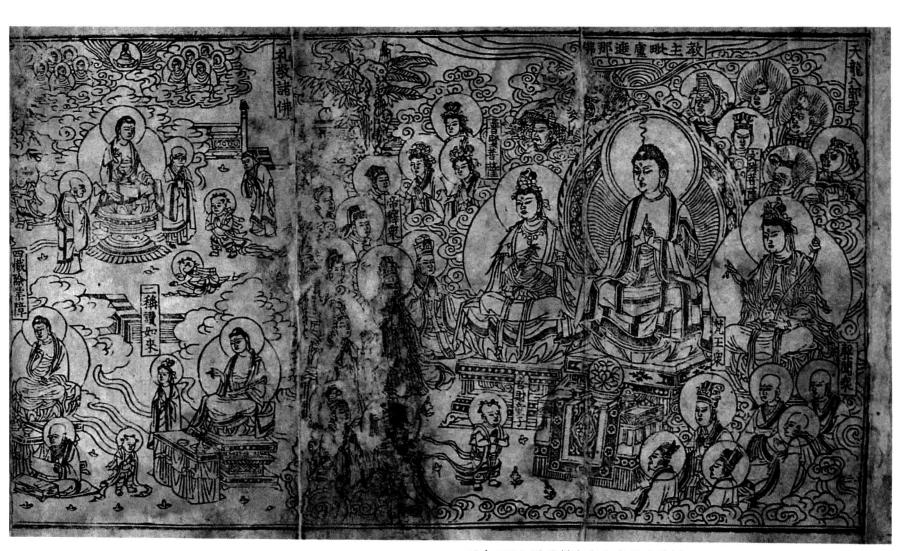
三四 TK186 刻本注清凉心要李醜兒宅經記印



三五 TK1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一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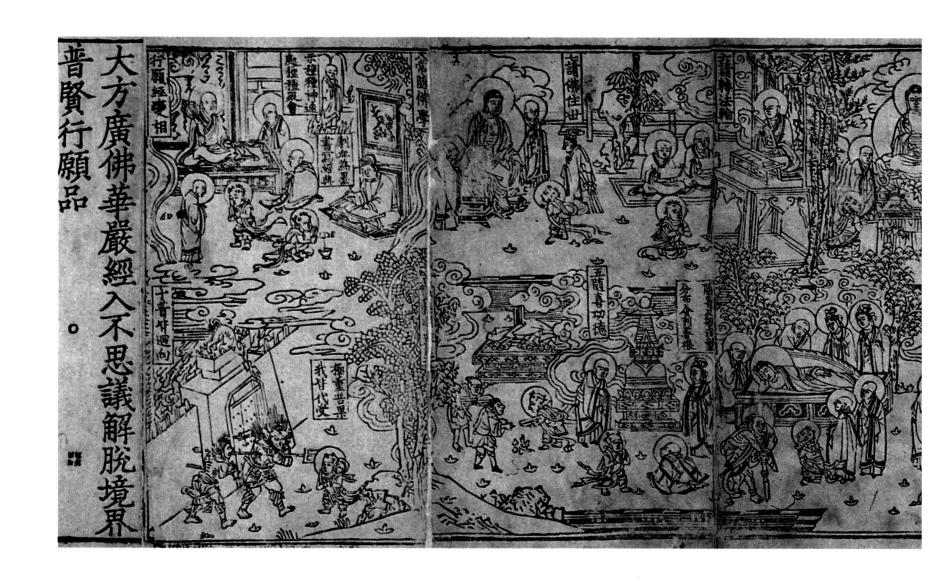
三六 TK81 西夏刻本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版畫刻工姓氏



三七 TK98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人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版畫



三八 Инв. No.212 西夏文刻本文海寶韻平聲





三九 Инв. No. 209 夏正德六年(1132)西夏文刻本音同牙音



四○ Инв. No.620 西夏文寫本五音切韻九音顯門

四一 Инв. No. 214 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刻本番漢合時掌中珠序

四三 Инв. No. 2616 西夏文刻本貞觀玉鏡統第二



四四 Инв. No.143 夏乾祐十三年(1182)西夏文刻本聖立義海第一



四五 Инв. No.741 西夏文寫本新集碎金置掌文



四六 Инв. No.210 夏乾祐十八年(1187)新刊西夏文三才雜字

络时间风炒 以好痛然 本流沙然椒彩刷处有物 兵州政湖流城城的战战的战战的批查将礼好 作和我好外外的海洋到我用到此好在新人及 刑多於然風對班城科或公科姓到外親外我的太例 另所独 的 新班城州行教外所到南部城外外的 城或補庸城以流祖和移外以路云就不 以高湖を新山路可以不明新到海州河 以外於所其及以外於此数的教的氣刻於其外的人 面城东到必州金州沿南孔 多级级城湖利州人

四七 Инв. No. 2627 西夏文譯朱筆校點寫本吕惠卿孝經傳



四八 Инв.No.148 西夏文譯刻本陳祥道論語全解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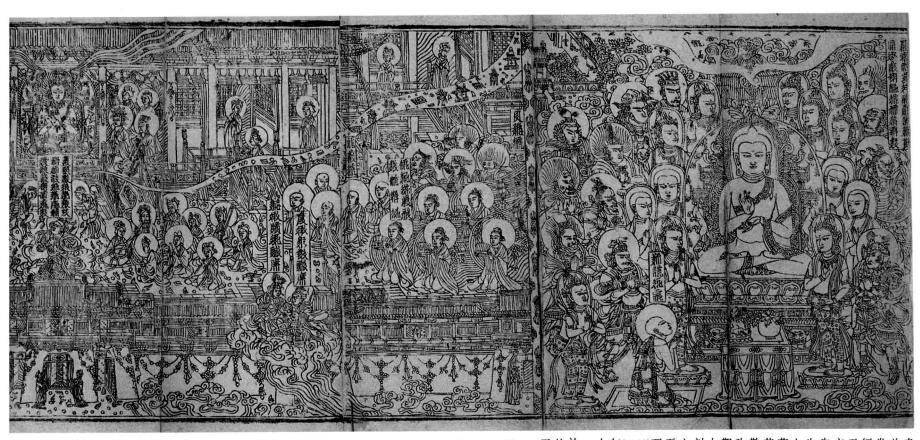
社 麦 歌 術 熱 幼 和 解 於 後 滿 林 敬 雅 雅 雅 稱 義 鏡 教 孤 歌 毛 係無職竟降在在無統 **依你藏整依斜张頭雅維致裝術發菲雕解酸**和雅彩練發臉無酸張收點作雜雜依鄉無報 剎 應藏職前發展教術 低改納松裕紅 粉維彩底條縣於裁散的我到鄉散改如來 雅希講版! **素乳機係枝恭服** 核 惟刹鄉刻言我親幼科毅飛詣暖件南 輟 維充 食幸 信 改 敬 雄 職 義 恭 衛 縣 好 歌 統維 我職 给 新鄉 雅 孤 義 義 施 恐 騰 継 裁領歐民都 多薄粉到鄉鄉 纲 統統 新鼓 绳 被 類 翰 献品 凤

四九 Инв. No.579 西夏文譯刻本孫子兵法三注下



五〇 Инв. No.125 夏乾祐十二年(1181)西夏文譯刻本類林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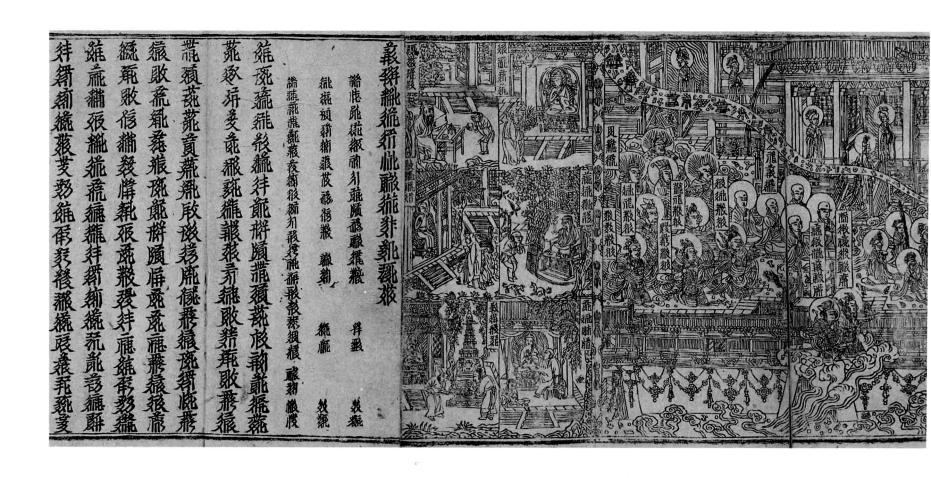
五一 Инв. No.132 西夏文譯刻本十二國



五二 Инв. No.78 夏乾祐二十年(1189)西夏文刻本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卷首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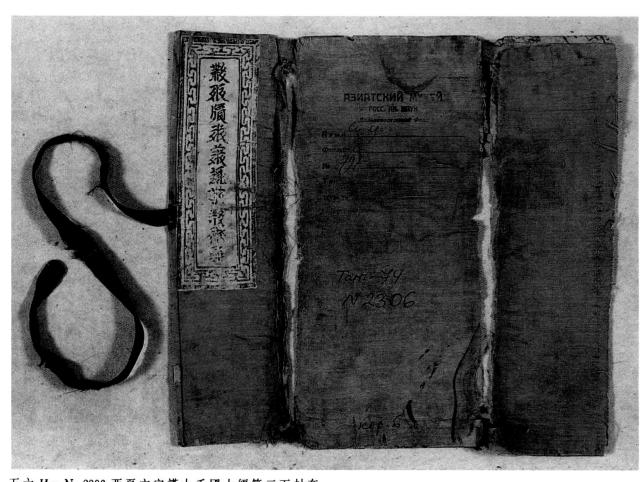
五三 UHB.No.87 夏天慶年間西夏文寫本佛説寶雨經卷第十版畫及羅太后寫經牌





五四 Инв. No.940 西夏文刻本繪圖本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五五 Инв.No.4166 西夏文活字版三代相照言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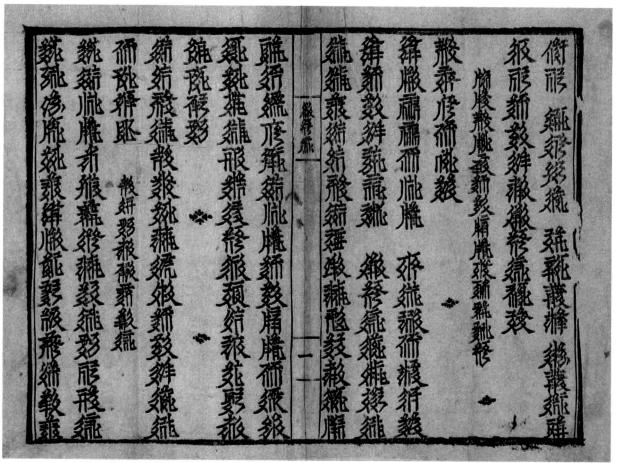
五六 Инв. No.2306 西夏文守護大千國土經第三下封套



五七 Инв. No.7038 西夏文刻本佛説大威德熾盛光佛諸星宿調伏消灾吉祥陀羅尼經版畫

विश्वाता, । प्रबुका किंद्र (य देश क्रिस्क्री त क्षाप्ताता, । प्रबुका किंद्र (य देश क्रिस्क्री त क्षाप्ताता, । स्व अक्षा देवय क्षेत्र क्षाप्ता क्षा क्षाप्ता क्षाप्ता क्षाप्ता क्षा क्षाप्ता क्षा क्षाप्ता क्षा क्षाप्ता क्षाप्ता क्षाप्ता क्षा क्षाप्ता क्षा क्षाप्ता क्षा क्षा क्षाप्ता क्षा क्षा

त. दुरा-टि.सेट न. सम्मान्य र . क्री. ट्रे न खुट-छट्ट- यर. सुट- यर. मया-टरः । है बकुट- वर्त्तु जी त र . वर्त्ति ट न खुट-छट-प्रि.सुट-टरः । इ. स. यह सुन्या त यु- ट्रे न खुट-छट- येट.सूट-व्येर-क्री श्रेय का कुट्ट- वर्त्तु क्री यु- यू-टरः । इ. स. त. प्रेट-क्री-इस. त. समया स्ट ट्रेस ड्रिट-खुट- हे । अरम. कुट्य र जुरास सुन्यु । । दे हु. यु-सुर-खुट- । न श्रेयम कुट्य र जुरास सुन्यु । । दे हु. यु-सुर-खुट- । न श्रेयम





五八 Инв. No.6510 夏應天元年(1206)西夏文刻本發菩提心及常作法事題記

स्योग्निसिक्दित्यक्दाता । श्रीमुद्धियिष्टितारान्तेन्ता । क्षेत्राचिक्दिता । श्रीमुद्धिता । श्रीमुद्धिता । क्षित्राचिक्द्यी । स्विक्द्या । क्षित्राच्या । क्षित्राच्या । क्षित्राच्या । क्षित्राच्या । क्षित्राच्या । क्षित्राच्या । देश्वेद्द्या । देश्वेद्या । देश्वेद्द्या । देश्

ण.चेर्.तथः जटकःइ १९.चरःकः १९.चरःच इर.चरः १९.वरःच १९.वरःच

यर्त्याश्चित्तरः। इसान्त सम्मान्तराम्वेद्वा अर्चित्र विद्या स्वित्त स्वत्त स्व

विद्यान्त्र प्रस्ति । विद्यान्त्र प्रस्ति । विद्यान्त्र प्रस्ति । विद्यप्त । विद्य । विद्यप्त । वि

六○ Tuber 3 藏文寫本辯法法性論





六一 Yŭryp 21 回鶻文寫本佛經

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册目録

TK1-TK20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TK2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一六
TK 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 一七
TK 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 三二
TK5	平水韻 五〇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五一
TK6V	粉蝶兒詞 一六〇
TK 7	廣韻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一九八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TK 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二四一
TK 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TK 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TK 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TK 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TK_{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_ 1	i e	1	5			
TK 20	TK18	TK 17P2	TK 17P1	TK 17	TK 16V	TK 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三五四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三四八	佛經發願文(西夏文) 三四八	佛經 三四七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三三七	雜寫 三三五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三二五

必色圖版目録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Ξ		_
西夏文解説白畫相面圖	泥塑彩繪釋迦牟尼佛雙頭瑞像	木板彩繪西夏文陀羅尼曼荼羅圖	絹本彩繪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像	絹本彩繪大勢至菩薩像	東方研究分所庋藏黑水城文獻	東方研究分所毛稿部	東方研究分所閱覽室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外景

ТФ14

宋西北邊境軍事公文

元甘肅行省寧夏路支面酒米肉鈔文書

TK7

宋刻本廣韻

麻布彩繪毗沙門天王

TK248

三七	三六	三 五	三四	=======================================	Ξ.	Ξ.	\equiv	二九	二人	<u>-</u> 七	六	五五	二四	<u>-</u> <u>-</u> <u>-</u>	-	<u>-</u> -	$\frac{-}{0}$	九	人	一 七	六	一 五.	四四
TK 98	TK 81	TK1	TK 186	TK148	TK 76	B63	TK134	TK 12	TK242	TK149	TK21世 次 第4	TKI加州资金	TK88 章 美女素	TK14	TK151	TK6	TK288	TK172	TK 153V B	TK322	TK 166	TK264	TK 300V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版畫	西夏刻本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版畫刻工姓氏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一版畫	刻本注清凉心要李醜兒宅經記印	刻本觀無量壽佛經甘露疏科文翠野樓記印	刻本佛説聖無量壽王經梵文印	宋端拱二年(989)智堅等三人往西天求菩薩戒記	刻本通理大師製立志銘心誡	西夏刻本佛説轉女身經一卷天慶二年(1195)羅皇后施印發願文	西夏刻本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下天盛四年(1152)沙門法隨等施印題記	宋刻本金剛般若經鈔第五大中祥符九年(1016)知丹州軍州梁某施印題記	TK21 西夏刻本佛説無量壽王經般若心經皇建元年(1210)普化寺沙門李智寶施印題記	TK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TK88。	西夏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乾祐二十年(1189)羅皇后施印題記	宋刻本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説救苦經	宋刻本呂觀文進莊子義	金刻本新雕文酒清話	金刻本六壬課秘訣	B60V 朱寫本卜筮要訣	元寫本六十四卦圖	金刻本孫真人千金方卷第十三	至元通行寶鈔貳貫	有關黑水人的信札

三人 Инв. No. 212 西夏文刻本文海寶韻平聲

三九 Инв. No. 209 夏正德六年(1132)西夏文刻本音同牙音

Инв. No. 620 西夏文寫本五音切韻九音顯門

四一 Инв. No. 214 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刻本番漢合時掌中珠序

西夏文刻本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十二

Инв.No.114

四三 Mhb.No.2616西夏文刻本貞觀玉鏡統第二

R.

四四四

Инв.No.143

夏乾祐十三年(1182)西夏文刻本聖立義海第一

四五 Инв. No. 741 西夏文寫本新集碎金置掌文

四七 MHB.No.2627 西夏文譯朱筆校點寫本呂惠卿孝經傳

夏乾祐十八年(1187)新刊西夏文三才雜字

四六

Инв. No. 210

四 八 Инв. No. 148 西夏文譯刻本陳祥道論語全解第八

四九 Инв.No.579 西夏文譯刻本孫子兵法三注下

五 0 Инв. No. 125 夏乾祐十二年(1181)西夏文譯刻本類林卷第四

Ŧī. Инв.No.78 西夏文譯刻本十二國

五二 Инв. No. 132 夏乾祐二十年(1189)西夏文刻本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卷首畫

五三 Инв.No.87 夏天慶年間西夏文寫本佛説寶雨經卷第十版畫及羅太后寫經牌記

五 四 Инв. No. 940 西夏文刻本繪圖本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 品品

五五 MhB.No.4166 西夏文活字版三代相照言集文

五六 Mhb.No.2306 西夏文守護大千國土經第三下封套

五七 MHB.No.7038 西夏文刻本佛説大威德熾盛光佛諸星宿調伏消灾吉祥陀羅尼 心經版

五 Mhb.No.6510 夏應天元年(1206) 西夏文刻本發菩提心及常作法事題記

五 九 Тибет6 藏文寫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六〇 Уйгур21 Тибет3 藏文寫本辯法法性 П 鶻文寫本佛經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3)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5)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7)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9)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1)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3)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5)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7)

其宗徽少華解了建語義趣 又能善武法 在大型 中有諸學 是 在大型 中有諸學 是 在大型 中有諸學 是 在大型 中有諸學 是 一一一 四 四 是 一一 四 四 是 一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一 一 一 四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是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9)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1)

五中 教化 尚 羅 不丘 阿 信是 如有 利 切 而 是寝 弗 寅 此 = 四增 後 衆等學 身 法 菩提 弟 比 知 其數有五人 丘 利 知者 虚等 涅 比 丘 知 阿 汉 如 因 如 此 方 方此 自漢 出世皆爵 而有心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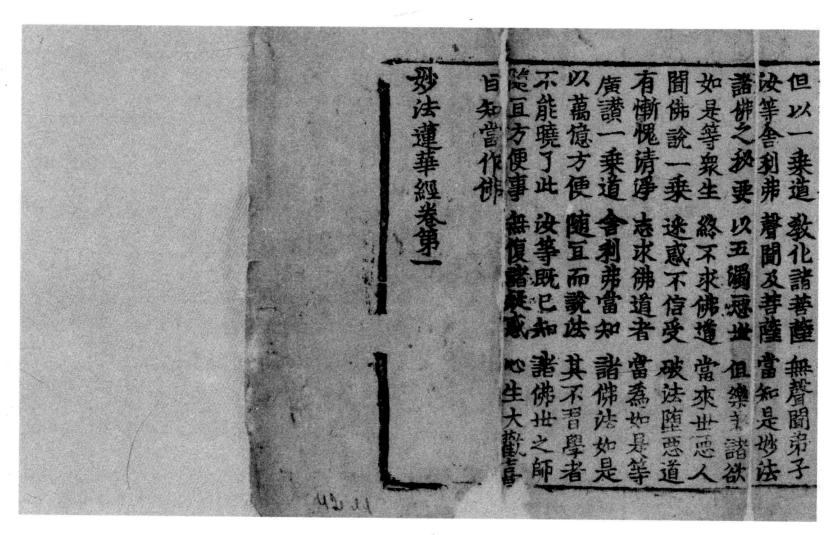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3)

入小自 提末切知所舍曾歡是行 夷比 若充心 方 大 普遍念集佛 不丘 貞福 E 其 部 佛經所 過信品 佛修我而 當我不鈕亦或以若 而 設行根說談話 所彼達如深 於惟縁諸衆 四增 弗 受 土說心戒是妙心 生其佛方妙小因 羅物 故此 衆諸此 先 带 亦 聞 所於 U 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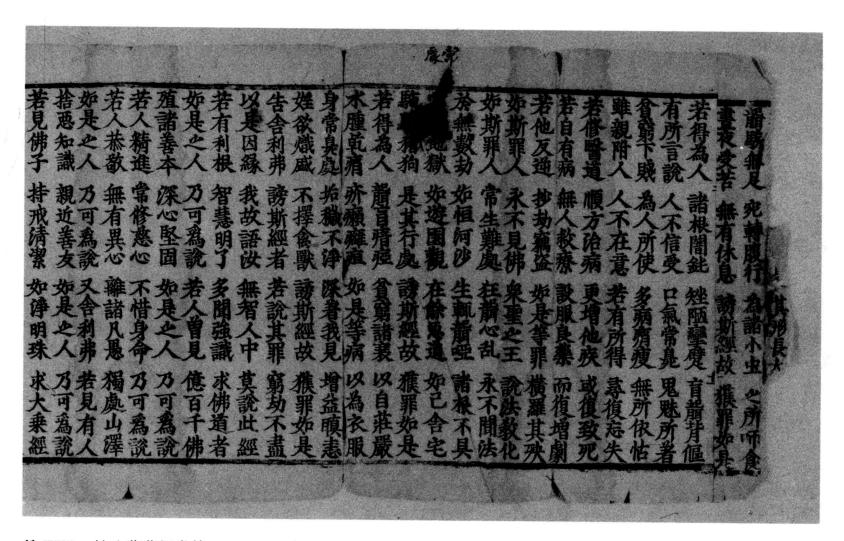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5)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7)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9)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31)



俄 TK2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2-1)

俄 TK2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2-2)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

本文字 一大字起以大音響普遍世界天人阿備羅 一大字起以大音響普遍世界天人阿備 一大字起以大音響普遍世界天人阿備 一大字起以大音響普遍世界 一大字是是 一大字是是 一大字是是 一大字是是 一大字是是 一大字是是 一大字是是 一大子是 一大子。 一大子是 一大子。 一大子是 一大子 一大子是 一大子

偈 雨所及 涅 相 味 两 各得生長 业 舒如大雲 光晃耀 所 自 相 即 為 以 知 佛亦如其體相素 一世 水 種種 故 垂藏 相 知 即 性 宜 衆伦 下之豊諸 随 充 正永速 隨 巴相知 宜宜 to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4)

求獨知或 如我 我 #定諸世 數無 大 衆 武 祭 世 尊 来 会 報 普 切别 潤 雜业 乘 演說 坐 間中 天 見 生 立 諸法之實 普替平等 利根 **确如大** 持 而各滋 衆多亦然 輪聖王 戒不致疫 佛作禪建聚 限礙 法维 小 根戒默 切 充我 替腊間 **阿為聖出亦其** 切來尊世基體 女 計 隐康門之樂 南震是演為有為法 两 無等僧作成現無裡搞他說之因但於上果求 等僧作脱 兩 不具 無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6)

無諸分數比時 世光解 列正 劫丘世無 足佛得以 欲 大有泉列 尊世作佛 後神丘名道為 重 緬下 宜雖無以坑 佛眼 瓦 此 亦佛夫 道堆 來她而 諸璃利 聞寶為不小小 經稱

同 旫 Z 住天間 册 敢 正 數後神 如 知釋 蒙佛 疑涛 頭河 尚 亦 即 诀 如是 記 便 國 TOT 食來者 即皆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8)

供兼 聲聞衆 於其 及 法共通 比 住合廳 利 丘 土夫遍 告諸比劫 净 國 宜 珎 脱 知閣地嚴實無諸層周無國上 恆無神 在器 小小

法國人四 脱軍佛迦以而 光無後滅旃丘說 佛諸 亦 個 正 地 能像佛士以一 餓 鬼 地地 五 畜周 百佛 IE IE 遍 生遍 為等以好 号十正華供所 和 方覺 國供供 所土養 金供清舍 養淨利佛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0)

盖 五 光 地 而諸起 佛士修佛目 於班捷 JE 具金量 为 数目其金 玑 正 道效佛恭 願 行日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2)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4)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6)

時五 黄天王名日大 諸 天龍 百萬億諸姓天王與 佛而諸恭 及 76 出 北 **梵衆而談偈** 等諸宫 時难 世 諸願 間殿

尊時愍 天 道大轉 益歸滅 產垂 佛於明 示 生聞 百甚 於有希伽 业千威 福--雕 間劫 非 概 世之作 是 因 相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8)

時 大節 五 彼 自 天 四 皆悉自都所止 數喜踊躍生希 如是介時上 交應而得 及見 婆娶 梵天王名 緣 散面 业妙宫間相般 我等宫殿 方 宫殿 正 有 百萬 所德 日尸 S 西 有 明 山市 億 伽師 聞明 見明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0)

空過 勉 脱 力 出 哉 क्र 103 及樂想 見 誻 佛 及 甘 轉 時 五 諸 泉 諸 百 智 有 願 曾正 乃 所 以垂 切算 即時三轉十二 **华** 願受我請 億諸姓天王偈 言难見哀愍饒益我等 頌 度 世 堕 日 見法 間 宫 欣 农两 姓天王即於佛 共以光餘 為 三 已成此故一 因 册 界 轉城 萌 暗 嚴切出 所 填勒 獄 衆間 眼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2)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4)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6)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8)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封面)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4)

(35-5)

网 成女嚴 但斯諸禪皆無 所得一諸無 世心 自 略淨悪悅已礙國 量合成切方數 阿知 五閒 日 日 法如所 葉阿無明養 多丘想生僧數通明明來 羅那迩羅上如六於現念餘我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6)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8)

復無 如 倍有恒清正 中是量沙 自 成阿 常日 汝 立山 正 佛復過 因 知世 阿 安無 -进 住 行得 多 於諸 足作 佛 善佛 阿化 两進 佛 三具 逝号 難成阿是藪阿吾因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0)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2)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4)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6)

(35-17)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8)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0)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2)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4)

受能 至經是 國 劫 持今典益數趣 世後世戒人特 足王 誦持 更生此随所拜此佛 經 勤無無 為我阿 布誓 必必於 目無不 格退劫 過 法此 直腦惜轉 係經通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6)

方於肉 白為 言 此此已 不仙 成欲聚散仙汝妙效四 情供用 世時 說我 精身採王 有 目 所阿 卅 鼓命 汝國大法所仙希私 終宣無體 國 人說王法故頂 說給無波仙乗 重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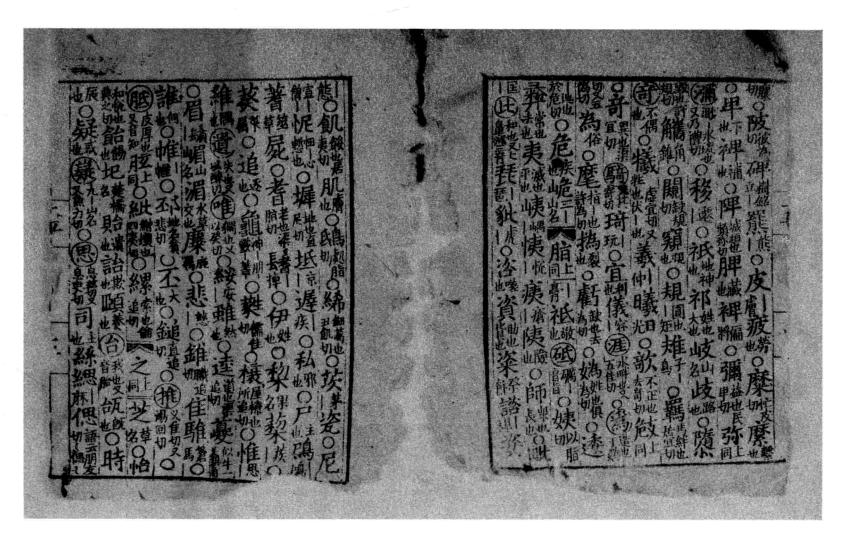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8)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0)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2)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4)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5)



俄 TK5 平水韻 (2-1)



俄 TK5 平水韻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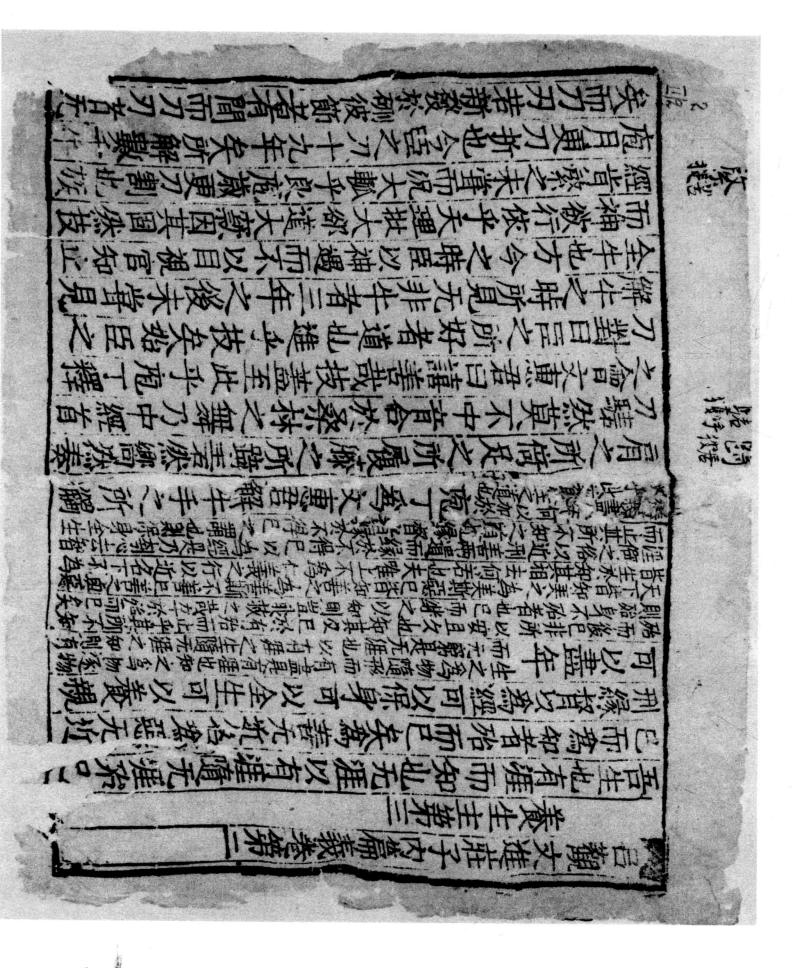
多世對 道因 於 即 **那州表同以為** 完子則未之善言不之律 等之何是以 二 富 活 到 音 盛用 心 間 引 何是以知 謂道者非言縣之所得盡出故 子之不知所擇觀之則以為我道之行者固非也以為品很不無與此是以夫子雖當言之而盡之以為孟恨之言也與則自 以有謂心方其有謂八所以无謂此不是害无不臣也 不量害无不近也故不喜求无所道 不得也而後,起放不從事於 用其言以求之則未免於為夢也改其庸 言則盡其处理以為孟被之言而望去有之 首言故學者所聞特其文章而已性與天道於如併問 心者之經言也大子能處心而用形其以聖智的 而集之則以如而入道者之節言也長格山長馬川國之所接也謂。而集之為我 即方具直書遇之也趙歌

若果然也則然之異年不戶北亦无辯化難之相待然不然是若果然也則然之異年不戶北亦无辯化難之相待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能相如而待彼也那何詞和之以天倪日是不是之既同中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中我與若真之

(109-4)

主社子内が佛主教教育の

沿其視則其有不齊者中此其所以乃殊而不預如而各此其所以乃殊而不強也を其處或而反是則物物不知行為莫此其所以乃殊而不發也能其不能通而為一夫之太相知不和如則各明其根表凡物之所以不盡者以其有我為且獨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而能相知乎竟是者以明物物有應則謂之意處遇也至人之視出人其身猶慮不



為發頭天下之去故情飲如势而誠之則何方若異四都者也 也解然已解如主奏曲摄囚而 之所異不可不異者也所然為 道而城万物之間逍遥而无 如其刀刃之无厚少以无具入有間改其 如其節之有間中生之多生也有 有九則院陽之極數也凡物之有形質者不能无関也而右對於於剛則視天下之事无適而不通不以為其生 而自为若新於於例則視天下之事无適而不通不以然而更刀也更乃則傷其生之雖言心臣之刀十百九年所愿以更刀割也疾⑥月更刀折心則所見无非牛者故 今天,夏 岩夏八而巳 并道之程与此者然鄉同然 羅信

節が

人出成去是資生者以知止其所不知而不以有僅獨不得則知之以納住前形也達此則知生之所以為生者不當有死也必受與此 火之在此新僧校新出其博出有盡也哉人時三則生的 若然若古者謂明之 問過去而已矣知其適來而改之 内傷立身為刑也真然馬出之東入能却 至身的刑也真僚馬生之東京龍利則國來而已矣其去大島是也五 通而非君而遊之則不免刑而已矣陰陽少之其所免也恰遍與如人死矣勘信之悟告然者占者謂之過之門以內司其所以 仍然水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為之泉樂是猶天以然取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為之泉樂是猶天不以以會以不覺不如此是所以會人也差無疾時與順京樂不能入也不能安時與順之有 少者果之如果其母以所 河方老者果之 如果其子 老胖者皆得明久道也而今此也盖 疑其我友而吊焉若此為不 也三號則哭死為不及天所山后號則哭死為禮哭死而用生也 白者謂明是帝 一飲刷天遊而摘其性命之雖言也了 幼以也若夫與物捷 見而確之與其為人

人間世第四

生当知其之业就被以養死為足以矣。與以養死為足以矣。與則不生言公與不能入而未實有死也此妻之之主也內而如為國於外而天至十矣內无知外无物則獨而不

意而り 與其心則非属已以從人者思若 低不定常人之前死所事就矣夫以 康而色受真如佩育也與則不編於中府發見於 處也至底无 棉上之品有而无亲高。 不張勝也獨者固好名而求 真高星里人 之於見極善病不能化其惡而也則二君三國者見皆以名實 身為刑禁其用兵不止其求無具无 、有层圆五色 也故其君因其修而南之亦好名而也永死攻董東下而拂其上則疑於骨首矣盖未信而為此則其也修其身則有民之為五矣以下而個机人之民劉奸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事以下絕附人之民以

当者は出現 亦七罪此雖此二次无罪而己胡足 門之間而難改压之侍則固矣然由夫正道而不堪人之意而仍其不禁也謀者密提入之意而律之之謂也夫不知求之於 之與己皆太之所不不動人之善之不善之而易乎其所知 馬直於古而非我之有則是攻人以法者也政督正也和大 兵患在於不能无心而後為三者之妻此所以衛不今也夫 以較无所往而不得以前守者納而所應者博改也今回 一而无心者他聖人抱一以為天下武故可以齒可以往可 B上土 則非直外合而己雖 然有内有外有方有今以此應物則 三者憑凝底其不至放執而不此也內直則非四不當者也外 也內直與天衛徒外曲與人為徒成而上出與古為徒回以謂以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夫子則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示之意来有與而无知者也更柔建日百佰者人舍之大助之人之所舍 井は十二 人盖之與不善之而真家直就其間武若然者人謂之重子盡子者之與己皆永之所不真不有所謂良貴者則奚為獨以己言勵中何自以者此之者以已践而人責故也自道顧之則知大子何而心之有此 天以已之言而斷乎而人言之動子而人亦善

失絕亦勇无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備為天使雖

其公者盡失此前以為之順而已矣哀亦猶是他樂之之本而此以為之東之即以為其此所以為之東京即即所以與之者不可不盡此所以與之本不可以與之不可易者則不理不可解於心足為人人與之不可易者也成不可解於心臣之事若其也其則可服至於说生而認成大子其行可矣,與我也有例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之好,如此即如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德之至也提手事而安之忠之處也自事其心者之恨而 德之至也把了有太之思之處也自事其心者之然,不身如不可解於心臣之事若我也无病而非甚也不不知以明此以是事君美我也无病而非君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美我也无病而非君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美我也无病而非君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美我也无病而非君也

知其所以獨其缺者百余之何其態天狼則之或之有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五人為祖人於此其為人於此其為人為與之為无力則危五國與以禁難而預聞制備問人以與以為與此人為明信五國與土獨福和其心而事之情得矣夫何作為以報哉雖致命盡其以而即令之使於齊也莫若為致命而已致命則不以犯日為其心之也不得以不得也其在為政命而以致命則不以死而即此以此其以於明祖與之態為之,不無物來之則以不堪之為而仍其以為國政而為國也之則之其為與之之,而以其其則是國國之之,而以其以為國政而為國也之則是實而以以之,與則是其以而以為與此之,與以為國政而為國也之則是實而以以為與之也以為國政而為國也之則是實而以以為其其其之而以為其其其之何任之,我也其其其之何以為其其其之何任之,我也其其其之

話が

ブルマー

解釋

は事業

大政

於仲尼曰王點元者也從之遊者與天子中八間自有元者王點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委問

者其角質患守亦其是而己所以免於利出之道也作男

其也難在於應記之時舊私而免之則於給无難失凡若以者乃所以為无用之用也遊母人間者則不免有世有世別有給動而有以外不且發也原見以自顧也其可食效仗之緣可用故則之皆吾仁然即无傷而足難因乃所以全也則異夫紀才然予畫她而越絕而已於與於此之亦亦而行者也則異夫已十已今歸人以德矣否如何已去,與解此以之外 迷陽迷陽元傷吾行送則不如前即往陽到何已而已矣非以監下人者也則是不過過不知問則有之則與其理之以與其一人者也
死不死就是而其為與也而人其之知避也已才已不而人以為如如此與和其過也則獨對不及此

陳生死就是而其為國上下之至東至其軍軍軍部通也則是所以為與之所以為與之人生為生命之後至則以全其生而已矣方令之則為舊地及日之以為為明祖之國之人,因此是其如不可是而其如之人,因此是一門也是子以成總為行日司見之行也即無在司食故仗之緣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也而其好人以為此之緣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人可是行初由无復五足山木自發也直見人自則也不可以完死才名中畫地而趨迷陽迷陽光鳴舌利其实之知載獨直平地真之中疆上不无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中一不過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中一

冀府既企職於衛監察獨也強則人又有罪故造化之間人而其所以為雖也算不異不致為於與為雖而雖然相關與此人與為其則就以此為其所以動物正若則以以此之所以與其此之以以是也被且何一月以物者為事子歌終絕去是而以官天地府 写一知之所知而心未 當死者子改且彈口而絕去是而沉官天地府万物直衛六點象可為去上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此事就正生以正與生失保犯之徵不體之實就不無獨也在久夏貴貴賣

買赎則先生之門固有裁政野共而不能悉已之勢則首其師矣此 徒嘉該外其限以悉人之數則從其師者山也伯於无人則道之體名也由從壽子產個 有出伯剛奏者也民則否不知誰之兩自出也否不知能之子象帝之先則長於上古物无以 而心未違死者也與物雖泉之版目司旨以為元所 自 上文象人之象也納視其所一不見其所喪則一和无所 自 上河所袭去然六酸非有也屬之而已耳目无知也象之而已象河術矣若然六酸非有也屬之而已耳目无知也自其同者観之 月矣 其生者視之則可官美万物雜眾皆備乎我者也自其同者観之 然原里與兩難入者也天外雖大宜定而不出的位自己一而為此者也或謂之九軍或謂之人軍或謂之人軍其員一也九 **埋者が以入包一而者九園以六包一下為七九軍副** 2)一面身上圆以上门名《保之而南信》之也保佑者始以此自名《保之而南信》为社来 容頭如此其至也則人 实律不從 以真 名正日要,首也所以一學之尊雄入於九軍則先發而以之所土之以勇自名而 微見其保給之難成其不體之實者此特納之裁正點,則不獨正者也以所以為衆止之所止而不肆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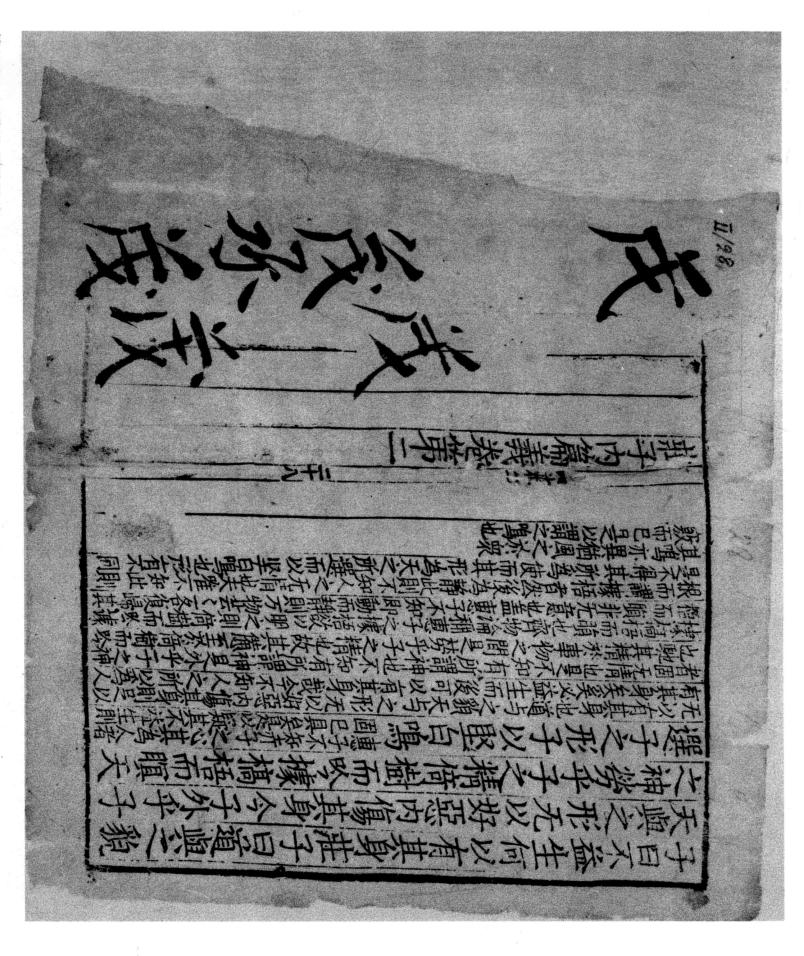
前既犯患出是失難今來何及矣无此具電角百有元者叔山无趾随見仲尼仲尼日子太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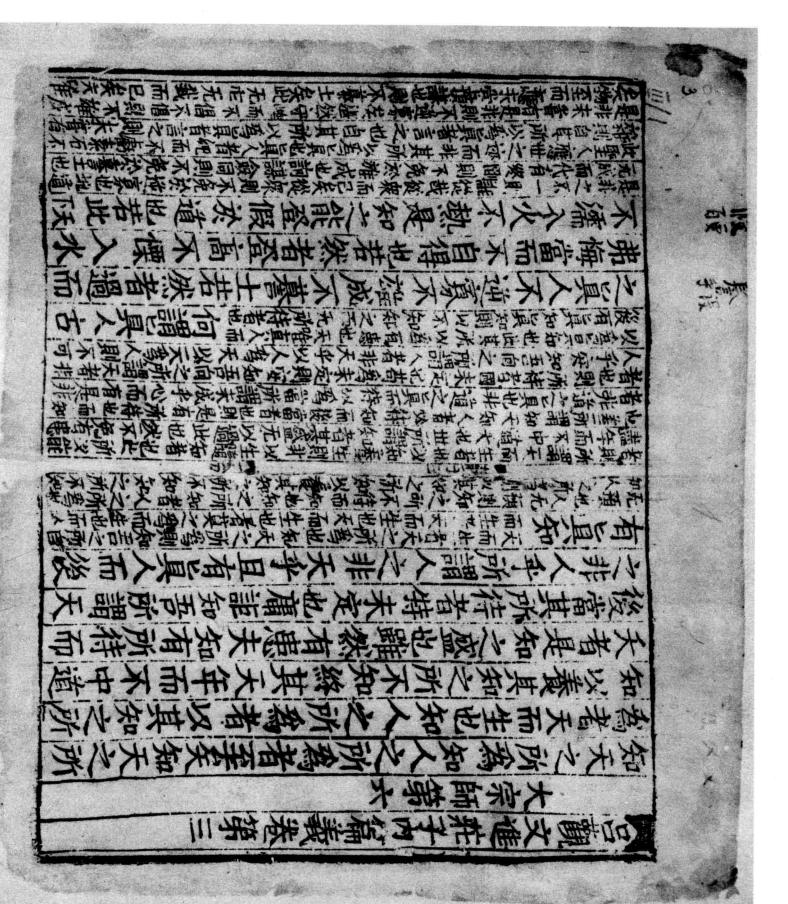
九年矣而未當知言元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而及不知先生之所我以盖即書與天子數十及者衆矣我佛然而然而適先生之所則發然如此以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五使失言不全命唯有傷者能之遊於罪之數中中央者中立過以不治旨行者富分和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其過以不治無行者竟為和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其與與其無其無以計其過以不當一者就不數



治不同也夫王朝文几已是 明其企屬而宗非不知仰尼而其言之或異者以內外之不不則其亦自 的而人 刑之兵以可解也則以可解也則以可解也則以可解此若失領天 信情 否其对受占者謂之

《長且久而 对的出生的而愿業之所由出以為文世而愿業之所由出了不足以名文也而德業之所由出了表现以至之之。 之死則至實之應不及以名之也无聚禄以第人也是則且與未有間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实无君人之也是以未有間其唱者也神者最然不動感而逐而或之器而也一則能之極數也相可有道之雖自也更為未子去則以自明於父母則由不道之謂於父母與為人妻一為長 前之惡人而名之為 夏縣屯衛不足以及其形則 妄也點而不知其所則 妄也點





共死之所然不能受而甚之未而值之土的明然於 看剛是以 心拍道首也受生而而其則與與無人 化有道有电象生而而其外顯如知有生而說之更而說之出生則新 古いことは 人次後納觸則發水糧之无禮禮之元真多食之不世不可得明出服者其強之言何治生也求見之以雖不可得也嘗說 其元今陳、赤孫之又保者也深之又深則至於无恩也然八之女所自我為通言以玄真事不者免之也未審真事而自深則傷事媒、而以過矣随至日氣之而而息之所自乾也身以同為仍見不為問見以為問見以其之之軍是則則直食不甘矣遇為關門 者也故不為思慮強自好之所役无思意入心之妻妻未婚有物者也真人有得愁 謂真知子得學 企具工 **は且東大知園非道也而員人之為也為所表所為也們雖使入我之為の同日得之有大雅万妻則物報以入我以前雖然入我,此何自得之有大雅万妻則物報以以副雖過也至之不得不慮也何**

就生完死者情地未然有死生者道出孽竟而非然亦得一一大人國珠不告有 忘於道所之江湖而不知有死生聚龍北若相完於江湖則性命之泉繼而 顏乎人傷之陸相向相關以則死之元及規則 妄泉獨自相与 鄭太陸相的以際付露以读死之而所其真乎則其真者而等者是也若為如其真者而緣即者而然之則生之元及其明矣人替以有君為与中已而自見者而然 (二个) 早首言英傷亦而作俱 照見 富之所及及不 身婚後之而飢生之 所自生 半則其為其閉故 被特以天為父天則否所自而生者加於命 与天則人之育 孙不得与正物之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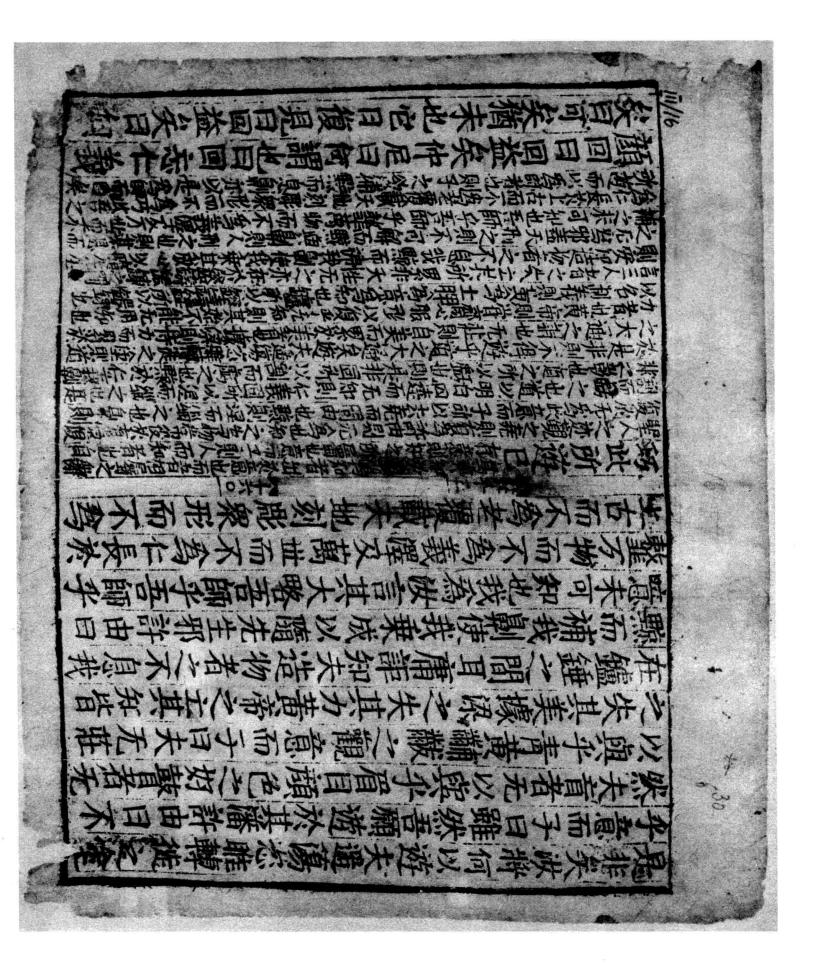
万物考問存而未其之心其为意因可聞計犯之我而有言因可聞其我 得其宜看也怕有所源以有匪之生而知此豈明育之別知乎天用之誠於取用力者其能未是明智明智為能知意 生於既之前非自力皆直注非是即難明皆為此就之而未其 实之手 灰羊者 这種之時前物於以彼天野衛衛罪之国矣而吾心一遭遇之馴勿等已年二非亦伊則行心三則之皆 与非道未有有而不去此故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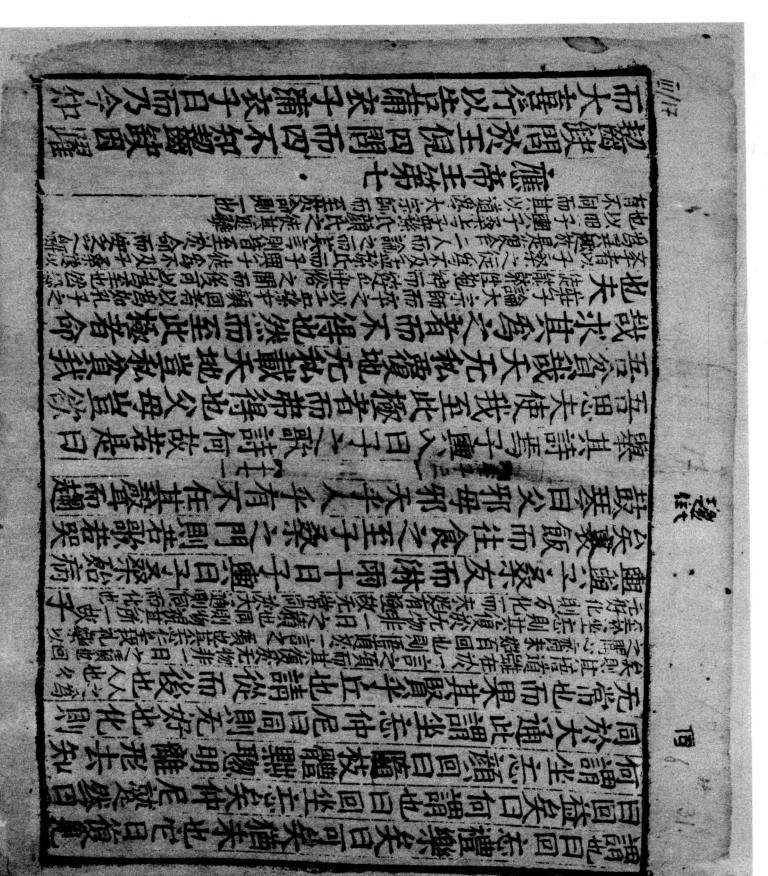
が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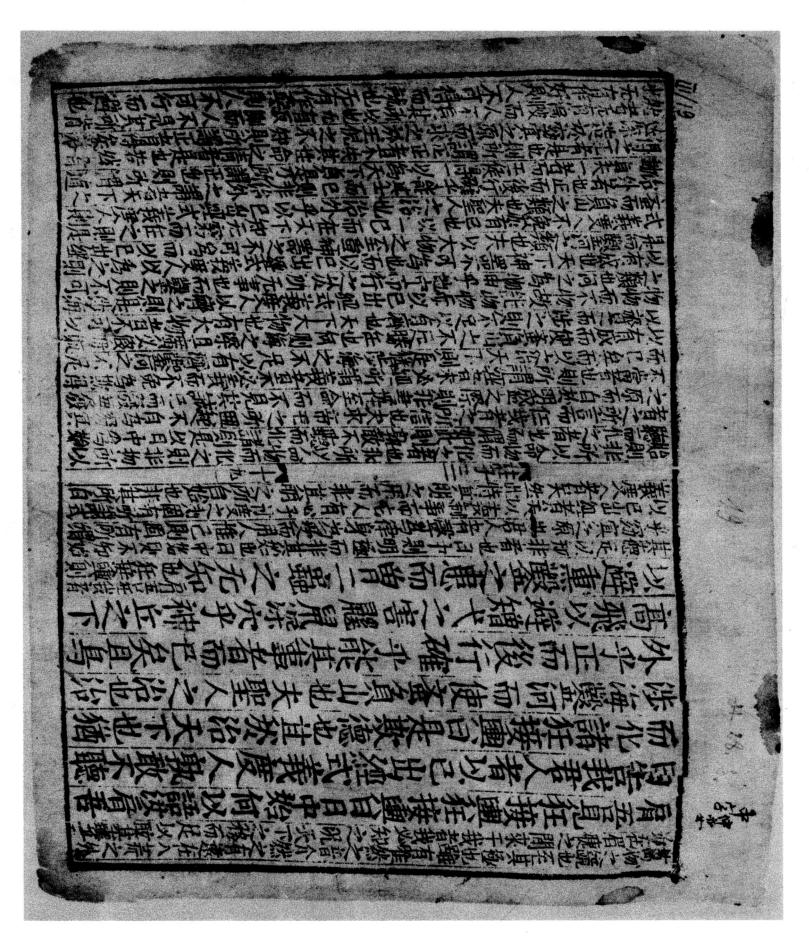
內學而未能有差刺終者不成日月生死非人情之所與此不過得道而之數至官以至彭祖之自有廣西及 大地伏井秋之龍交和母進好上軍於俱偏馬夷人首天川,有舌之 傳說而已道為天下 生道而可以為軍府也非特補達入生亡之聖人成問成顯述雖不同未 ,先六極之下先天地生長水人者老者以其時而名之也而 生育也我则不生雖今日猶為又極也凡高少思常 傳統以神春也我則不 神經鬼帝傷无妻矣万勢之存有天地而後有也而此則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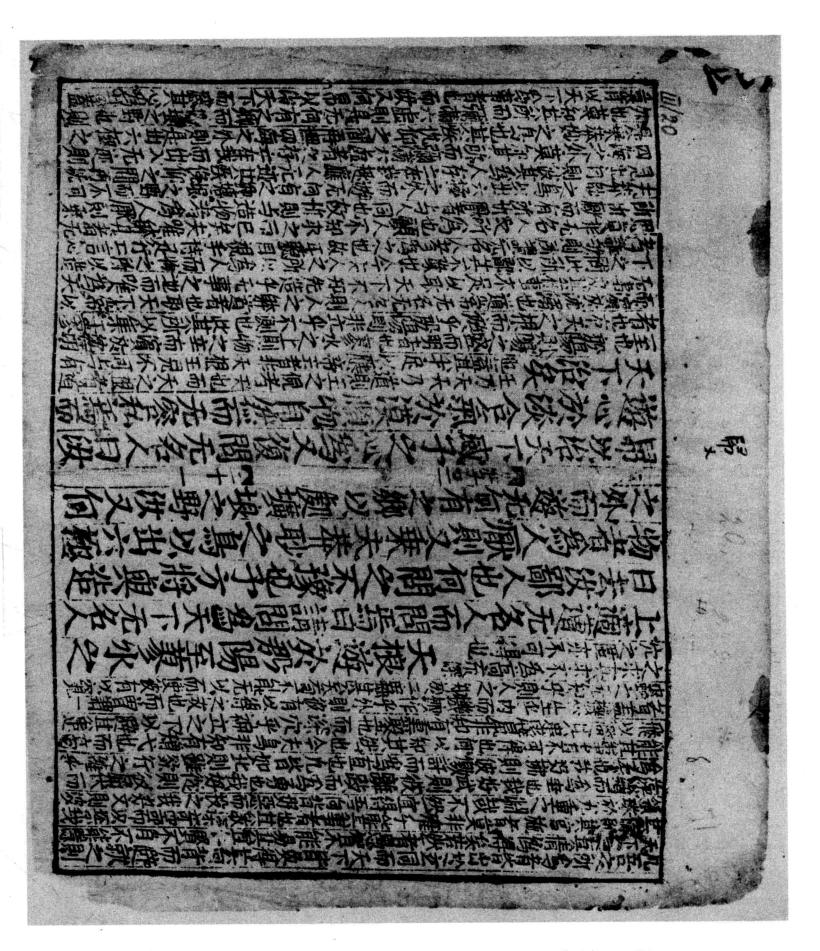
小副其入不距而照其為此物物则是不能受完的以後子祀之間也日次聽之中則所以考其所开則反照於性之雖言也言造物者又納以子為以及以雖詳難而不害鑑於并也并 佩出而不緊則實而可惡者也然此時陰陽之無有於耳其心數也出傳發音上有五陰區團屬或兩胃高必而分異者為得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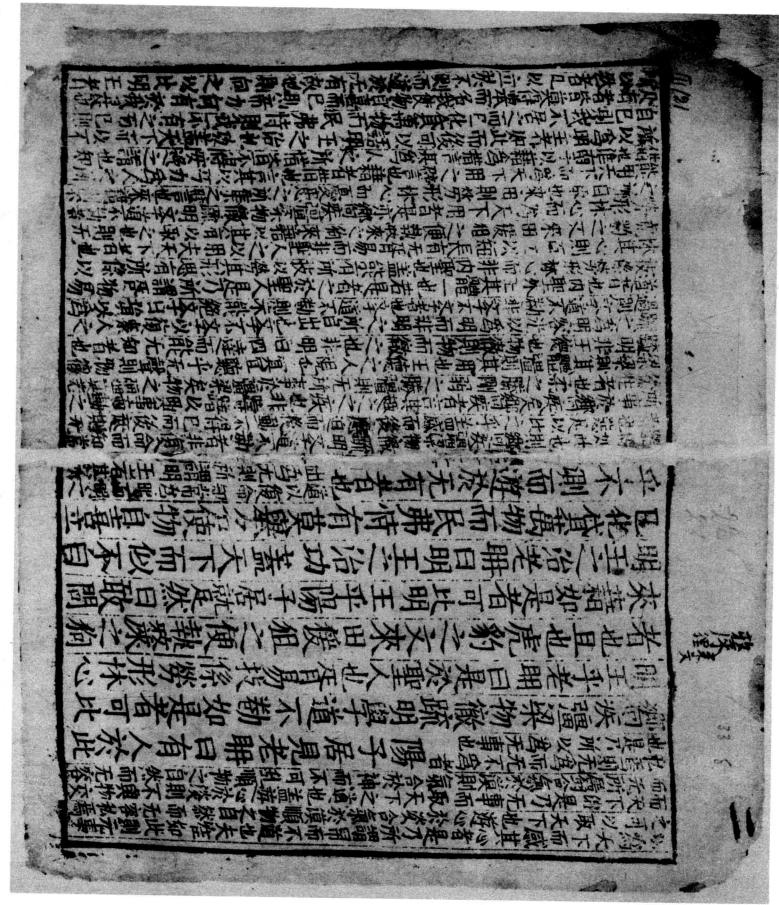
能知否所謂吾之乎且做赏為鳥 生气而沉拥去於道 特无事。而に会地而法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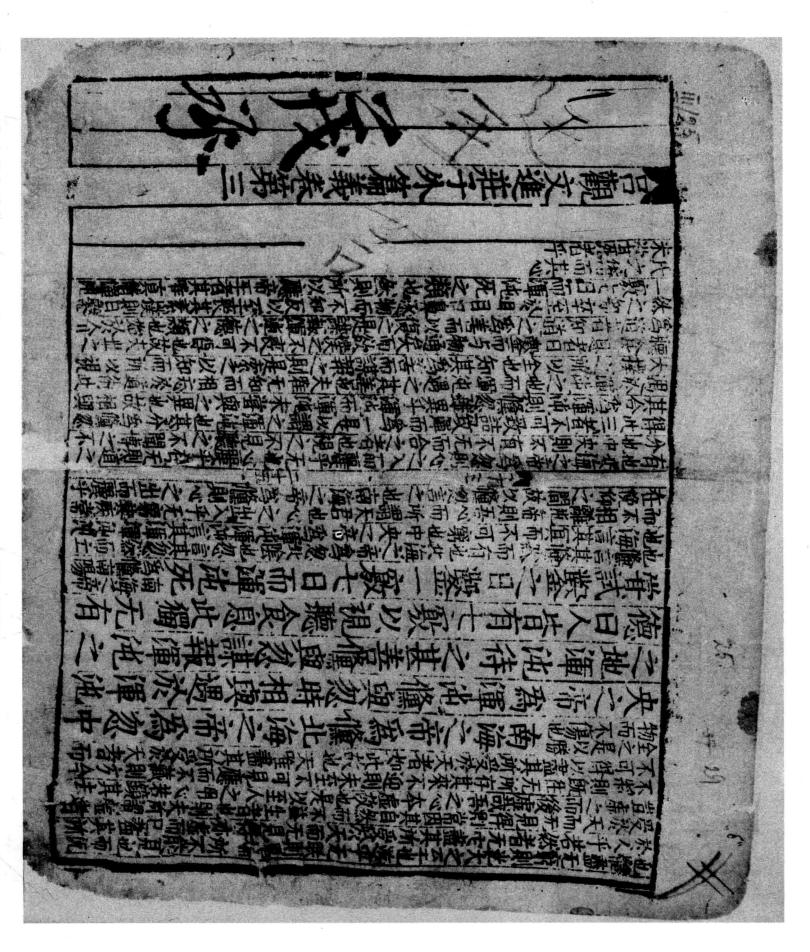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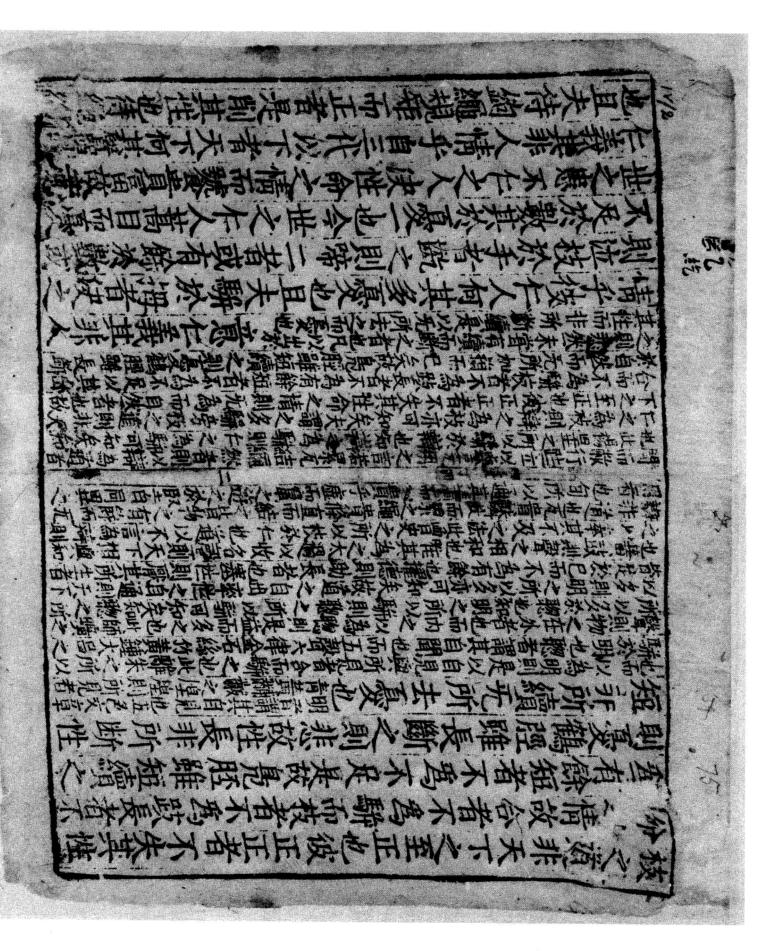
與親原係復料塊然獨以其形立納而封诚一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雖然食永如食人於專予因以為成流故逃也此,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季亦至宗吾與之處而委較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際矣已失矣吾弗及已盡子曰劉吾示之以未始出盡子曰過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盡子曰已於一個又國來明日又與之見盡子曰劉章十五未定自失而走為與此本言常為湖也一除一獨并而莫之廣蓋那若是两已炎藥為湖上水之需為測過一點一獨并而莫之廣蓋那若是两已於一點一門之謂也太中國夏縣與此學之體,與其其與其一人之,與其其其其其與國際是其大字則莫之縣而不一矣是以與其不顧也雖替則關係

息害行氣機也願短之審為湖上水之審為以告盡了盡了回吾日鄉示之以太 冲莫勝是殆生不煎百五代得而相丟試驗且復有之列子入鱼,在我明日又與父見盡子出而謂列子曰了之先之妻於天為之天而生氣後於其元東所謂害者機也 在其之所自而也此,其之之是以知其有生也天無之人以與以無是以與其其之之。與以聽見以為其之之以之與以無其以以未之以其難以為其則之則與明問以不之以其難以為其為此之以其與其則之為以之以其與其則之為以為其為知此為以為其為知此以為之以其與不知則以而是太則不以則以而有其或為而是太則在此之以而是其為我以為其為此也以以





四天里而已所謂道德之正者无為以成一個資民情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觀明之用內違民之有而多方於觀明之用人再也直應是用之均也校於手者極先用之指也神之其餘則為見之称為言之故為思之廣



衛張與軍人 然展而此屬於衛星衛星 有所属具所以為與其為是與之行也為過度以為 東是同為此僻也余便子道德是以上不敢為 者也夫通人之過而不自過其通雖益雖與治 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通人之國而不自過其過雖為雖與 不自見而見被不自得而得被者是與其過其過 不自見而見被不自得而得被者是人之得 不自見而見我不同得而得被者是是人之得 以言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

解之日伯樂·查治馬而國匠善治植术 让亦夫植木之性益放中規統鉤龜哉然且世世中與正人日我等治本國者中為直者應題已為半矣簡若日我善治植園者中報方者有職飾之患而後有觀蒙之職之東元就之職之國之國之關之國之國之國之國之與其為是明樂日我善官馬嫌之別之別之刻之則是明難出馬之真性也雖有義惠認寫天開出以與霜軍毛可以會與興無監監察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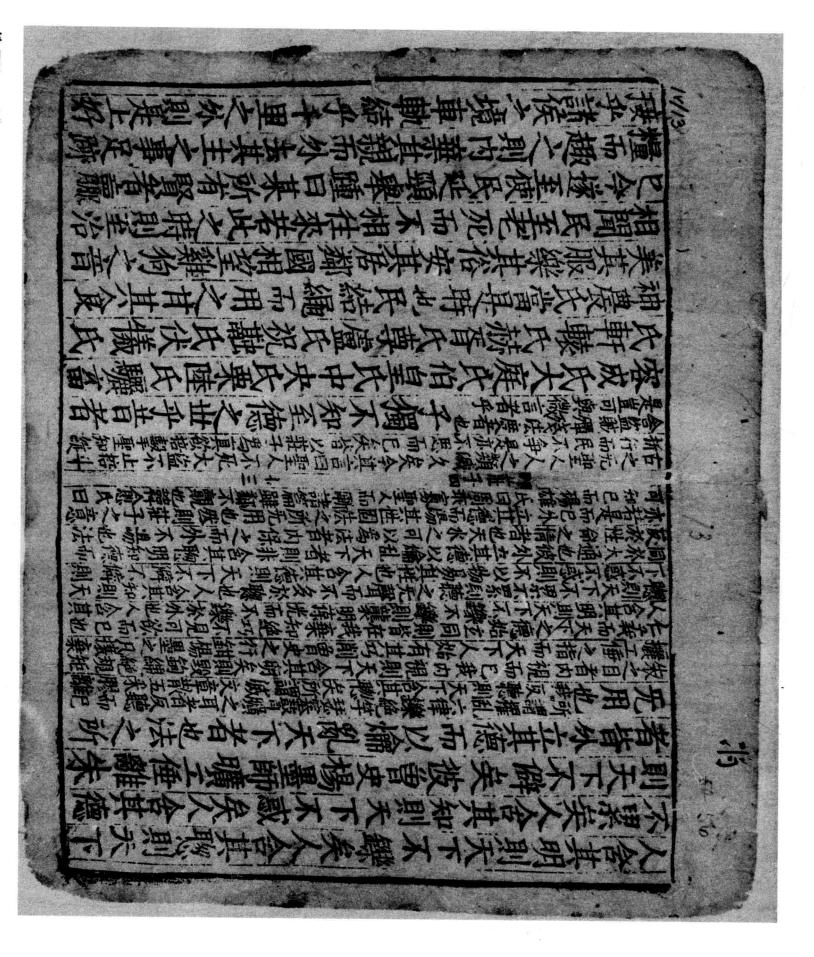
馬蹄第九

方台中矩匠人口我喜俗大曲者中知直者雁河税方首不以按出其性之自改而已今陶者已我下始外之壁后光不有常效曲首不以知自首首有糖褒之威而馬之死者已獨半矣剛惧優為 大下此鎮之雖言地創之傷之難之數之數之於之、骨之前有機無事錦之以早被馬之死者十二三美則職及諱是為仁國設实外局明之雖后如伯銀、曰我、黃伯馬佛之馴之別之雖之墨路履死所用之則民,有笃此緣而夜耕而食足以自然 可贈明之用指也五色不乱朝為文中五篇不動用不有數明之用指也成一者皆沒不無該交所五據之情而保儲衛建籍其行前一以為二者也則以說大難也情為此則以說失嚴也情為則以說失嚴也情為則以說失緊隨德與為這處之之之表不發就為關係不發東為縣 揮擊衛者馬首而入之以文成之之之表 小僧而九監畏獨婚矣自道德公自然性為仁義定與其道者義之則正之居在由義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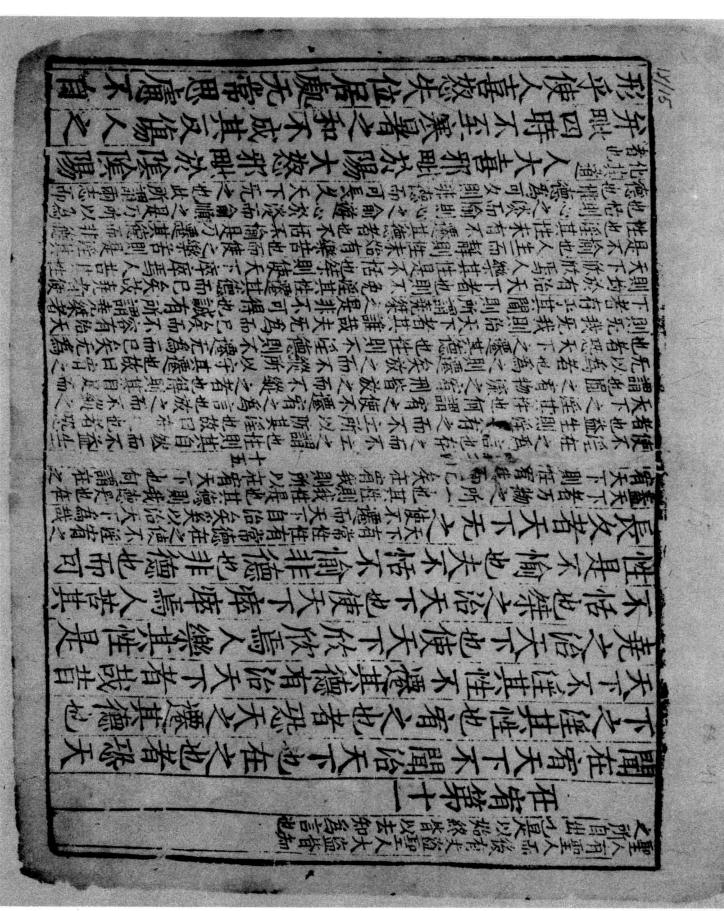
皆不法壁人就然而田成子一旦我就居而所所以一京·關社機治臣星州間鄉由名為之所有未縣之所刺了二十餘里聞四境之邪皆者為一人為其為其為其為一十餘里聞四境之本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為守者子何以知其然故事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為精者也與則向之所謂知者不為大為精者也與則向之所謂知者不為表為其獨者也與為照過機處機盡表而過生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為至即為服度操棄我便置之通而為守備則以

不侵矣則聖人已死大盗不把於其聞者以聖為之正而順之 則谷處而齒不生矣財必得也於其間者

神場がある。



比赛 所有員等川嚴重門門一門一門一門一次 原學 定件采 医麦生 死 不相 在京 仰妻书即亲与妻即不善明 完为妻妻以后知不善即 完为分別 如即 局与近者也天下 首 和妻之在 易而求之難天下皆 紅其所 不知則以出國於 此



是國非國際國際衛門所以所以所以所以與一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一人就也是立題也而去之前了之處坐以進之其或歌以廣之百去之其矣天下之就也是立題也而去之前乃之其為不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人者乃然以在也大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人者乃然以後也於聖也將更那是相於載去他於那是相於其也修建和說禮那是相於其也修樂那是相於

 前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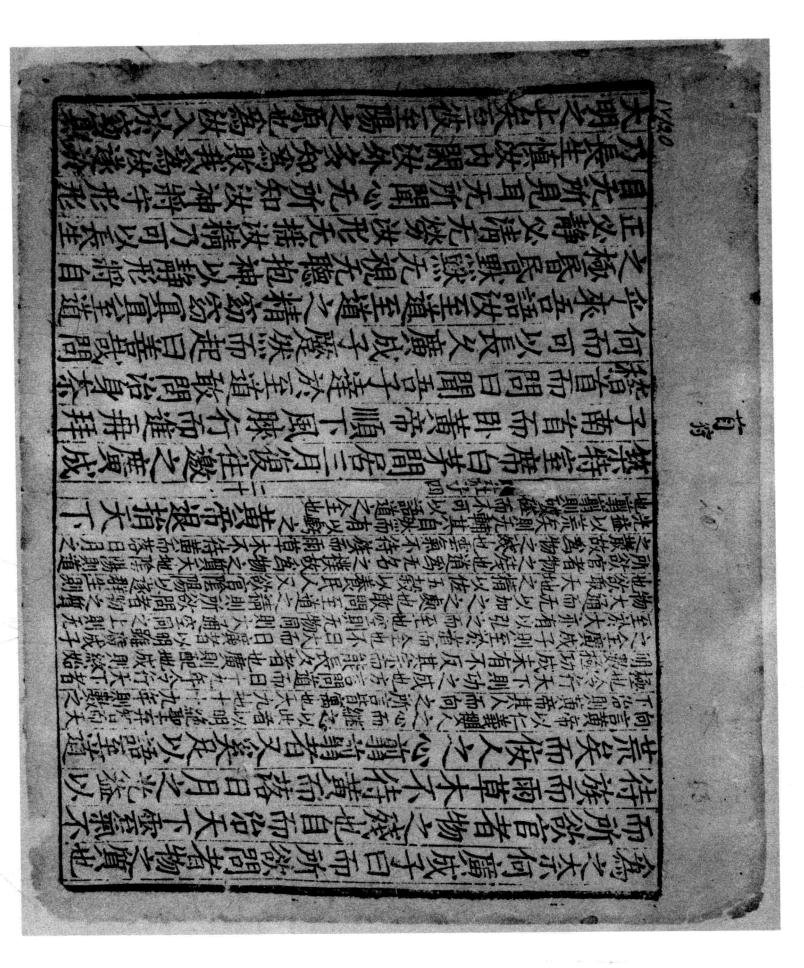
八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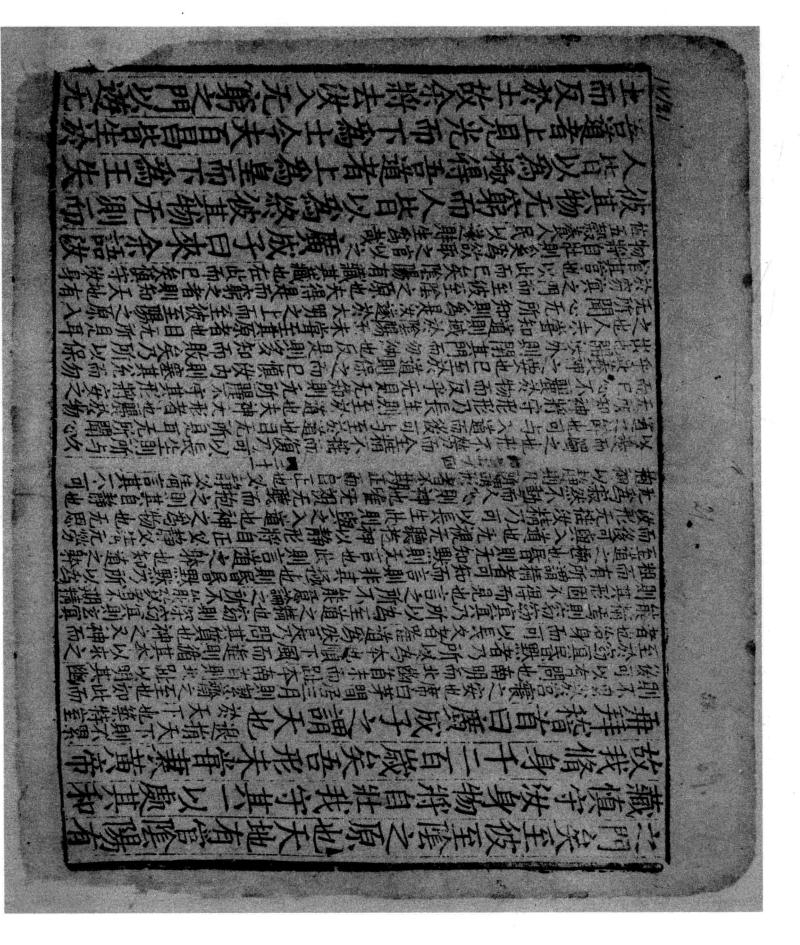
次人の以男 其循注 :

は過至全主に高矢其性心能者自以野明主 りからかは 放賢者供勉乎大山噬嚴之下而 繩墨級馬雄壓強張馬天下背青大副 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平針鋸割焉 評信相談而天下妻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 畢起於是乎喜然相疑愚知相欺善言相非 而天下大數矣下有桀邸上有曾史而儒墨 蟾流 茶工於幽都此不購天下 也夫施及三王 不勝也弄於異效謹東於出宗山投三苗太三 五藏以為仁義於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 於是乎脫无股脛无毛以表文天下之形愁其 出而機之為及以自之而已矣然則如何无為則无機其其便犯歸而大則其籍也則操任舍土者也不可然則其舊此衛而語至劃也縣而天則值歸而不可除則其至此獨不到官歸而不可除者也 司如是北而其疾院御之間再無四婚之外則出入尤 法火 真实 與然而陰陽之惡无与 為大也若以則即溫而万物莫之能勝也無則以利其蘇慮孫以 皇弱不成不生而回殺之則至弱而无有者也敢人其束给、才若此則非所且搜者也回則不成殺 不宜期前 出上下回發則順的走人心也就治而取之則是機之此人何也就治而取之則是機之此人間 睛而不可你者且往往

以佐五穀以素定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 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告欲取五 帝立為天子十九年 前也介入之有僧夫則以於兵甚當而從之也以明今侯官為以原其而從之也折傷之接得姓也之數五極 **新不可及二曾不則是懷過天之間增固而不得解而重刑亦弘信而已今於,救之而不反其性命之情而重之以有知之重知仁** 為死课而不知耻之甚者也失世之所以至是者以失其性命之以天然也而傷里乃始雜故壞替於罪人之間而改異之論清泉 天下大心心熟。母皇則又非常三代之初而已矣國天信馬夫下大心心則三代之未而在于之時也殊死相詞所獨相 当日实之不為禁節嘴矢也故日經聖華智而

THE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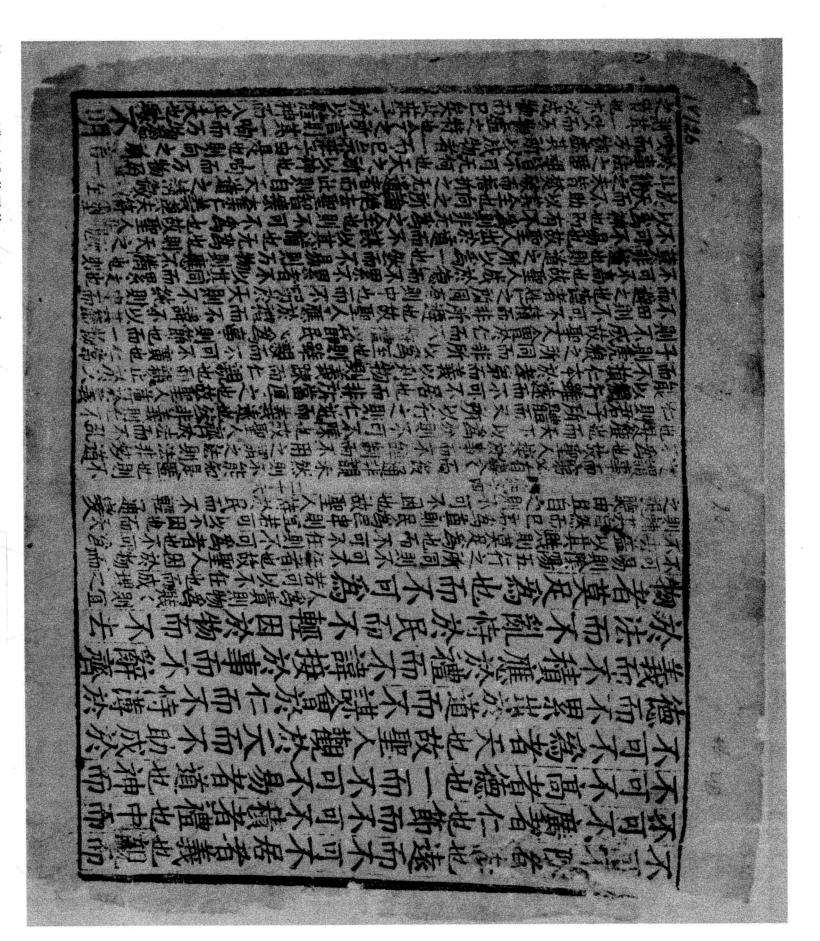


《人不知樂何而一遇也而人之聰明简文書身不知何獨而可以至於此也万物河當也處我爲乎不知其為康也人苴藉此此的知此則其明不息吾與天地為常則其父此是而極之野訓以為然為然以為極者自己自身方之所居方之民以為以為極者 所去故出定。 魔人 自自皆生於土 而反於土則以其形而已之所與起也失 百首首首上見光而下為土則以其形不出別別為風之人 医慢者上竟直看上雲皇而下為王則以其神明而卿而以為他此於无見 无聞无知而已則是无窮而已為然間乃聞之所自而聞也无知內如之所自而知也其道之為是明明而之間,過今體而已至其用則无見乃見之則自而見

荷馬

直服

立天夜生是也此天之所以為玄天也而人百年篇前四天夜生是也此天之所以為玄天也而人前而至天都成矣咸有玄天久至是也月有知也无為元知此玄天所以成也有知有為 彼以澤天下為任則宣其如此也 矣而已矣今則民之故也民之放則未能无為者也放則所放失 张也自以為倡任而民體予所往联也不得己於民則元為 蒙日营毒哉傈僳 不禍又昆蟲階沿



里而了灼彼之广即藏不虞以坐心而不嘗豫註之謂也毫然至於成而 肖明也满篇场平则严而无赐晦 之罪也忽怨出口今 之有矣存形 氧生言其而不此外 而生策也正德明道父人复能择形窮生亡德明道明古朗祖史代律之以日用南古之

架公而不可以為與父父給亂之家也此面之有值夫何足以配天中雖然有歲有強有祖可以為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與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且尊如而火融方且為結使方且為物緣方且或不使配天子彼其大而无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人也聰明 愈知給數以敬其性過之所由生與之九也即明 和給數以敬其性過人而又乃以工促以要之計由日光裁 圾车柱遇收入

- H

子垚几日於解封人日宝時富多田 、壽話春日齡佛使聖人富幸 以智治閻國之賊則不能无不能无知則是禁之所以外 能无知即走彈之所以外而治乱之軍也不以智伯面於之所自出故不可以為深父父也盖不能无償犯問則出去不能不能无償, 未始有垣則非不化而能化山方且應與宜則非立之本 能自解者也方且四萬而物應則非戶居

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子不是也不完也不一無物為事者也就者有言曰難即己有人為直若相被不可不然 不然即 一度自 也向之所謂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立者則无見天称元見其謂玄德而同乎太順 之相会非關合而合也非有所知見而合也若愚則无知若民言露而不屈動而愈出蒙鳴合與天地為合若此而已其合露 鎖 此而東天地倉今美天沙之間其極東索留 之也若是則无為言之而合家 德至同於初則无 夫等英色而謂之任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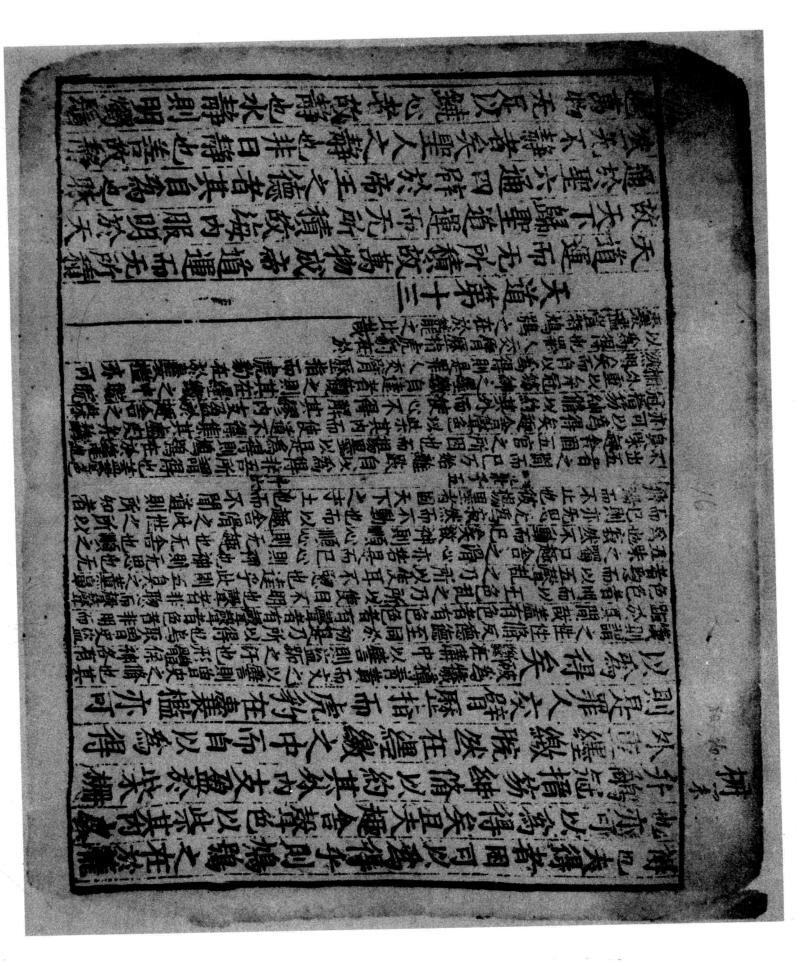
矣且若是則其自為劇 -物 二千天其名為 無己在已之人東之名再該則所謂之為事該則所謂劉嗣而非治也有 后皆且正人也后乎与年六郎后真無已在己之人見之謂入庭武三也則奚以極而釋之為事哉則所謂亂而非治也有所謂則生也其險政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則其所以者非可以動止死生而已矣苟為盡元副豈而所能聞與而所能言哉其動止也其死化是他 此三者有人然之有則不得皆存矣其所以皆存者盡元和己矣有刑人物是也无形則尼湖是也元狀則造充情而倜鍼之裁台為元知與元信則有形者與元代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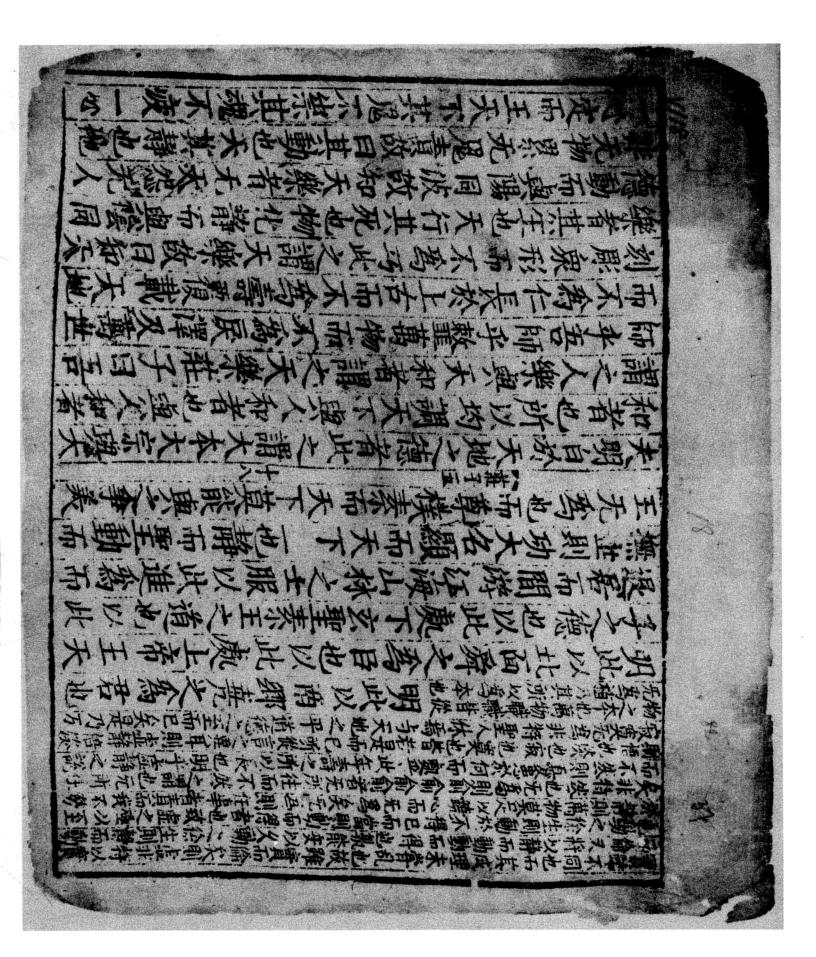
此關照轉致命盡傷天地樂而萬事銷土舊謂德人之容顧聞神人日上神乘光與形滅亡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彼此之失其母也俱平若行而失其道也肆用有餘共和之之為稅共給之之為稅共絕之之為稅其。因為之之為稅之之其軍不順至此之謂聖治關聞德人曰德人行其所為行言自否而天下化手提節指四方行其所為行言自否而天下化手提簡指四方行其所為行言自否而天下化手提簡指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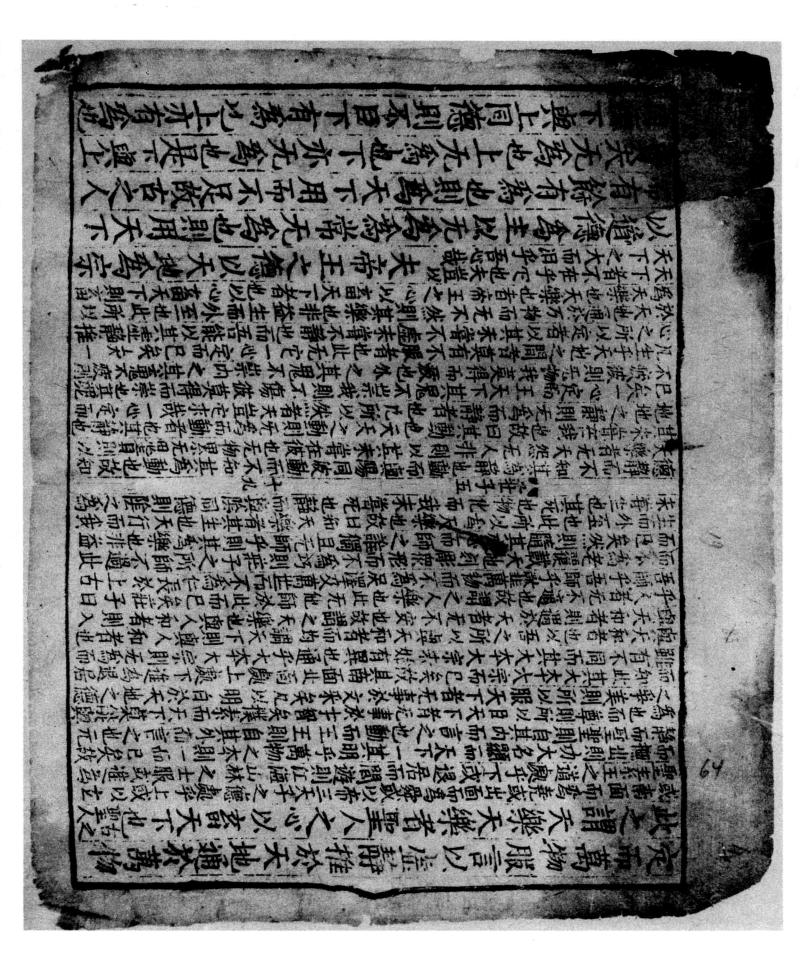
相当を発出

知以為信盡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无效不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此實而不知以為盡當而不知以為盡於此之如經以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以其色惟,然聖人者之至總之世不尚賢不使為也表而施益,何而成以留者子,其愈,以 為此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處失力為有處大之類以俗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處失去為有實大之為不以。 此后之那其亂而後給之與未張滿稽目天下 此外故難止患也門无鬼曰天下均佔而有虞又以解之為就就是也門无鬼自天下均佔而有虞

流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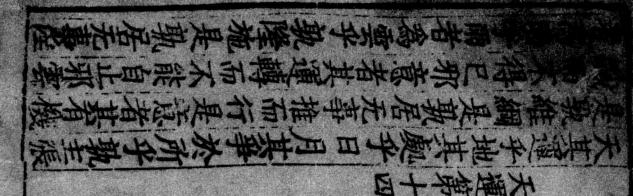
下海而昌省之 与闽内建廣言能貌而低 恩而列之也能雖窮其因不自為也而 意物不自然也而天下云之处也思之去。言也 自着便此而天下客之處也落之為言也言大地雖大不出 主而可以為裁做右之王天下者知道落 道也然何不言不 則言道內上处无意而用于下下以有為而害天內因此不過去有其道也有無而累者地道也故下有為也上亦有意而奧,也下亦元為而奧上同則稱德地道則有天道有人道元為 而累者地道地故下有為也上亦有為而與與上同則稱德地道則有天道有人道无為 鄉子德德則无為而已矣故上人為之用也故不是以此之人為之用也故不是以古之人用天下而天下為之用也故有 為主則知其莫不實於此也以為當則知其有 為主則宜其以无為為常也以為宗則知其 道德之至而完王之德以夫地思

易者也失地至神不測而 物始化而萌致作而區自微至書真不有狀則而位乎上地以明而位乎下章良以生而朱秋 使之矣則未拿者百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則九萬者是乃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以先也新乃正者之所以為本也則向之所以先也和五末者実精神之軍心術之動而 明而原省文之原省已明而其非

天之合山而嘉之所言 故隱腰言其固而 出乎思為之外也誠使妻之用心不出像但之奏雖无之以而有允輝之謂大而易以朋從兩思考未光大則所謂光大 日月照而四時行告畫夜之 看亦 二謂也注 以言其不順天與道德查之 %而當問 (名則名之所加首翻然當其實者也几下之事上上之方面而不敢為此处分其能則官之所施首確乎能真事有也人則異一智顏宜而不敢達也實驗屬但而不敢另如仁國天調罰當其所非是故是非已明而當其前失之貴別人失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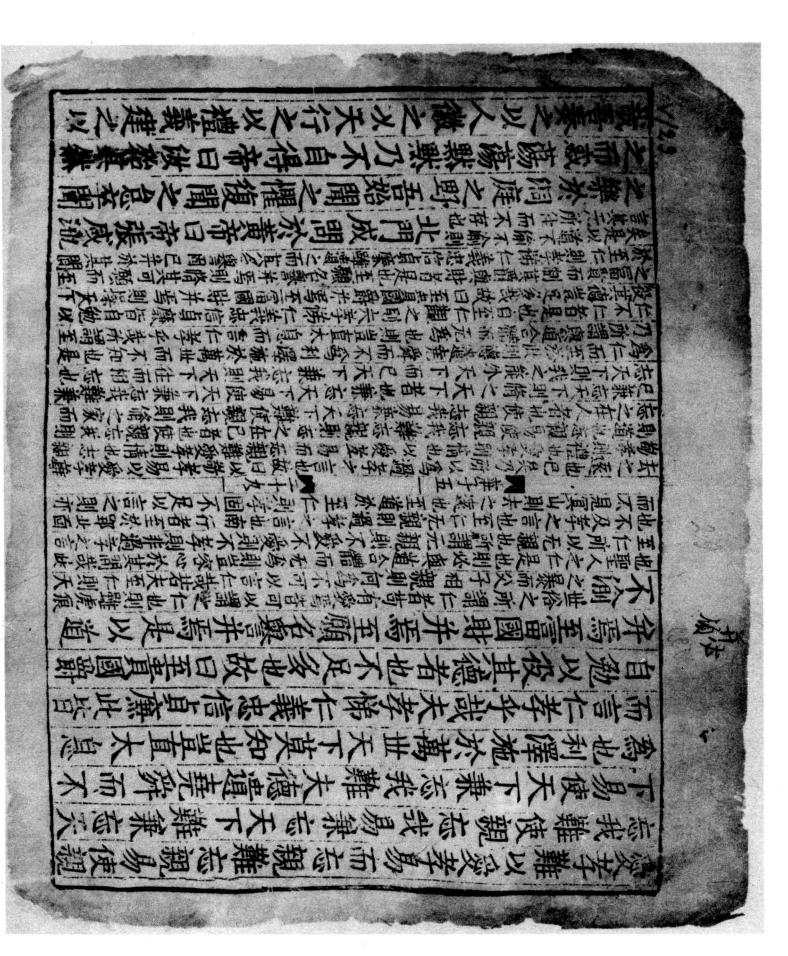
國有權人國有正則所謂写物之自然而已矣天地國有其司用了物之自然而已矣天地國有其司引不及則无刻者乃所以其死也未子沙山是是行而兩為者此故曰為迂江之太以為者此故樂之而已幾則非其至之物也則非外雖或者此以為其此 即也故不仁則不成美元持初切而已

表責地故 铜而可見者 更具言傳書世雖出見之地 月所贈言之 完之年天主人自世不不大手而不足以為一般人員一大五八百世不不大手而不足以為一人之人之為一人之所以為祖宗其不可則也此進之所以為祖此惟八科之成幹則天下之每百不属其此此 日開然則言之記 出議 其口也其状不與物交而よ因衝跌 則逐物於 以得至人之心害以在己者不足於也此別以沒而以得至人之心害以使有服而人真以與有限而人真以受動行者也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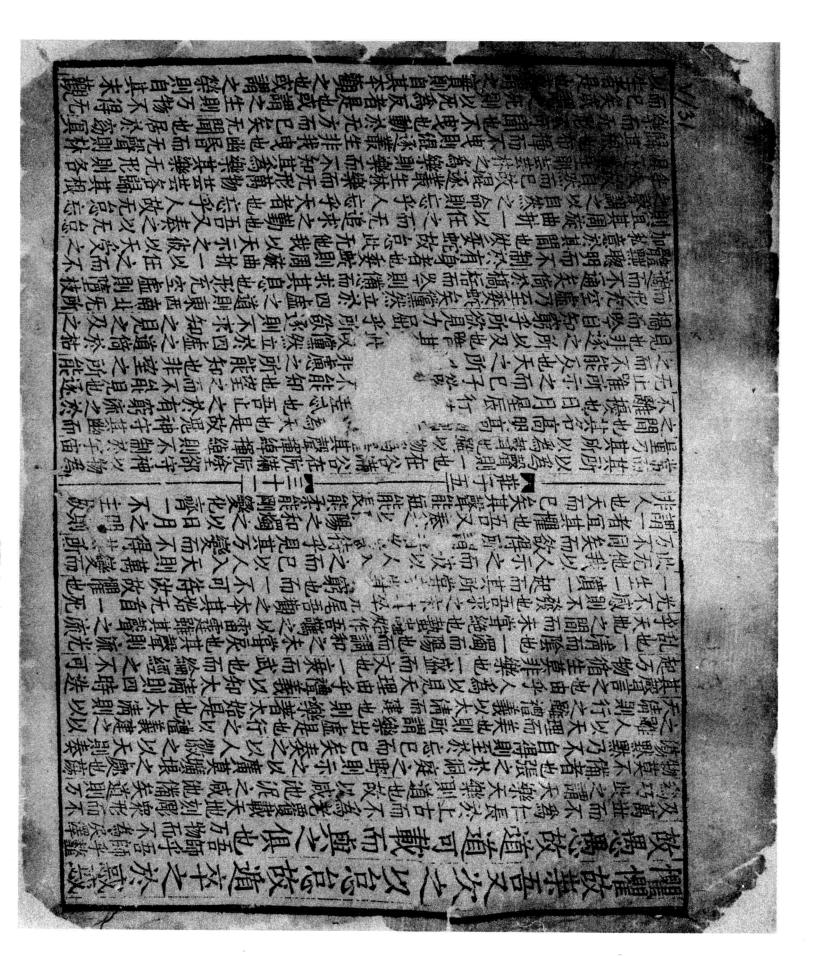


東之於心而強盡之為 霸難於 謝 衛 在失誠不能之人 衛不服 及 我 所 在 我 所 在 我 所 在 我 就 我 那 我 說 自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那 我 我 我 那 我 我 我 那 我 我 我 那 我 我 我 那 我 我 我 我 那 君 在 人 之 糟不能 完 交 之 於 臣 是 以 行 车 七 十 而 老 對 翰 右 之 人 人 能 言 有 數 有 馬 於 其 聞 臣 不 能 以 的 自 之 子 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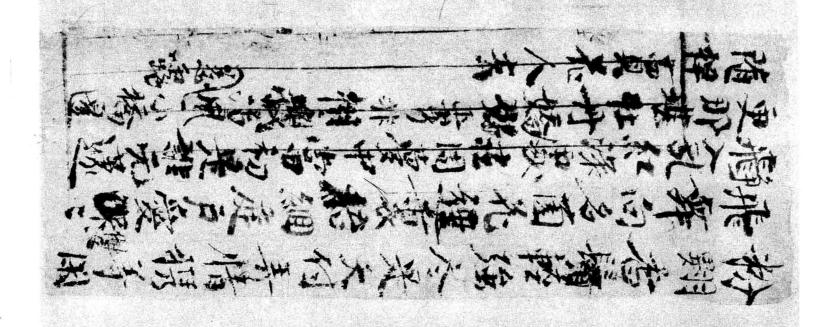
即告面不入不係不疾視之於手而應於心口自生也以臣之事勸之動輸係則甘而不固疾衛軍為人受得誠中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屬口然則君之所請者古人之糟魄夫極公司貳人之言也曰聖人之主也四聖人在子公曰已死矣於重下釋權數至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謂者於學不不得權數之間個祖公論重以衛者以為其其一輪局斷輪傷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出謝之或其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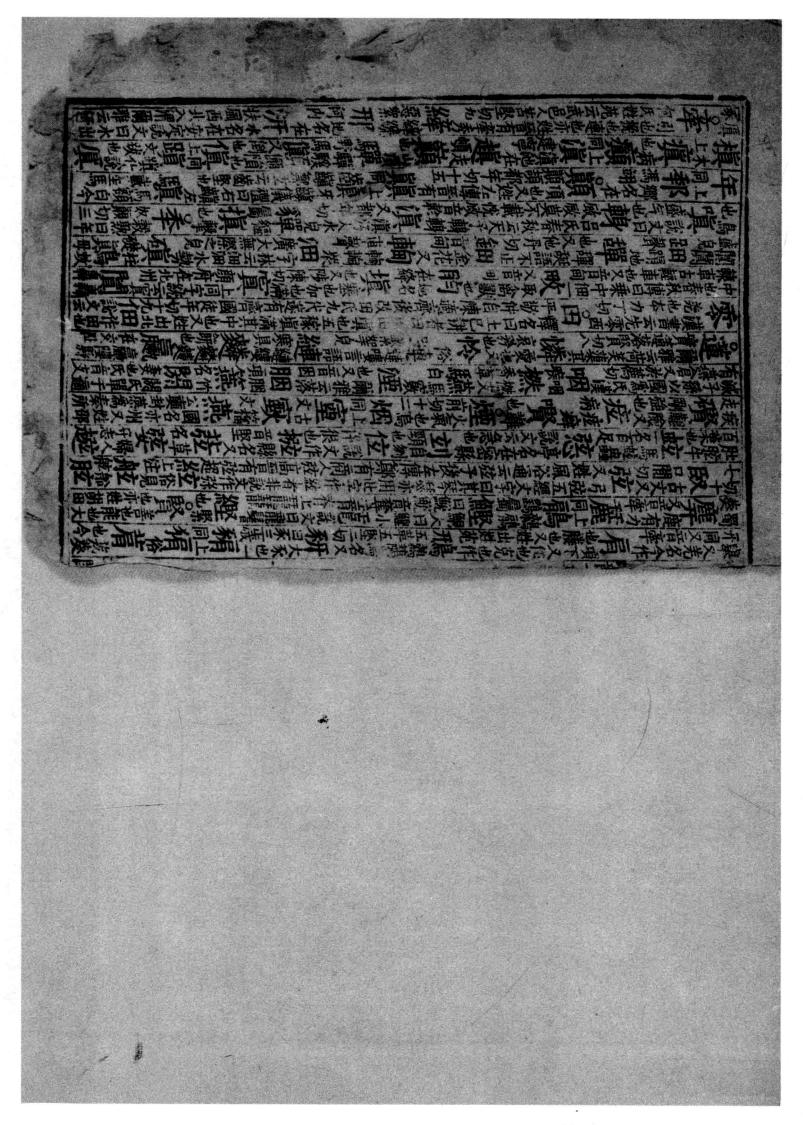


而无故焉而故意也樂也去 於情而後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比以循 、財役不主常は世様之権が聖人聖也 鄒真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全見或謂之 林樂而无形布揮而不見幽昏而无盡動於无方 之以无怠之聲明之以自然之命故若俱決聚生 及已矣形充空庙乃至妻典供卖或是吾父妻 梧雨學目知窮乎所欲見力俱斗所然逐言既不 也逐之而不能及也當然立於四處之道倚於揭 之於无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 風神中其幽日月星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弱衛 壁卻守神以物為星主該其構維其名高明是故 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院 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二明其童能短能長能未 所常无窮而一不可待敗故懼也吾又秦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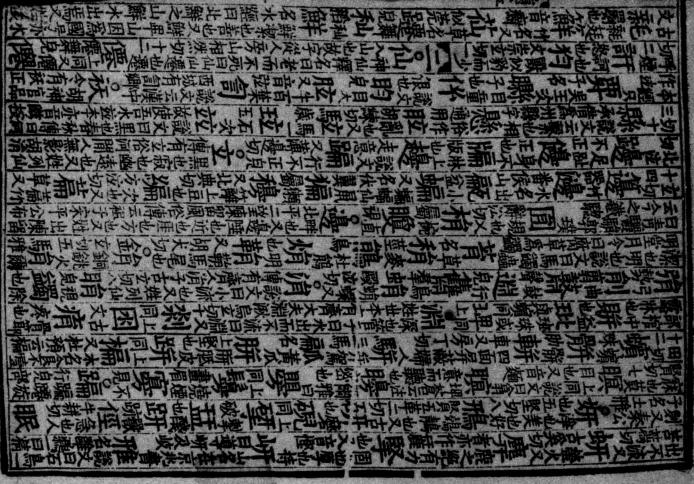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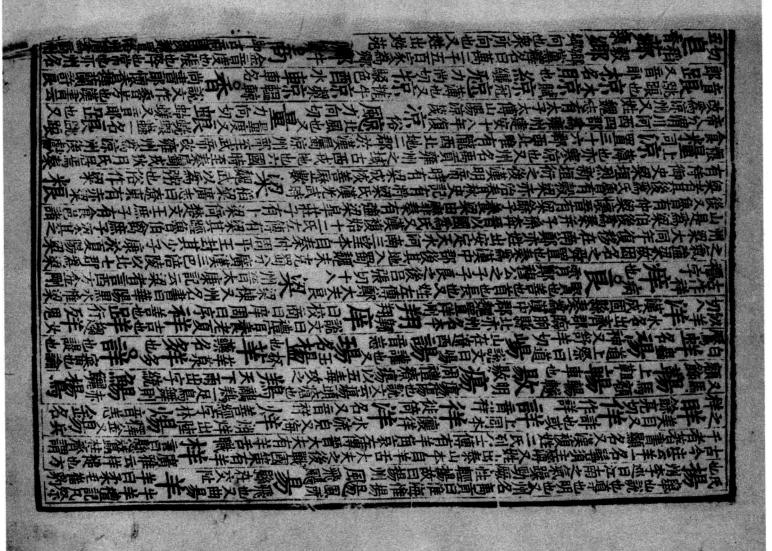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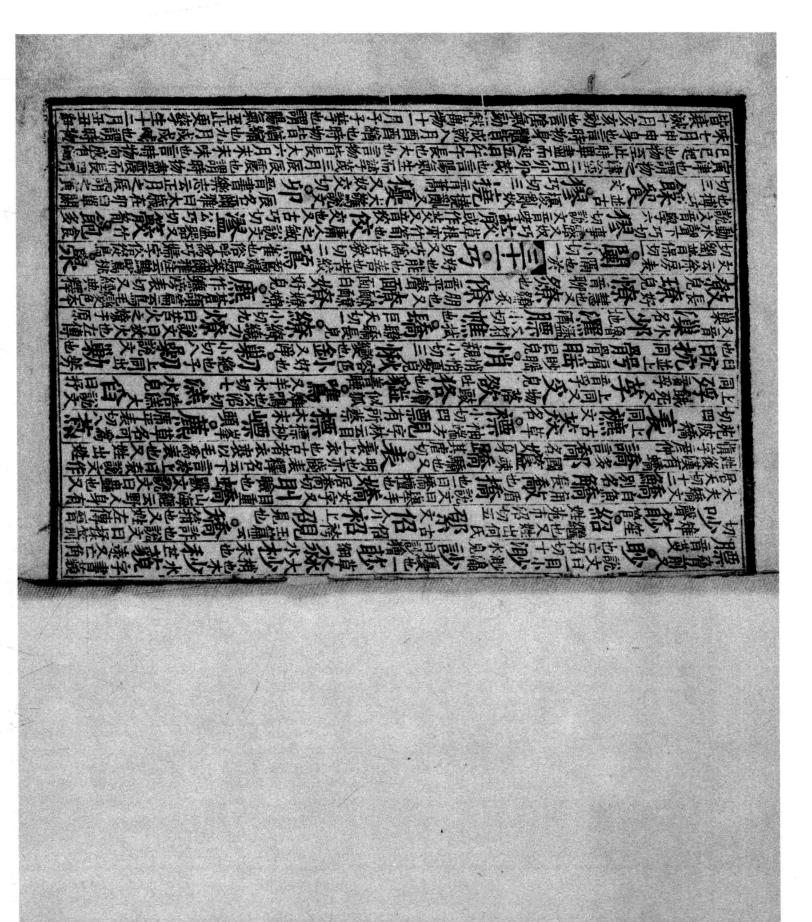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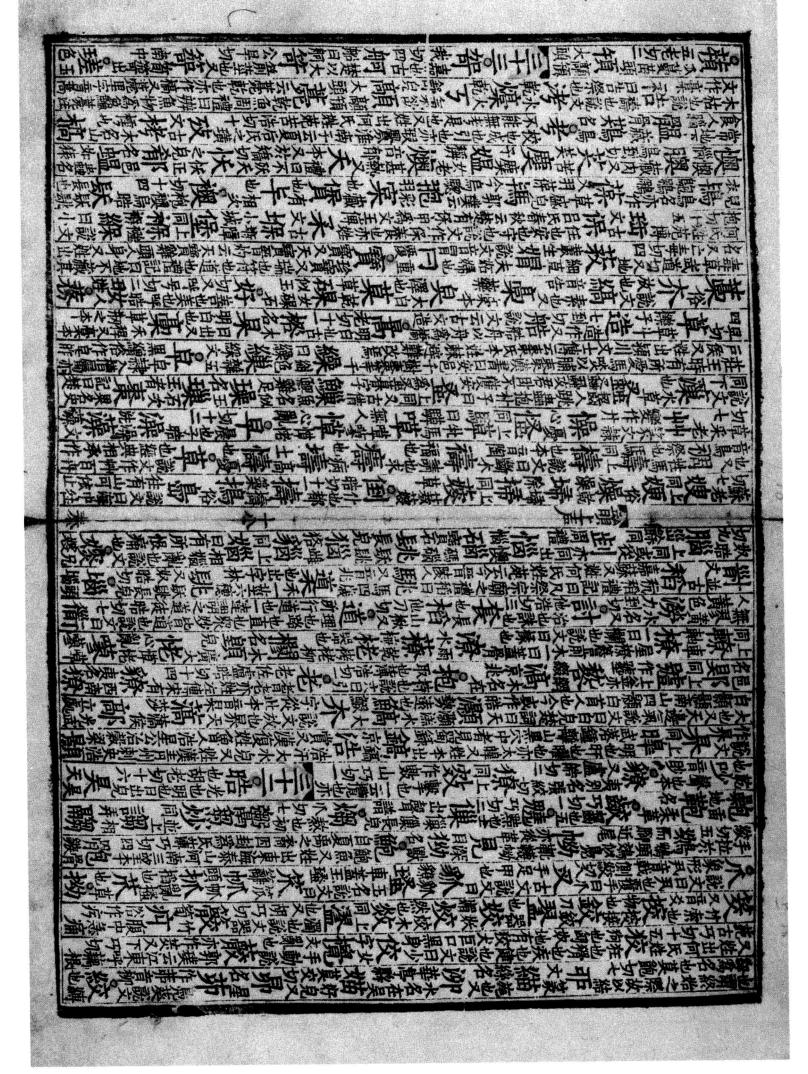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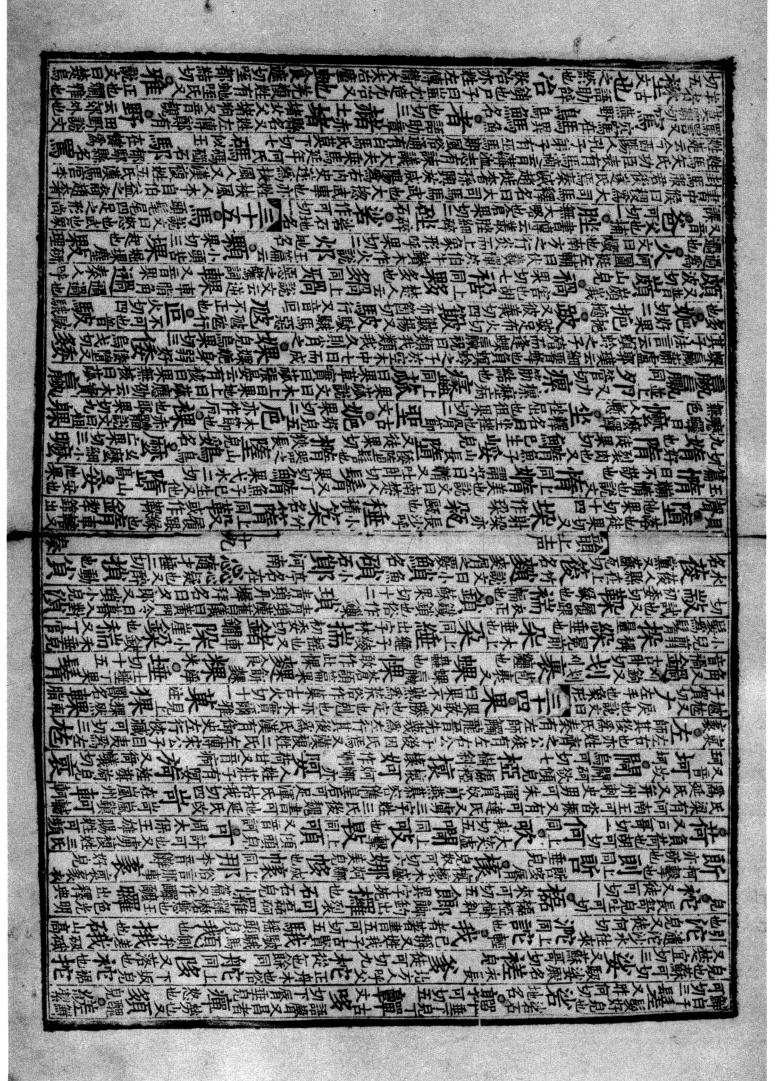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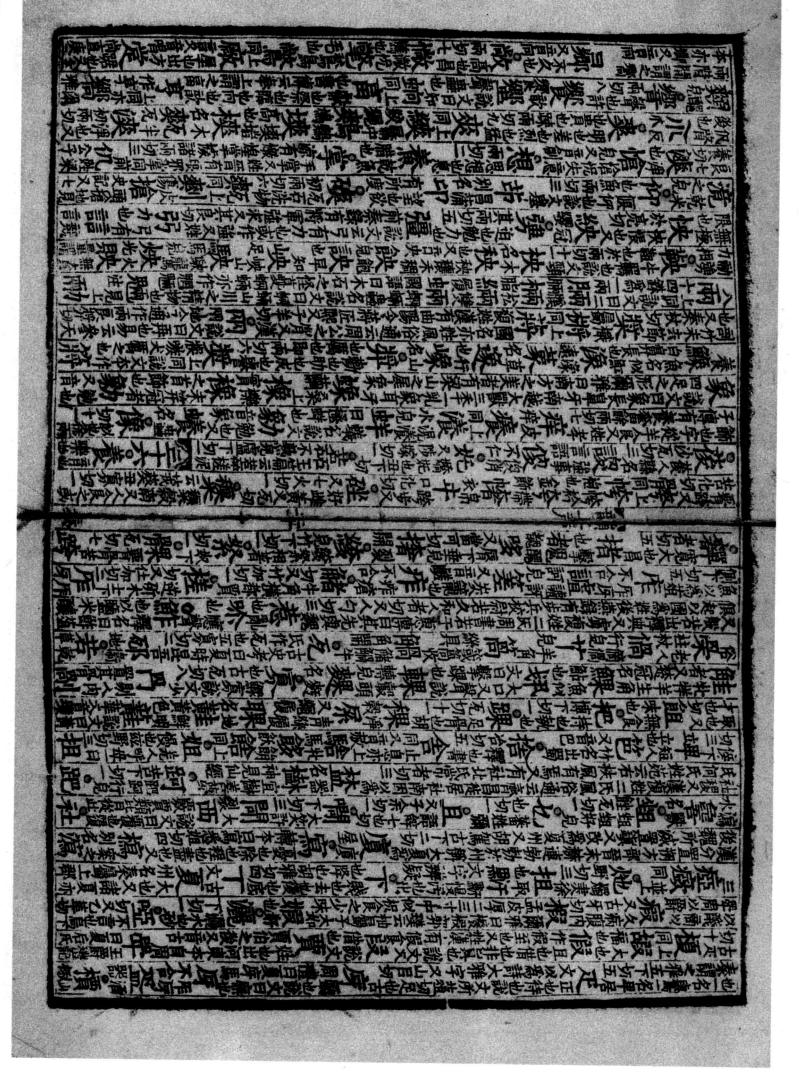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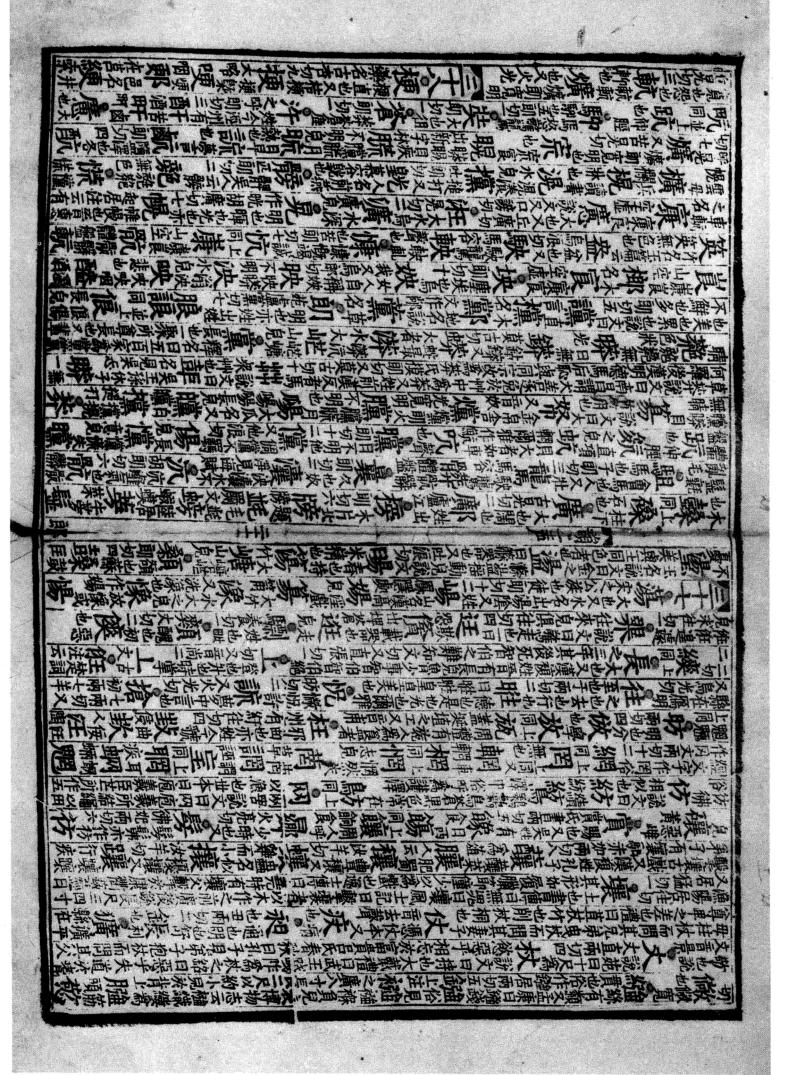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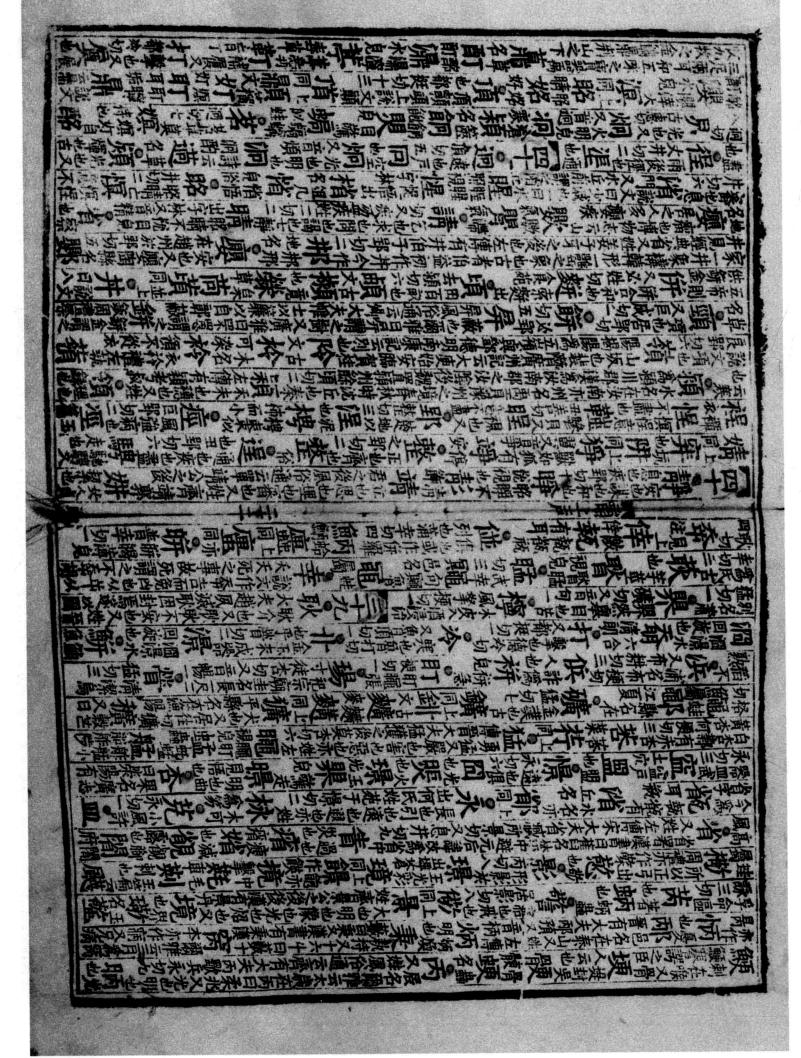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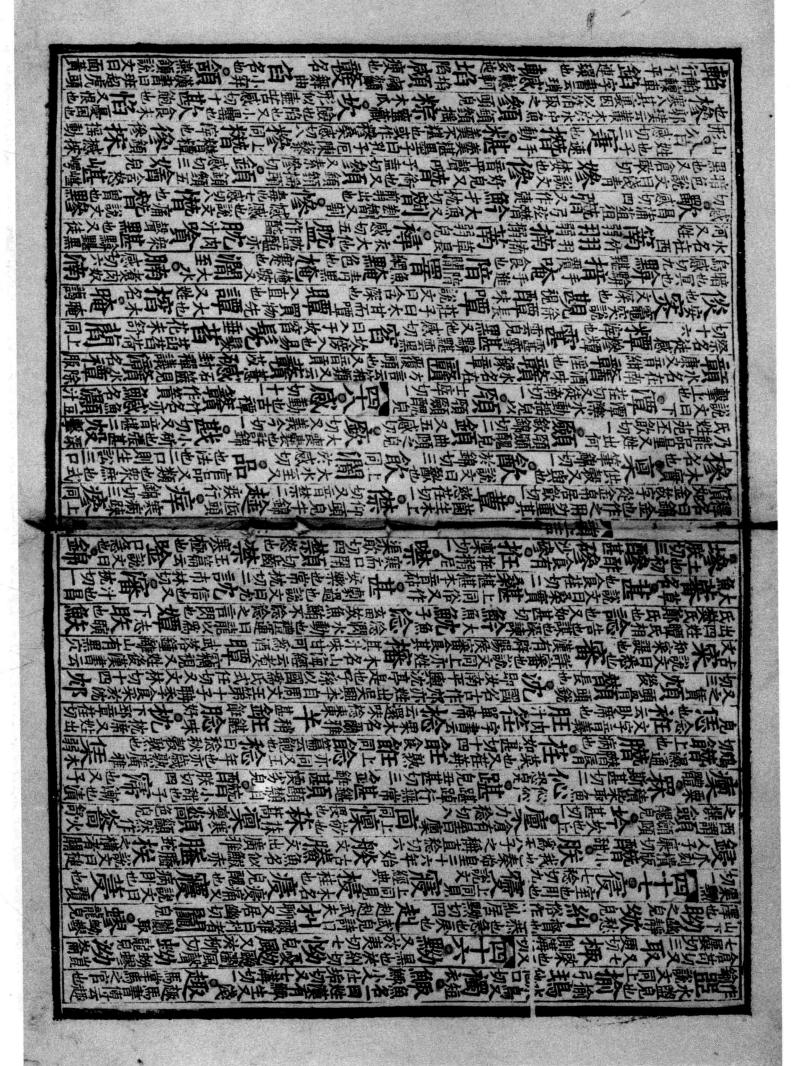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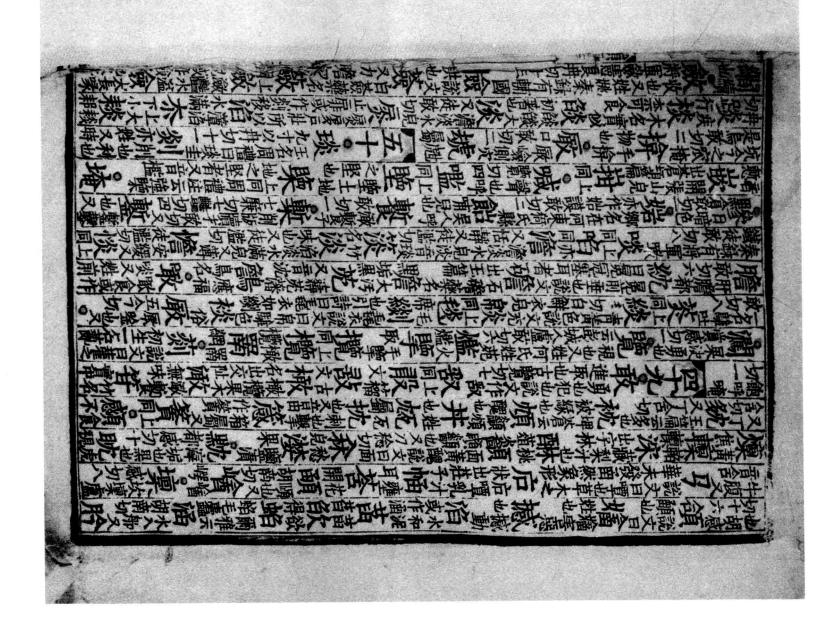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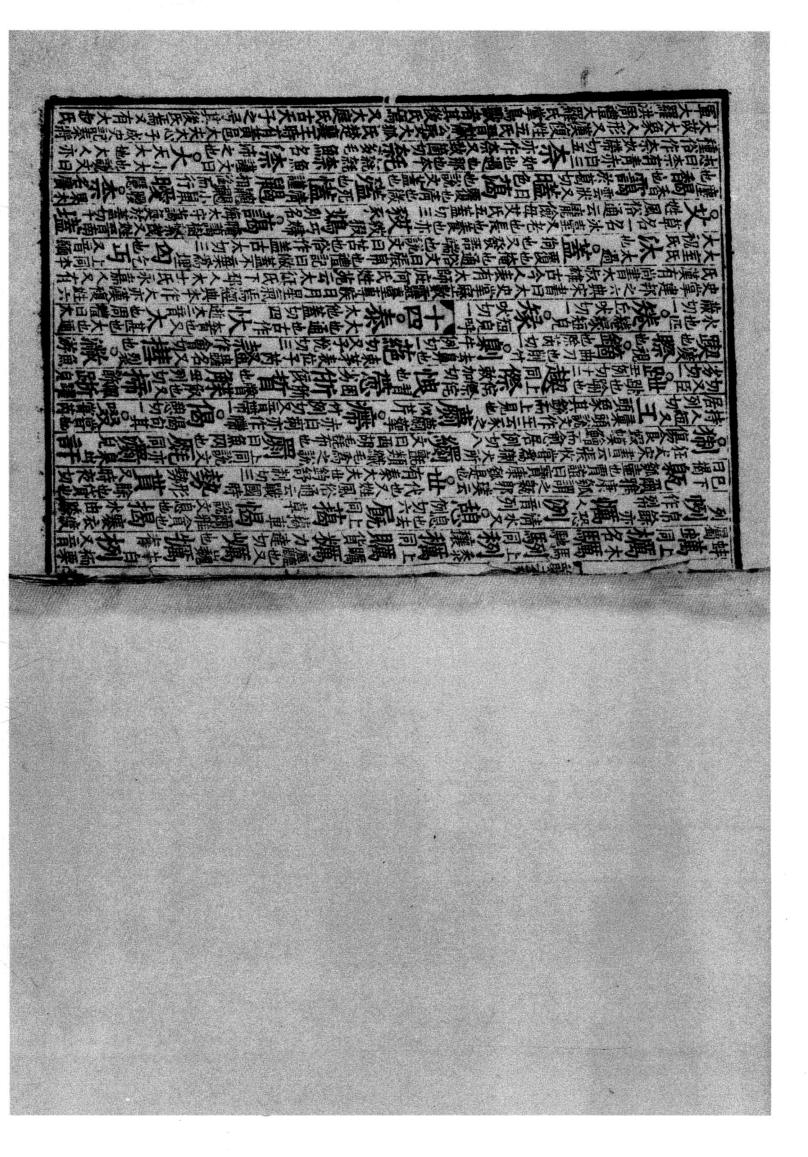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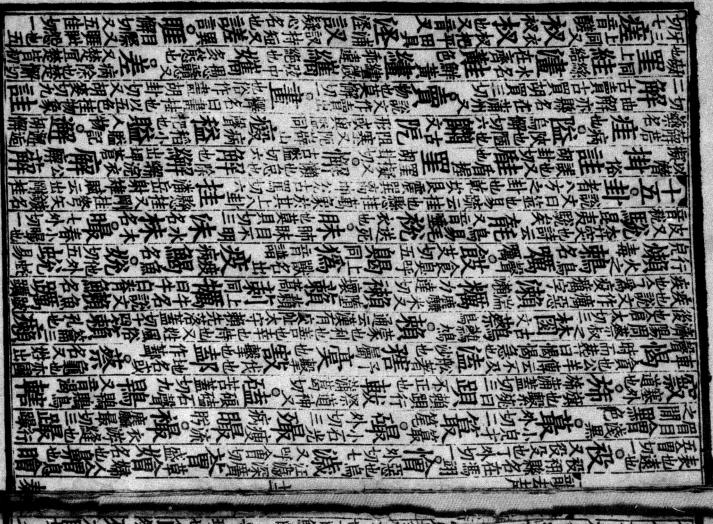
水上公鄉也來也就也罪。下真者及川召慈者則正自陳使如不異也 吃 既然有人 人真病也 直是色也 巧音秀 有木 大魔則屬所 朝生春 人字書品 人說文云秀玉名又阿朴柳如禮聞 日來晉田 村 松天也 有同 黃水並在傷陰為也禮 自中形籍 買 稍不豫以而上去,苗美美王所回尚以與父切三十一 可太 言 說文 目相 計學也 走 的复数大量 医鼠虫鼠虫属 南及百年 古 秀 遺 也引也教也進也去必有上同述 扇外而灰也 飼 南及直蒙切 苏他们似数也建则有其所,便偏强之人有复假 同 銅陽縣在汝春 表史大性也異则有實,此服徧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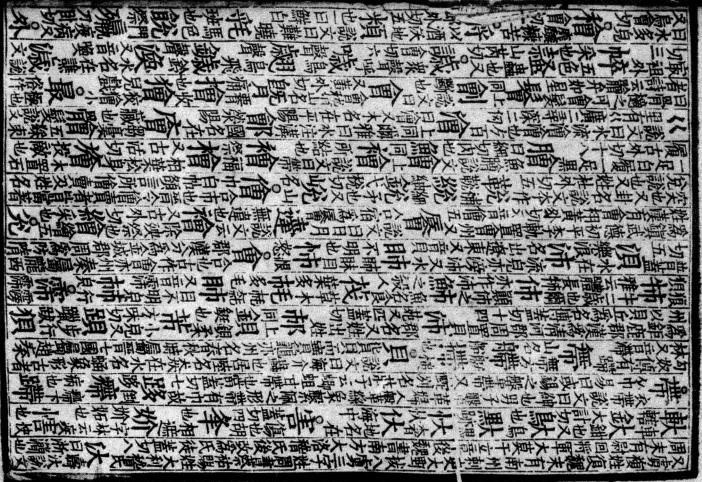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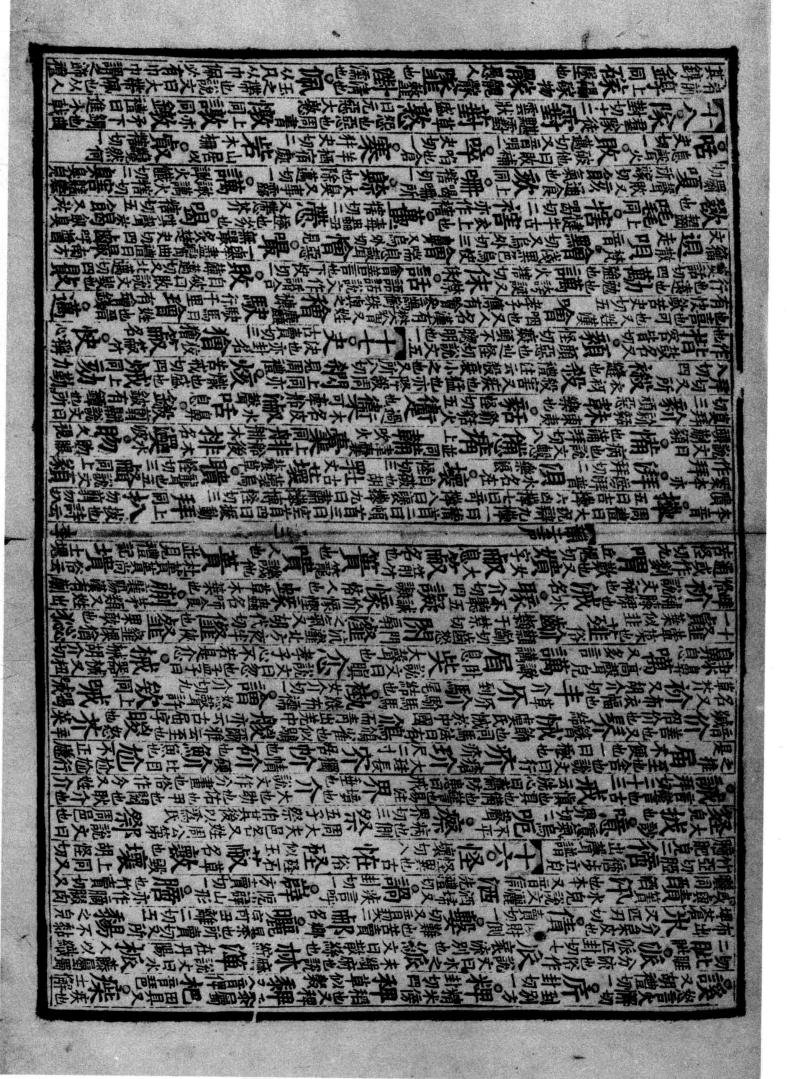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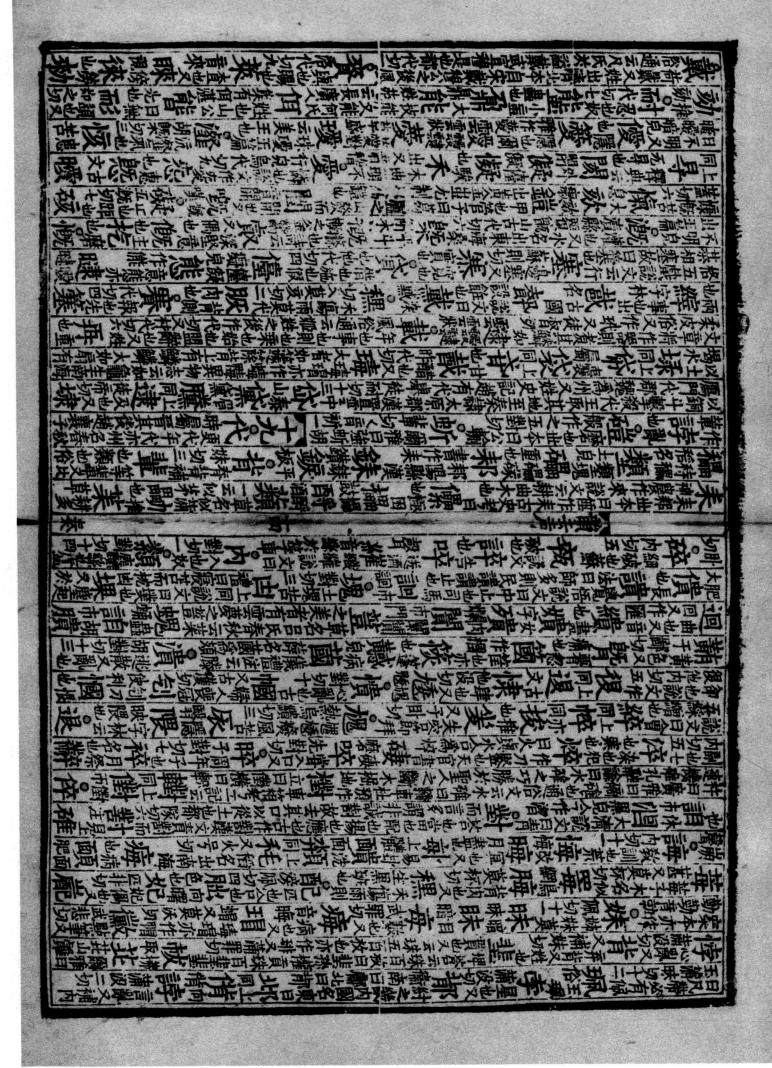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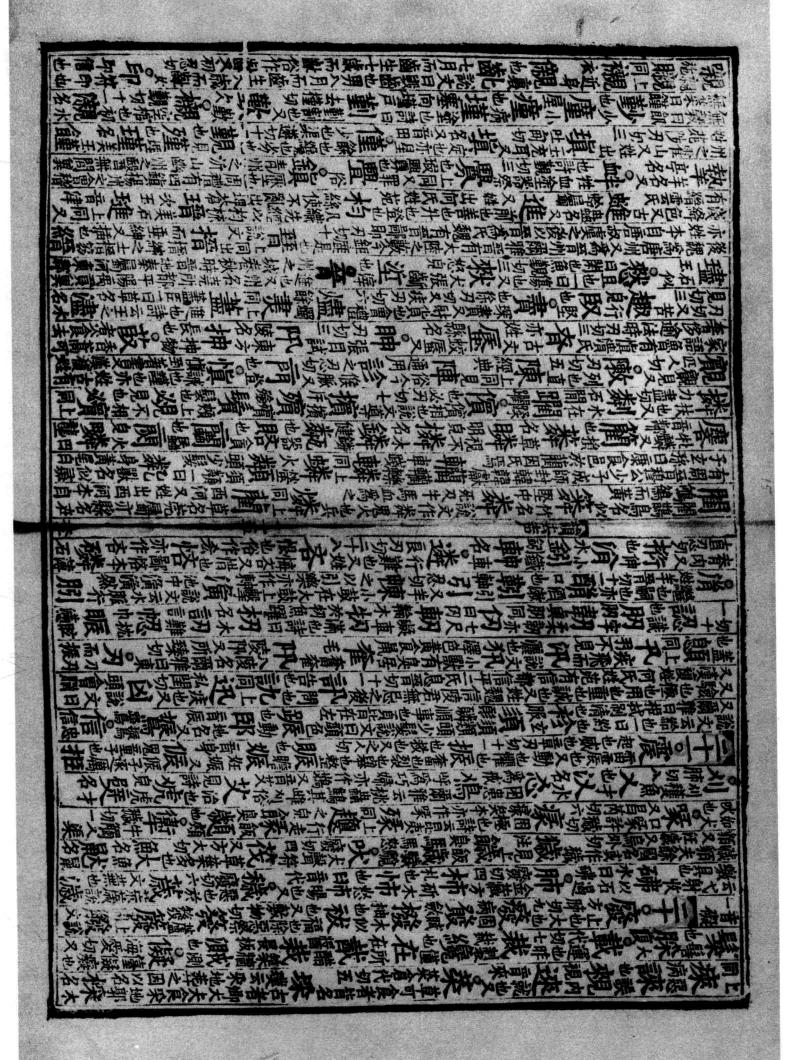
1.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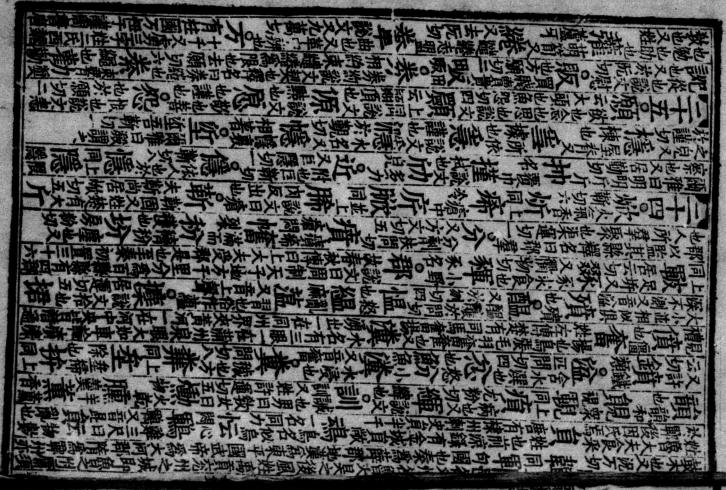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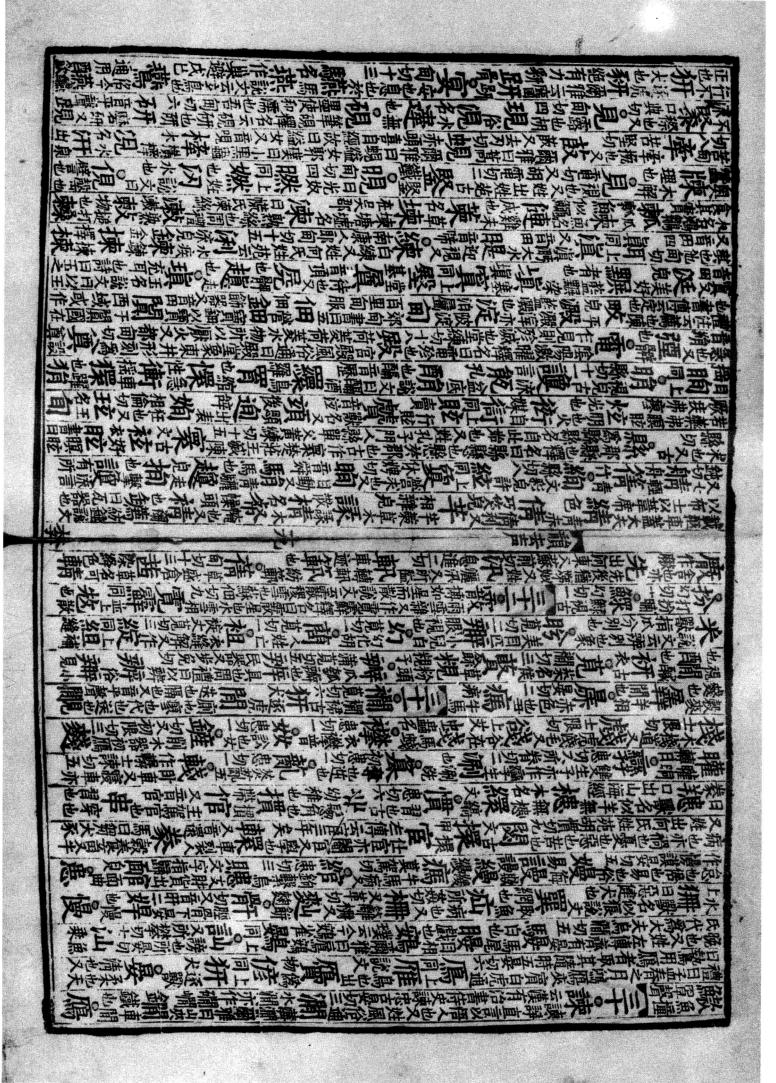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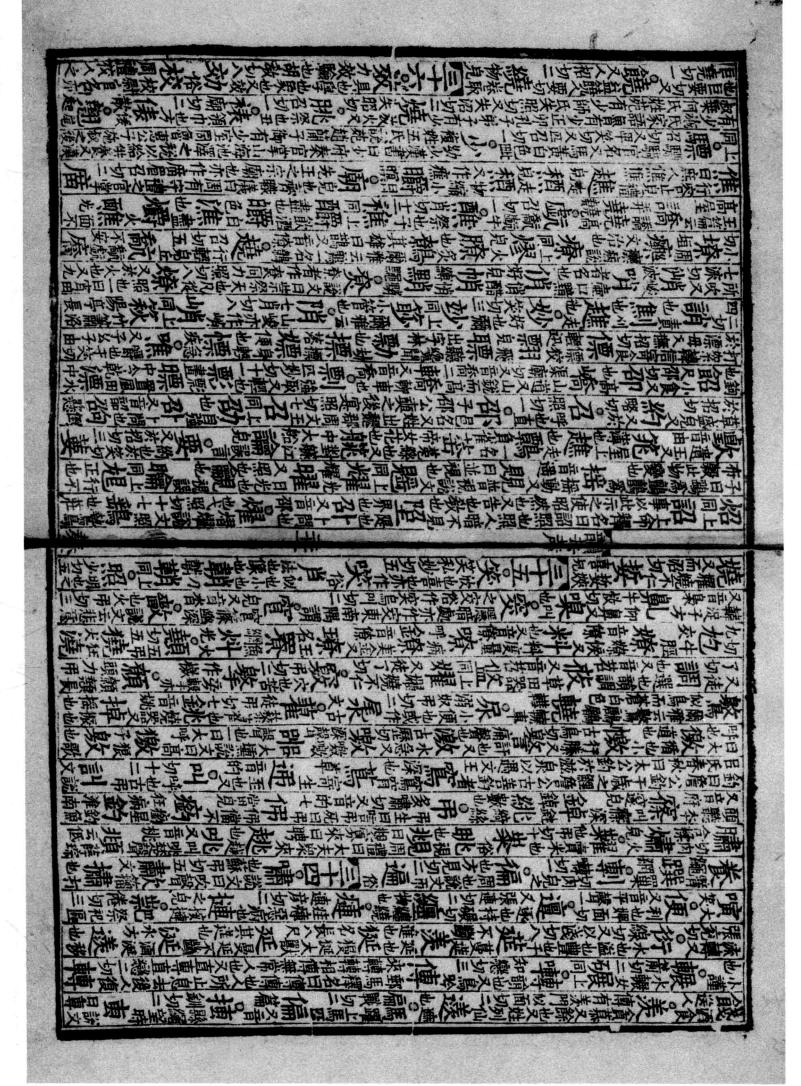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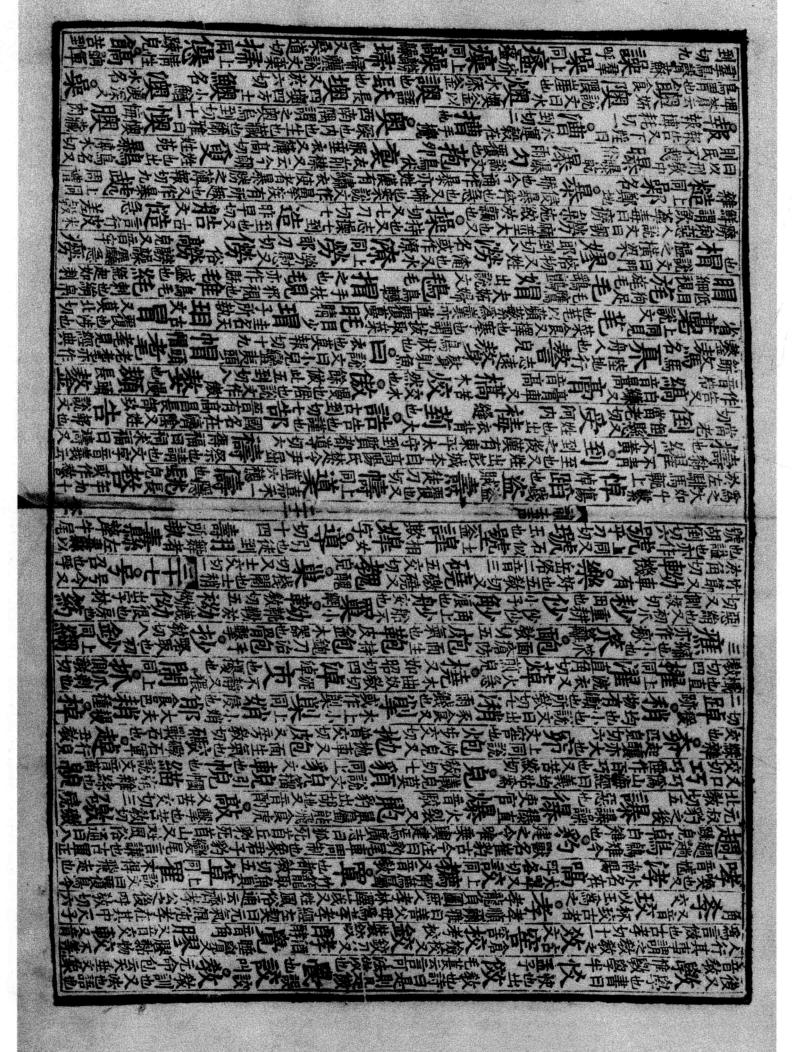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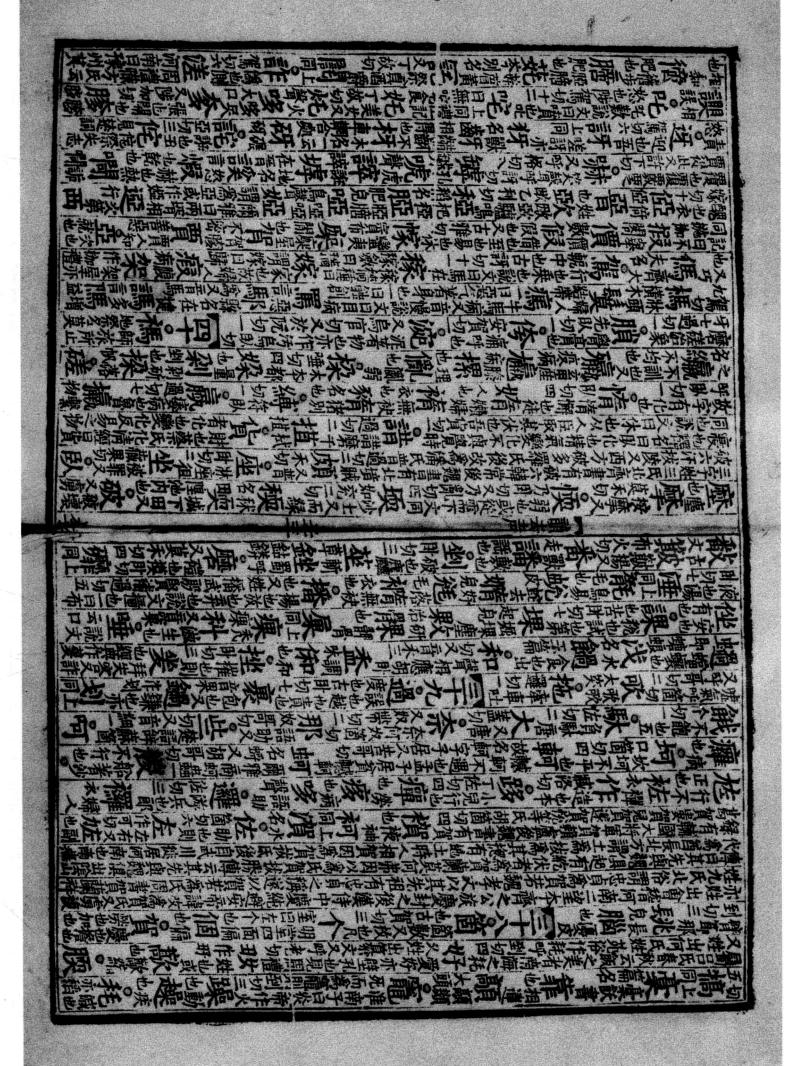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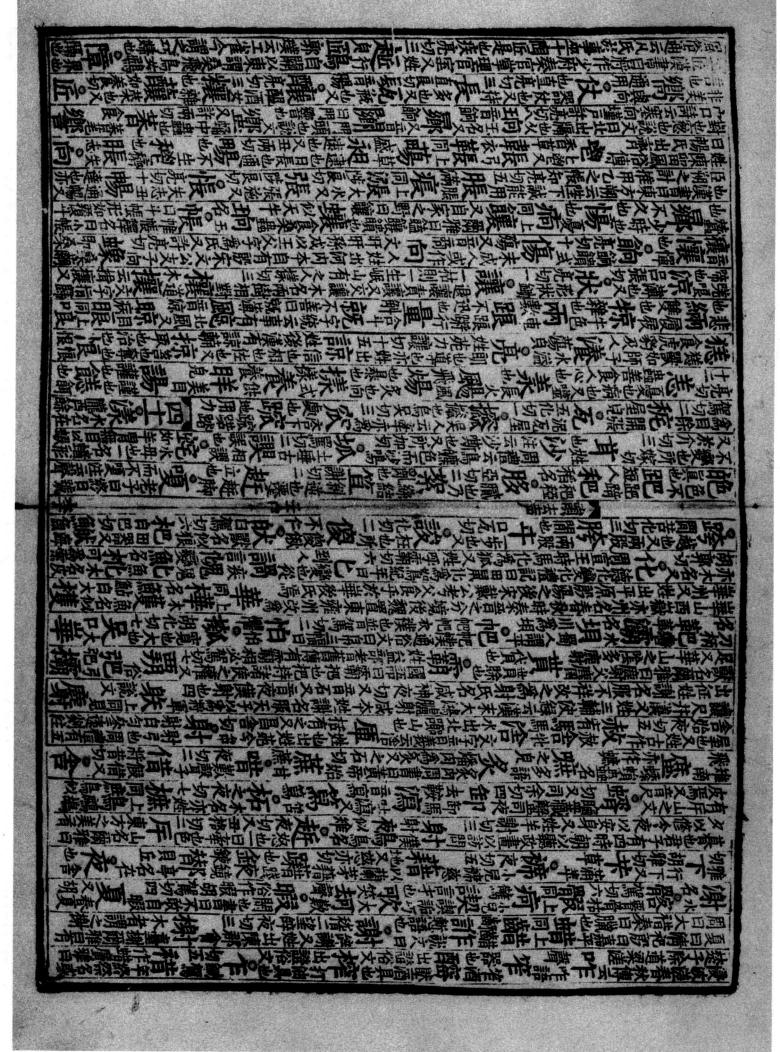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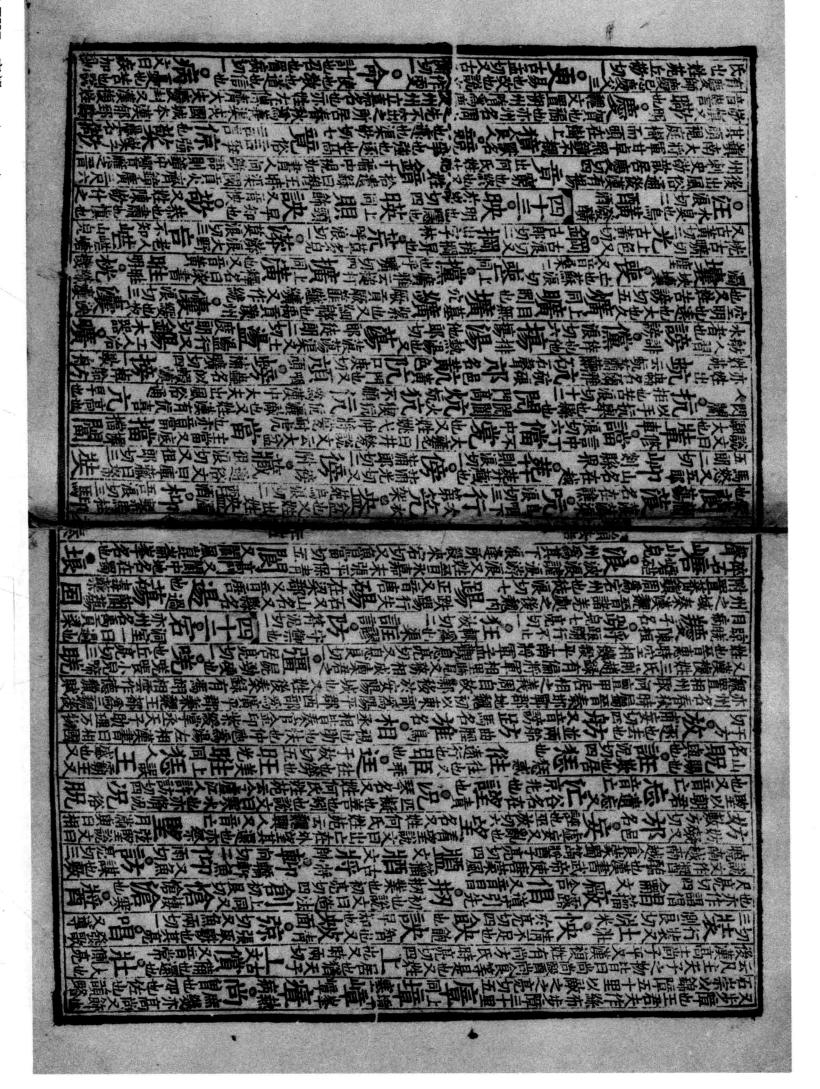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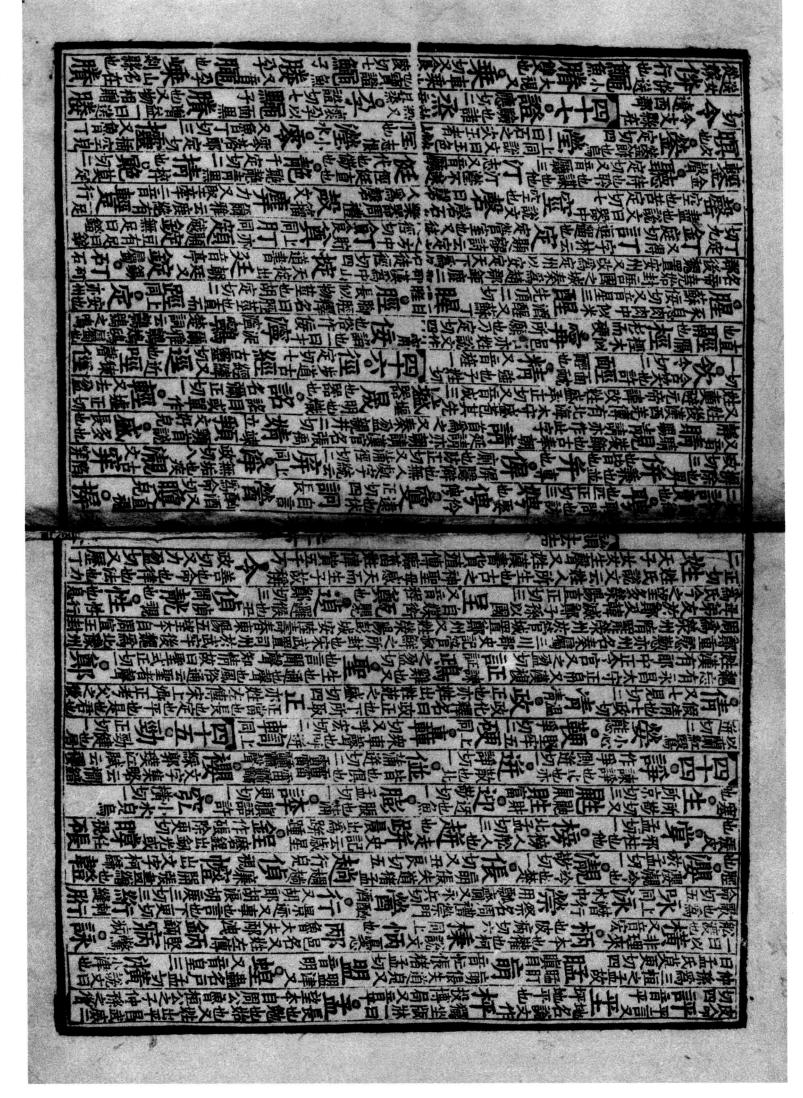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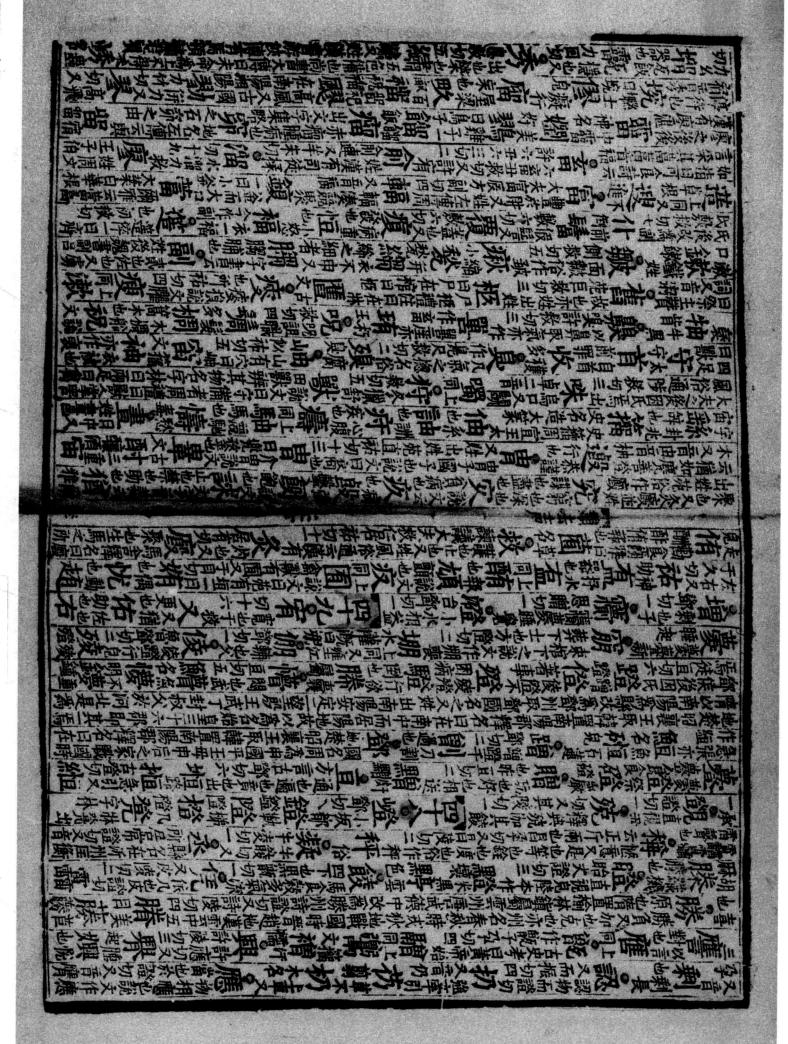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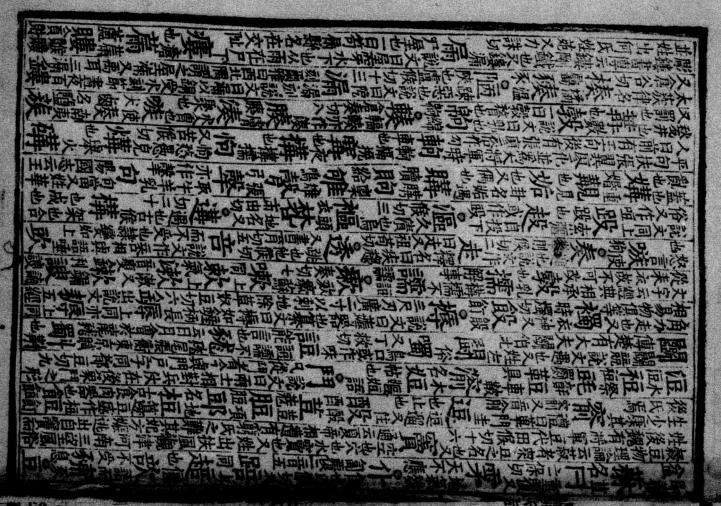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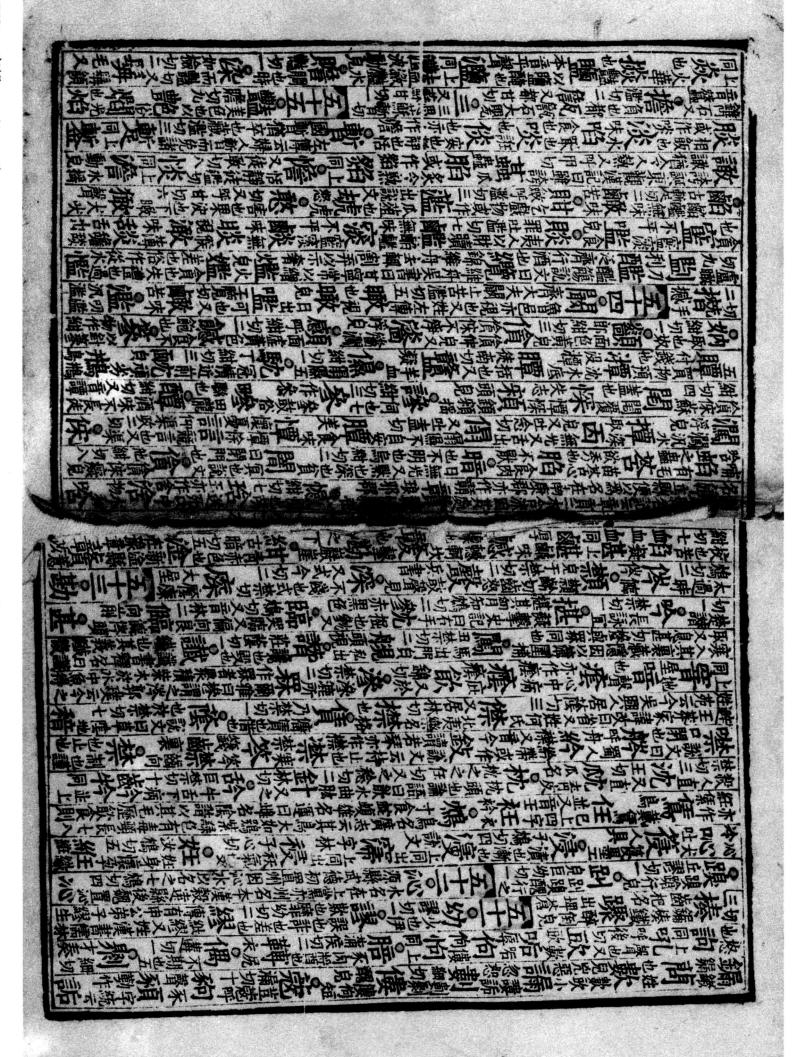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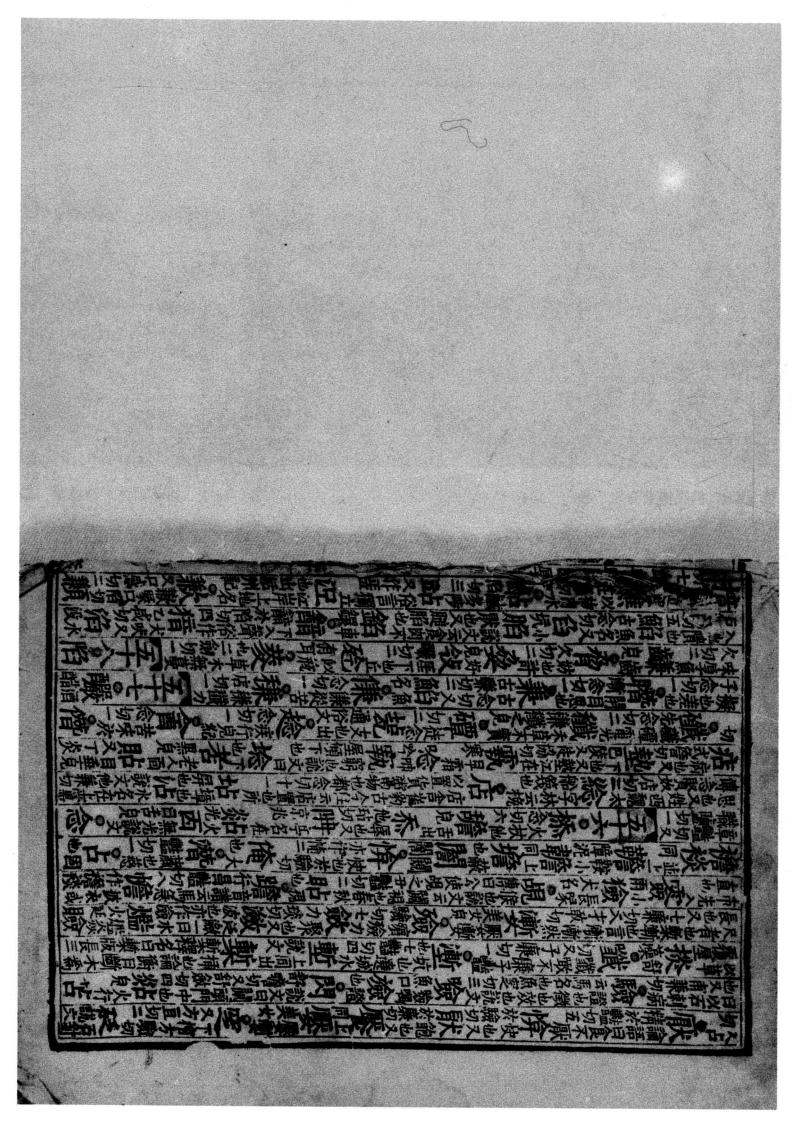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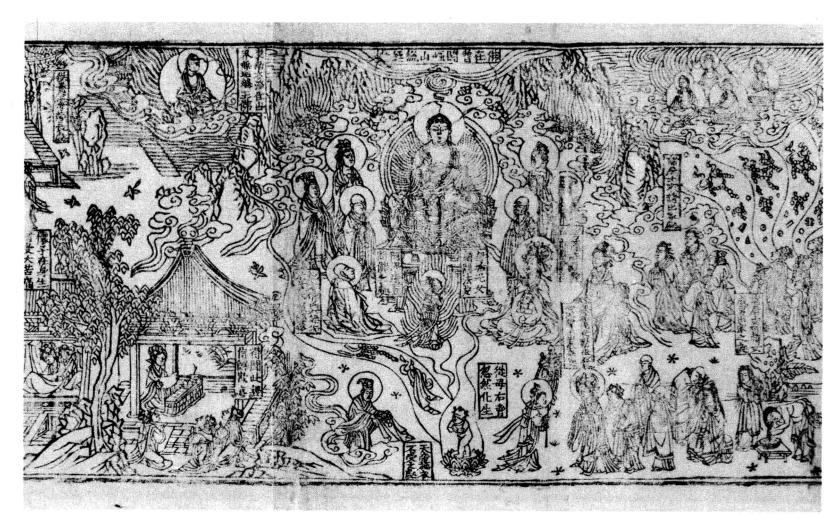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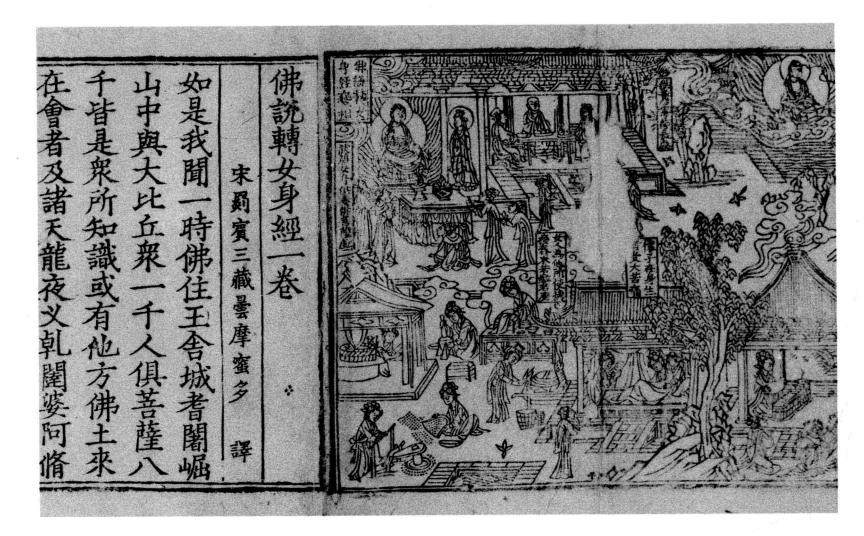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

千皆是我所知識或有心方佛土來一千人俱菩薩八在會者及諸天龍夜义則闥婆阿脩在會者及諸天龍夜义則闥婆阿脩與來在會个時世尊四衆園遠而為為一時中諸根具是不難始為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問介時尊者阿泥盧豆見是淨日,中華法教有所問介時尊者阿泥盧豆見是淨日,中華法教有所問介時尊者阿泥盧豆見是淨日,中華法教有所問介時尊者阿泥盧豆見是淨日,中華法教有所問介時。

亦時尊者阿泥盧豆見是事已白佛 言世尊是净日所懷之女諸根具足 時而不說之所以者何若有衆生不信 始來誠諦之言此人長夜受大苦烟 始來誠諦之言此人長夜受大苦烟 始來誠諦之言此人長夜受大苦烟 時見此女在母胎中諸根具足不信 時間用根無過失聲信者有衆生不信 時間可適耳根無過失聲信之時表 音清淨所謂易解聲質直聲清淨聲 音樂聲離諸煩亂如淨月聲美妙相 去貪欲瞋恚愚癡之聲令人此衆會 去貪欲瞋恚愚癡之聲令人心能 去貪欲瞋恚愚癡之聲令人心能 去貪欲瞋恚愚癡之聲令人心能 去貪欲瞋恚愚癡之聲令人心能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5)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7)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9)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1)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3)

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何等為四一者與心二者解心二者深心三者方便四者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與關於公三者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與關於公三者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與關於法學是一者與關於法學是一者與關於法學是一者與關於法學是一者與關於法學是一者與關於法學是一者與關於法學是一者與其是一對所持進必成其果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發動人一者發動,是是一個一者,不可以一一人。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5)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7)

縁起法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知 內無我二者知外無有衆生三者俱 知內外無有壽命四者畢竟清淨無 長二者觀無相不没三者不分別無 有四法一者不證滅智四者不證若智二者不 者不謂正法三者身在僧數終不退 者不謂正法三者身在僧數終不退 者不謂正法三者身在僧數終不退 等觀察生皆是福田三者佛及衆生 等觀衆生皆是福田三者佛及衆生 等觀衆生皆是福田三者佛及衆生 皆悉平等四者法及衆生心常平等二者 等觀衆生皆是福田三者佛及衆生 等觀衆生皆是福田三者佛及衆生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9)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1)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3)

The Male 3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5)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7)

男子何謂為四一不惠害三不順恨三 復次女人成就五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五一樂求善法三尊重正 場次女人成就五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五一樂求善法三尊重正 女身速成男子迴向菩提是名為五 人成就一次就音提與四於說法者敬 一方常念法欲轉法輪三常念佛願成佛身 表中之天一切藉煩惱垢六常念天欲為 一次,所得不壞信二 於法得不壞信三於僧得不壞信二 於法得不壞信三於僧得不壞信二 於法得不壞信三於僧得不壞信二 於法得不壞信三於僧得不壞信二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9)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1)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3)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5)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7)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9)

無有男女相 幻師以幻術 於四衢道中化作男女像 兵栗共闢戰 皆共相侵害地人效夢中 造作種種事 以其無真實 我全觀生死 如幻無有真實 體 但從顛倒生 譬如水中月一点,如人效夢中 造作種種事 以其無真實 治療 現有動搖相 或是是河池 赤如熱時錢 現有動搖相 或是是河池市修現前法 得難安人身 若有能知空 不應分別生 則於現法中 身證無星礙 是佛境界力 復從宿福生 中,有礼佛足語其本夫諸居士言善知 有礼佛足語其本夫諸居士言善知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1)

欲成男子身 當發菩提心所願便成就 京礼佛足語其本夫諸居士言善知 與心佛出世難不生諸難亦復甚 與心佛出世難不生諸難亦復甚 與心佛出世難不生諸難亦復甚 是語轉女身諸菩薩言汝曹皆是我 於佛前發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 自佛言世尊釋之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 之語轉女身諸菩薩言汝曹皆是我 於佛前發菩提心與未來一時 一時言世尊願為我等出家莫如善 是而得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人 是而得出家 白佛言世尊願為我等出家莫如善秦比丘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人來比丘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人。秦明世尊告新勒菩薩汝當為此諸善學之思事子如法出家弥勒菩薩白佛言一數三菩提心若母發心我為已報是會被其母所自言養婆當發阿耨多羅上,身心安樂恒於夢中見諸如來身心意歡喜頭達而為說法我於是時中人自念言令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學性我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喜頭躍一點發阿耨多羅三賴之心常歌喜頭躍一點發阿耨多羅三賴之心常歌喜頭躍一點發阿耨多羅三賴之心常歌喜頭躍一點發阿耨多羅三賴之子必是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3)

心自念言令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 整隆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敬樂 對我當隨汝語重更發心亦時無治 光女左手之中自然而出上妙寶蓋 少來當發大願為諸天世人作法寶 一之蓋亦時淨日夫人取其寶蓋奉上 少來發是願言以此善根令我將來 為諸天世人作法寶之蓋 身來生此間又舍利弗言此無垢光史 身來生此間又舍利弗言此無垢光史 一一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一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一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5)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7)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9)

難防觸境生迷一十種惡因易就同毒 樹而可伐類蚖蚰以寧親圊厠不堪猛 佛功德經云若能斷弃女人身者則為 一大國土有女人處則有地獄又稱揚諸 華明泥洹門故佛世尊說轉女身故律云十 華成男子如或不能讀誦但能志心歸 來生無量諸苦壞衆恶行問絕三 至若有讀誦此經聽聞受持默離女身 法成男子如或不能讀誦但能志心歸 來身決定無疑今後諸經謹録于後 不數願為先狀惡女身 心發願為先狀惡女身 心發願為先狀惡女身 心發願為先狀惡女身 心發願為先狀惡女身 人為女衆苦之所逼勿極生眼離願焓 人為母衆苦之所逼勿極生眼離願焓 人為母衆苦之所逼勿極生眼離願焓 人為母衆苦之所逼勿極生眼離願焓 人為母衆苦之所逼勿極生眼離願焓 人為母衆苦之所逼勿極生眼離願焓 人為母衆苦之所逼勿極生眼離願焓 人為母衆苦之所逼勿極生眼離願焓 人為母衆苦之所逼勿極生眼離願焓 人為母衆苦之所逼勿極生眼離願焓

南 南 信經 正女 覺像樂 光乃至之十 服 善我 佛 彼云 至云於生德 器 至女 若現狀經 不永 是身離云 所聞 取 紫 女轉願者 正課 咒 見佛 人战捨有 終我 得男女女 四日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51)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53)

潜不戲伽足包 善行义住云廊 一親女法薩 恶親相 耶捷王薩不復 坐年臆心厚等亦不 禪少乃念不共不應 王摩分於犀名近 希律近找 随子 在弟至佛獨語樂於 进 訶別法地普劇 相 於子為若入亦見女 **婆又如**施撲 臣親名所和 又 伽 人及那 世官 耶 **奥弥猫女家** 近普 修小不人若近他取 陁 趣 薩 而順薩 攝見親說有五家 觀而行演 殊 亦厚法因種 生 訶 諸 亦 心不说不緣不與欲 不 項男小規 諸訶 殊與餘齒獨之女 丘則畋現 近 心薩 同事笑入人劇 亦 不云相 丘說漁戲 及梵親何亦不詞 有 師不不時以女 師 常樂現但為原 前隨經是法捕又兇路志近名不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

(32-2)

深破亦大應若世法但無無空名好意 **蓬是著戒不臣入有拿相以名所如初坐年臆** 不名气屏相自親戲則入五比說 官行善 图 活近女以等欲 並 緣相性相 近在 上險親後 此隆 所好現 下近比說嬉妥魁不畏心滅 訶倒 而 有以若若諸如畋皆 說 不到 此無說姓是獵勿懷菩優 沈 二比法女之漁親希 蕯 逐旦小陁國 人推近至 生不隆 無不轉觀殊 利為 劇 準 礙 出 如 -勿戲蔵 介如無不虚切利 念戲親親殺親說 王是 時是障起空法是 佛笑近近 道近者者 等學 法

之過他說經又安其 人應文住心子正 斯 及住殊初安臣 中趣-短 行如於有 有我 後怯門 觀法滅不所 下近比說 弱 毌 陛 法殊化禅 有行一處不見 華師演定 末 **用** 题相 空動 經利暢起 時為有亦不 餘讀法 世但聽不嫌 法經中 是無如是 親名有 諸 **須生親** 尊以者生名 師 時 静並近堅弥非近所不 **欲大不怨瓷不不說** 經國 重乗遊嫌其說樂是 室戲戲因山生戲有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3)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5)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7)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9)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1)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3)

疑 此 問 阿巴五巨 當 而佛 逸告 得信此 說威 多弥 固 上是 汝 住勿 如大 自 不 可慰 回 量设中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5)

年 履云皆不久亦佛此出為不然佛作縣云中 始為何起除已來昔義 而恭世行尚從高 NT 不所十衆可設間佛未釋 定 道 等信 生 五 疑 信 心弦道久種偈 難無亦說百分道世華神佛近問怯如是歲別甚尊在通子伽 佛佛雖世心 來自滅 **业**線後知信得 心無道少白如成事地學數於十 薩 随 無量來而而少就所為甚子面壯甚 是悉宜久令世 子尊語通所刀向 思诵蓬 宜聞願或達說能阿方人 來近老皷人多議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7)

弥等 時法化今 勒當信當 信為信解 首解如解 受 力止當 諸經心說 而信佛合如來如其如 退誓信未 地産 三伽阿聽 為由百菩耶脩如知言願菩 於堕令從在 祇微他千提城羅來諸雀說薩大衆男 少悪開佛禪 塵阿萬宏不皆欲善願之大衆 時道解聞定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9)

一大人 中國 一大 中国 一大 中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1)

恐怖佛 此 而修 說功因苦大 独 生凡能鑿於命說時和阿是淨作樹 公众 難此直祇充不妨 和 新 佛皆聞諸泉暑生林火在出 逸在亦治断修智 野自生 見三罪見随所 者而為在令 實衆燒羅遊 言世子永所如無我 量身名生盡華樂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3)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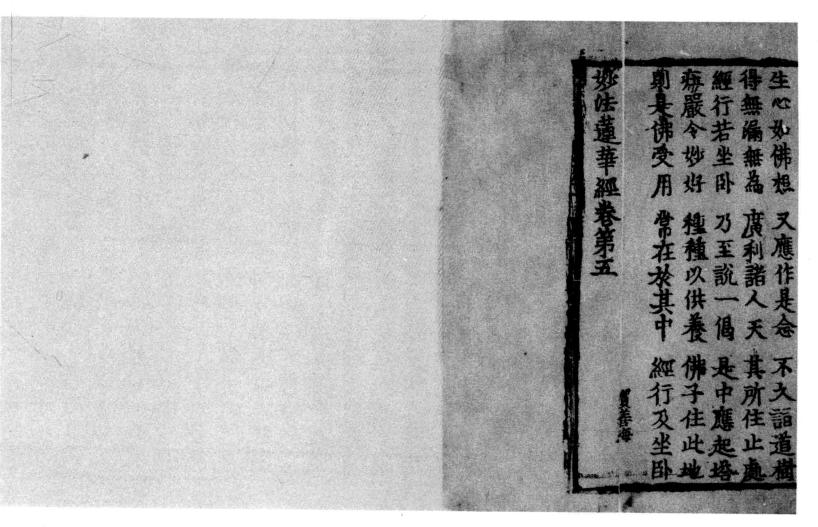
以住於如諸住求以如上及行若慮德 是於無是有於於迴是服緣五 因空量亦得調無向等 聞 緣閉億能法柔 故劇劫忍者地道 生坐心復於 分以毗羅 盡以珍布那說 及功耶櫃 十睡於念此心復事此園異施由偈者有 常無常所不行無 諸林之供他言 萬攝數堅輕傾及欽易莊飲養劫 有是乃 前 勘心劫固慍動厚漏數嚴食佛數 是功至功禪尸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7)

量心福 有切場 持何所逸解深所師度諸劫頃 子泉入行史於女 若汎得多佛心尊 自廣功若語者 在間 法 聞行 是净於法今受我福入我此諸此生坐心 之而道無日此說為悉說諸禪一 此 所世經壽如無 喜功 阿 起遠於多 如解此聞 亦 計地諸信 如 瓔特無言有摠 ·琉曆解 若上越疑持是出王來受薩梅 璃聞則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9)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31)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32)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封面)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4)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6)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8)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0)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2)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4)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6)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8)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0)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2)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4)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6)

華養人来中立此善言我捨兩經
 華養屋屋所及當者
 華經及一切不養之母者
 華經及一切不養之母者
 華經及一切不養之母者
 華經及一切不養之母者
 華經不少少人所養
 華經不少少人所養
 華經不少少人所養
 華經不少少人所養
 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華經不少人所養
 華華經歷
 華華經歷
 華華經歷
 華華經歷
 華華經濟學
 中華養養養
 <l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8)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30)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3)

王於随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5)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7)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9)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1)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2)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3)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4)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5)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7)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9)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0)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1)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3)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5)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7)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8)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

切 而 而 自 ジ 立 妙 莊 立 莊 提 銀 恒 好 地 嚴 恱 相 迦 廢 何 因 則 深 S 础 们 秵 自 此 区 因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5)

戒 ビ 煩 順 生 佛 坪. 是 不 N 他 腳 莊 田 雖 思 住 丑自 脸 边心

恒 阳 尊 煩 他 此 何 此 如執草 CO 願 田 同 連 同 明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7)

何 自 他 彼 國 如 册 自 從 此 名 有 住 此 何 切 天 所 毌 垂 此 服 自 求 火人 在 佛 此

王 日 月 明 即 光 除 亦 佛 此 時 明 住 即 正 進 J.E. 开 币 即 復 白 現 佛 詣 此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9)

削 **悠**諸 四者 欲利 堅 轉 益 心是名 匿 三者 四日 亦 心三者 今 即 當 四 切 何 一者常 便 訶 佛 29 四 脫 到 四 四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1)

緣 願 PE 者 者 他 是 復 他 三者身在僧 四 忍 命四 有 苦智 四 四 四者 者 者 法 者不 雖 四 四法 一者 者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3)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5)

佛 利 國 佢 和 佛 也 明 此 利 髥 切 和 何 何 想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7)

見差別 則 何 是 無 則 無 者 煩 舎 必 成 别 利 就 云 有 性 同 能 就 利 無 所 所

調 何 無 何 赵 道者是則名為畢 分 那 而 利 即 是 倒 雨 正 能 道 頗 是 正 何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9)

諸 是 有 異 漏 則 盡 阿 為 觀 何 而 何 耶 竟 所 是 解 言 解 知 說 得 則 利 脱 胱 脱 諸 汝 倒 解 脫 而 解 脱 舎利 **今所** 統等 切 其 問 相 耳 腁 脫 能 相 弗 正 觀 隨 故 脫

女言若有衆生先種善根 巴 諸 舎利弗言 間 求 女言我亦 是 有 女言尊者 得 漢舎利 耶女苔言有舍利 盡 所 出 阿 佛 漏 則] 度者 有 盡 智是故我言是阿羅漢諸 名 此 道 阿 為 女辯 頗 即 品品 遠 舎利弗今我 N 究竟 得 有 現 我 離 聲 因 說 以何 解 緣 切塵垢 是 間 失17 此 說 統
设
今
所
統
等 形 見而 弗 脫 身 佛 而 緣 是 諸菩薩 時 故 亦是 威神 而 應以 而作是 火人 作是言 rt 漢法是 緣 何 願 漏 為自 百 丘 覺 聲 樂、 緣 盡 比 聞 我 佛 唯 丘 阿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21)

耶 世尊 佛言是 解 U. 漏 離 發無 詵 聞 能 介 垢 此 法 無 修 佛威神 上菩提 時 破 垢 比 何 CV 辯 世尊 得 光 白佛 女 成 道 解 是 異論 男 欲 煩 胜 利益 心唯 炪 子 佛 女亦自 何 者 女 之 威 心放三 身 雜 成就 謂 願 神 rt 成就 速成男 則 為 世 丘 有 為 乗 尊 自 白 此 四 所 佛

何謂為三一身業清淨持身三戒 何 次女人成就四法得離 次女人成就二法能 幻惑所有善根願離 何 悉以迴向 淨難四過三意業清淨 成男子迴向菩提是名 為四 四住 忍辱力是名為 有 一不患害二 善所生善 瞋 速成 迴 四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23)

女身速成男子迴 師 子何 次女人成就五法得離女身 子 以正法而自娛樂四於說法 何 煩 何 五如說修行以此善根 個 四住忍辱力是名 五 欲 於佛 向菩提是名為五 患害二 得雜 念佛 離 願成 瞋 為 信 恨 施 四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25)

此 女身 於師 使 業所 犀 不 得 此 如 須 猶 自在 所 生 虵 亦 由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27)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29)

我於此不轉女身成男子者終不起也又諸居士於當放此諸婦生母 有於佛法中出家修道諸居士曰如尊者 若於佛法中出家修道諸居士曰如尊者 索時諸居士於佛法中令得出家先當度我等是諸居士於佛正法欲得出家先當度我等 大成就威儀亦時諸居士於我法中隨意出 成就威儀亦時諸居士於我法中隨意出 房子佛神力故即昇虚空高七多麗佛之威神 自善根力正觀思惟得離太身變成 相異口同音而說偈言 於第一義中 超法悉如知 但從分別生 於第一義中 超法悉如知 但從分別生 於第一義中 超法悉如知 但從分別生 於第一義中 超法悉如知 但從分別生 於第一義中 一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1)

身證無墨礙 是佛境界力 復從宿福生亦修現前法 得離女人身 若有諸女人亦修現前法 得離女人身 若有諸女人亦修現前法 得離女人身 若有諸女人亦修現前法 傳華女身出家菩薩之心,於佛前發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提心,其一時言此尊為諸亲生發阿耨多羅三義三菩提心與為此事者。 一時言此尊稱為我等出家草母是我 一方佛言此尊稱為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 一方佛言此尊稱為諸衆生發阿耨多羅三義三菩 一方佛言此尊稱為諸衆生發阿耨多羅三義 一方佛言此尊稱為諸衆生發阿耨多羅三義 一方佛言此尊稱為我等出家草母是我 一方佛言此尊稱為我等出家草母是我 一方佛言此尊稱為我等出家草母是我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3)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5)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7)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9)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41)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43)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44)

於佛前 提心佛出 佛悉如山草釋迦牟 **新三菩提心此亦** 新 佛 比丘 间 程 三佛 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 發菩提 多羅三賴三菩 心為諸衆生發 尊 陁 出 難 願為 諸菩隆言汝曹皆是 時 心願 不生諸 阿 復難 我等出家莫如 轉女身諸菩薩 耨多羅三顏三 尼如來阿 今佛 阿耨多 居士言善 世得 介能 知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1)

怪心破戒 汝於十月在我 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 身心安樂恒於夢中見諸如來 見貪欲瞋恚愚癡之心常歌喜 佛 比丘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 婆之恩母言我 然世尊當為出家个時無 男子如法出家弥勒菩薩白佛言 而得出家 言出尊 母所白言養婆當發阿 前後圍遊而為說法我於 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 佛 心瞋 心若母發 願 **志懈怠亂念思慧** 中從是 心所 心我為 垢 耨 光

心自念言令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 菩薩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樂 那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令 為諸宗世母為 於安左手之中自然而出上妙寶蓋 之蓋介時淨日夫人取其寶蓋奉上 如來當發大願為諸天世人作法寶 之蓋介時淨日夫人取其寶蓋奉上 少來者發是願言以此等根令我將來 身來生此間又舍利弗言此無垢光 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治此 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治此女本是 一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中, 一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3)

安女身非因行業又含利弗汝見是中言已見佛告舍利弗皆是此女前一世父母舍利弗無完者不舍利弗皆是此女前一時事多羅三新三菩提而不退轉者其數易知此無垢光女長夜發顛之,種震動進行善法於阿耨多羅三新三菩提而不退轉者其數事所有星宿心成就相好莊嚴男子發此言若實令我女身而成就相好莊嚴男子發此言若實令我女身而病就相好莊嚴男子之身亦時妻難知亦時人。

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 至如此甚為希有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 者舍利弗誠如所言諸菩薩摩訶薩 大養莊嚴欲利益成就一切衆生甚 五時會中萬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恒出佛法功德之香說是強 是聞其法者深心信樂得大威勢產 完此無垢光菩薩說真淨法若有藥 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 經廣說女人之身種種過患亦廣解 經廣說女人之身種種過患亦廣解 經濟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 經濟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 經濟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5)

經廣說女人之身種種過患亦廣語。

經廣說女人之身種種過患亦廣語。

清誦通利為他解說廣令流布所以

持善根求離女身阿難言汝當受持此經

是斯則疾矣阿難自佛言此經名轉去

及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

及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

及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

及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

以對妻者有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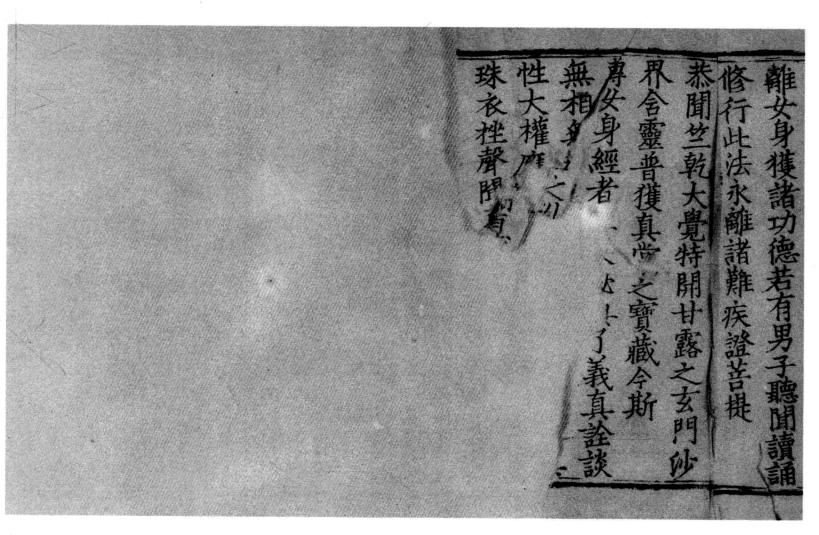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7)

離女身 依三寶或稱佛名号或念六字神 依法 南 南 速 成男子如或 師依僧護巴夫主不如此婦女身得丈夫根何等以大威德拖羅尼經云婦人 量壽經 受持於後不復更受女身,樂師瑠璃光上佛本願功極生點,為女衆苦之所逼切極生點為女衆若去并 洹 南无歸依僧 取正覺家 樂發 養 照 、悪女身 提得心 誦但能志 其捐 若現默經是身離云 種 法 **女轉願若** 壽聞 兜必 心歸 人成捨有 得男女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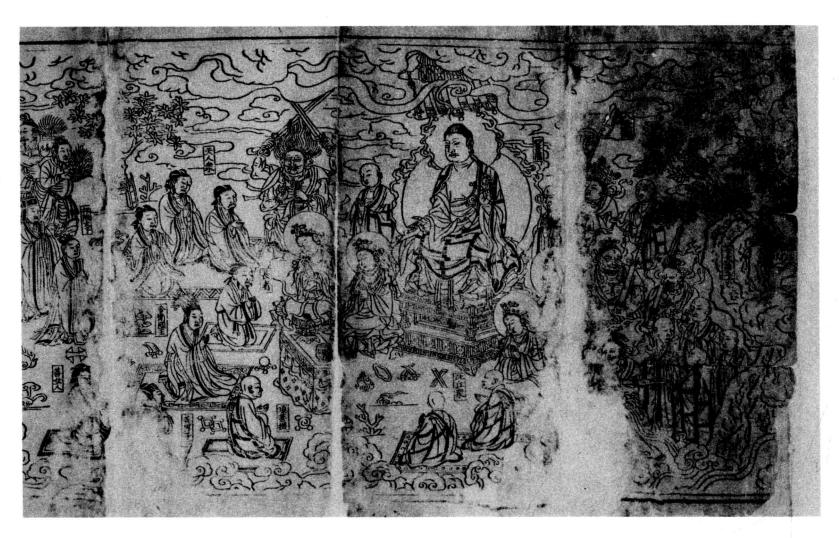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9)

說已 有造佛形像五者供佛菩薩師 母者此經 四造佛形像者大乗 寶二者稱念佛名三 不復受女人之身五供佛 告弥勒菩隆言若有 多依諸聖教略陳 悉咒減輔說不成男子者我擔不大悲抱持經云若有女人歌女求 更已者金 命明 正女 復特勝 覺像 得王 見經 被云 新 佛若 福田及師 來有 誦 功 取正元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11)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12)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3)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4)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5)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6)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7)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之數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9)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0)

相何以生 何我故得 受 以相此聞 希有功德世等是實相者即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 故即人 離是無 提 經 相 信解 我 世 相相 佛 是 相相相 經 聞 四如是之經 如是 衆衆是 即 即後 佛 址 者者 知是 相相 須即所希 祖人復有 善是以有有典提非者何衆信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無須提波知是

非

第

是名

甚為

何得

經

幾不

有

須

波如

我菩思羅是

無如波

我

無為來雅

非忍

唇波

超我所以不知道。

相昔

無壽

者

相體

何我

(22-11)

等争节他中国广复以直 以初 目 以 恒 河

壽者相方

應

生真

良真些是又会過

往

昔

節

節

解時

若有

我

相

人

-相

生

阿相作 忍者 無以邊佛 須菩提 則 相 序 羅者 日 味觸法 仙應 新 人生 明 一藐三菩提 來即 於順 菩薩心住 故介 益 須所須 提菩世菩 提 語相 如來 生 此經 無不善我又有 須 法 住法 所 無過相 住 應 色生 提而 行法 離 相於相 行 布此 心有不 切無 相 衆百生 如無 非 生世相 世如

無

我

相

無

相

生

相

者

相

何

汉

故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3)

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力是沒菩提所言一切法有法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領菩提所言一切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一切法有其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於來世當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與著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於是中無實無虚是故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法與著提所言一切法者即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領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於是中無實無虚是故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言一切法有其是故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言一切法有其是故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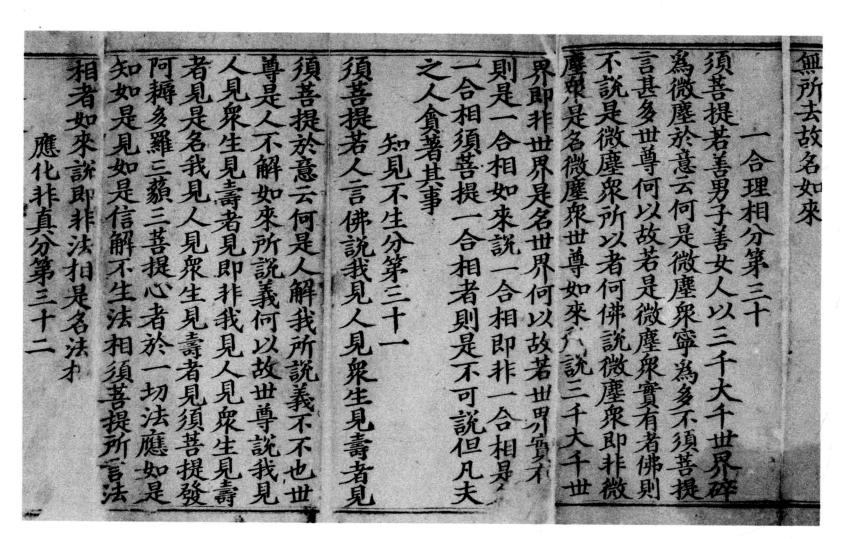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5)

(2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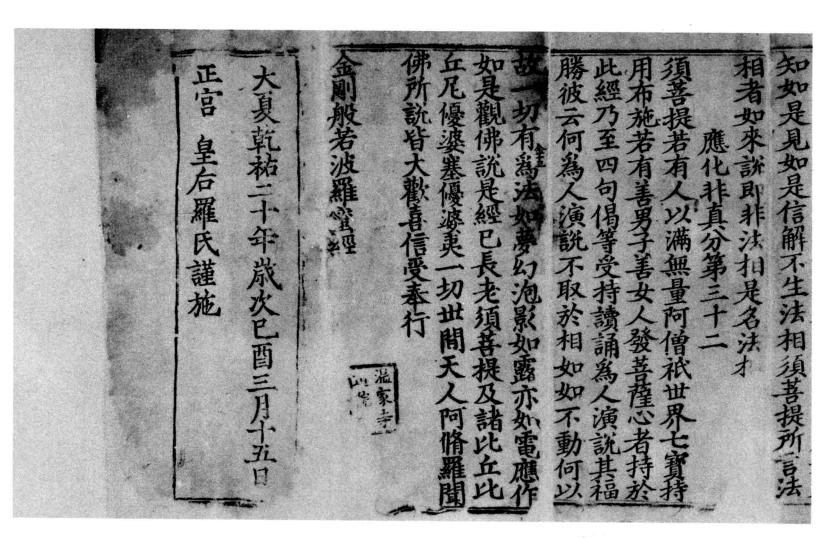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7)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9)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0)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1)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2)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

說在量心乱 如未诚安我佛雷乃十 法知至 可二自得我道 是來度如心所作 心場齊 心聞永天非介拔我隨以 邪卒且是 實心說者 自星邪 义滅 說日 法 日衆 周 至悉諸漏 諸說過巧魔 如 志思 是世 家便法世說佛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3)

義住佛佛日提二前利直修應薩力邊國其彼東繩 利而出滅陁華記小時弗無佛佛非無不中劫佛華以天 多大等無弗說亦度其足告劫其華偽慧所初能為實功量來偈三之佛安諸授國光志具淨發知 可以名 後國行比堅人佛 二正土多丘滿 廸 直界於養佛 但植 1名無無普 出如伽滿阿小小是 切佛 除 三如王滿法所 至净無足 **自無量吾日** 棚 6. 瑕劫隆 國 計織已行光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5)

正正 殿龍時應兩人 羅夜四月足普 城住 聖供 王脱三仙义部放 民 身 虚虚摩 法於空空訶 輸波中中 暑無者 腾光法十命光 一而 自 羅天衣記 舍膌 所十小小住世大具善士 華子以心利 韶初俱迴 等亦供 弗 重今天效於妙釋 此復而百所天桓無阿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7)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 - 9)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1)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3)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5)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7)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9)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1)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3)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5)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7)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9)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30)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

事要偏 歷次导孤 1	接入会衛大城七食於其城中次第七十五十八月八月十八年十二百五十八月八月世尊食時著 大此立界十二百五十八月八月世尊食時著 一天,在大城七食於其城中次第七日 一天,在大城七食於其城中次第七日 一大战五界十二百五十八月八月世尊食時著 一大战五界十二百五十八月八月世尊食時著 一大战五十二百五十八月八月世尊食時著 一大战五十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	看首三界尊 歸命十方佛 我今發弘願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本請金剛愛菩薩 本請金剛愛菩薩 本請金剛愛菩薩 本請金剛愛菩薩 本請金剛愛菩薩 本請金剛愛菩薩 本請金剛愛菩薩 本請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縁 発頭文
------------	---	---	---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3)

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如理實見分第五 方虚空可思量不 薩無住 非身相 施其福 上下虚空可思量不 提白 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 佛言世尊頗 佛 小河思量如 於相 世尊須菩 須 不 世等 一佛三四五年一次就如来流 根 提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4)

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 若取非法 即著 諸衆生若心取相 德何 者相 是諸知

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 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 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 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 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顏三菩提亦 為法而有差别 有所說法耶須菩提 法出生分第八 言如我解佛 無

耶如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7.

於意云何

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

(21-5)

洹 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看味觸法是名須 **冱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 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 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 善提言不也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院含能作是念我得 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院含須菩提 德多須菩提 切諸佛及諸佛 於意云何須陀洹能 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 依法出生分第八 出須菩 相無相分第九 世尊何公 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 言不也世尊 是投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 阿羅漢道不須菩提 那含須菩提於意云 以故阿那含名為不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為多不須 阿羅 何以故斯 何 以故須菩 何 提法 如来 洹名 須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7)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8)

子相以善即三 善即 F = 业 信心清淨 河 非 得開 业 詵 界是名世 則 如是 如是之 所 相 以 一貫相當 後 經世 聞 何 百歳 即是 如 法 須菩品 般 相是 可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9)

阿相 者相 提 相 無如波 節支 和世 刼 如來說 相 相 相 世 何 利王 無 心提 即 生應 實相者即是非相是 後 P 忍辱波羅 相 住心若 色 相 相所 即是非所以者 心切 何 施 五 如 百 有 以 於 何

要言之是經有 善男子 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恒 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即非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如 公好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 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 十五 河沙 於法 無所住心若心 不 可 行 色 施如人 即施 逆 不非 非如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1)

他如來為發大乗者說為發最上乗者就若有人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有此經一切世 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 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 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 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 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 是人時時,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此處則為是塔 能淨葉障分第十六 作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有此經一切世 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此處則為是塔 能淨葉障分第十六 作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有此經一切世 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有人於後末世 不能及領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 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其說者或有 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其就者或有 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其就者或有 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其就者或有 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其說者或有 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其說者或有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3)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獨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為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養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養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我們有沒菩提為意云何如來,我們有沒菩提為,其是此事如來,就是此事如來,就是此事如來,就是此事如來,就是此事如來,就是此是我們有沒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就是此人以是內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就得 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就得 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就得 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就得 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就得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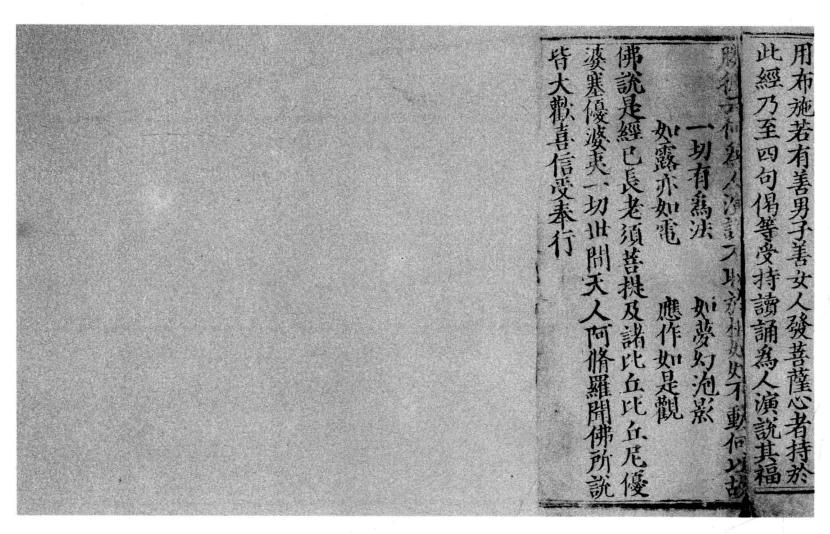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6)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7)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8)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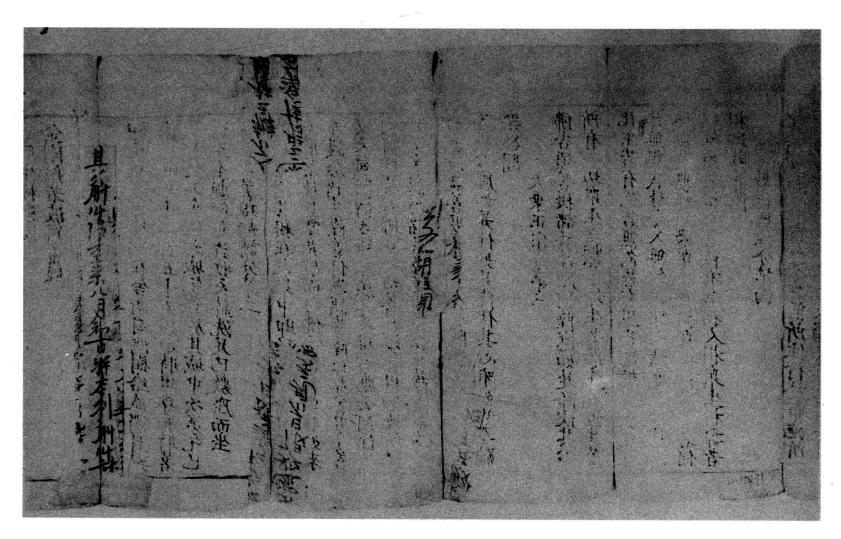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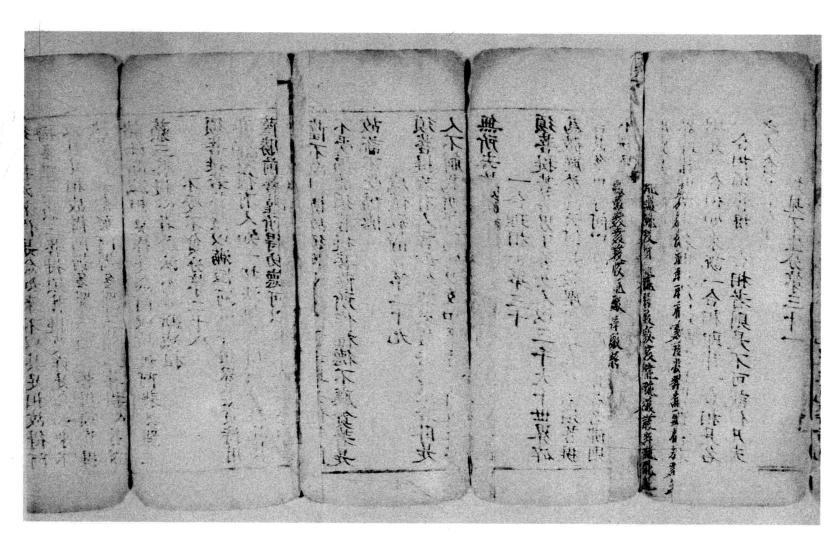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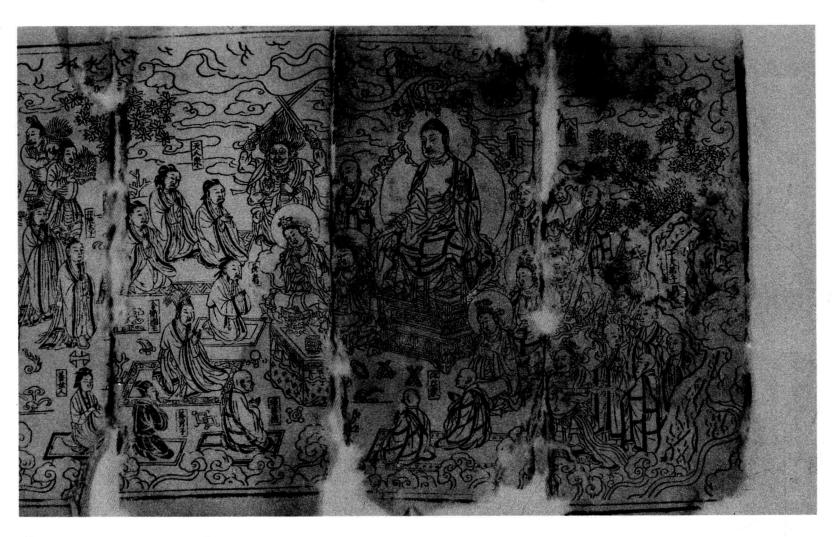
俄 TK16V 雜寫 (3-1)



俄 TK16V 雜寫 (3-2)



俄 TK16V 雜寫 (3-3)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

幸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白海水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白海水金剛 奉請常野金剛 奉請白海水金剛 奉請常野金剛 奉請白海水金剛 香請金剛養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 發願文 養育三界轉 歸命十方佛 我令發弘願 老問光遊興經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菩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相上金剛經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菩 老剛般若波羅蜜經 が素三歳法師鳩摩羅什 譯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一班三塗苦 一班三塗苦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3)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5)

提取如来有所說法耶鎮菩提言如我解佛所 有定法如来可說何以故如来所說法皆不可 有定法如来可說何以故如来所說法皆不可 沒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二十大千世界士寶以 有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二十大千世界士寶以 有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二十大千世界士寶以 有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二十大千世界士寶以 有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二十大千世界士寶以 有著提於意云何有於此經中受持乃 有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專何以故須陀洹名 是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 有是不可謂菩提言不也世專何以故須陀洹名 是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 有是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專何以故須陀洹名 是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 有是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專何以故須陀洹名 是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 有是不可謂常法者即非佛法 是是一切故須菩提言不也世專何以故須陀洹名 是一切故須菩提言不也世專何以故斯陀含 是一切故須菩提言不也世專何以故斯陀含 是一切故須菩提言不也世專何以故斯陀含 是一切故須菩提言不也世專何以故斯陀含 是一切故,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7)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8)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9)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0)

則 無所見若 住如 心提 色不 無 河 所應 沙初 經須住 等日 住 百希以 心不相衆 百 禺後河 如無 住應發生世 E 7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1)

亦 不 可持人 説 以供 知若 而此 上 散趣此 稱解 阿 悉 是切 善連萬 祇 塔世 世經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3)

明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來有人與不有內服須菩提若菩薩何以故如來就在嚴佛上者即非莊嚴是世事如來有內服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大服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大服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大服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大服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服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於意云何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為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5)

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讓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自佛言世尊頗有是名說法介時慧命須菩提自佛言世尊頗有異生於不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的佛言,其一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之有。 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來說非眾生是名聚生 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菩提 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菩提 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菩提 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來 一方言善法者如來說非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條 一方言善法者如來說非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等一十二 一個智無比分第二十二 一個智無此分第二十二 一個智無此分第二十二 一個智無此分第二十二 一個智無此分第二十二 一個智無此分第二十二 一個智無此分第二十二 一個智無此分第二十二 一個智無此分第二十二 一個智無此分第二十二 一個智無此分第二十二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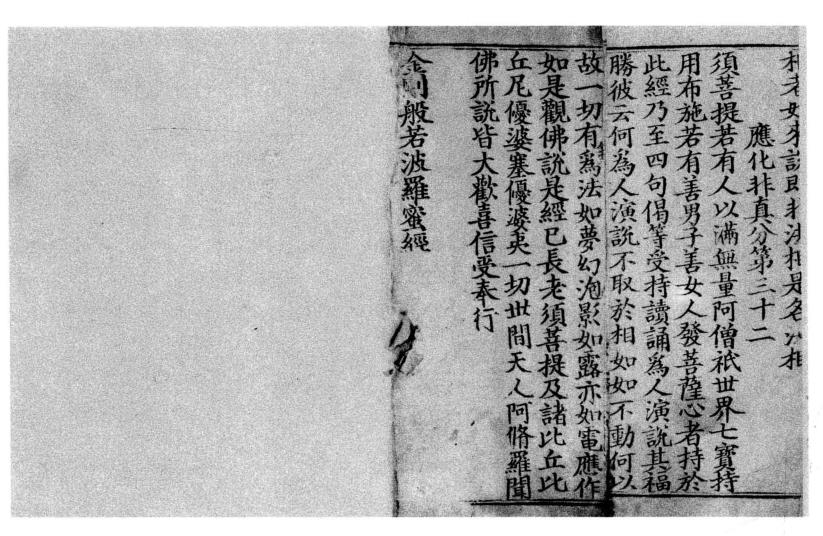
(21-17)

(2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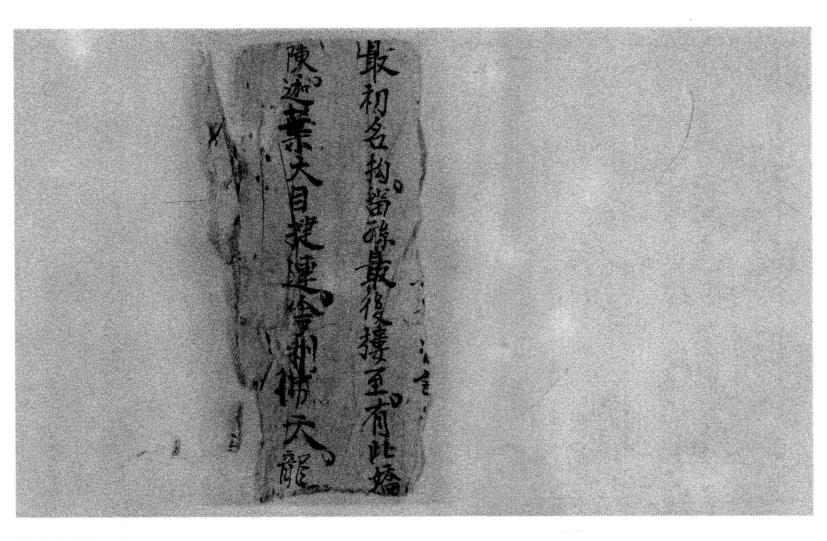
如是等七戰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 如是等七戰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 與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 要來生為菩提之所化分第二十五 是來生為菩提之所化分第二十五 是來生為菩提之所化分第二十五 是來生為菩提之一十一相觀如來作是念我當 其妻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 其妻提內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 無對無滅分第二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 無對無滅分第二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 無對無滅分第二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 無對無滅分第二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 無對無滅分第二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 無對無滅分第二十七 無對無滅分第二十七 與是相故得阿爾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 其是相故得阿爾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 其是相故得阿爾多羅三茲 其是相故得阿爾多羅三菩提須菩提 其是相故得阿爾多羅三菩提須菩提 領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其作是念好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為著養若菩達所有為養養者養養者養養,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為其是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菩提若善是為一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若是我是不受福德須菩提菩達所作福德不應為書是以諸菩達所作福德不應為書人以故為菩提其菩提其著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在為一个一个理相分第二十九一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若是微塵來實有者佛則為一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若是微塵來實有者佛則不是一人等可求放為其是相故得阿以故若是微塵來實有者佛則不是一人等可求放為其足相故得阿其為人。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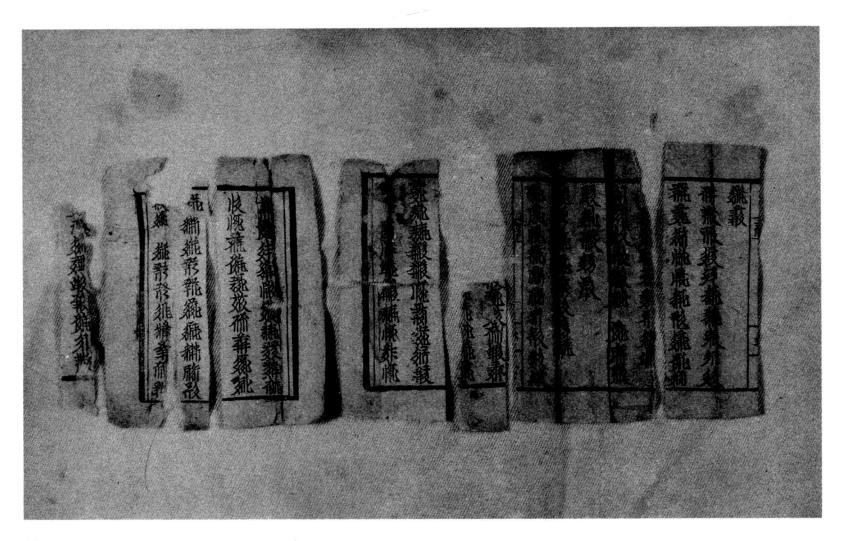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0)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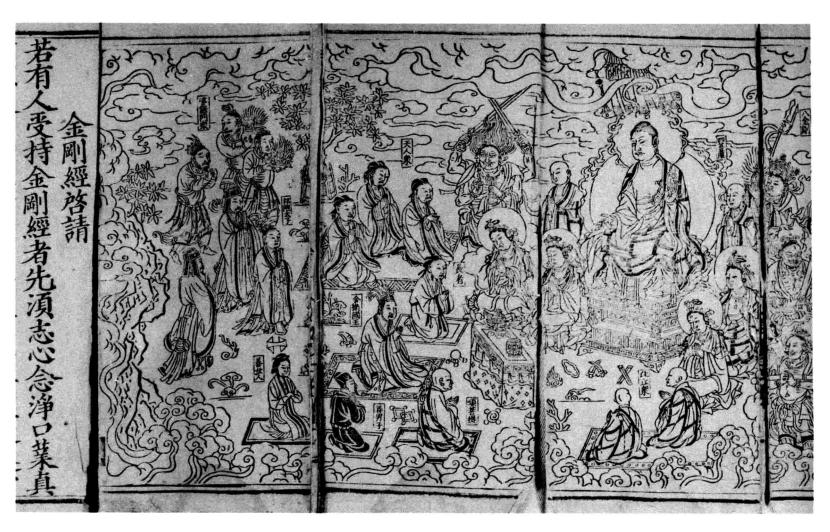
俄 TK17P1 佛經



俄 TK17P2 佛經發願文 (西夏文)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2)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者隨水金剛奉請者所對金剛	帝 就說義 三婆縛 機日雅 安主地真言 安主地真言 安主地真言	修乳 修乳 摩訶修乳 修修乳 產婆訶答辨 修乳 摩可葉真言然後啓請八金剛四菩薩名号所在之處常當辨護 净口菜真言
奉請金剛語菩薩	奉請白净水金剛奉請白净水金剛	養真智 度會地尾	修修判 <u>產婆</u> 河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3)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4)

等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宗者有世尊如来 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屬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 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 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 中一切來生之類若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 大東正宗分等三 大東正宗分等四 大東正宗分等四 大東正宗分等四 大東正宗分等四 大東上看越若那是路伏其心 大東上看越 大東上面。 大東上看越 大東上看越 大東上看越 大東上看越 大東上面。 大東西。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5)

少一里主分第四 與一里主分第四 與一里主分第四 與一里主分第四 與一里主分第四 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善提南西北方 建無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善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在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在 與菩提自佛言世事頗有來往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在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南西北方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南西北方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南西北方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南西北方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南西北方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內來所說身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所說身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所說身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所說身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所說身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所說身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6)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7)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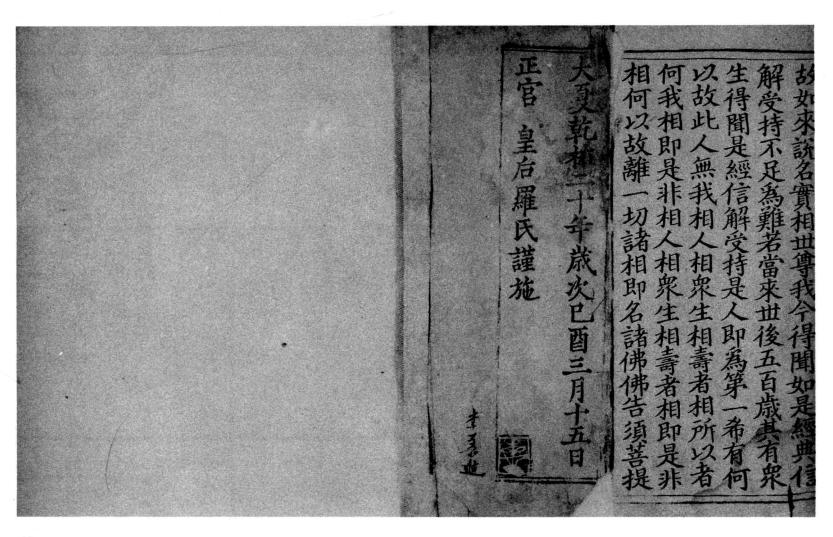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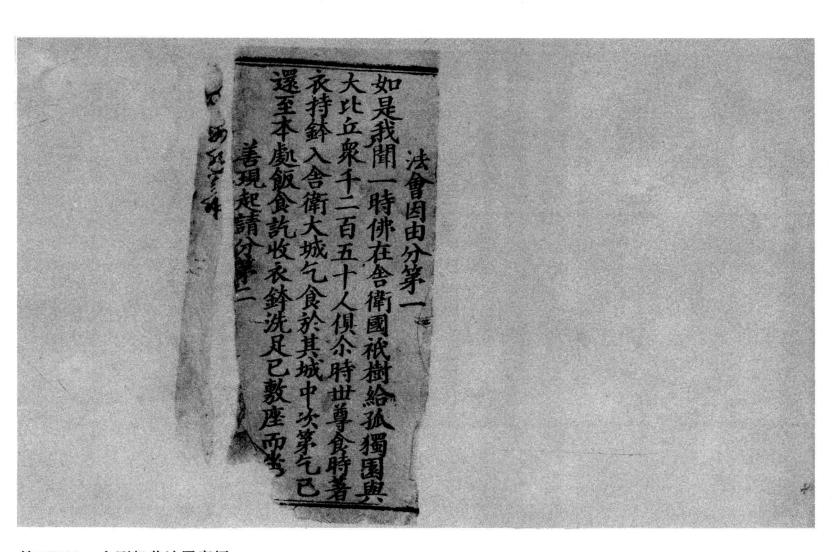
(12-9)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0)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1)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2)



俄 TK2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俄藏黑水城文献 1 汉文部分

作者=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

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页数 = 354

SS号=13484807

出版日期 = 1996.12

出版社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号=7-5325-2036-6

中图法分类号 = K 2 0 6

主题词 = 中国 - 古代 - 史料

参考文献格式 =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 1 汉文部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96.12.

内容提要 = 俄藏黑水城文献有八千多个编号,系中国中古宋、夏、金、元时期的写本和刻本,其中绝大部分为西夏文文献,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文及少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献,距今七百至九百年历史,均属珍本、善本或孤本。